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总卷

贵
阳
史
话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阳史话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 12.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8596-9
I . K297.3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RT2046 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总卷

贵阳史话

GUIYANG SHIHUA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王潇潇
装帧设计 陈 电
责任印制 黄红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9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1-18596-9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胡忠雄 王 宏

成 员 戴建伟 邓 谦 汪延皓 刘丽先 李 波
宋庆松 何谋军 胡 琳 杨 菲 沈 兵
何 丹

总 审 订 史继忠 郑荣晴 文思宛 杨 青 彭文俊

办公室主任 邓 谦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 问 陈祖武 顾 久

主 任 史继忠 郑荣晴

《贵阳史话》编委会

主 任 刘本立 黄成虹
副 主 任 刘丽先 邓 谦 段 洪
成 员 曾 军 李冬生 文 军 程 瑶 曾一崧
李正常 韦俊帆 周恒屹
指导专家 顾 久 史继忠 熊宗仁 郑荣晴 杨 青
文思宛 彭文俊

《贵阳史话》编辑部

主 编 史继忠 刘丽先
执行主编 郑荣晴 邓 谦 段 洪
副 主 编 曾 军 曾一崧
撰 稿 史继忠 朱 江 段 洪 曾 军 梁 瑞
孟凡松 包志怀 田 理 曾一崧
编 辑 李冬生 文 军 韦俊帆
编 务 秦安阳 李炳芳 赵 蕊 夏 丽 刘 丹
钟 涛 龙 丹 安 妮 方俊杰 张 茜
图片提供 濮振远 陈季贵 唐成权 徐海燕



总序

胡忠雄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而镶嵌在云贵高原的明珠——贵阳，更是被一代代文人迁客所推崇和追捧。五百年前，一代圣贤王阳明初到筑城，便对贵阳山水发出“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的赞叹，后来龙场悟道又对贵阳气候给予“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盛赞。山水之城与避暑天堂完美邂逅，让人在如春凉夏的惬意中尽享如诗时光，爽爽贵阳就这样在夏日的徐徐清风中向我们走来……

徜徉于这座有着山水禀赋和文脉传承的城市，攀黔灵山，感叹“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的天地造化；游南明河，体悟“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的天人和谐；登甲秀楼，领略“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城市韵律；访文昌阁，见证“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的城市文脉，一山一水尽显气韵，一楼一阁各展风流。

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硃坐万竹中，凉风生静衣”，是黔中贤士竹林畅游对清风送爽的感慨；“虹霓蒸海气，烟雾洒春岚”，是明朝文人送友赴任对宜人生态的赞誉。大自然对贵阳格外偏爱、不吝馈赠。北纬 26 度、平均海拔 1100 米，最佳的纬度与高度在这里相拥，造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风景

和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夏季平均气温 22.3℃、相对湿度 76% 至 79%，最佳的温度与湿度在这里相遇，让人体机能良性运转、肌体活力充分焕发；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 1 万多个、平均风速每秒 3 米以下，最佳的浓度与风度在这里相逢，让人沉浸氧海、吸氧畅游。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这方独一无二的康养胜地，成就了贵阳蜚声中外的避暑美誉。

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四万年前，贵州先民在高峰镇招果洞建造了“洞穴家园”，创造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两千年前，秦通楚道，汉置牂牁，神秘的夜郎古国融入了汉帝国，成为汉文化天空中一颗灿烂星辰。一千二百年前，自唐代开始，开阳兴起丹砂开采，逐渐成为我国丹砂采冶的重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中国红”。一千年前，从宋代以后，青岩古道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形成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无数传奇故事、历史沉浮都在马帮的声声驮铃中回响不息。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远赴南京觐见朱元璋，化解了西南边陲战乱危机，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千古佳话。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无数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以身证道、改天换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一处处红色地标熠熠生辉，留给贵阳人民厚重的红色基因。六十年前，“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的“三线”建设者，以青春抒写家国情怀，铸就了砥砺初心、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古往今来，渊深厚重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贵阳儿女、浸润着黔中大地，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

看扶风山泉清树古，茂林掩名祠，奇山藏书院，体悟“雨滋苔藓侵阶绿，露洗松阴满院清”的幽静雅致。看天河潭飞瀑流湍，水自天上泻，雾从云中生，沉浸“空山闻水声，碧潭衍飞瀑”的壮阔景致。看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立黔南首关，俯重峦叠嶂，饱览“一山高耸翠微巅，突兀穿云欲到天”的钟灵毓秀。看十里河滩水明如镜，流潺潺岁月，忧芸芸苍生，尽享“真山真水到处是，几步花圃几农田”的田园风情。看红枫湖一碧万顷，织河道沟汊，集旧沙湾洲，欣赏“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看高坡云顶碧草连天，草长莺飞绿，奔马驰浩瀚，沉醉“倚空千嶂横起，银阙正当中”的静谧灵动。还有弦歌不辍的孔学堂，碧水苍山的鸭池河，童趣盎然的云漫湖，浪漫温情的花溪公园，古朴幽深的青岩古镇，绚丽绽放的万亩樱花，玉水金盆的底窝八寨，烟雾缭绕的南江大峡谷……延绵百里的环城林带，穿城而过的南明河水，星罗棋布的绿地公园，缓缓铺展出“十里山水半入城”的美丽画卷。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居于闹市高楼也能品山水之味，游走林间田舍也能赏城市之美，寄身市井巷陌也能享湖草之乐。崇尚天人合一的贵阳人，早已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浸透血脉、融入灵魂。

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辣，构成了贵阳美食的底色。糟辣椒、糊辣椒、油辣椒、烧辣椒、糍粑辣椒，辣得酣畅，软糯香滑的辣子鸡、麻辣松脆的香酥鸭、行销全球的“老干妈”，成为无数游子的“乡愁”寄托。酸，勾勒了贵阳美食的特色。酸可与一切相溶，红酸、白酸、鱼酱酸、晒醋酸、杨梅酸，酸得过瘾；酸可与一切相遇，鲜鱼、牛肉、猪蹄、肥肠，热气腾腾的酸汤火锅，既开了胃又暖了心。奇，增添了贵阳美食的亮色。贵阳有数百种小吃，肠旺面筋道弹牙、牛肉粉汤鲜味美、糯米饭咸甜相宜，在每个早晨唤醒沉睡的味蕾；清新的丝娃娃肚容万物、热辣的豆腐果外焦里嫩，在每个小摊等待逐味的老饕；滚烫的糕粑稀饭甜糯香浓、冰凉的玫瑰冰粉沁人

心脾，在每个街角惊艳疲惫的心灵；爽脆的折耳根其貌不扬，却能在每碗蘸水中释放奇特的口味。鲜，体现了贵阳美食的绿色。最优良的环境、最洁净的土壤，造就了绿色生态的山野之味，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等“黔菇”，雷竹笋、方竹笋、楠竹笋等“黔笋”，香椿、阳荷、蕨菜等“黔芽”，与甘甜井泉不期而遇，完美诠释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辣、酸、奇、鲜，在此起彼伏的吆喝、摩肩接踵的喧嚣、流光溢彩的夜市中，绽放出“千家万户店铺开”的市井烟火。

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这里有贵酒黔茶。“贵山贵水迎贵客，好山好水出好酒。”酱香白酒醇香浓厚、手工米酒清香甘甜、生态果酒蜜香飘逸，“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贵酒已凝成时光的幽雅细腻，汇成岁月的回味悠长。“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黔茶“其味极佳”，滋味香浓的都匀毛尖、不疾不缓的湄潭翠芽、汤色红艳的普安红茶，在沸水升腾中奏响自然的韵律、释放大地的芬芳。这里有贵银苗绣。“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千年非遗历久弥新，“纹、珠、饰”美轮美奂，“绣、画、染”出神入化，千锤百炼的银饰，巧夺天工传“绝活”，银丝万缕间闪耀民族艺术之光；大美无言的苗绣，绣出时尚新“国潮”，飞针走线中编织民族无字华章。这里有黔药贵果。“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苗岭山脉间，孕育着一座“天然药物宝库”，56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5种黔产道地药材遍布黔中大地，成就了以杜仲、灵芝、天麻为代表的“贵州三宝”黔草名片。“奇山秀水出珍果”，猕猴桃、刺梨果、蜂糖李、红樱桃、火龙果……这些蕴山水之灵秀、领自然之神韵的绿色食品，是“舌尖上的贵州制造”，也是献给世界的健康礼包。

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纵情山水之间，没有案牍劳形、车喧马嚣，只有逍遥自得、从容悠然。这里，让莘莘学子神往，革命圣迹、儒学基

地、地质公园，是感悟精神、研学心修、探索奥秘的宝地，可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这里，让年轻一代心动，奇峰峭壁、清溪飞瀑、深涧幽洞，是攀岩探险、漂流露营、山地运动的天堂，可在“忽魂悸以魄动”中饱览鬼斧神工。这里，让不惑一族躺平，民族风情、古镇文脉、乡村民宿，是都市休闲、农耕体验、亲子游玩的乐土，可让“久在樊笼里”的身心“悠然见南山”。这里，让银发老人忘忧，天然药谷、生态氧吧、矿物温泉，是理疗康养、候鸟旅养、修身颐养的福地，可在“游目骋怀青山间，物我两忘绿水中”享受最美夕阳红。每一位旅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埋心底的诗和远方。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让我们通过《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穿越重重关山，冲破氤氲云雾，相遇“爽爽贵阳”，共赴心灵之约、共鉴山水之美、共品人间之味、共享“六爽”之魅！

序

顾 久

我算得老贵阳人。但常追问，我的贵阳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早先的故乡于我，只意味着生活场景及其中片段的所见所感。幼年家在法院街，印象中，那是一条石板铺就的小街。不宽，冬日结冰，人滑倒前会下意识急伸双臂，熟人就打趣：“哟，你要排（念第三声，意思是‘丈量’）这条街有好宽？”不长，从这头街口的“水站”（一条街只有一个公用水龙头，街坊们常常挑着水桶边排队边聊天）挑到另一头，最多只换一次肩。街上大户人家的大门叫“朝门”，其外有齐腰的“腰门”，用来内拦婴儿、外挡鸡犬（早先或许还有马匹）的。朝门进去每每套着好几层院子（“院坝”）。每个院坝都铺着白色的石板，其中有石桌、石凳、石花台，有的还有石鱼缸。满街清一色木板房，用前端带叉的小方棍撑在各色窗棂上采光。白天，哪家炒什么菜人人皆知，几个院坝的孩子可以端着饭碗到处串；晚上，窗纸映着夹竹桃的影子，投来不知何处正在演奏的胡琴声、儿歌声和叫卖声……后来读书，先是都司路小学——人们已不明白“都司”为何物，后改叫“都市路小学”。旁边有城南的天主堂“南堂”，辉煌早已剥落，而我们的教室就曾是教堂布道处。后来进南明河畔的贵阳一中，那是父亲、我和女儿共同的母校，不过当时叫“私立南明中学”。当时的贵阳，是指以法院街为圆心，以南明河畔的小学、中学为半径的世界，偶然到父亲工作的贵阳师院，到朝阳桥前的火车站，已属于很远的

北端与南端郊外了……尽管生动，但毕竟是感性的碎片。

后来上山下乡，到黔东南州凯里“脚里”苗寨和州农机厂各度过四年与五年，1977年恢复高考回到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我生活的圈子又开始以贵阳云岩区作为圆心与半径。再后来，又往毕节供职四年半。不同时期的两次远离贵阳远眺故乡，我感觉它就是一个不断从农耕社会大步迈进城市的省会区域。再次返回是到贵州省文史馆就职，馆里满是各位先生和收藏的文献，对故乡的认识又从个人生活经验进而有了理性的观照：如果没有弄错，我的入黔始祖叫顾成，是朱元璋时到贵州的，后来封了镇远侯，死后又追赠夏国公。夏国公祠堂后来建成城南小学，母亲就在那里上班；而当年我读书的“都司路”，就是顾成老祖的办公地点。我想，童年的贵阳生活场景早已不像当今的贵阳，那么，顾成老祖、祖父、父母们生活的贵阳场景又是怎样的呢？我常阅读思考，但仍不得要领。

因此，我要感谢眼前这本《贵阳史话》，以及对历史文化高度重视的市委领导及相关部门，感谢助力这项工作的专家，感谢市档案馆以及为此付出心血的所有朋友们！这本篇幅适中、内容充实的《贵阳史话》，既有简洁通畅的文字，还有珍稀生动的照片，以历史为经，以重要事件为纬，把贵阳市从古到今的往事编织成色彩斑斓的锦绣。从中，我知道了贵阳从数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走来，历经汉唐、宋元、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新时代的步步历程，于是，对家乡片段的感性有了宏观有序的俯瞰感。通过本书，我还感受到故乡有趣生动的生活场景：甲定的苗族曾有洞葬习俗，该民族还保存着古老完整的“簪汪古歌”，龙洞堡有过从“铺”到“哨”再到“堡”的演变过程，贵阳的河流与古桥使我联想到旧时亦城亦乡及桥上的过客，各省驻筑会馆曾经是贵阳交流财富与信息的重要组织形式，母校贵阳一中对面曾有铸造铜钱的钱局，张道藩编写过中国首部谍战片《密电码》，还有那么多令人难忘的先贤与往事……于是，贵阳的历史线索与丰富细节在我的心目中更加清晰与鲜活起来。

我是老贵阳，这本《贵阳史话》对我认识家乡尚且如此重要，于是推测：

对于想要了解贵阳的本地干部、市民、学子，以及外地的游客，本书一定也会大有裨益。所以，真诚地向大家推荐这本好书，希望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贵阳，爱上贵阳。

编写说明

本书作为《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总卷，旨在从宏观视角鸟瞰贵阳发展历史，展现独特的文化底蕴，从而帮助读者加深对贵阳历史文化的认识。

一、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考与借鉴丰富的地方历史文献，遵循历史发展的主线，凸显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和特点，展示贵阳从远古走来，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轨迹。

二、本书叙述时限，上不设限，下至贵阳解放。为有助于读者了解贵阳整体概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阳的发展历程也做了概貌性的介绍。

三、本书记述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域为主，古代史事记述范围为贵阳府辖区。

四、本书以史实为基础，采用专题编写方式，以史话的写法，讲述贵阳的历史故事，力求通俗、可靠、适中，增强本书的可读性、趣味性。

五、本书强干弱枝，力求做到：点面结合、古今结合、雅俗结合与图文结合，旨在尽可能适应读者群的阅读需求。

目录

引言	01
----	----

第一章 唐代以前的贵阳	08
-------------	----

一、史前先民洞中住	09
二、先秦贵阳属夜郎	13
三、诸葛孔明平南中	17
四、魏晋贵阳归牂牁	19
五、四大族系聚牂牁	19
六、唐代贵阳称矩州	23
掌故：	24
清镇汉墓群	24
城南“武侯祠”	25
甲定苗族洞葬	26
无字天书“簪汪古歌”	26
始于唐代的贵阳丹砂开采	27

第二章 宋元时期的贵阳	29
-------------	----

一、贵州之名太祖赐	29
二、元改贵州为顺元	31
掌故：	33

宋廷在南方买马	33
开阳画马崖	34
贵阳最早的佛教寺院	35

第三章 明代贵阳 37

一、明朝建立宣慰司	37
二、贵州遍地设卫所	40
三、贵阳迎来大移民	43
四、贵阳设府成省会	50
五、两度修建贵阳城	54
六、开办学堂建书院	61
七、阳明悟道创心学	67
掌故：	73
奢香开辟龙场九驿	73
明代贵阳出“天马”	75
四百余载沈官桥	75
龙洞堡的来龙去脉	77
贵阳四条河 桥梁何其多	79
明代贵阳十景	85
霞客游记描贵阳	86
大西军贵阳抗清	89

第四章 清代贵阳 91

一、九门四阁百条路	91
二、七十二行百业兴	96



三、乡村市集赶场忙	101
四、万马归槽于贵阳	104
五、文教事业大发展	107
六、五大宗教共一城	116
七、山城会馆何其多	120
八、邮局报馆进贵阳	123
九、辛亥革命举义旗	131
掌故：	134
吴三桂剿灭水西	134
古风古韵话牌坊	135
曹维城与曹状元街	137
来仙阁上不见仙	138
贵阳有条钱局巷	140
“公车上书”中的贵阳举人	141
“贵阳女婿”梁启超	142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贵阳 144

一、贵阳自此称为“市”	144
二、军阀混战乱贵州	156
三、护国运动急先锋	161
四、文化新风入黔来	163
五、“五四”风雷撼山城	165
六、红军三次过贵阳	168
七、贵州成立省工委	171
八、魔窟息烽集中营	174
九、抗日救亡掀高潮	176
十、图云关上红十字	180

十一、“二四”轰炸酿惨案	185
十二、战时经济大发展	188
十三、“文化重镇”贵阳城	201
十四、大西南交通枢纽	222
十五、爱国民主运动兴	227
掌故：	231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231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	233
贵阳历史上第一个公园	235
设在贵阳的气象观测站	237
城内有座铜像台	238
贵阳何时通电	238
民国贵阳的三座机场	240
肠旺面馆的行话	242
中国谍战片开山之作在贵阳拍摄	243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眼中的贵阳	244

专章 七十五载铸辉煌 247

一、大西南战役中解放的首个省会城市	248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贵阳	253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贵阳	255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贵阳	257

后 记 260

引言

贵阳市位于中国西南部、贵州省中部的黔中丘陵盆地上，简称“筑”，别称林城、筑城，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贵阳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所处北纬 $26^{\circ} 11'$ 至 $27^{\circ} 22'$ 之间，正位于北纬 24° 至 29° 内，该纬度是地球上最适宜生命孕育和繁衍的地带。

《贵阳史话》以贵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支撑，凸显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和亮点特色，用史话的形式讲述历史文化故事。诸如贵阳名字的由来，经历了什么事，七百年来对贵州、对西南、对全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要设



贵州省，省会为什么定在贵阳等疑问，读者在阅读本书后将会获得解答。

一座城，因历史而显厚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增添城市内涵。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轴线回望，贵阳的历史灿烂多彩。

人类的生存、繁衍离不开其所在的自然环境。适宜的气候、富饶的土地、丰沛的水源为贵阳地区史前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必要而较为理想的生存基础。在大自然恩赐的丰厚条件下，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便在招果洞建造“洞穴家园”。两千年前，春秋属牂牁国，战国归夜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水田农业，使贵阳地区步入农业社会。秦开五尺道，汉置牂牁郡，贵阳便被中央王朝纳入行政建置，清镇汉墓群见证了这一历史事实。隋唐复归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纷乱状况。唐代，今贵州之地属黔中郡黔州都督府，在乌江以南设羁縻州，贵阳在羁縻州的范围。宋代，宋太祖赵匡胤赐名“贵州”，贵州专指贵阳一地。元代“改贵州为顺元”，建“顺元城”，贵阳的城市雏形自此初现。明代，驿道畅通为开发贵阳提供了重要条件，奢香夫人开辟龙场九驿，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让贵阳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明代的贵阳城已成为“万家之邑”，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两次建城基本确立了贵阳城的格局，老贵阳流传的“九门四阁”也是在此时形成了历史记忆。清代，各地客商云集贵阳，形成“七十二行”的繁荣行业布局。至晚清，贵阳出现了近代企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华北以及东南沿海沦陷地区的众多机关、学校、企业和疏散人口纷纷迁入贵阳，贵阳成为后方重镇，并于1941年建市。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单位、人口陆续返迁，贵阳相对失去特定的发展条件，经济、文化逐渐萧条。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迎了解放。从此，贵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建设新贵阳的壮阔新征程。

二

一座城，因“通道”凸显战略地位。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虽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但山川地形制约黔中经济的开发步伐。随着驿道渐次开通，作为贵州建省后的省城贵阳，独特的区位交通地位日益凸显，逐步形成影响西南并辐射全省的战略地位。

“贵州”现在我们生活省份的省名，可是，“贵州”曾经是贵阳市的历史名称，最早可追溯到宋朝，历经宋、元、明三朝。元代由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与川黔、黔桂两驿道在“贵州”（今贵阳）交会，“贵州”成为咽喉重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顺元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战略眼光看“贵州”，在全国尚未统一时，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便在“贵州”设卫（即贵州卫），与成都卫、武昌卫形成掎角之势，控制西南一方战局。与此同时，把“水西”（鸭池河以西）的彝族安氏土司和“水东”（鸭池河以东）的宋氏土司合二为一，称为贵州宣慰司，改顺元城名为“宣慰司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成为明代第十三个行省。从此，原先专指贵阳一地的“贵州”，便成了省名。贵州建省关系整个西南形势，关系云南边防的巩固和西南地区的开发，是明代大棋盘上的重要一招。明代的贵阳，已成为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明清实施的大规模移民实边，清代完成的改土归流，进而贵阳作为东进西出、沟通南北的“万马归槽之地”，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军事要地。作为省城的贵阳在边疆的巩固、多民族的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地区转移，贵阳逐渐成为后方重镇、西南交通枢纽，战时经济空前繁荣，经济功能大为增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地位更加强化，为全民族抗战作出巨大的贡献。

贵州建省，贵州省名因“贵州”得名。将省会原来的名称作为省名，贵阳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仅有的一例。

三

一座城，因山水而名彰。贵阳居于云贵高原的盆地中央，有“滇黔的锁钥，蜀粤的屏障”之称，“山高水深，重峦叠嶂”之说。山有“黔灵扶风之胜，水有涵碧芳壮之观”，城址“富水绕前，贵山拥后，复岭环列，四塞崇冈，雄峙两关”。

仁者乐山，贵阳因在贵山之阳而得名，因山而尽显城市风骨。贵阳作为省会处于全省版图的核心，主城区就位于黔灵山、百花山、南岳山等纵向山系之间，被群山锁扣，又被蜿蜒的水系切割。紧贴市区北沿的黔灵山，林木葱郁、深谷幽潭、猕猴成群，号称“黔南第一山”。据贵州现有最早的地方志书明朝（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贵山在治城北二里”“白崖山在贵山之麓”“白崖山在治城北二里”。《贵州名胜志》记载：“城北二里有贵山，蜀道所经，一名贵人峰。”贵山在贵阳城北，古代贵山“孤峰峭拔，兀出群山”，就像一位身材魁梧高大、身披毡毯的贵人。贵人峰即为黔灵山关刀岩。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迁程番府入省城，次年改为贵阳府，“贵阳”成为地方行政机构的专名。实际上，《明实录·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初一）（即1389年3月28日），“都督张铨、王诚、孙彦驻贵阳”。据此说明，贵阳名称的出现至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距今600余年。

贵阳因山得名，冬有青山护暖，夏有流水悠悠。地处高原又受季风影响的贵阳可谓是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在寂静的岁月中，山与城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构成今天一幅“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和谐生态画卷。

智者乐水，有水美而润泽之城，因水而尽显城市灵动。贵阳市位于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分水岭地带，一城在中国两大水域之间，这种分水岭的奇特现象在云贵高原区是绝无仅有的。一河因贯穿贵阳城而得名贯城河，好似一条碧绿晶亮的玉带蜿蜒城中，美其名为“玉带河”，河上建有化龙桥、普陀桥、沙河桥、狮子桥、六洞桥等。诗情画意的贯城河阅尽贵阳城的市井百态，繁华变迁。

随着贯城河揭盖复涌，勾起贵阳人美好的历史记忆，唤起人们心里的淡淡乡愁。南明河从西南向东北拥城而过，被誉为贵阳的母亲河。明代王阳明先生有诗句“松林晚映千峰雨，渔人收网舟初集”，描绘了当时如诗如画的南明河景色。明代景泰、天启年间称南门河，嘉靖年间称南明河。南明河沿途接纳了陈亮河、麻堤河、小车河、市西河、贯城河等，赋予筑城水的秀美灵性，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孕育了贵阳的历史文脉。流淌着淡淡的乡愁，串联起清逸峻美的黔灵山、挺秀城南的甲秀楼、玉带卧波的浮玉桥、梵钟高唱的黔明寺。沿河两岸人文荟萃，科教昌明，民风淳朴，文风鼎盛，英才辈出。南明河不仅是贵阳人的母亲河，更是贵阳人的精神家园。

贵阳因山得名，因水灵动，贵山富水成为这座生态之城最高的文化尊崇。

四

一座城，因精神而为名城。历史文化孕育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尽显城市品质。在历史演变的岁月长河里，贵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断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成果，丰富与发展自身的地域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和而不同，川流不息”为特征，民族文化、移民文化、阳明文化、红色文化等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文化形态，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

古往今来的贵阳仁人志士胸怀天下，知行合一，敢于尝试、勇于进取，走出大山，建立不朽的功业，至今为后人所传颂。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的杨龙友，不少诗作被收入明末付梓的《八大家诗选》。吴中蕃一生著述宏富，文学大家孔尚任读其《敝帚集》，立改“黔中无人”的旧观。《康熙字典》首席编纂官周起渭，初至翰林院时，即兴而作《万寿寺大钟歌》，写出“帝王子孙无所处，血溅长陵一抔土”的历史慨叹。开发台湾有功的周钟瑄，土民感其

恩德，为之立祠塑像，每逢生辰之日为之庆贺，盛赞其为“周公”。贵阳明清两代就有“一千举人、两百进士”之美誉。清代出了武状元曹维城、文状元赵以炯，赵以炯成为“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第一人”。

贵阳虽因地理条件所限，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贵阳城市精神赋予贵阳人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进取与担当，在历史上不乏许多惊世之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创办贵州第一所新学，不仅是贵州兴办近代教育的开端，而且也是国内最先改革书院的典范。

“公车上书”震惊朝野，贵州籍举人签名的有95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中贵阳籍举人参加签名者就达32人。“辛亥革命”风云激荡，贵阳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贵州成为全国第六个宣告独立的省区，贵阳也走在辛亥革命的前列。1911年文通书局正式对外营业，位列民国时期全国七大书局之一，为贵州出版事业做出巨大贡献。1935年1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这是党中央在长征期间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方党组织。“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是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林青烈士留下的铮铮誓言，更是无数贵阳革命志士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信念写照。贵阳作为贵州的中心，在风云激荡的百年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形成了贵阳厚重的红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守护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脉。今天，在中共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贵阳人民发扬“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赓续奋进，后发赶超，践行“两山”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的贵阳篇章领衔而成。贵阳勇立数字经济发展潮头，“中国数谷”的城市名片首屈一指，正以厚植历史文化名城的责任与担当，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阳贵安篇章。

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回首来时路，七百余年的历史沉淀描绘出今日“新城气旺旧城尽，不愧雄奇冠此州”的林城盛景。揭开岁月洗涤的历史文脉，让我们在散发着墨香的书卷里相遇，一起穿越历史，走进这座被誉为“爽爽贵阳”的美丽城市。



甲秀楼、翠微园景区

第一章 唐代以前的贵阳

贵阳处于云贵高原东部的斜坡上，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属山地、丘陵为主的丘陵盆地地区。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温和型，兼有高原性和季风性气候特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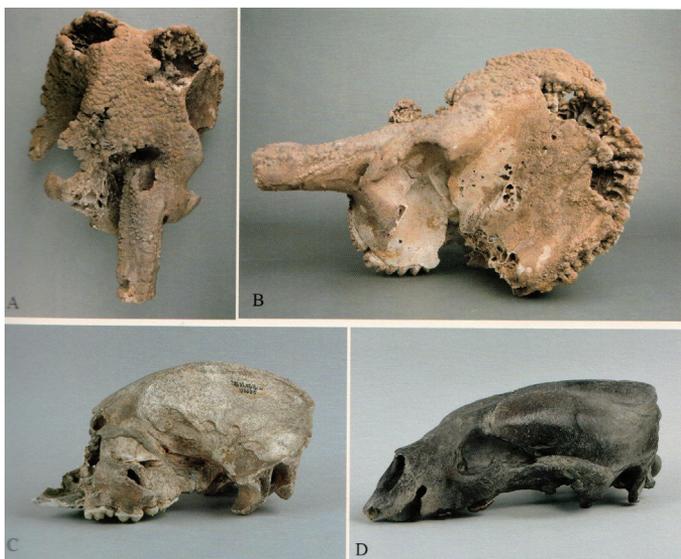
贵阳城地理环境优越，“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贵山，在治城北二里，鸦关在其后。郡之得名以此。”在古人的观念中，“山能特立方称贵”，城北二里的这座“孤峰峭拔，兀出群山”的山峰，颇显贵人气，故名贵山。古人按山的向背分阴阳，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贵阳一带地处贵山之南，城在贵山之阳，故名贵阳。

贵阳远古至两汉的历史，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我们只能言其大概。从目前已经发现的乌当大堡古人类的活动遗址和猫坝、洛湾、太慈桥等地搜集到的磨制石斧来看，贵阳早在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春秋时期，贵阳是牂牁国的辖地。战国时期，贵阳属于夜郎国的管辖范围，是夜郎国百姓重要的定居点之一。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国设立三十六郡，贵阳在秦朝郡治的管辖之下。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牂牁郡后，贵州大部分地区属牂牁郡，牂牁郡下辖十七县，一说贵阳属夜郎县，一说贵阳属故且兰县，至今尚无定论。唐朝时，今贵阳地区称为矩州。矩州存在的时间是唐武德四年（621 年）至五代（907—960 年），300 多年。谢氏为牂牁大姓，是古代生活在今贵阳地区及其附近的少数民族。唐末，随着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的崛起，谢氏逐渐衰落。

一、史前先民洞中住

远古时代的贵阳地区气候温润平和，四周被高山环绕，中间丘陵翻滚起伏，河流纵横，森林茂密。1998年，在距息烽县城南10公里的永靖镇后坝村鸦米寨，当地人称为“龙背坡”的东南侧靠近山顶的一块凹地里，发现一大一小分属两只恐龙的化石，据推算，两只恐龙，大的恐龙在8米左右，小的恐龙也有5米长，这是贵州第一个经过正式科学发掘的恐龙化石地。古脊椎动物的发现，标志着贵阳目前最早的时空可追寻到1.8亿年前的侏罗纪时代。从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看，当时贵阳地区茂密而品种多样的原始森林里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伴生的动物群成员有灭绝物种巨獏和中国犀等，现生物种有鹿、麂、牛、鼠、水牛、猪、羊、豪猪、猕猴、熊、虎、豹等20多个属种，这些是大自然给予的食物“恩赐”，贵阳远古祖先靠集体围猎，靠山间取之不尽的食物，繁衍生息。

今天考古工作者在开阳县发现有古人类文化遗址；在乌当区、白云区、开阳县、修文县和清镇市，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28处。在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的牛坡山上，“牛坡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黔中地



A 东方剑齿象头骨顶视
B 东方剑齿象头骨侧视
C 马头骨侧视
D 大熊猫头骨侧视

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志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被列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安新区招果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打制石器、磨光石器和骨角器，还有若干火塘，为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招果洞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该遗址发现的墓葬和随葬品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墓葬遗存和随葬行为，也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行为之一。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5万年至3.7万年，证明在4万年以前黔中地区就有人类居住、活动。可以说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部斜坡上的贵阳地区，已是一派生机。

1985年12月初，在开阳县清水江畔的羊场平寨乡么老寨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考古人员采集到代表中年个体的两枚臼齿和一枚犬齿以及代表儿童个体的一枚门齿和齿根残部化石，根据其固有的形态特征和石化程度判断，距今约1万年至4万年。由此可以判断上述人类生活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与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以及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等同属一个发展时期的晚期智人类型。“开阳人”化石的发现，填补了贵阳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空白，这是目前我们所认识的贵阳辖区范围内最早的原始居民，使我们得以观察到数万年前贵阳原始居民的一些状况。

1997年11月，在乌当区东风镇大堡村猫猫山东部的望天洞、猫耳洞两个洞穴内，发现大堡猫猫山古文化遗址。大量原始人类的打制石器和具有石化程度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原始人类“用火遗迹”被发现。经研究，可以确认该遗址为史前人类生活居住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大约一万年。该遗址的发现，首次揭示了贵阳人类历史的渊源，填补了贵阳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空白，为探索贵阳早期人类生活面貌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证据。

2003年8月，因修建贵开二级公路，对公路沿线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古人类遗址——开阳打儿窝遗址，让距今约一万年的旧石器时



打儿窝发掘遗址



打儿窝古人类遗址出土器物

代晚期的贵阳画面再一次被翻开。经近两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共发现遗迹现象44个，包括墓葬11个，灰坑19个，灰堆8个，骨堆1个，钙板胶结物5个，出土碎骨上千千克，其后又发现哺乳动物牙齿化石2181颗，上、下颌骨115个，各部位骨骼化石1415块，骨制品9327件，比较珍贵的有19颗中国犀、7颗巨獭的臼齿。在人类遗址发现巨獭、中国犀化石，对史前考古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佐证。另外，打儿窝遗址出土大量的烧骨、灰堆和各种打制石器、骨器、磨制石器、动物化石和陶片等数十万件，根据碳-14测定，可以确定开阳打儿窝遗址是一处距今2.75万年至8000年并延续到宋明时期的古人类遗址。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完整性，以及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目前在黔中地区可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贵阳观山湖区是史前文化遗存密集分布的地区。东起观山湖、西至新场、南靠野鸭塘、北抵陶家山，长、宽各7~8千米的面积范围内，就发现银子山、白岩洞、象鼻洞、杈口洞、下茶园、排风坡、猴子洞、排风洞、尖山庙、无名洞、望天洞、空岩洞、月亮洞、路边岩洞、贵箐炼铋厂1号洞和2号洞等16处古人类文化遗址，获得石制品、陶片等古人类文化遗物1300多件，包括石制品1100余件、陶片100多件，以及一些动物遗骸和用火痕迹等。经过初步研究，其中的8处地点因为发现有陶片和磨制石器，其时代初步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距今万余年至几千年；另外8处地点时代相对要早一些，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一万年。2006年，位于观山湖区金华镇的金华肖家洞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出土和采集到各类制作精美的骨（角）器80余件，器形主要有骨铲和骨锥，陶片和石器出土相对较少。从试掘的结果来看，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开阳打儿窝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部分基本一致。观山湖区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不但是贵阳早期人类繁荣的标志，更是早期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人类走向现代的一份写照。

优越的生态环境让贵阳远古祖先们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他们无需造房和开荒种地，反正到处是冬暖夏凉且安然无虞的天然溶洞。他们依洞聚居，共同

觅食生存，树林里到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山珍野味，足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已发现的史前遗址，基本上都是属于洞穴或是岩厦遗址。“洞天福地”里，贵阳先民创造了丰富的史前文明，让贵阳成为中国人类发源地之一，贵阳万年前空山幽谷的美景，令人凉意满怀、舒爽清凉的气候，悠然自得的生活环境，一直延续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让贵阳成为人们向往的避暑胜地。

二、先秦贵阳属夜郎

贵阳地处黔中，黔中一带的历史虽然古远，但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与中原地区相比，因地处边陲、关山险阻、路途遥远，故社会发展缓慢。由于属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历代统治阶级采取的统治方法又与中原有所不同，因而在地方行政建设、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等方面，都表现出许多特殊性。宋元以前，有关贵阳历史情况史书记载多不详，今天我们只能说说大体情况。

春秋时期，西南各地部落林立，互争雄长，古代西南土著濮人建立了牂牁。它的管辖范围从乌江向南，一直延展到今广西、广东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如今的半个贵州省几乎都处在牂牁的管辖下，贵阳地区也在其中，土著濮人，就是今天贵阳部分少数民族的祖先。

到了战国，史书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称为西南夷，有时为了区别起见，把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称为“西夷”，而把贵州、云南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南夷”。

贵州之地大体分为夜郎、滇、邛（qióng）都、犍（x）、昆明、笮（zuó）都、冉駹（máng）、白马八大族群。司马迁第一次把西南少数民族载入史册，《史记·西南夷列传》篇末写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国也，最宠焉。”所谓的“国”，无非是较大的部落。这就是说，在西南数以百计的部落中，被封为王的只有夜郎和滇，但夜郎地域辽阔，而滇国仅在滇池附近一片，只能算是一个小国，点明了“夜郎最大”。《史记》记载，在西

南夷中夜郎不但疆域辽阔，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已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定居族群。而笮都、冉駹、白马尚在“或土著，或移徙”的阶段。犍和昆明还“随畜迁徙”，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当时西南夷的各族群社会，大致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即所谓“军事民主”时期，各部落首领为“君长”，数十部落联合成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以某一大部落为中心，人们通常所说的“夜郎国”，实际上是以夜郎部落为中心，由数十个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这些小部落即所谓的“夜郎旁小邑”。在“旁小邑”中，见于史书记载有的且兰、句町、漏卧、谈指、同并、鼈（bì）、平夷、毋敛等部落，由于这些部落较大，汉代以它们为基础设县。

战国中期，夜郎开始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77 年），楚国大将庄蹻（qi o）率部队沿湖南沅水溯流而上西征云南滇池地区，攻克了位于今福泉及都匀北半部的且兰国和夜郎，深入滇池地区。就在庄蹻率军入滇之时，秦国乘机派部队夺取了位于川、黔、湘交界的黔中地，断了庄蹻的归路，庄蹻只好留在滇池为王，不久，庄蹻和他的部下改换服装，顺从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庄蹻率部队经过今贵阳地区，可能是古代外地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到达少数民族聚居地。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为加强西南地区的联系，秦始皇下令修筑从四川通向贵州的“五尺道”，这条道路从四川修到了今贵州遵义，据推测又从遵义南下修到今贵阳，很可能还从贵阳往西修到了今云南，路线和今天从贵阳往北的川黔公路、往西的黔滇公路差不多。“五尺道”修通后，秦王朝中央按照郡县制的规定，从贵州当地部落首领中任命了一批人为官吏。并在今贵州境内重新设置黔中郡和罽（xín）成（今黎平）、毋敛（今独山）、且兰（今福泉）、夜郎（今石阡）、汉阳（今赫章）、鼈（今遵义市东部）等县。当时，贵阳一带虽然没有直接设置郡县，但因整个夜郎都驻有秦朝的官吏，贵阳与夜郎的其他地区一样，听命于秦王朝的统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国夺取南越王地，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委派官吏治理，向当

地移民 50 余万人。这时，贵阳地区大体属象郡管辖。

西汉初年，西南地区郡县制废弛，夜郎国又成为西南势力最大的部落王国。汉朝继承秦朝郡县制作法，在贵州采取优抚和征剿并举的政策。

汉武帝派鄱阳令唐蒙出使南越（今两广地区），南越王拿枸酱招待唐蒙。唐蒙吃后觉得很有味道，就打听枸酱是什么地方出产的，回答说是蜀地。唐蒙问：“蜀地离南越迢迢数千里，山川阻隔，怎么运来的呢？”南越王得意地回答说：“是从南越西北面的牂牁运来的。”“牂牁！”唐蒙心中一惊。他回到长安一打听才知道，枸酱是蜀地的商人拿到夜郎去卖，夜郎有一条牂牁江可以通到南越，枸酱是从水路运到南越的。他又听说夜郎国有精兵十万，就是南越也奈何不了夜郎国。唐蒙于是献计汉武帝：借夜郎国的十万兵，乘船沿牂牁江而下，出奇兵征服南越。汉武帝同意了唐蒙的意见，任命唐蒙为郎中将军出征夜郎。唐蒙经过一番筹划，率领上千人的部队，从今四川进入贵州，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唐蒙以绸缎多匹赠给多同和其他小部落的首长。他对多同说：只要服从汉朝中央的管理，同意政府派官吏来，你不仅可以继续做夜郎侯，而且儿子也可以做县令。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权衡利弊，多同和酋长们就同意了。多同为了表示友好，就回赠了许多枸酱给唐蒙。唐蒙回到长安，将多同赠送的枸酱献给汉武帝。枸酱是什么食品呢？汉代以前，中国人所说的酱一般有三种，一是指鱼肉酱；二是指谷物酱，如豆酱；三是指果酱。枸酱属于第三种，“枸”就是贵州所称的“拐枣”或“鸡拐枣”“鸡爪瓜果”，是一种生长在山野间的果实。它的外形弯曲，色泽棕黄，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只要咬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它那独特的甜味和果香。有助消化、增强免疫力、降低血压等多种功效。枸酱是把拐枣捣烂如泥或用末制成的一种糊状食品，类似今天的果酱。

西汉政府在夜郎地区设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仍归犍为郡管辖。这以后，汉与夜郎的关系时密时疏。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南越反叛，武帝派驰义侯从川南发夜郎兵攻打南越。夜郎的且兰部不愿远行，害怕出兵后其他部落将其老弱病残掳走。于是，纠合部众反叛，杀犍为太守。汉武帝遂令驰

义侯将且兰灭亡，以夜郎之地改设牂牁郡，夜郎王只有归顺汉王朝。“平南夷为牂牁郡”对贵州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夜郎之地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贵州地区逐步进入“郡国并治”时代，开启了文化发展和多族共融的新局面。

“牂牁”为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犹如夜郎、且兰一样，用汉语根本无法解释。牂牁郡的设置是以夜郎部落联盟为基础，夜郎部落首领封为“夜郎王”，牂牁郡设太守管政，设都尉掌军，“夜郎王”实际上只能管理夜郎部落，牂牁郡十七县实为原先的十七个较大的部落，设有故且兰、罽封、鬲、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淡槁、进桑、句町、漏卧十七县。

牂牁郡建立后，汉政府派兵驻守，就地屯种，又募“三蜀大姓”即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的龙、傅、尹、董氏等大姓率家丁、奴婢、罪徒到牂牁郡开垦，屯军官兵和汉族移民一律编入户籍。《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牂牁郡“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到了东汉，移民有较大增长，《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十二，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汉书》和《续汉书》所记的人口，实际上是指移入牂牁郡的汉族人口。为了使官兵安心戍守边疆，汉族移民能安居乐业，汉政府在要冲之处、通道之途建立城邑，建房屋、置田具，开阡陌，置医巫以治疾病，设祭坛以供祭祀。男女婚配，生死相恤，坟墓相从，死后就地埋葬，因而留下许多汉墓。贵州汉墓的分布，主要在黔西北的威宁、赫章，以及黔西南的兴义、兴仁一带；黔中的安顺、清镇、平坝、黔西等地也有分布。这也充分说明牂牁郡的分布范围。

故且兰为牂牁郡郡治。为何称故且兰呢？因为且兰部落已为汉军所灭，因其原先为且兰部落故地，故称“故且兰”。《贵州水道考》的作者洪亮吉则认为，贵阳地区应在且兰县的范围内。《贵阳府志》称，贵阳之地，“战国末为且兰地”，“汉置故且兰县为牂牁郡治”“今贵阳府尽故且兰地也，贵筑、定番（今惠水县）、广顺、贵定、龙里则且兰境地”。



夜郎王降而不顺，受封之后越发骄恣，一再干扰牂牁郡的设置，到汉成帝年间，公然举兵反叛，终于被当时的牂牁太守陈立设计诛除。前后延续了200余年的夜郎古国的历史至此也就宣告结束了。

西汉中期以后，贵州经历了一段政局不稳定的时期。当时统治者开始推行所谓“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王莽建立新朝，由于强行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官名，任意贬低边疆地区侯王的等级，恣意侵侮少数民族，西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很尖锐。时逢各地农民起义，地方豪强纷纷割据，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公孙述割据巴蜀。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同年（即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谢暹（xiān）以牂牁郡功曹身份，联合本郡龙、傅、尹、董几家大姓起来“保境为汉”，反对公孙述的地方割据，并派遣专使，绕道番禺江上，向汉光武帝刘秀进贡，表示忠于汉朝。刘秀十分赞赏，封谢暹为“义郎”，并世代传袭，这是史书对牂牁谢氏的第一次记载。

三、诸葛孔明平南中

从东汉到南北朝，郡县设置虽屡有变化，但今贵阳地区几乎都在牂牁郡境内。进入东汉以后，牂牁一带仍处于时而安定、时而动荡的状态。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政，政治极端腐败，地方豪强大姓趁机各据一方，混战称雄。牂牁地区的龙、傅、尹、董、谢等大姓豪族长期担任地方官吏管理牂牁，当时贵阳地区很可能在牂牁大姓龙氏的势力范围之内。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西南大部分地区被泛称为南中。蜀汉初年，刘备政权在南中地区的统治相当薄弱，位于今云南益州郡的豪族大姓雍闿杀死太守，举兵反蜀，牂牁郡丞朱褒起兵响应，一时间南中地区战云密布，蜀汉对这一带的控制岌岌可危。雍闿、朱褒等人的叛乱活动，严重干扰了诸葛亮结盟孙吴，北上与曹操争夺中原的大政方针。蜀国丞相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分兵三路征伐南中，第一路由诸葛亮率领，攻越郡；第二路由部将马忠率领，攻牂牁郡；第三路由李恢率领，攻益州郡。由于诸葛亮采取了

马谡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七次打败和活捉雍闿部下孟获，又七次放了孟获，大得人心。这年秋天，终于平定了南中的叛乱。

南中平定后，蜀汉将原先的犍为、朱提、牂牁、益州、永昌五郡调整为牂牁、建宁、云南、兴古、越巂、朱提、永昌七郡，在味县（今云南曲靖）设庾（lái）降都督统管。牂牁郡变动最大，将谈藁、毋单、漏江三县划归建宁郡，将宛温、谈封、句町、漏卧、进桑、西随六县划归兴古郡，牂牁郡仅存且兰、牂、平夷、夜郎、谈指、毋敛六县，设治于且兰，今贵阳之地仍属且兰。经此变动，牂牁郡的范围大为缩小，基本在今贵州省境内。率兵平定牂牁的马忠出任该郡太守。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色，处事能断，因此，恩威并立，深为当地人民所敬畏。

诸葛亮平南中到过贵阳没有，历史没有准确的记载，但老贵阳城却有关于诸葛亮及其部队的传说和三处古迹，其一是位于贵阳城内西南角永祥寺遗址处（今遵义路海关大楼后）藏甲岩。清代贵阳八景之一，“藏甲遗踪”说的就是这里，藏甲岩又名孔明洞、鬼王洞、贮甲山。这是一块巨大的岩石，石骨嶙峋，岩中有洞。明代《贵州名胜志》说这洞是诸葛亮南征时，其部将士藏盔甲之地。该书还记载：相传有人拿着火炬进入洞中，看见盔甲悬挂在洞壁上，当这个人想取下盔甲时就有大如乌鸦的蝙蝠飞来扑灭火炬，火炬熄灭后只听见一片啾啾的叫声。藏甲岩的传说给贵阳增添了神秘动人的色彩。第二处观风台（观水路东南侧），《贵州通志》记载，传说是诸葛亮观星之处。第三处铜鼓山（今仙人洞道观），《贵州图经新志·山川》记载：贵阳城东水口寺，有一座植被丰茂、地势险峻的高山，名为“仙人洞”，是贵阳重要的道教圣地。此山又名铜鼓山，相传诸葛武侯藏铜鼓于洞中，每逢阴雨，就会听到洞中如铜鼓之声传出，故又称铜鼓岩，民间有“铜鼓遗爱”之说。



四、魏晋贵阳归牂牁

司马氏代魏建立晋朝，继续沿用诸葛亮统治南中的方法，一面笼络豪强大姓，一面继续在当地置郡县。西晋泰始七年（271年），将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划归宁州，将牂牁、越雋、朱提三郡划归益州。此时牂牁郡的境域基本不变，但增设了万寿、并渠两县。东晋时，将建宁、晋宁、朱提、牂牁、越雋、兴古、云南、永昌划归宁州管辖，是为“南中八郡”。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宁州刺史王逊又将牂牁郡一分为三：以万寿、且兰、毋敛、晋乐、丹南五县为一郡，仍名牂牁；以夜郎、广谈、谈乐、谈指四县为一郡，名为夜郎郡；以平夷、警两县为一郡，初名平夷郡，后改平蛮郡。大体上讲，黔北地区属平蛮郡，黔西、黔西南地区属夜郎郡，黔中、黔南地区属牂牁郡。南朝时，“南中地区”人口增多，经济发展，郡县也随之增多，共设16郡，牂牁、夜郎、平夷、朱提、兴古五郡仍属宁州。南齐时，又将牂牁郡改为南牂牁郡，郡治且兰，领且兰、万寿、毋敛、晋乐、绥宁、丹南六县。又析武陵、牂牁两郡边地新设东牂牁郡，领宜阳、平阳、西平阳、西新市、东新市、南新市六县，大体在今黔东一带。梁、陈、周三朝，郡县未有大的变动。尽管蜀汉、两晋、南朝时期“南中”均有郡县设置，但历代王朝鞭长莫及，不过遥领而已，太守、县令多是土著大姓。

从建置沿革上考察，蜀汉及西晋代设的牂牁郡实为汉牂牁郡的且兰、夜郎、谈指、毋敛、警、平夷六县，而将在云南的县分出，贵阳之地显然属牂牁郡。东晋将牂牁郡分为牂牁、夜郎、平蛮三郡，从地域上看，贵阳之地仍在牂牁郡内。南朝时的南牂牁郡，地域基本同于东晋所设的牂牁郡，贵阳之地仍在其中。《贵阳府志》称贵阳府地在且兰、万寿、晋乐等县。

五、四大族系聚牂牁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区，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回族、壮族、蒙古族、畲族、瑶族、毛南族、仫佬族、

满族、羌族等 18 个世居民族。民族数量之多，在全国仅次于云南和广西，居全国第三位。从历史上考察，贵州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迁来的。

贵州地处川、湘、滇、桂之间，是西南的腹地，素称“西南之奥区”，历史上是南方民族迁徙流动的“大走廊”。因为这里地广人稀，在周边地区逐渐被开发并纳入行政建置的情况下，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不断向贵州移动，致使贵州成为四大族系交会之地。

贵州古代属“西南夷”。所谓“西南夷”，是指巴蜀以西和以南的少数民族，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西夷”是指蜀郡以西的民族，大抵分布在今川西南、川西及甘肃南部；“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今云南、贵州及桂西北。汉武帝“平南夷为牂牁郡”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贵州民族大迁徙的时期，民族的迁徙与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后来的贵州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郡县制的渐次推行，汉族移民开始进入贵州，但规模较小，比重不大，影响有限。汉代移民的主要方式是“移民实边”“移豪民，填南夷”，号召内



《贵州百苗图》节选



地汉族地主、商人到“西南夷”屯田垦殖。大批官吏、驻军、屯民以及“被贬的罪人”、在内地“失地”无法生活的农民来到贵州，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贵州境内定居下来，他们主要集中在郡县据点上。为了使其“安乐而不思故乡”，遂令就地立城邑、制田产、筑居室、具田器、置巫医，使之“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全”。因此，凡汉人移居之所，皆有汉墓群，由此可知当时移民的分布状况。今在贵阳清镇等地发现的汉墓，可以证明贵阳是其中心活动地区。“寓兵于农”“屯田守之”的移民政策，官兵以部、曲、屯的组织相合，久而久之，形成一股势力，他们当中的统治者便形成了有权有势的“牂牁大姓”。见于史载的有龙、傅、尹、董、谢、赵，以后各大姓各有盛衰，至隋唐而赵、谢独强。在汉族移民大批进入牂牁的同时，牂牁境内出现了几次少数民族大的迁徙。

古濮人是贵州高原的主要居民，今贵州省的仡佬族即属古濮人后裔。濮人一直是战国时的夜郎国和汉代牂牁郡的主体民族，亦称夷濮、夷僚。《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濮人“椎结、耕田、有邑聚”。“椎结”指濮人的头发成椎状盘结，既是濮人的发型特征也是外貌特征。“耕田”指濮人已懂得耕种田地，种植粮食，属于农业民族。“有邑聚”指濮人开始聚族定居，村落已经出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夷僚所在的牂牁郡自然条件恶劣，雨水多，牲畜养殖少，无蚕桑，与其附近的郡相比，人民贫穷；夷僚巫术盛，禁忌多。处于黔中腹地的贵阳，其居民属于濮人。

雄踞“西南夷”的夜郎灭国后，濮人势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牂牁谢氏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濮人已被分割为若干彼此互不联系的地方势力，不得不辗转依附历代中央王朝或地方割据势力以求自保，渐沦为被人支配的地位。特别是三国蜀汉到两晋十六朝的成汉政权期间，濮人数次被强迫迁徙入蜀后，牂牁郡内濮人势力更加衰败。

夷人，今贵州省彝族的先民，他们属于古代氏羌族系，按彝文《西南彝志六祖起源》记述：其始祖祝明，春秋、战国时率部从今青海河湟地区迁到四川

汉源一带。传至笃慕俄，为避洪水之难，又率部众迁至云南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其后家族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支，遍布川、黔、滇毗连地区。东迁进入牂牁的主要是布系和默系，其中迁入黔中一带者，主要是布系中的播勒部（或称普里部）。住在云南沾益的一支为阿佐赤家；住在云南宣威的一支为古若格家；住在贵州威宁的一支为乌撒家；住在云南镇雄的一支为芒布家；住在贵州大方的一支为阿者家；住在安顺的一支为播勒家。

三国蜀汉时期，居住在云南东川一带部落首领济火，因“通道、积粮”协助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有功受封，以后子孙逐渐强盛，由云南中部迁贵州罗甸。二十世勿阿纳的时候，开始向贵州大方迁徙。二十五世妥阿者逐渐战胜当地濮人，据有今黔西大部，并将势力伸入鸭池河以东部分地区。

越人，主要是古越人中的西瓯一支，是今贵州省布依族的先民，他们属于古代百越族系，原属南方少数民族，居住在两粤、江浙广大地区。到汉代，贵州虽纳入郡县体制，但除郡县所在以外的广大地区，仍为土著王侯统治。同时，今黔、桂边境一带，虽然崇山峻岭，但不少江河如红水河、龙江、都柳江等均贯通黔、桂两地，便于沿河谷地带溯江而上，成为越人迁徙的理想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长期分裂，争战频繁，统治南方的历代王朝加紧对境内各族的剥削压榨，迫使今黔、桂边境的越人，特别是今布依族先民沿蒙江（今惠水涟江）、北盘江继续往北迁徙，进入今贵阳至安顺一带的黔中腹地。如今贵阳市属花溪区、清镇市，以及黔南州属长顺、罗甸县、平塘县就有众多布依族聚居地区。

蛮人，主要是原住江西、湖南的一支，即古书所说“左洞庭，右彭蠡”，在中央王朝势力侵入后，不断西迁，先至武陵称“五陵蛮”，再至五溪称“五溪蛮”，后沿清水江而深入牂牁腹地，遍布山谷，他们是今贵州省苗族的先民。

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和少数民族的频繁迁徙，为黔中地区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考古部门在清镇等地发掘的西汉时期的墓葬，从中出土了为数甚多的铁锄、铁斧、铁刀等农具。这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

工具和技术通过汉族移民传入牂牁。同时，作为南中豪门大族私人军队“部曲”，也吸收“夷人”为部曲成员，于是出现了“夷汉部曲”。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和战斗中，一部分汉人被“夷”化，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广泛被“夷”人吸收。

六、唐代贵阳称矩州

经过东晋、南北朝 300 多年的纷乱，隋朝统一中国。为提高行政效率，隋文帝将州、郡、县三级机构改为州、县两级。到隋炀帝时，改州为郡，但仍为两级建置。隋朝存在 38 年，仅在黔北地区设置郡县，计有沅陵、黔安、巴东、明阳、牂牁、泸川等六郡，乌江以南大部分地方无力控制。

唐代的行政建置基本承袭隋代，仍保留州、县两级，只是曾一度以郡代州，刺史改称太守，以后又恢复州的名称。唐代的州分为两类。一类为经制州，由国家掌握田亩、户籍，直接委官治理；另一类为羁縻州，羁縻州制是唐朝创建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是以往历代官府未曾实行过的新政策。就字面而言，羁字的原意是指马笼头；縻字原意为牛靷。羁縻，喻牵制联系之意，借以形容天子与边疆四裔的关系，羁縻不绝。羁縻州制专设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在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顺唐朝中央政府以后建立起来的，实行“因俗而治”，州、县官均由部落首领充任，“以土官治土民”。州的刺史一律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由他们代表封建王朝对辖区行使统治权。从唐代开始直到南宋末年，贵州境内一直保持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的局面。

唐代，今贵州之地皆属黔中道，唐高祖武德三年（620 年），居住在黔中地区牂牁郡的被称为“牂牁蛮”的大姓谢氏首领谢龙羽率先遣使朝贡，举土内附，高祖授谢龙羽为牂州刺史，封为夜郎郡公，朝廷以他的地盘为牂州。这是唐朝在贵州设立的第一个羁縻州，也是唐代在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个羁縻州，据推测牂州在贵阳至安顺之间。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设黔州都督府，统领各州。黔州都督府设在今重庆彭水，因贵州之地皆在其南，故称“黔南”，以“黔”

称贵州。唐朝强盛时，在贵州的统治中心逐渐南移，黔州都督府改为播州都督府，后又迁往今贵阳附近的庄州，经制州的设置扩大至乌江以南。至天宝年间，唐王朝在贵州设置有黔州、思州、叙州、锦州、奖州、费州、夷州、播州、溱州、南州等 10 个经制州。乌江以南统治力量薄弱，只能借助当地土酋的力量进行统治，则设 50 个羁縻州。在乌江以南的 50 个羁縻州中，充、牂、琰、蛮、矩、庄、应 7 个州有相当势力，它们之中有些曾一度为经制州。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由于政局动乱，“改黔州为黔中郡”，后陆续将充、牂、琰、蛮、矩、庄、应 7 个经制州降为羁縻州。黔州都督府所领的 50 个羁縻州中，属今贵阳市及清代贵阳府辖有关的羁縻州有：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设置的矩州（今贵阳）、蛮州（今开阳）、功州（开阳、修文间，大概为今修文久长）、南平州（今平塘）、勋州（大概为今平塘通州）、清州（大概为今平坝马场至清镇市东一带）、庄州（大概为今青岩）、今州（大概为今长顺）、乡州（大概为今长顺县代化）等 8 个州。

掌故：

清镇汉墓群

墓葬是历史的见证，从汉代墓葬的分布上可以看出当时汉军在贵州驻扎和汉族移民的状况。汉武帝时期，牂牁郡地域广阔仅设 17 县，汉军和屯田一般都设置在要害地点。汉军长期驻守在一个地方，死后一般就地埋葬。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有汉墓的地方当时肯定为郡治、县治之地。

贵阳清镇是贵州汉墓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在清镇与平坝交界的尹关、琊陇坝、芦荻哨、下山口、余家龙潭、新桥、冷坝、牧马场、土门寨、平庄、老鸡场、萧家院、金家大坪等处均有汉墓群，已发掘汉墓 70 余座。在汉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琊陇坝出土的西汉元始三年（3 年）铭文漆耳杯、铜龟灯、铜兔水盂；新桥出土的西汉元始四年（4 年）朱绘漆盘、人兽博山炉座；后六出土的尚

方乳丁雏鸡铜镜和“婪千万”铜印；还有土门寨出土的铜釜等；卫城镇永乐乡有7座汉墓，出土了铁刀、铁剑等汉代文物。这些汉墓中最珍贵的是清镇琊陇坝出土的漆耳杯，其上的铭文是“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輿髹羽画木黄耳杯”字样，并有素工、休工、上工、黄涂工、画工、羽工、清工、造工等名。

汉墓是汉代“移豪民，填南中”的历史见证，黔中地区在汉代已有较多开发，是牂牁郡的重要区域，很可能是牂牁郡治故且兰所辖之地。从汉墓的分布情况来看，贵阳当在且兰县的范围，贵阳“汉属牂牁且兰”应当是可信的。

城南“武侯祠”

三国蜀汉丞相武侯诸葛亮的“仁义礼智信”观念和“忠君”思想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典范，因此，诸葛亮一直被中国人肯定和推崇，同时历代统治者也尊其为“良臣”楷模。

诸葛武侯在贵阳留下了众多传说。明清两代时任贵州贵阳的一些政要出于对诸葛武侯的敬佩，便在贵阳建武侯祠以祀之。贵阳武侯祠最先建在铜鼓山，明正德中后期（1521年前）因年久失修已经全部损毁，巡按胡琼将圣寿寺（今翠微园）更名武侯祠，以祭祀诸葛亮，直到明末。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孙可望驻贵阳，命部将高恩将武侯祠迁至南明河对岸，将原址改建成观音寺，供奉观音菩萨。南明时期所建的武侯祠在战火中倾毁，清康熙中期重新修葺（其址为今甲秀广场侧南方电网贵州公司处），新修的武侯祠曾与甲秀楼、浮玉桥、鳌矶石、芳杜洲、涵碧亭、翠微阁、海潮寺被列为民国时期“贵阳八景”。贵阳武侯祠与甲秀楼相映成趣，关系十分密切，游览甲秀楼的诗文，楹联往往提到武侯祠、丞相祠堂。明代贵州巡抚江东之在其《甲秀楼》诗中写道：“明河清浅水悠悠，新筑沙堤接远洲。秀出三狮连凤翼，雄驱双骏踞鳌头。渔郎矶曲桃花浪，丞相祠前巨壑舟。此日临渊何所羨，擎天砥柱在中流。”另有《甲秀楼》一旧联云：“葛相祠前一川静；竹王城外此高楼。”1926年，周西成主政时将武侯祠改设贵阳发电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贵阳武侯祠原址毁坏，改建成贵

州省电力局办公大楼。20世纪90年代即建成今南方电网贵州公司大厦，该楼立于甲秀广场一侧。

甲定苗族洞葬

苗族有一种古老的葬式，人死后不是土葬也不是火葬，而是以家族为单位，将棺木藏于山洞之中，称为洞葬。这种古老的洞葬，在花溪分布较多，以高坡甲定村洞葬规模最大，最为典型。在甲定龙打岩的山腰上有一个天然洞穴，它有上下两个洞口，洞高约20米，宽10~20米，深35米，洞内藏有棺木120多具，是王姓苗族洞葬。棺木用6块木板拼在一起，两头用“井”字形的木架加以固定，做成一个长方体或头大尾小的楔形，大的长约2米，小的仅长1米。先葬的放在洞底，以后陆续叠放在前面的棺木上，年复一年，堆积如山。一个洞里的棺木都是同一家族的，不分辈分，也不论男女，但死者必须是年满60岁已婚的人，早夭的、凶死的、非正常死亡或死于外地的人不能将棺木入洞。甲定的洞葬据说已有600余年历史，它保存了一种极其古远的丧葬习俗，传承了苗族的古老文化，在社会学、民族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无字天书“簪汪古歌”

簪汪古歌是苗族支系四印苗进行重大活动时，唱诵的民间口头文学。无文字记载，世代口口相传，是四印苗族最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载体。

四印苗分布地集中于清镇市麦格乡龙滩、小谷陇、龙窝、腊脚，站街镇的中寨、木林，卫城镇的迎燕、银桥、麦巷等村寨；修文县古堡乡红星、乌栗、长冲、平滩、木厂等；乌当区水田镇安多寨、火烧寨；观山湖区郝官、甘冲、杨五沟等地。这些地区海拔较高、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喀斯特地貌地形典型，为簪汪古歌的活态流传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生态条件。

簪汪古歌有别于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古歌”、麻山苗族的“亚鲁王”。簪汪古歌以民族英雄“簪汪”为叙述核心，古歌描述了人类的起源，一直到战争



迁徙、生产生活、民俗禁忌等场景，其迁徙部分有战败后从“北京”（泛指北方）出发经历的百余个地方（地名），艰难迁徙到达清镇，这是苗族其他支系的古歌中没有的。战败后，四印苗又将苗王印章绣在女性服装上保存至今。它形象具体地展现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进程。

簪汪古歌内容十分丰富，有英雄簪汪赞颂歌、建房希望歌、出生祈福歌、出嫁祝福歌、去世引路歌等。歌师在该族重大传统活动，如正月跳年场、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丧葬祭祀等场合唱诵。

从2010年发现至今，整理、翻译出的636行（只是古歌的两个片段）中，生动地反映出该民族生产、生活、迁徙、战争等内容，主要叙述了簪汪带领族人农作，渔猎，捕获“母龙”，修王城，失“龙心”，出王城，守“独州”，划界“分州”，渡海登岸，到“老王冲”，焚烧祭祀书、田契、地契、芦笙谱，然后分兵，定居贵阳的迁徙、征战过程。古歌唱诵低沉回环，有生动的场景描写和千姿百态的人物关系，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农耕、渔猎细节。

古歌传唱成为该族民间文学最为活态的一部分，是记载四印苗族群迁徙史、生活史、文化变迁史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民间文学价值和民族历史研究价值。

始于唐代的贵阳丹砂开采

古人视汞矿为珍宝，提取朱砂、水银可供药用，炼丹必用朱砂，皇帝的御批也非用朱砂不可，谓之“朱批”。在中华三千年深厚的丹砂文化史上，丹砂采冶中心大部分时间集中在贵州境内。贵阳的开阳丹砂采冶始于唐代，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有蛮州（今贵州开阳）刺史宋鼎进贡朱砂500两，五代时清镇（今贵州清镇、平坝）刺史宋朝化进贡朱砂500两。明代为了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贵州采取分区限制开采政策，明初主要集中在万山开采，务川和开阳基本禁采。万历时贵州官员为保护民生、抵制太监监矿而严禁全省开采，强令水西安氏土司专门建立一支50人的护矿土军（土司军队）驻守开阳白马附近

马鞍山，在内阁首辅沈一贯等人的全力支持下数次迫使万历皇帝收回派太监到贵州任矿监的成命，贵阳开阳朱砂场因此成为明代中国基本未受太监矿监残害的唯一矿业产区。

开阳丹砂采冶遗址主要分布在双流镇、金钟镇、永温镇一带，分布面积 200 多平方千米，是目前已调查发现的世界规模最大的丹砂采冶遗址群。开采汞矿和提炼水银都十分艰苦，甚至危及人的生命。一旦汞气泄漏，人将中毒，轻者牙齿脱落，重则致死。以汞为业的人，对“宝王”（朱砂之王）怀着敬畏的心情，敬之如神，祈求保佑，既望求业兴盛，又盼人能平安，于是建庙供奉“宝王”。

开阳宝王庙是目前已调查发现的世界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丹砂神庙，始建于明末开阳丹砂采冶开始兴旺时，1782 年重建，现仅存戏楼、关圣殿和观音殿。

开阳宝王庙矿址也是新中国早期核工业基地之一核工业部 761 矿旧址，该矿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合格原料铀，同时为新中国早期核工业提供了约 25% 的合格原料铀。



宝王庙山门遗址

第二章 宋元时期的贵阳

开宝七年（974年），矩州（今贵阳）控制者乌蛮部落首领普贵入开封朝见宋太祖，并将矩州献给大宋。宋太祖赐普贵敕书中有最早的“贵州”的记载。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占领了今贵阳地区，屯驻城中，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王朝设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驻此。

一、贵州之名太祖赐

两宋时期，地方行政建制基本上仍然沿袭唐代旧制，但是对唐代的“道”进行改制，称为“路”，成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

对今黔中腹地一带，两宋统治者均本着“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既定国策，对西南少数民族诸多防范，唯恐大理等国进犯，于是沿袭唐代的羁縻政策，以求相安无事。宋代对贵州的控制比之唐代更为松弛，乌江以北的经制州皆属夔州路，比较稳定的只有思州、播州和南平军，乌江以南则为绍庆府所领导的四十九羁縻州。

各羁縻州之间混杂一些民族政权，滋生了地方大族势力。这些羁縻州、藩国及部族政权实际上都由发展起来的各个地方大族所控制。

黔西北为罗氏鬼国、乌撒、毗那，黔西南为自杞国，黔南偏西为罗甸国及顺化九部落，黔南今惠水、长顺一带有龙、方、张、石、罗、程、韦“西南七姓蕃”，这些大部族都不同程度地与中央王朝保持一定的依附关系。

宋初，水西普贵纳土归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寰宇通志》及《大明一统志》称：“普贵，土人，开宝年间纳土归顺，赐爵以镇一方。”并录有宋太祖赐普贵敕书：“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非要服。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故我伐之……”

按宋制，归附的部落首领入朝，由皇帝亲自赐名，赐名“贵州”无非是取名吉祥之义，当时的“贵州”就专指今贵阳一地。“贵州”处在大山之中，无城郭，三五百户，府唯短垣，木栅而已，山高箐广，实为一个大的村落，俗称“黑羊箐”。

“要服”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理想的地理结构是将王畿以外按距离分为五服，每一服向外推五百里。由近至远分别是侯、甸、绥、要、荒，距王城1500～2000里者称“要服”。宋太祖赵匡胤以“惟尔贵州，远非要服”来形容贵州的遥远。

宋太祖赐普贵敕书中提到的“贵州”之名为“贵州”得名之始，到了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也以“贵州”为省名。普贵奉有明确的诏令，“爵禄、土地、人民世守如旧”，以此统治更加名正言顺，于是国势大涨。此后“罗氏鬼国”或“罗施鬼国”之名屡见于史。

在水西势力崛起的时期，大姓宋氏也在蛮州（今开阳）一带兴起。宋氏在唐代就有宋鼎与当时牂牁谢氏等诸番一道向唐朝朝贡。到了宋代，宋氏已据有蛮州和清州（今开阳至清镇、平坝一带），占有鸭池河以东的大片土地，约控制今贵阳、开阳、修文、息烽、平坝、龙里、贵定等地的全部或部分。《黔宋史略韵编》记载：宋氏为黔地大姓，迁移贵州时间最长，散布在黔中各部，其统治面积比其他姓都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宋景阳，河北真定人，宋开宝八年（975年），已经官至宁远军节度使。奉朝廷之命平定了广西诸蛮的叛乱，进兵都匀、贵州（今贵阳）等处。被封为宁远军节度都总管镇守上述各地。治理地方深得民心，柳州、庆远的多数老百姓都归附他，其中苏、赵、兰、高、察、南、容等七姓举族投奔。（道光）《贵阳府志》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

宋景阳武力将乌蛮赶出黑羊箐(贵阳),设大万谷落总管府。蛮语称“蛮”为大万,州为“谷落”,所以蛮州总管府又叫大万谷落总管府。宋景阳死后,朝廷赠太尉、谥忠成,子孙世袭其地。

二、元改贵州为顺元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进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宋室基本解体。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占领了今贵阳地,屯驻城中。当时的贵州之地依其地势而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是三省毗连的极边之地。三省往来用兵,政区随时变动,时而属湖广,时而又属四川、云南。这与贵州“一面高三面低”的地形有关,西部与云南高原紧紧相连,北面向四川盆地倾斜,东面和南面的两个斜坡向湖南、广西丘陵过渡,故有“上云南,下四川,下湖广”之说。黔中地带像一条脊梁横亘在三个斜坡面之间,山高箐广,阻碍三省交通。为了确保军事行动顺利进行,“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从而使“海宇混同”。元代大兴“站赤”(蒙古语,即驿道),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修筑驿道,纵横千里,遍布天下而达于边疆。元代在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共设站赤400余处,修建从湖广横穿贵州(专指贵阳)通云南的湘黔驿道;由贵州(专指贵阳)至云南的滇黔驿道;由成都经重庆至贵州(专指贵阳)的川黔驿道;由贵州(专指贵阳)至广西的黔桂驿道;由四川宜宾经毕节、乌撒(今威宁)、曲靖至昆明的川黔滇驿道。除川黔滇驿道外,其余4条均在“贵州”交会。

川黔驿道从成都出发,经过重庆,跨过乌江而达贵州城(贵阳)。从贵州城(贵阳)南行,有一条黔桂驿道通往广西,可以通达中越边境。最重要的一条驿道起于湖北江陵,南行过洞庭湖口,经湖南常德、桃源、晃州进入今贵州。此道横穿今贵州,途经平溪(今玉屏)、镇远、偏桥(今施秉)、麻峡(今麻江)、黄平、新添(今贵定)、贵州城(今贵阳)、普定(今安顺)、普安(今盘州)入云南。入云南后,经马龙、曲靖而达中庆(今昆明)。由中庆西行而

南折，走大理、永昌（今宝山）、腾越（今腾冲），有路通往缅甸（今缅甸）、八百媳妇国（今泰国清迈、清莱一带），并联通老挝、柬埔寨及印度。这条大驿道实际上是由湘黔、滇黔两条驿道组成，与川黔、黔桂驿道在贵阳交会，构成了贵州驿道交通的基本骨架。

驿道开通后，地处偏远的贵州，纳入全国驿道交通网络，与内地一脉相通，并可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改变了过去的闭塞状况，成为南方大通道上的必经之地。贵州成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要害地方，成为西南驿道交通枢纽，湖广、四川、云南三省联系更加密切起来，贵州的战略地位凸显，成为西南军事重镇。于是元朝廷将贵州城（今贵阳）更名为顺元城，意思是“顺服元朝”。

蒙古贵族进逼黔中的时候，曾一度企图“以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结果因脱离当地实际，计划无法实现。蒙古兵一走，各地“蛮酋又纷纷自立”。元朝廷以武力镇压无效，不得不改行“招抚”之策。下令“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并在当地开始设蛮夷官，即土司。元政府通过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一批只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机构和职官，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统治体制，土司制度由此而产生。通过土司、土官进行贡纳的征收，并从形式上保证全国范围在政治上的统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潭州行省遣两淮招讨司经历刘继昌招降西南诸番，于“八番”之地置九安抚司，并立八番宣慰司以统其地。至元十九年（1282年），置顺元等处宣慰司，以速哥为宣慰使，也速答儿为都元帅，命药刺海总领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斡罗思又设立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由于黔中地域狭小，官府多，于是合八番、顺元二宣慰司及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为一，改称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治于顺元城（今贵阳）。顺元城即宋代之贵州，其地在今贵阳市南部，《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指明“更贵州为顺元”。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辖顺元路军民安抚司（今贵阳地区）设雍真葛蛮等处（今开阳）、养龙坑宿等处（今息烽养龙司镇）、武当



等处（今乌当）、水东等处（今新添寨）、贵州等处（今贵阳）等 23 个蛮夷长官司。“八番”（今惠水）设立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程番、罗番、金石番、方番、洪番、卢番等 9 个安抚司，又设管番民总管府控制黔南地区。当其盛时，亦溪不薛宣慰司（“水西”，今毕节市）和思州军民安抚司皆受其节制。

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在顺元城（今贵阳），这个“府”是元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最高机关，宣慰使、都元帅均直接由朝廷任命，代表朝廷推行中央政令，管辖地方事务。由此，顺元城既是黔中地区的军事中枢，也是政治统治的中枢，它通过驿道的连接和军事活动，把思州、播州、亦溪不薛等地联系起来，贵州省的雏形也由此逐渐形成。

顺元城是一座土城，城址狭小，城墙不厚。有东、南、西、北四门，东门即老东门，西门即大西门，南门临南明河，原贵阳一中河对面的土城墙即为元代所筑。北门在钟鼓楼（钟鼓楼在王家巷口，即今之勇烈路口）一带。整座城以南门至北门的道路为纵轴线，东门至西门的道路为横轴线，两条街道正交的地方就是大十字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在城西南隅，旧址在今都司路。关帝庙有两座，一座在治城南门内，一座在城南三里新添关，即今图云关。则溪水自北而南流入城中，穿城而过，汇入南明河，故称为贯城河。城内居民以世居少数民族为主，也有随元军而来的蒙古人等。江西庐陵（今九江市）人彭如玉来到贵阳，在今大十字南侧不远处创建了普庵堂（后改为大庆寺、明代改为大兴寺），这是贵阳最早的佛寺。往南数百步有忠烈宫，元建，祀唐朝忠臣南霁云，俗称黑神庙，现为达德学校旧址。忠烈宫对面有忠烈桥，桥西为元顺元路儒学旧址，明代改为文明书院。大十字北侧为大道观，这是贵阳最早的道教官观。

掌故：

宋廷在南方买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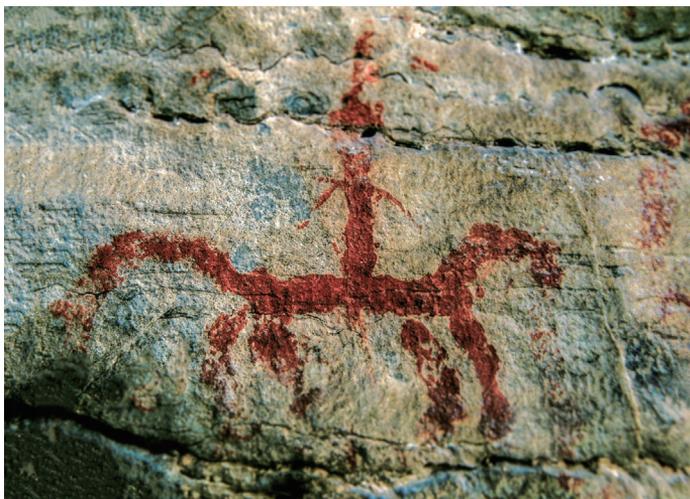
宋朝缺乏战马，是因为五代后唐末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求得契丹即后

来的辽国支持，灭后唐建新朝，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冀北燕、代，马之所生”，中原王朝失去了另一处主要养马地。从此，五代时期的中原王朝、继五代而兴的宋朝再没有建立起如汉代霍去病、唐代李靖等所率领、能够对长城以北游牧民族予以致命打击的骑兵。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职业军人身份建立王朝、屡经战阵的宋太祖，对战马、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北宋建国后，马匹就成为北宋朝廷急需解决的战备物资。于是宋廷在南方四川先后建立起了以黎、雅、泸、叙等州为中心的马市。由于川黔两地相邻，当时黔北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罗氏鬼国所产马也运往四川互市贸易。

到了宋室南渡之后，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与金、蒙古频发战争，当时长江以北广阔地区已被金人所占，川马运输成了问题，于是宋廷又开了广西马市。由于贵州特殊的区域位置，连接广西、云南两省，贵州便成了大理国与广西进行马匹交易多条通道的必经之路，处于宋廷与大理国买马道上的贵州自杞、罗甸等国便充当了“马贩子”的角色，自杞、罗甸等国日益发展成为南宋重要的边马供应地和马匹贸易的中转站。这使得宋王朝不得不重新考量贵州在西南地区的交流纽带作用，这一认识在此后元、明两朝逐渐加深，对贵州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开阳画马崖

开阳画马崖是贵州现已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它由小岩口、大岩口和梯子岩三处岩画组成。画马崖在开阳县高寨苗族布依族乡平寨村的顶驮山崖上，因马在画中占有突出地位而称“画马崖”。它以赭石为颜料作图，画有各种图像百余个，以小岩口图像最多，画面宽12米、高1.6米，其次是梯子岩，大岩口仅有图像十余个。图像有太阳、马匹、人物及狗、牛、鹿、山猪等动物，还有若干神秘的圆点。画法古朴、简洁、自然，多是用线条勾勒。太阳是古人最崇拜的自然物，图中的太阳有的放在显著位置，有的夹杂在人物、动物图中，有的光体大而光芒短，有的光体附近有星辰。人物均为正面，用线



开阳画马岩

条画出四肢，或骑马，或舞蹈，或持矛、盾，梯子岩画中的巨人高约 0.9 米，宽 0.5 米，在南方岩画中极为罕见。画马形态多样，有的慢行、有的奔跑，马上的人或正坐或侧坐、反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岩画大都在临河的山崖上，开阳画马崖就在清水江边的山岩上。这与古代的自然崇拜有关，画出各种神奇的图画以“镇邪”，故大岩口和小岩口都有民间书写的“泰山石敢当”的避邪字样，还留下道光十三年（1833 年）的一段巫师做法事的文告。岩画的时间久远，可能出现在图画文字时代，也可能是各时期不断增补而成，没有确切的年代。它所反映的是古代的生活情景，是狩猎图，是风俗画，是神秘的图景，是千古之谜，在许多民族中都流传着神话故事。这种古老的图画，是艺术史上的珍品，《中国美术史》收录了开阳画马崖的图像。画马崖展示了古人的生活情景、原始信仰和丰富的想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贵阳最早的佛教寺院

大兴寺地处繁华的大十字南面大街上 100 米左侧，元朝至正年间（1341—

1368年），江西庐陵（今江西省九江市）商人彭如玉来到贵阳，在此创设普庵堂，供祀普庵祖师。其后僧人真贤继承其业，改名大庆寺。到了明代，寺庙不断修复拓建，规模宏大，寺内有四大天王殿、山门、寮舍，又塑三圣、毗卢诸佛像及观音、地藏、十八罗汉像，寺前庭院广植松柏，又建围墙环绕，镇远侯顾成祭明蜀王，遂改名为大兴寺。明万历年间，贵阳绅民为缅怀贵州巡抚郭子章（江西泰和人）平定播州之乱、治黔有方，在大兴寺内建郭青螺（郭子章号）祠，又建武庙于寺中，春秋祭祀。清朝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贵州巡抚阎兴邦重修关圣殿。雍正时又重修毗卢殿，乾隆时重修大士殿、准提殿。大兴寺自清中叶以后，佛殿年久失修，信众逐渐减少，逐渐改建为学堂。到了1931年拆门外石坊、石墙，将寺院前部改建为明星电影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兴寺成为百货大楼的一部分。

大兴寺大殿前原有井，名“灵泉”，传说月出没时，虽偏在东西，泉中皆见影，明代“灵泉印月”说的就是这里。“灵泉”相传泉水甘冽，入口略带涩味而后回甜，因此俗称“涩泉”，是优质的矿泉水，可与云南玉溪市北城镇的“涩水”媲美。旧时，每年入夏，城中人争相汲取，用来解溽热、止干渴；用来制作夏令小吃“水晶凉粉”。水晶凉粉色白透明，不夹气泡，以蜜饯木瓜、刺梨作拌料，入口即化，凉透心脾，是当时贵阳消夏食品中的名点。“灵泉”煮沸以后，用来沏茶，茶香醇厚。揭开茶盅盖碗，缕缕蒸汽上升，虬结盘曲，结成龙形，一时之间挥之不去。

第三章 明代贵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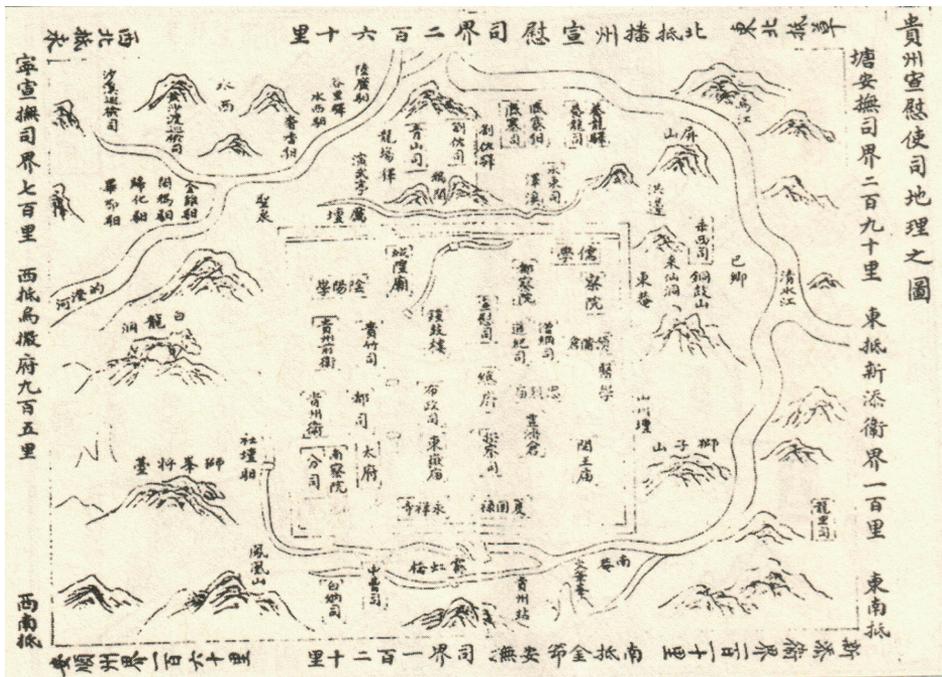
明朝时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军政分管”。明洪武五年（1372年），水西宣慰霁翠、水东宣慰宋蒙古歹（宋钦）归附，二土司合并为贵州宣慰司，司置顺元城，改称“贵州宣慰司城”。明朝在贵州遍立卫所，实行屯田，整治驿道。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建立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任命蒋廷瓚为第一任布政使。该机构又是省一级最重要的机构，因此后人即以此年为贵州建省之始。明隆庆二年（1568年），程番府从定番（今惠水县）移治于今贵阳地，遂设贵阳府，这是“贵阳”一词作为行政地区名之始。其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名贵阳军民府。

由于交通的改善，商人、工匠纷至沓来，活跃了贵州山城的经济。如湖广、四川有大批商人来到贵州从事商业活动。中原文化在建省以后广为传播，王阳明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悟出“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创办了龙冈书院，开贵州书院讲学之风；传道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贵阳因此被称为“王学圣地”。

一、明朝建立宣慰司

明代黔中地区有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两大土司，水西土司霁翠在元代为四川行中书省左承兼顺元等处宣慰使；水东土司宋钦，因征讨有功，元朝赐其名为“蒙古歹”，归顺明朝后又赐名为宋钦。对土司的归附，《明史》记载，“西

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就是说，土司有愿意归附者，则重新授予元朝任命的职官。洪武四年（1371年），元朝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投降，明朝遂废宣慰司都元帅府，并于贵州城北门附近的顺元军民宣抚司旧署置贵州宣抚司，命霁翠等在贵州宣抚司任官。贵州宣抚司有一定的临时机构性质。洪武五年（1372年），水西土官霁翠与水东土官宋钦入朝，朝廷遂将两者合并为贵州宣慰司，以水西土官霁翠任宣慰使，水东土官宋钦任宣慰同知，设司署于贵州（今贵阳），称“宣慰司城”，隶四川行省。洪武六年（1373年），明廷为笼络霁翠、宋钦，还以诏书的形式确认贵州宣慰司的地位高于其他宣慰司，《明太祖实录》载“诏贵州宣慰使霁翠位居各宣慰之上”。贵州宣慰司的地域，



明代贵州宣慰使司地理图



包括“水西”和“水东”两部分。贵州宣慰司的建立，标志着元代鸭池河两岸的水西土司、水东土司被正式地统合到一个“宣慰司”之内，进而形成一个整体。

水西、水东民族不同，制度也不一样，将此两大土司合为贵州宣慰司，目的在于使之互相牵制，以便朝廷控制，以使两者维持相对均衡的态势，能够十分有效地避免其中一方的实力过于强大，以至吞并另一方，进而出现一个明朝难以控制的强大土司。

安氏作为彝族土司，以“夷罗民四十八部”为基础，将领内划为十三则溪。“则溪”作为行政单位，兼具民政、财政与军政职能。以彝族为主并包含各民族在内的土民，皆被束缚于则溪之内。安氏在鸭池河以西设十一则溪，鸭池河以东设两个则溪，称为“水外六目”。宋钦家族亲领的水东之地，境内除汉族移民外，还有布依族先民（仲家）、苗族先民（东苗、西苗等）等诸少数民族。“马头”是宋氏土司建立的非正式行政单位，也是这些非正式行政单位长官的称谓。马头制度的运行模式与内地的里甲制度有一定相似性，大多数的马头均由宋氏宣慰使直接委任，但也有向长官司过渡性质的世袭马头。宋氏亲辖的“洪边十二马头”，即十二个征收赋税的区域。

安、宋两宣慰使、同知都在贵州城内的贵州宣慰使司办公，而公署的“两庑”则分属安氏与宋氏。以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贵州建省以后，宣慰安氏、宣慰宋氏不愿时刻处于流官监视之下，遂频繁往返亲领之地与贵州城之间，成化以后甚至开始常住水西、洪边，以避免长居于贵州城。安氏住宅在城北三里则溪地，俗称宅吉坝。城北二十里的云锦庄为宋氏别业，小桥流水、楼台亭阁，为贵阳一景，庄前有“大明□□将军贵州宣慰使宋公墓”，墓志铭为篆书，今存乌当文管所。

贵州宣慰司领贵竹长官司（治今贵阳市郊）、水东长官司（治今贵阳东北郊）、中曹长官司（治今贵阳中曹司）、乖西蛮夷长官司（治今开阳县西北）、青山长官司（治今息烽县青山乡九庄）、白纳长官司（治今花溪黔陶乡）、扎佐长官司（治今修文县扎佐镇）、底寨长官司（治今息烽县西南底寨）、养龙

坑长官司（治今息烽县养龙司镇）、龙里长官司（治今龙里县）。又在鸭池河上设陆广河巡检司、沙溪巡检司、黄沙渡巡检司，控制水东、水西交通。这十个长官司，元代均属顺元路。

极盛时又领程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程番）、小程番（治今惠水县东北小程苑）、大龙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南大龙苑）、小龙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南小龙）、卧龙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卧龙）、方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东南方番城）、金石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西南下金石）、韦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南韦番）、洪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西南洪番）、卢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东北卢番）、罗番长官司（治今惠水县城南罗番苑）、上马桥（治在今惠水县东北上马桥）、卢山长官司（治今惠水县西南卢山镇）、木瓜长官司（治今长顺县陆化）、麻响长官司（治今长顺县麻响）、大华长官司（均在今长顺县代化大华）、平伐长官司（治今龙里县境）、大平伐长官司（治今龙里县境）、小平伐长官司（治今贵定西南谷撒把平寨）、丹平长官司（治今平塘县通州镇西南）、丹行长官司（治今平塘县西南）、羊场长官司（治今龙里县羊场镇）、把伐长官司（在今贵定县境）等二十三长官司及金筑安抚司（治今长顺县广顺镇）。这一地区，元代为“八番”之地，可以看出贵州宣慰司之地即元代八番顺元宣慰司地。

贵州宣慰司地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万历）《贵州通志》记载，“本州隶属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习，一如中华”“土著诸夷，种类不同，俗尚各异”：曰罗罗者，即古鸟蛮；曰宋家者，其始中州裔；曰蔡家，与宋家杂处；曰龙家，亦用汉人文字；曰曾竹龙家，其俗与龙家同；曰红侗佬，妇人以毛布染红作裙；曰花侗佬，裙用五色；曰东苗，首以织花布条束发；曰西苗，俗同东苗；曰仲家，多楼居、好衣青衣。

二、贵州遍地设卫所

明军进入贵州后，废除了元代遗留下来的统治机构，建立了土司和“流官”

统治体系。朱元璋认为贵州能“肘腋咽喉四省”，实为“西南之奥区”，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于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建贵州卫指挥使司于宣慰司城，与成都卫、武昌卫互为犄角，达到控制西南地区目的。贵州卫驻城西南卫坡（今都司路近次南门处），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置于卫司之南，控扼驿道，防守关口，设有龙洞、梅子、界牌、牛路、北关、干沟六哨。不仅将当时的贵州城（今贵阳）打造成了整个贵州高原的军事指挥核心，更为其后贵州建省，贵阳成为省的治所奠定了基础。

贵州卫与贵州宣慰司同治于贵州城，有“奉王命，以讨不臣”的职能。土司与流官分享治城，其目的就是制衡土司。贵州卫士卒多健俊之士，不乏长期追随明太祖征战的江淮老兵，战斗力较强，且指挥官能力出众，如贵州卫指挥佥事张岱、贵州卫指挥同知胡汝、贵州卫指挥顾成等，故能频繁地参与明王朝的军事行动。

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朱元璋决定远征云南，剿灭盘踞云南元朝梁王势力。朱元璋以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大军自南京经浙江、江西、湖广进入贵州，再经镇远、偏桥、平越、黄平、新添、龙里、“贵州”（今贵阳）、普定、普安直抵云南曲靖，偏师从四川出发，经毕节、乌撒入云南。两军在曲靖会师，逼梁王决战，一举将其军队歼灭，三月便将云南平定。云南平定后，朱元璋感到忧虑的是“大军一回，云南又成孤悬”“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于是明军在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和川黔滇驿道上设立卫所，保证驿道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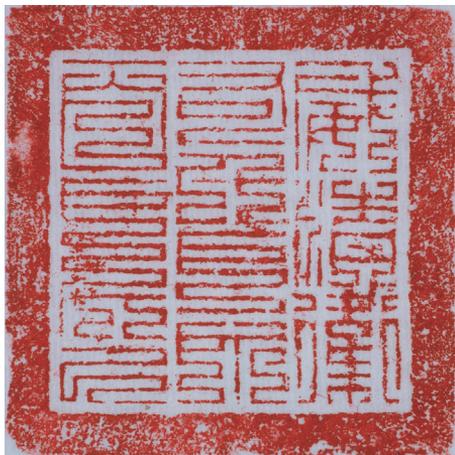
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统领十八卫和两所。都指挥使司设在“贵州”而称为贵州都指挥使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调陕西都指挥使程暹为贵州都指挥使。明代制度，宣慰司一级的土司须受地方武职约束。贵州宣慰司正式被纳入贵州都司的管辖体系之下。贵州都指挥使司所用官署是元代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旧址。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建立，代表着由“流官主政”政治传统的恢复，而启用元代八番顺元等处军民

宣慰司都元帅府旧署，而非另建新署，正是为了向霭翠等土司宣告这一点。不久，明政府从贵州卫中分设出龙里、新添、威清、贵州前4卫，崇祯年间又置敷勇卫（今修文）、镇西（今清镇卫城）两卫。

贵州都指挥使司驻贵州宣慰司城，以贵州卫、贵州前卫拱卫都司，史称“居中二卫”；在贵阳以西设威清卫（今清镇）、平坝卫（今平坝）、普定卫（今安顺）、安庄卫（今镇宁安庄）、安南卫（今晴隆）、普安卫（今盘州），史称“上六卫”；在贵阳以东，设龙里卫（今龙里）、新添卫（今贵定）、平越卫（今福泉）、清平卫（今凯里）、兴隆卫（今黄平）、都匀卫（今都匀），史称“下六卫”；又在川黔滇驿道上设乌撒卫（今威宁）、毕节卫（今毕节）、赤水卫（今川黔交界的赤水河）、永宁卫（今四川叙永），史称“西四卫”；而将湖广都司在贵州设立的镇远卫（今镇远）、平溪卫（今玉屏）、清浪卫（今镇远青溪）、偏桥卫（今施秉）、铜鼓卫（锦屏）、五开卫（今黎平）称为“边六卫”，共计24卫。

明军以卫为单位，完全占据了今贵州省境内的交通要冲与战略要塞。明朝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立的卫所多达30个，这些卫所大都分布在驿道干线上，与

明代威清卫千户所百户印



土司领地相间杂，目的在于贯彻朱元璋“霁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的战略意图，以满足对贵州全境军事扼控的需要。后来，设置卫所的地方逐渐实行“改土归流”，不断扩大流官统治区域。明代及清初所设府、州、厅、县，大都在曾经设过卫所的地方。直到今日，许多地名仍保留着卫所的痕迹。例如贵阳清镇市，就是威清卫的“清”和镇西卫“镇”字结合而成。

三、贵阳迎来大移民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平定云南，为了巩固云南边防，确保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诏谕水西、乌撒、东川、芒部诸酋长修筑道路，宽丈余，以六十里为一驿，十里或二十里设一递铺。设置卫所时，考虑到军队调动的方便，一般将卫所设置分布在驿道沿线，逐步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驿道干线网络。贵阳以东为湘黔驿道，设有贵州（今贵阳）、龙里、新添（今贵定）等12驿及贵州、龙里、新添、兴隆、东坡5站，东出沅州（今湖南芷江）经常德以通江陵。这条驿道是南方的一大通道，沿驿道可达江陵，它是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北通襄阳、南阳、郑州、保定而达大都（今北京）；溯江而上可达奉节、万县（今万州）、重庆、泸州；顺流而东可达武昌、安庆、金陵（今南京），把贵州与中原及长江流域联系起来。

贵阳以西为滇黔驿道，设有威清、平坝等十驿及威清、沙作等12站，又设亦资孔（今盘州亦资孔）递运所，出平彝（今云南富源）以通昆明。这条驿道也是一条国际大通道，通过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之路、中国与东南亚友谊之路，各国使节往来不绝。在镇远祝圣桥上的魁星阁前，原先有一副抱柱的楹联，上面刻有“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这个富有诗意的楹联，并不是墨客骚人凭空的浮想，而是当年驿道经过镇远、贵阳、昆明到缅甸等国的真实写照。缅甸自元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缅人骑象进京朝贡，持续了好几百年。明朝设缅甸军民宣慰司，缅甸朝贡不绝，朝廷在“四夷馆”中还特别设了一个“缅甸馆”。洪武年间，缅甸使

者与思州宣慰使田大雅在镇远相遇，一同结伴进京。

贵阳以西北为龙场九驿，此道为水西女土官奢香所开，设有龙场驿（今修文）、六广驿（今修文六广）、谷里驿（今黔西谷里）、水西驿（今黔西）、奢香驿（今黔西西溪）、金鸡驿（今大方、黔西间）、阁鸦驿（今大方、毕节间）、归化驿（今大方、毕节间）和毕节驿，在毕节与川滇驿道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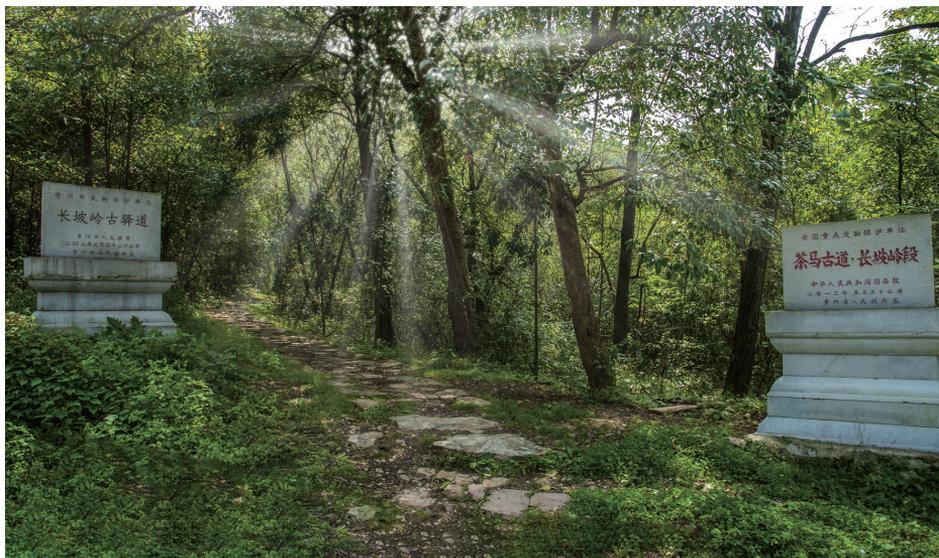
贵阳以北为川黔驿道，设有扎佐（今修文扎佐）、底寨（今息烽底寨）、渭河（今息烽境）、养龙坑（今息烽养龙司）等 11 驿，出安稳驿（今川黔交界处）以通重庆。

贵阳以南为黔桂驿道，贵阳至平越一段共同使用湘黔驿道，然后折向南经都镇、来远（均在今都匀）二驿，过独山、荔波县以达广西庆远府（今广西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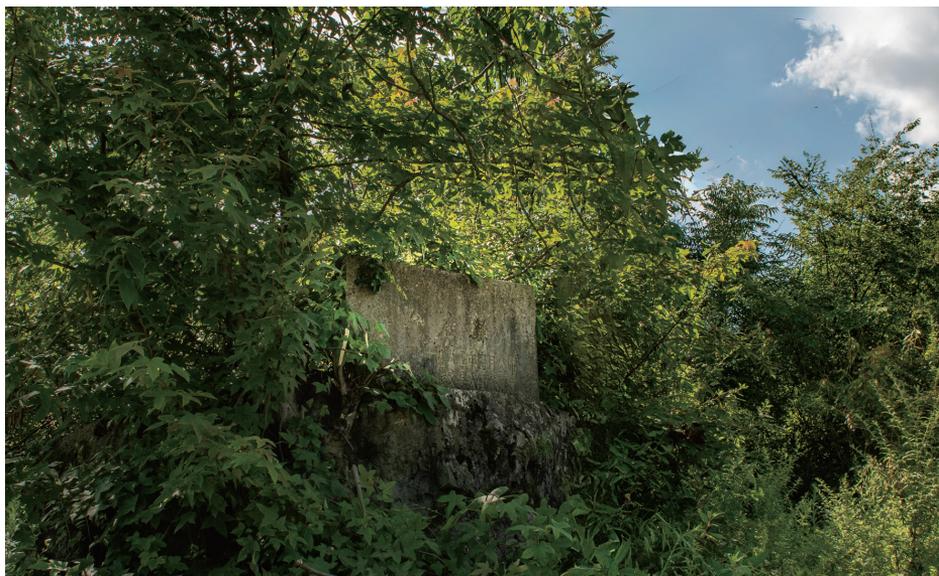
这条大道上军旅往来如织，过往官员络绎不绝，外地移民沿驿道源源来到贵阳，云贵的文士也经驿道赴京考试。明朝万历年间，贵州巡抚王缙、巡按马呈图上了一道《移云南协济议》，要求云南增加驿道开支的经费：“据贵州按察使驿传道呈称，查得贵州驿站，万历七年（1579 年）自正月日起至十二月终止，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百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只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以十分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只及三分。至于上六卫（贵阳以西）、西四卫（黔西北）各驿站不下数十，尽皆云南过客，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仅在一年之中，云南过往贵阳的马加上贵州过马就有 4000 余匹。

贵阳还有通往龙里、贵定、开州（今开阳）、六广（今修文六广）、威清（今清镇）、广顺（今长顺）、定番（今惠水）、大塘（今平塘）的各条道路，四面八方的驮马云集贵阳，所以在南门外有一条供驮马歇息的“马棚街”（今新华路），城南有“大马槽”（今博爱路），次南门外有驿马坡，城中有供奉马王的天驷宫，城外有马王庙。

驿道的开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粮饷供应的问题，但贵州地广人稀、



长坡岭古驿道遗址



六广驿遗址

劳动力严重不足，军队粮食供给不足始终是个棘手的难题。于是朱元璋经过反复考量，决定以军民开垦屯种。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大兴屯田。屯田分军屯、民屯、商屯三类：卫所皆有屯田，“军食自贍”，就地屯种，谓之军屯；官府“招徕游民”，择地屯种，隶于府州，谓之“民屯”；募盐商于缺粮处招民垦种，谓之“商屯”。贵阳地区，三种屯田皆有，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商屯仅明初在贵州卫实行过。

明代在贵州设置卫所的同时，开始了大量移民。如果以一个卫 5600 人计，即有十余万驻军进入贵州。明代还规定屯军须带妻室前往屯地，即世为军户。若以此计，则移入贵州的人口应在二三十万。军屯属卫所隶于贵州都指挥使司，每卫有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以百户所为单位建立屯堡，贵州



朱昌营盘坡城堡遗址



卫、贵州前卫、威清卫、龙里卫、新添卫各有五十屯堡。贵州、贵前二卫的屯堡以百户长官命名的居多，如孟官、金官、陈官、李官、郝官、窦官之类；有的直接以开屯百户官姓名命名，如秦棋堡、刘士连堡、胡朝堡、袁方堡；以地名命的如青岩堡、龙洞堡、洛湾堡；以里程命名的如八里屯、五里屯；以出产物命名的如斑竹堡、杨梅堡、李子园堡、毛粟堡。威清卫的屯堡，以千户所名称加百户所编号命名，如中千户所一百户所屯堡为“中一”，依次而有中二、中三……中八、中九、中十。依此命名法，“前一”即前千户所第一屯，“后五”即后千户所第五屯，“左二”即左千户所第二屯，“右四”即右千户所第四屯。明代贵阳地区共设屯堡 250 处。屯堡围绕卫所，星罗棋布，这些卫所屯堡就是移民新村，也就是汉人的村落。为解决军粮，这些卫所屯堡先是作为军屯移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据点。由于食盐、布帛、农具等日常生活品的需要，不少军屯村落发展成为定期的贸易场所，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这样，卫所所在地不仅有行政管理职能，而且经济因素的内容也不断增多，不少发展成当地相对发达的乡镇，经济实力大多很强盛。如贵阳市花溪区的青岩古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极具魅力，有“贵阳南大门”之称。

由于军户皆来自农耕发达地区，到黔中地区后仍按原先的方式耕作，无形中把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了进来，迅速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面貌。昔日的不毛之地，在这些来自江南的军人子弟手里，变成了千里良田。他们把中原和江南的农业技术、耕作制度、兴修水利、改良田土、发展牛耕、改进农具、培育良种等制度和技術带进贵州，辐射黔疆四方农耕。明代贵阳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加，粮食品种如稻谷、大麦、小麦、燕麦，有“麦之类五”“豆之类十”之说，稻谷又分红稻、白稻、糯稻。据许瓚《滇行纪程》记载：“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酒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万历年间，贵州卫屯田 44869 亩，贵州前卫屯田 37056 亩，威清卫屯田 41350 亩，龙里卫屯田 63147 亩，新添卫屯田 26885 亩。

中原“农历”在贵阳得到推广。永乐年间，贵州宣慰司设立“阴阳学”，

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农历”。由于“农历”比之少数民族原先的自然历法进步，很快得到采用，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大都在正月过年，并按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业生产，以十二生肖和干支推算年、月和日。

民屯属府州而隶于贵州布政司，明政府在“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下，将内地“狭乡”（地少人多之地）之民移往“宽乡”（地广人稀之地），并由官府招徕游民、罪徒，黔中是移民的重点区域。移民就宽乡，虽然也是集团性移民，但不像军屯有严密的组织。移民到达后，由官府择地安插，发给耕牛、农具、种子，三年内不征粮，三年后起科，征收赋税。不设屯堡，聚族而居，实际上是移民聚居的汉寨，与苗寨错杂而有区别，编入户籍，计亩升科。

据《贵州通史》所载，洪武五年（1372年）建立贵州卫后，军粮严重匮乏，而当时，尚无军卫屯田，故于次年贵州卫急奏：“岁计军粮七万余石，本州及普定、播州等处发征粮一万二千石，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以给军食。”在政府的鼓励与提倡之下，商人为了牟利纷纷来到贵阳地区，或挽运外地粮食，或就地募民屯种，但无论何种手段取得的粮食，最终都以商品形式卖给卫所官兵，同时换取购销食盐的“盐引”。取得购盐凭证“盐引”之后，又从产盐地将食盐运到贵阳进行销售。这是一种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因为城中不可一日无粮，也不可一日无盐，所以米和盐的贸易，一直是贵阳的经济命脉。米的供应虽然在屯田兴起后有较大缓解，但田土贫瘠，所产粮食仍不敷人口增长的需要，贵阳城的食米主要靠定番运来，故定番米三日不至，贵阳即成“饥荒”。食盐最初是销沿海一带的浙盐和两淮盐，后因商人感到路途过于遥远，逐渐以销川盐为主，运销食盐的商业长盛不衰。以后，各卫所均按此法。这种招商输粮而给予“盐引”的办法，后来发展成商人在边疆地区招募民众垦荒屯种交粮，这种商人管理的屯田就是商屯。

在明初“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下，数十万卫所官军、商屯、民屯及流寓官民进入贵州，大批匠户也随之而来。“匠户”的到来，让贵阳手工业兴起，他们随军而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筑城池堡垒、官署军营，铸造刀枪、

火器，生产各种军需民品。明代的匠人一律编入户籍，终身为匠，世代承袭，称为“匠户”。匠户与一般军户、民户不同，他们已脱离农业生产，专精一业，或以师带徒，或父子相传，技术比一般人高。这些匠户都来自中原、江南、湖广等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匠户的进入实际上是给贵阳输送了一批技术力量，推动了贵阳手工业的发展。贵州建省以后，在贵阳设有军器局、织造局、杂造局和冶铁所。织造局的任务是生产各种布帛，缝制官服及军伍被服。杂造局生产日用必需品，烧造石灰砖瓦陶瓷，制造各种用具。由于兵器、农具和工具都需要用铁，所以专门设置冶铁所。这批官办局所的出现，是贵阳手工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规模、组织和技术，都远远超出民间的家庭手工业。

明代中叶以后，对匠户制度做了较大改革，匠人一般都改作“以银代役”，称为“班匠银”。自此以后，匠人为了谋生并交纳班银，纷纷自立门户，建立手工作坊，从而把城市手工业推到一个新的阶段。“绣衣坊”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有不少裁缝、绣匠云集街市。图云关原为油榨关，当年在此设有榨油房，以后竟发展为榨油一条街。当时市面上有皂靴、雕漆器、马鞍、皮包等出售，说明有些匠人靠生产这些物品为生。当时贵阳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已有很高水平，成化五年（1469年），钦差巡抚贵州都知监郑忠至贵阳，欲铸大铜钟一口，悬于省城大兴寺，经多方查访，命洪飞做铸匠。钟成，高四尺有余，钮长一尺五寸，口周一丈六尺，重三千斤，铜质斑斓，制作精雅，钟面铸隶书大字四行，曰：“皇图巩固，帝道遐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钟现存贵阳黔灵山弘福寺，反映这一时期贵阳铸铜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由于大规模修建城垣、桥梁、道路、衙署、军营、民房，烧造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贵州山区石灰石遍布各地，且木材、煤炭资源也很丰富，烧制十分方便。另外，贵州工匠在建筑上还有一独特之处，即用一种野生的羊桃藤汁拌入石灰之中，可使黏合更加牢固。

随着贵州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巡抚刘大直募江浙纸匠于渔浦湾设立纸厂，制造各色纸张，市民子弟学习“至今赖其利”。

龙里卫也设有纸局。当时贵州的纸不但量大，而且质量较好，除本省使用外，还销往云南。由于贵州纸物美价廉，昆明城内用的纸基本上是贵州出产的。贵阳还出产“饴糖”，民间俗称麦芽糖，又称糍粑糖，系用糯米等粮食充分熬烂，煮成稠粥，再加麦芽发酵使之糖化，熬制而成，是制作各种糖食的原料。贵阳府还产一种“水胶”，又称“牛皮胶”，以动物皮革，主要是牛皮，经石灰浸泡后，用火熬制而成，成黑褐色硬块，使用时加水熬成稠汁，可做黏合剂，木工制作家具时使用最多。

明代，屯田戍边推动了第一次移民贵阳的高潮，大批汉族人口移居贵阳，改变了贵阳民族结构，提高贵阳生产力水平，对中原王朝将贵州纳入国家有效管理和开发，起到立竿见影作用。

四、贵阳设府成省会

（一）贵州成为第十三个行省

明朝建立，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制度，在同一省区之内设立三个机构，都指挥使司掌军事，布政使司掌行政，提刑按察司掌刑审监察，谓之“三司并立”，使之互相制约，听命于朝廷。因管理地方行政的机关是布政使司，于是以布政司取代行省之名。北京称“北直隶”，南京称“南直隶”，分全国为十三个布政司。《明史·地理志》谓：“布政司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江西、曰湖广、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

贵州是明代第十三个布政司，即第十三个行省。从历史上看，清代设十八行省，民国设二十八行省，当今全国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区三十四个，由此看来，贵州建省在全国是较早的。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看到贵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洪武十五年（1382年）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以军事控制驿道、控扼土司。随着中央政治权力的渗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统治的社会基础逐渐动摇，加以卫所又星罗棋布地插

入土司地区，对之进行严密控制，并不断施加影响。于是朝廷利用各种机会，逐步裁废了一批大小土司，以其地改置府、州、县，设流官管理。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宣慰司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司宣慰使田宗鼎因为争夺朱砂矿井，历年争战不息，朝廷知晓后屡禁不止，于是朝廷派镇远侯顾成率官兵五万讨伐，以解决“二田”争端。“二田”被擒械送京师禁锢。朝廷遂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革除，以思州宣慰司地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4府，以思南宣慰司地分设思南、铜仁、镇远、乌罗4府。并在此基础上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简称：贵州省布政使司）于贵阳，以蒋廷瓚为布政使，蒋廷瓚成为贵州省第一任省长。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标志着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划自此开始。

“贵州”本贵阳一地之名，因宣慰司衙门设在“贵州”而称贵州宣慰司，都指挥使司设在“贵州”而称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卫、贵州前卫也因“贵州”得名。同样布政使司因设在“贵州”而称贵州布政使司。从此，原先专指贵阳一地的“贵州”便成为省名，至今六百多年不改。不过，当时的贵州省仅领8府、3州（安顺、镇宁、永宁）、贵州宣慰司及长官司。终明之世，贵州布政使司所领，除贵州宣慰司外，有10府、9州、14县，后屡经划拨调整，到清雍正年间，方形成今天的境域。永乐十八年（1420年），置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掌全省刑名按劾之事，有“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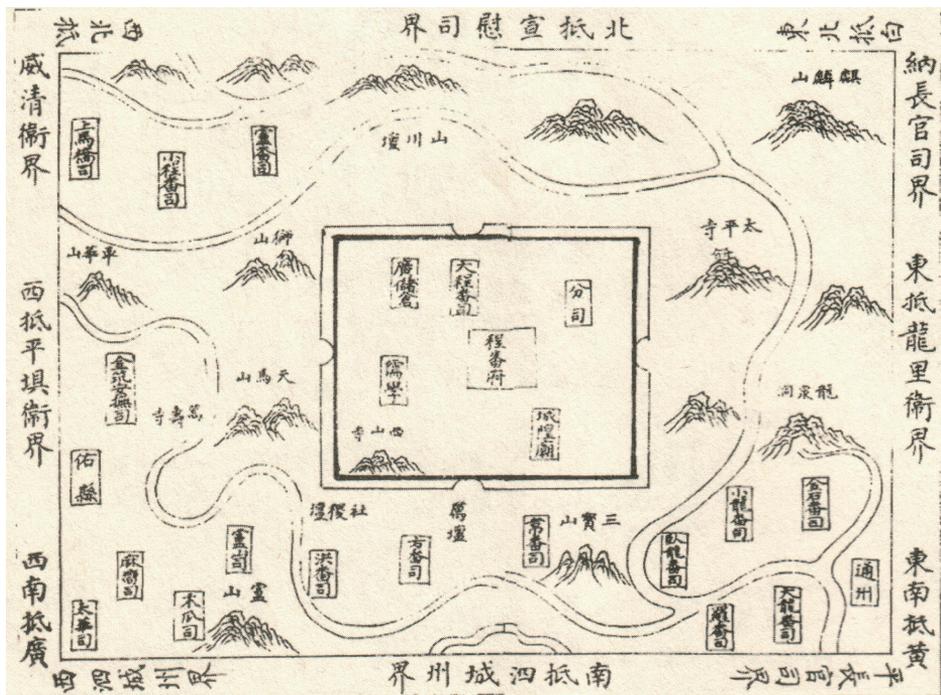
至此，都、布、按三司均已相继建立，统治机构已臻完备。作为省级行政区划标志的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设立，永乐十一年（1413年）成为贵州建省之始。

当时，论土地，贵州的面积比其他各省都小，只是现今贵州面积的三分之二；论人口，军民加起来只有100多万人；论社会，全省皆土司地区；论财赋，“不如江南一大郡”。贵州在明代为何建省？郭子章在《黔记》中写道：“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汀，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他一语道破贵州建省的根

本原因是驿道所经，从湖广通云南的大驿道以贵州为喉襟，云南进出必经贵州，川黔滇驿道也经贵州，为了确保云南边疆巩固，贵州必须建省，何况，四川与广西交通须经川黔驿道和黔桂驿道，通过驿道把西南各省连成一气。贵州建省后，云南边疆巩固，再没有出现南诏、大理自雄一隅的状况，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连成一片，有利于国家统一。

（二）贵阳设府

贵阳设府的先声是程番设府，这一过程最早可上溯至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朝经营贵州之初，就将韦番、卧龙番、小龙番等安抚司降为长官司，并废除木当等蛮夷长官司，编为木官、克度、通州三里。这些土司与里分布在



明代贵州程番府地理图

偏离驿道的广阔地域内，名义上虽隶于贵州卫，但后者并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管辖。正统年间（1436—1449年）曾略加调整，将原隶贵州卫的金筑安抚司直隶贵州布政司，领木瓜、大华、麻响三长官司，其余长官司改隶于贵州宣慰司。但这些土司依然远离流官机构，难以节制。成化十二年（1476年），程番长官司方勇声称愿意开设府治，于是明廷在地势平旷的程番长官司地设置程番府，统领金筑安抚司并上马桥等十七长官司，包括了现今贵州省的贵阳、开阳、惠水、长顺、修文、息烽、贵定、龙里、罗甸等市县，并修城池，设学校，编原住民入籍。由于都、布、按三司及贵州宣慰司均驻省城，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城内事务无人管理，于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增设程番府通判一员，驻扎省城，专管支放粮饷。

隆庆二年（1568年），为保证明朝廷能够真正对省城百姓进行有效管理，黔抚杜拯与巡按王时举等官员向朝廷疏请在省城设府，他们考虑到原住民的抵制以及经费等因素，提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就是可以保留土官，不再请求添设新府，但将程番府治所移至省城，并将平伐长官司与贵竹长官司改流，设二县，隶程番府。

杜、王二人的奏疏得到了朝廷官员的支持，但是，杜拯的继任者赵锦对此却提出异议，他同意程番府治所移至省城，并要求更改程番府这一带有蛮夷色彩的名字。但对改流设二县之事他深表疑虑。他建议先移府，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考虑改土归流，并二司为一县。

隆庆三年（1569年），程番府更名贵阳府，贵阳正式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开始于此。这也标志着贵阳作为贵州省会城市的确立，同时也体现了明朝对贵州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贵阳府兼管军、民两政，地位重要，贵阳府升为贵阳军民府。省城设府后，程番旧治只设通判一员驻镇，明廷对此地的控制权相对削弱。府学远在贵阳，程番的学生求学不便。赋税、徭役征派也遇到困难。万历十四年（1586年），贵州巡抚舒应龙、巡按毛在疏请在程番设置定番州，

请求将贵竹、平伐二长官司改土归流，加上归化、新哨二里，并为一县，附郭贵阳。这一提议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便获批准。但置县附郭之议仍然受到兵科给事中顾九思等许多官员的质疑，没有通过。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改流设县之事才得到朝廷批准，于是贵竹司更名为贵竹乡，辖南隅、西隅、北隅、谷池、归化、新哨等六里（不是计算长短的里，是指基层行政区域的里）；以原平伐长官司地改设平伐乡，辖上牌、下牌、江肘、谷广等四里。新贵县共辖十里。万历十八年（1590年）新贵县署设在贵阳城内东南，其地即后来的贵筑县署所在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新贵县原属平伐乡的一部分划出，加上定番州的一部分，成立贵定县，隶于贵阳军民府。清初将卫所并入州县，贵定县迁至原新添卫城，原贵定县改称“归治”，即今贵定县归治镇。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金筑安抚司地移入汉人日多，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今长顺县）。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因水东宋氏土司参与“奢安之乱”，朝廷平叛后将水东宋氏土司革除，以其亲辖“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今开阳），并将宋氏在贵阳附近之地改为贵阳府亲辖地，又以水西安氏“水外六目地”改设镇西卫和敷勇卫，安氏土司退出贵阳。

至明末，贵阳军民府辖有新贵县、贵定县、开州、广顺州、定番州。贵阳军民府亲领中曹、白纳、养龙坑、虎坠等四长官司。贵定县领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新添等四长官司。开州领乖西长官司。定番州领和番、小程番、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卢番、方番、韦番、洪番、罗番、金石番、上马桥、卢山、木瓜、大华、麻响等十六官司。实际控制了贵州宣慰司全境。

五、两度修建贵阳城

明初的贵阳宣慰司城（贵阳）基本保持元代顺元城的原貌，明代先后两次大规模兴建贵阳城，形成了后贵阳城的格局。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马烨将原“土筑城墙”



改为石城墙，并向北扩展城池。城周九里七分，高二丈二尺，修建了城门、月楼、水关等设施，其规模和坚固性远非顺元城可比，一般人称这座城为老城或内城。

贵阳城的东门因系军事要隘，取名武胜门；南门在南明河畔，过了彩虹桥（南明桥）便可踏上进京的道路，取名朝京门；西南隅开设一门，以便贵州卫官兵出入，次南门通往今花溪、惠水等地，要“以德教化”今惠水一带的“八番”，取名德化门，俗称次南门；西门有路通往黔灵山名胜“圣泉”，取名圣泉门；北门原在钟鼓楼（今王家巷），明初拓展至贯城河边，北门外为宋氏土司辖地，为表“怀柔”之意，取名柔远门。贯城河原为则溪水，从北向南流过城中，设水关两座，一座在贯城河入城处，另一座在贯城河汇入南明河处。

第二次大规模兴建在明末天启年间。洪武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贵阳城已日感狭小。到了明代中叶，贵阳城北门外居民逐渐聚集，普定街（今黔灵西路）、人寿街（今黔灵东路化龙桥一带）等街道次第形成。万历年间，播州杨应龙反叛，多次扬言要渡乌江，直逼省城，北门外的居民蜂拥入城，贵阳城内人满为患，巡抚郭子章曾上疏朝廷，请求仿广州、扬州筑贵阳外城，但未得到批准。天启初，贵州发生奢（奢崇明）安（安帮彦）之乱，贵阳城曾一度被围达三百天之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既出于防守，又出于老城外居民增加的实际需要，明朝中央政府决定修筑贵阳外城。

“天启六年，总督张鹤鸣、巡抚王城于北门外增砌外城六百余丈，设威清、六广、洪边、小东四门。”其中，威清门俗称威西门，即今威清路与枣山路交叉路口，因自此门可直通威清卫（今清镇市），故名威清门；六广门即今沙河路与中华北路交叉路口，因从此门可通今修文六广渡口，故名六广门；洪边门，即今普陀路与环城路交叉路口，因自此门可通洪边十二马头（今开阳县），故名洪边门；小东门俗称新东门，即今黔灵东路与环城路交叉路口，因次于内城之东门，故名小东门。由于外城修筑时间较晚，故俗称新城或外城。中间以内城北门（今喷水池）相通。南门和次南门由贵州卫守护，西、北两门由贵州前卫守护，东门由两卫共守。经洪武和天启年间两次兴建，贵阳城垣已全部建成，

广西相通，仅湖广至云南驿道，每年过往马匹不下三千，过往官兵、商旅不计其数，因而贵州驿和贵州站成为全省最繁忙的驿站。由于城北扩建外城，城区扩展到今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一带，城区将近扩大一倍。

城内街道渐成网络，以大十字为中心，通往南门的街道称城南大街，通往北门的街道称城北大街，以南大街和北大街构成贵阳城的中轴线。其余街巷纵横交错，到了万历年间，贵阳的街道已经不少，除以大十字为中心而通往四门的东街、南街、西街、北街而外，尚有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六街……

自明初至明中期，商业市场随着汉族人口不断增多而增加，交易渐兴。最初由于普通汉民难以定居贵阳城内，商业市场普遍位于城门附近或者城外，贵阳内城北门外由于汉族人口的聚居，相应地形成了多个商业市场，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多在此完成交易。后来由于汉族人口逐渐进入内城，老百姓在牌坊下做买卖，渐渐地出现了坊市贸易。当时贵阳城内外，形成了十二个坊市，治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东门内有小十字街市，治城南门有南市，治城北门有北市，治城北门外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凤鸣桥市、洪边巷口市。南门外有马荣街。各市百货云集，又各有侧重，三牌坊、四牌坊、谯楼街、凤宪坊等市为商业繁华之区，店铺最为集中，商品种类、数量最多；北市、凤鸣桥市、十字街市、洪边巷口市等为新辟的商业区，多为堆栈，外地客商运来货物多在此批发；马荣街市是驮马集中之地，馆前驿市运输繁忙；化龙桥附近的鱼巷铺主要经营水产，早晚有鲜鱼出售；绣衣坊一带各色锦绣服饰店铺林立。

贵阳作为省城中心，凭借驿道、大道的畅通，形成物资交流中心，百货汇集，交易频繁。主要货物有丝、麻、土布、葛布、皂靴、雕漆器、皮包、马鞍、蜂蜜、饴糖、土粉、水胶、油、漆、蓝靛、乌梅、降真香等。

城内主体建筑是各衙署，多在城南。宣慰司署在十字街以北，布政使司署、按察司署在十字街以南，都司及贵州、贵前两卫在贯城河以西。

宣慰司学在治城东，府学在北门外，文庙建在宣慰司右侧。寺观、坛祀、

亭馆是当时重要的建筑物，宫室有尊经阁、三圣阁、圆通阁、乐射亭、皆春亭、筹亭、菜根亭、嘉瓜亭、贞松亭、后乐亭、真趣亭、紫薇亭、世禄堂、育英堂、阅经堂、讲堂、谯楼、肃边楼、东楼、万卷楼、晚翠楼；寺观有大兴寺、永祥寺、大道观；祠庙有文庙、城隍庙、忠烈庙、东岳庙、真武庙、五显庙、晏公庙、文昌祠、夏国公祠、先民祠。

明成化年间重新修建了谯楼，高五十尺，周五十步，俯瞰全城，钟鼓以报晨昏。梦草池在西街北侧，塘周一百八十丈，文士吴中藩在此建别墅以居，颇有盛名。位于黔灵山的圣泉相传为明初镇远侯顾成所辟，是贵阳现存最早的名胜古迹。泉水从石罅中渗出，一天中盈缩百余次，明代就有“圣泉流云”之说。

这一时期街道的特点是牌坊林立，计有牌坊 80 余座，著名的有国戚休坊、总司风马坊、接武坊、贞节坊、旌义坊、绣衣坊、五马坊，还有标志贵阳战略地位的有“西南重镇坊”“永奠封疆坊”“滇黔锁衢坊”“贵阳形胜坊”“万里千城坊”；展现风景名胜的有“曲江春色坊”“圣泉观坊”“大罗真境坊”。表彰科举的牌坊有“翰林坊”“进士坊”“举人坊”。



民国时期大道观大罗真境牌坊

明代贵阳乃“四水相集”之地。城南门外有南明河沿城墙蜿蜒而过，南明河碧波滚滚，沿河岸风景秀丽，有许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文物景点和游览地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贵州巡抚江东之在南明河鳌矶石上修建阁楼一座，以培风化，并命名为“甲秀楼”。其中蕴涵深意：一是“科甲挺秀”，二是“秀甲黔中”，期盼贵阳重教兴文，人才辈出。与甲秀楼遥遥相对的是象征文运昌盛的文昌阁，文昌阁建在武胜门城墙上，阁高踞东门之上，有高屋建瓴之势，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城，隐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意，其目的是培养文风和扶掖地方教化。



民国时期的甲秀楼



文昌阁今貌

则溪水（贯城河），又名玉带河。它像一条碧绿透明的玉带，从贵阳城北八里的崆峒山发源，流入城区后，蜿蜒曲折通过城区，到城区西南部，过六洞桥，出水关，汇入南明河。贯城河纵贯城区，为了车马行人通过的需要，在这条河上架起了许多座桥，贯城河上最早修建的桥，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

1424年)建成的狮子桥和都司桥。

水磨河(市西河),源于三桥下五里,于西门金锁桥向东流入两江口汇入南明河。明代沿河有许多水车,碾坊一座连着一座,水磨转动声不绝于耳。水磨河河水清亮碧绿,是附近老百姓主要的饮用取水源。

太慈水(小车河)在太慈桥汇入南明河。徐霞客来到贵阳时,曾经游览了小车河美丽的自然风景,并在他所写的《徐霞客游记》中记载小车河“涌流两岸石间冲突甚急,南大溪所不及也”,这“南大溪”指的就是今天的南明河。王阳明先生游览过太慈水,并写下了“太子桥”一诗,使小车河和“太子桥”声名远播。

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军事重镇和宣慰司城,住有大量官户、军户、民户和匠户,需要从农村运进大批农产品保证对城市居民的供应,并把城中的手工业品销到广大农村,于是推动了城乡之间、军民之间的商业贸易。在贵阳城的周围,有数以百计的屯堡,这些屯堡既是军事城堡,又是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它们是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连接点,在交通较方便的地方,后来都形成了农村集镇和场市。城郊集市贸易兴起,集市皆以十二生肖命名,子日赶鼠场,丑日赶牛场,寅日赶虎场,卯日赶兔场,申日赶猴场,谓之“转转场”。交易方法,以物易物和银钱购买都有。交易对象,卖者多是附近少数民族老百姓,买者多是城内住户,如官吏衙役、驻兵家属、一般居民、学堂师生、和尚、道士等。

沿着驿道来的马帮将一驮驮盐巴、布匹运进来,又把一驮驮山货、桐油运出去,南门外出现了驮马集中的马荣街市。明代贵阳城已是“万家之邑”,嘉靖年间“官兵杂役五千九百四十八户,三万零七百四十四丁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至“六千六百九十九户、三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丁口”,有官员,有军户,有匠户,皆来自江南、江西、湖广,贵阳渐成为黔省区域中心城市。



六、开办学堂建书院

明代是贵阳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明初，朱元璋即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定为“安边”的基本国策。贵州建省以后，明王朝针对贵州地区土司统治源远流长、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治理贵州的过程中，遵循朱元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统治思想，在加强军事控制的同时，强调“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把发展学校教育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的安边政策加以推行。

明王朝始终遵循这一既定国策，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按察使、提学副使，以及府、州、县、卫的官员，大多恪尽职守，以推动贵州文教为己任。他们设学官，建文庙，办书院，倡儒学。在此政策的感召下，各府、州、县、卫、司“徧（遍）立学校，作养人才”。有明一代，贵州建卫学20余所、府学10所、州学3所、县学6所、宣慰司学1所、宣抚司学2所，开办书院27所，教育之盛前所未有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监察御史裴承祖以土司地区“诸重蛮夷，不知王化”，奏请在贵州、播州、思州、思南各宣慰司及其所属安抚司、长官司设立儒学，“使知诗书之教”。自此以后，各土司相继建立儒学。

贵州宣慰司儒学于洪武年间在贵阳创立，地址位于元代顺元路儒学旧址，它是贵州创办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官办学校。除建有明伦堂、尊经阁、育英堂、启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四斋、号房外，还于宣慰司学之侧建立文庙。遵经阁内藏有朝廷颁赐的《五经大全》，仿唐代雁塔之意建石塔两座，一塔为进士题名，一塔为乡贤题名。

宣慰司学以土司子弟教育为主，由于明政府认为土司的教化应当从土司子弟入手，这不仅可以“变夷俗之陋，杜争夺之源”，而且可以培养出一批甘愿为朝廷“奔走惟命”的接班人，因而把对土司子弟的教育作为推行土司制度的一项重大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加以重视。为了强化对土司子弟的教育，明

令“未经儒学教化者不得承袭土司”。弘治十二年（1499年）规定：凡年满十岁的土司应袭子弟，均应就近送宣慰司学或州县学读书习礼，到袭职之时，必须取得当地学官的考核结状，否则不准承袭，于是土司子弟入学读书便成为替袭的必由之路。这一制度推行以后，土司渐被同化，例如水西土司安陇富颇能“晓字义，事母孝，持家以俭，爱民如子，尝恶其土鄙陋，欲变之”；其子安观“凡居室、器物、衣服、饮食、婚姻、丧葬、取众待宾、攘灾捍患之事，颇依华夏之礼”；安观之子安贵荣“好读史，通大义，设庠序以明礼义，旧染陋俗寝变华风，用夏变夷之功日见其甚”。水东宋氏土司亦如是，在儒学的熏陶下，“尚礼义，以气节相高”。正统、嘉靖间，宋昂袭贵州宣慰司同知职，崇尚儒学，改弦更张，网罗经史，重金延聘文士教授子弟，时人称其“循良如文翁”，他与其弟宋昱，其子宋炫皆为一代文士，词文传诵一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对宋诗大加赞赏。经过一二百年的提倡，贵州土司多被汉化，“立意诗书，登科入仕者，游济辈出”。

土司儒学生中“俊秀子弟”通过选拔可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对入国子监读书习礼的土司子弟，朝廷给予优厚待遇，规定：“于例不考”，放宽入学条件，除照例供给廪膳而外，每年冬、夏二季皆由皇帝颁赐袭衣、靴袜，以示“关怀”，使之“一心向学”“归于王化”。

贵州宣慰司学创立以后，“贵州文风一开，人才日盛。学者明经登第而为世用者，往往与中州相伯仲”。明代宣慰司学科甲之士全省最多，进士23人占全省进士的四分之一，举人268人。著名者有越升、易贵、徐节、范冠、朱绶、杨师孔、潘润民、马士英等。天启二年（1622年），奢安之变爆发，明朝镇压以后，撤销了贵州宣慰司学。

贵州卫、贵州前卫两卫及附近军生、民生也在贵州宣慰司学就学，其他卫所也在驻地创办了卫学，主要教育军卫官兵子弟。由于军队都是来自中原的移民，文化基础远好于贵州本地土著，加上交通便利，中央王朝重视，所以卫学的成才率也比府州县官学为高。

贵阳府建有贵阳府学，在定番州（今惠水）建有定番州学。在贵筑县、贵定县也分别建有县学。此外，贵阳府还也建有武学，为统治阶级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朱元璋在洪武八年（1375年）诏令全国创办社学时，社学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创办，主要设在乡村、卫所、城郊和少数民族地区，招收7岁以上、15岁以下的民间儿童入学。自永乐以后，明朝廷严督贵州各属长官司于衙门附近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社学，令童蒙入学，读书习礼，接受儒学文化。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规定社学中优秀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各级儒学校学习，这样社学与府、州、县儒学在学制上衔接起来，调动了地方创办社学和民间子弟踊跃入学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贵阳社学的发展。

贵州书院的兴起和发展，都与王阳明在黔讲学及其学说在明代盛极一时有着密切关系。明正德二年（1507年），因弹劾宦官刘瑾，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为驿丞，并于次年抵达贵州龙场（今修文县）。他在住地建龙岗书院（今修文阳明文化园）传授学问，“黔之闻风来学者”络绎不绝。弘治十七年（1504年），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再建贵阳文明书院。正德四年（1509年），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因慕王阳明思想，邀其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在文明书院首次讲述“知行合一”，在贵阳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提学副使蒋信在贵阳新创“正学书院”，对其名的解释是“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公开表示正学书院要传习、研究的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王阳明《龙场诸生问答》成为贵州书院办学的鲜明标志。书院讲习心学，继承王阳明自由讲学的传统，在贵州学术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王阳明弟子马廷锡在南门外渔矶湾创渔矶书院，贵阳自由讲学之风开始盛行。

科举制度对明代贵州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贵州未建省前，贵州生儒要参加科考，要到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省。路途遥远，盗贼出没无常，以致生儒赴试往返十分艰苦。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将贵州划分为独立的行省单位。在科举制度迅速发展以及贵州建省双重条件下，朝廷为确保地域间的

均衡发展，明确颁布了允许贵州参加乡试的诏令。据《黔书》：“贵州设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1425年）始令贵州生儒就试湖广。”由于湖广路途遥远，而云南较近，所以明政府同意贵州考生可到云南就试。至此，贵州开始了长时间依附云南乡试的历程。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贵州都积极向朝廷争取“独立开科”。嘉靖九年（1530年），贵州思南府（今思南县）进士田秋升任礼部给事中，曾经也是赶考之人，田秋深知其中的艰苦，因此对家乡开闱一事非常关心。嘉靖十四年（1535年）八月，田秋利用自己给事中的身份，也奏请在贵州独立举行乡试，向朝廷说明贵州士人赴云南不只路途遥远，还可能遭遇瘴毒而丢掉性命，并且向朝廷表明贵州已经有充足的经费可以自办乡试。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杏任贵州巡抚。十四年（1535年），便向朝廷申请贵州开科，此次申请后，朝廷认为贵州附考云南路途不便，且贵州人才日盛、经费充足、科场具备，已达到开科要求，因此，同意贵州“自可成录”，还将贵州解额增至25名。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贵州有1000多名士子报名参试，朝廷特派官吏入黔主持开考仪式。为了表示支持与庆贺，田秋特地捐资购地，以租谷充作试卷费。开科之日，贵州士子齐集贡院，考试气氛隆重而热烈。

贵州独立开闱乡试后，贵阳士子获得天时地利的优势，中举者和进士及第者人数开始增多。明代贵州全省中进士108人，贵阳有26人，占全省四分之一；全省举人1145人，贵阳有335人，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可谓“科甲挺秀”，人才联袂而起，俊秀之士比于中州，各方面涌现一批英才，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员。贵州卫人徐节官至山西巡抚，因弹劾宦官刘瑾罢归；贵州前卫人王尊德官至两广总督，潘润民官至云南布政使；贵州卫人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崇祯年间，国势危艰，皇帝下诏“破格求才”，得10人拔为巡抚，在贵州遴选了黎平府的何腾蛟和新添卫（今贵州贵定）的邱禾嘉，均为一代名将。

忠君爱国是贵阳士子刻入骨子里的信念，在国家风雨飘摇时期，贵阳科举人物大多比较活跃，为了国家大义不惜牺牲自己。如《黔诗纪略》记载：丘禾

实一家“崇祯末，并殉寇难，一门双忠，尤足以张世泽”。康熙《贵州通志》记载：王尊德“天启间，安邦彦围贵阳十月，屡疏请援，围得解”。与王尊德一起参加解救贵阳的还有杨师孔和潘润民等人。又如《明史》所载：“十七年三月，京师陷，帝崩，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马）士英（贵阳人）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臣不敢言。王立之，士英力也。”后马士英被清军捕获，拒降被杀。明朝统治末期，贵阳的科举人物纷纷投入爱国活动之中，但遗憾的是并未扭转明朝灭亡的局面。

贵州建省以后，贵阳文教事业随之振兴，宣德以还，本地人文蔚起，科名之士崭露头角，文人墨客也逐渐涌现。

王训，贵州宣慰司人，宣德间任贵州宣慰司儒学教授，善诗文，著《寓庵文集》三十卷，被誉为贵州“开草昧之功”第一人。

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宋昂，为政宽和，重文教，善诗歌，与其弟宋昱合著《联芳类稿》，传入京师，有两首诗歌收入《明诗综》。

嘉靖年间，被誉为“一代雄才”的诗人杨慎被流放云南，多次路过贵州，写了《夜郎曲》《罗甸曲》等诗歌数十首，推动了贵州的文学创作。

万历年间，贵定丘禾实以诗歌游记闻名于世，贵筑潘润民著有《味淡轩诗集》。有明三百年，黔中诗家，当首推“天末才子”谢三秀，著有《雪鸿堂诗集》和《远条草堂》，共收诗千余首，为黔中之冠。莫友芝认为谢三秀的诗“清雄宕逸，风格隽远”。礼部尚书李维楨在《雪鸿堂诗序》中赞扬他说：“诗家诸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备具。”并称赞他的诗是“治世遗音”。

越其杰，明末抗清志士，文武双全，所谓“上马则横槊，席地则咏谈”。一生写了近万首诗。著作有《薊门》《知非》《白门》《横槊》《屡非》诸集。收入《黔诗纪略》的诗有226首。

杨龙友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因其诗被列为“崇祯八大家”之一，因其画被列为“金陵九子”之一，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奇男子。

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论诗，认为贵州无人，得见贵阳吴中蕃的《澈寻集》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后，一改过去认为黔地无诗的错误结论，在《敝帚集》序中说：“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评价了其诗在贵州文学的历史地位。

明朝统一天下后，诏令编修“天下州郡地理形势及降服本末之书”，令各省编修省志之风大盛。贵州在明代共修省志4部，现存3部，均在省城贵阳编修。成化年间修《贵州图经》，但已亡佚，弘治间重修，故名（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该志由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沈庠删正，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赵瓚編集。全书共17卷，“以地为经，以事为纬”，按政区分类，列建置、山川、风俗、土产、

学校、宫室、寺观、名官、流寓等24目，记事简略，“取其可信，缺其可疑”，刻本极少。（嘉靖）《贵州通志》由贵州按察司副使谢东山删正，贵州宣慰司训导张道編集，原翰林院编撰杨慎作序，“以事为经，以地为肆”，分为建置沿革、郡名、疆域、山川、风俗等40个门类，尤详于田土、户口、赋税、教育，条理清晰，内容翔实，比弘治图经为善。（万历）《贵州通志》，该志是时任贵州巡抚、兼督湖北川东地方军务、右佥都御史江东之，贵州布政使王耒贤，贵州提学僉事（后任副使）沈思充修；云南按察副使许一德、刑科给事中陈商象所纂。全志24卷，按省会、安平道、贵宁道、新镇道、思仁道、兼制、经略、艺文编排，叙事原则是“归志所载者仍之，新者续之，繁者芟之，漏者补文，讹者订之，归说可疑而别立新说者两存之，远事据经史，近事据见闻，不以臆说”，《记略》“艺文”录有大量文献资料，不失为“黔书善本”。郭子



章《黔记》为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编纂，虽为个人所著，然卷帙繁多、资料丰富、体例严谨、门类最新，不失为一省之良志。四部省志，可见贵州文化之兴盛。

七、阳明悟道创心学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他虽然生于浙江余姚，却成就于贵州。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宦官刘瑾迫害忠臣，王阳明仗义执言，被迫害下狱，正德三年（1508年）被贬谪至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做龙场驿丞。

王阳明初到龙场，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有时断水断粮，生活条件艰苦，而王阳明的意志在逆境中得到磨炼，愈加坚毅，他很快从烦恼和失望中调整情绪，注意心性的修养和锻炼，体会圣人处逆境时的思想境界和作为，并以此激励自勉。他通过研读《易经》领悟易学精髓，悟出“心即理”的哲学思想，他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因此，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心理本是合一的，“心即是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龙场大悟奠定了王阳明心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此其思想如开闸之水一泻千里。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学术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并建立起“致良知”论，最后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与程朱理学交相辉映。富有鼎新精神的阳明心学，把儒家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从此走遍天下，龙场也因此被称为“王学圣地”。

王阳明在龙场驿丞的官职虽小，却与贵州百姓亲近，当地老百姓十分同情王阳明，主动为他修建房屋遮风避雨，因所建新居位于龙场龙岗山上，遂名“龙岗书院”，并在此授徒讲学，龙岗书院是传播王学的第一所书院。王阳明默忆儒经，编成《五经臆说》以作为教材。制定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作为学规，告诫学生：人，不立志就不可能勤学，不勤学就不可能有成就。为人处世，

不可能无过，有过则应必改。谁也做不到让所有人满意，但应尽量让更多的人满意。同时，作为人，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帮助并引导他人向善。责人向善应注意方法，让人乐于接受，否则，会适得其反。在教学中，他一面以中原文化训诲“诸夷子弟”，一面阐发“良知”学说，听讲者有百余人。王阳明在讲学中，扫除官学教育的死板沉闷，运用灵活的教育方法调动学生兴趣。为了启发思考，提高学习兴趣，阳明先生还常常同学生展开讨论。他的《教条示龙场诸生》和《龙场生问答》确立了王阳明的教育思想。《龙场生问答》是一篇弥足珍贵的课堂讨论记录，他以“心与理合二为一”和“求理于心”的“心学”理论为



王阳明绣像碑刻



教学内容，大胆进行教育革新，否定程朱理学的“即物穷理”“求理于事物”的学术陈见，并在讲学活动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向“知行合一”的思想逼近。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并创办书院，聚徒讲学，教化乡民，引起贵州地方官的重视。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毛科是王阳明的同乡。毛科十分器重王阳明的道德和文章，欣赏王阳明独树一帜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曾邀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因身体有病未能成行。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毛科致仕归里，席书继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到贵州后，听说王阳明贬谪龙场驿，在龙场创办龙岗书院，讲述良知之学，遂前往龙场，与王阳明辩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席书推崇王阳明知识与德业并重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认为应该让更多的学子聆听阳明先生的教诲，接受王阳明思想的熏陶。为教诲贵州学子，特修书一封，敦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以提高贵州学子的道义修养和文化素质。席书书信言辞恳切，王阳明带着以教弘道和为贵州培养学术人才的愿望，欣然接受席书的邀请，到贵阳文明书院担任主讲。

正德四年（1509年）夏天，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做主讲时，专门刻印了南宋谢枋的《文章轨范》作为教材。王阳明在文明书院重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教育贵阳学子，批评举业对宗圣向道之志的戕害。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首次阐发“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行而不知是盲行”。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首讲“知行合一”，影响逐渐扩大。席书称赞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也”，并且认为“此说一倡，从是风动于仁义道德之域，将肩摩而踵接矣”。席书常常在公余之暇，到书院与王阳明讨论心学，“设问答疑，或至深夜，诸生环而观听者数百计。至此，贵阳人始知心性之学”。

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为贵州教育界打开了新视野。在王阳明的倡导下，明代贵州私塾的教学方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歌诗”成为贵州私塾教学的一项主要内容。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以后，王阳明的弟子王

杏到贵州任巡按御史，到贵州各地巡查，常闻里巷歌诗“蔼蔼如越音”，询问当地人民，方知是“龙场王夫子遗化也”。

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期间，游览过许多地方。游南明河畔的南庵（在今翠微园内），作《南庵次韵》二首，后又作《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有“隔水樵渔亦几家，缘岗石径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峰雨，枫叶秋连万树霞”等诗句。他在城中拜谒南霁云祠（即黑神庙，旧址在今达德学校），作《南霁云祠》诗一首，有“贺兰未灭空遗恨，南八如生定有为”之句。游贵阳来仙洞（即仙人洞），诗云：“古洞春寒客到稀，绿苔荒径草萋萋。书悬绝壁留僧偈，花发层萝绣佛衣。提榼远从童冠集，杖藜真觉鹤猿知。石门远锁阳明洞，应叹山人久不归。”他还游过太子桥、二桥和三桥，还造访了城北的易氏万卷楼。

王阳明一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三篇被收入《古文观止》作为范文，《瘞旅文》和《象祠记》两篇就是在龙场写的。他写了许多好诗，最有真情实感的莫如在贵州所写的《居夷诗》。

王阳明在贵州培养了众多的弟子，活跃了贵州的学术氛围，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而得其真传“承良知之源，以开黔学”者，首推陈文学和汤昇，他们都是贵阳人。另名还有孙应鳌、邹元标、李渭、马廷锡等。除在贵州培训弟子外，在外省也培养了众多弟子。如王杏、徐樾、朱麟、王学益、胡尧时、刘大直、赵锦、赵维垣、刘丙、阮文中、冯成能、吴国伦、沈思充、郭子章、徐秉正、肖良干、江东之等，他们都曾出任贵州巡抚、巡按、提学使等官职，均在贵州传播王学，大兴讲学之风。

贵阳人对王阳明无比崇敬，最先建祠祭祀王阳明。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在王阳明离开贵阳20多年后，巡按监察御史王杏应王阳明门人汤昇、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的请求，赎白云庵旧址建王阳明祠，置膳田，祭祀王阳明。隆庆五年（1571年），贵州巡抚阮文中、按察使冯成能，将阳明祠迁建于巡抚衙门内侧，即后来的贵山书院内。



贵阳东山阳明祠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贵州巡抚庆保迁建阳明祠于扶风山。光绪五年（1879年），黔人四川总督丁宝楨及乡绅唐炯、罗文斌等捐资重修阳明祠。祠堂内有王阳明朝服线刻石像、明穆宗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敕书碑刻及《先生训士四条》《先生论俗四条》碑文，三面有回廊、栏杆及厅堂、半亭，环廊壁上有王阳明手迹石刻和历代文人墨客题吟。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教习高山公通、金子新太郎等数人立碑于龟形石座上，碑高3米多，上面书刻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题阳明祠》诗：“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1916年在阳明祠北侧修建尹道真祠，纪念东汉开创“南疆之学”的尹珍，享堂前有“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的联语。

贵州成就了王阳明，王阳明恩泽于贵州。清代在东门城墙下建“君子亭”，意在纪念王阳明的君子之风。在君子亭附近的池中种植莲花，从此便有了“莲花坡”地名。贵阳曾有王守仁路（在今省委大院内），现有阳明路，都是为了纪念文化名人王阳明。



民国时期东门外君子亭

为纪念王阳明开教贵州的历史功绩，民国年间，贵州地方政府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将开州改名开阳县。据民国《开阳县志稿》记载，开阳之名，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所建的开阳书院，时人解释为“开阳者，盖欲开阳明之学也”。1930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准以奏报，令开州改名开阳县，以示贵州人民对阳明先生的永久怀念。



《阳明先生集要三编》

掌故：

奢香开辟龙场九驿

洪武十四年（1381年），贵州宣慰使霭翠去世，由夫人奢香代袭。那时彝族土司势力强大，在滇东北有乌蒙、乌撒、东川、芒布、镇雄土司；在四川有永宁、马湖土司；在贵州有水西及普定、普安土司。彝族土司控制川、黔、滇毗连地区，一旦发生动乱，必影响整个大西南政局。都督马烨不识大局，好大喜功，企图以鞭撻奢香之事，诱其反抗，借机一举将彝族土司歼灭，以其地改设州县。

奢香受辱后，其部愤怒欲反，奢香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认为水西一旦举兵反明，彝族各部必起兵响应，造成西南大乱。为解决封疆大吏与民族首领的矛盾，朱元璋高瞻远瞩，认为对彝族土司只能安抚，不能剿。朱元璋决定治罪马烨后，向奢香提出“何以报我？”奢香回答说：“当令子孙世世戢罗夷，不敢生事。”“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朱元璋听了这一回答非常高兴。

奢香返回贵州后即修筑“龙场九驿”，开通了与蜀滇的道路。龙场九驿起



奢香夫人开辟龙场九驿时修建的“蜈蚣桥”

自龙场驿（今修文县城），经六广驿（今修文六广）、谷里驿（今黔西谷里）、水西驿（今黔西县城）、奢香驿（今西溪河畔）、金鸡驿（今大方金鸡山）、阁鹤驿（今大方城西大小阁丫之间）、归化驿（大方与毕节交界的归化河），而达毕节驿（今毕节县城）。又在各驿之间增设十八站，谓之“龙场九驿十八站”。这条驿道横穿水西地区，不仅使水西与贵阳紧紧相连，而且将湖广通往云南的大驿道与黔西北的川黔滇驿道联通。驿道的畅通，为商旅往来，粮饷运输，公文传递，兵旅征伐，官吏往返，以及与周边各省的联系都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府州县的增设提供了条件，使贵阳成为“万马归槽”之地。奢香去世后，朝廷予以厚葬，并赐奢香为“顺德夫人”。今大方有奢香墓，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朱元璋赐名其子安的，帝曰“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从此水西彝族土司始称安氏。

明代贵阳出“天马”

元末，起义军首领明玉珍在重庆建立政权，国号“大夏”。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明玉珍的儿子明昇继任，并归顺明朝，“纳降”的贡礼要准备什么呢？明昇是一个头脑很活络的人，闭上眼睛一想：像朱元璋这种马上打江山的开国皇帝，肯定不喜欢金钱美女、珠宝古玩之类，能让皇帝情有独钟的，无非是骏马和宝剑之类的神兵利器。明昇派出大批识马懂马的“伯乐”，足迹踏遍西南，最后在当时的养龙坑（位于今息烽境内）长官司选得十匹宝马奉献给明太祖朱元璋，其中最著名的一匹就是“龙驹”。此驹通体雪白，中无一根杂毛，高九尺，长丈余，体格极其威武雄壮，嘶鸣之声如雷霆万钧，动如天马行空，风驰电掣，一尘不惊，可谓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性烈如火，傲骨铮铮。当明昇将宝马牵出呈上之时，朝中王公大臣见了上贡的白马“龙驹”，无不惊为神兽。众臣之首的御史中丞刘伯温当即上奏：“昔汉明帝遣使往西域求佛法，获白马负经书而来。今皇上初登大宝，西南臣服，献此白马，实为开国之瑞。”朱元璋当即龙颜大悦，令典牧副使（掌管畜牧的官）高敬着意饲养。当年八月，朱元璋率满朝文武、皇亲国戚到清凉山行“夕月”礼（古代帝王在春分举行祭日礼，叫朝日；秋分举行祭月礼，叫夕月），乘此马前往，感觉如蹑云端，四蹄踏泥，一尘不动，就像今天武侠电影中的轻功高手，迅疾、平稳，跑起来悄无声息。朱元璋甚是喜欢，于是赐名为“飞越峰”。大学士宋濂为此写了一篇《龙马赞》，并命画师画下龙驹形象，交宫内收藏。明昇也因献马之功，受封“忠义侯”。四川名士杨慎又作《飞越峰天马歌》，一句“高皇御天开大明，龙马出自养龙坑”让贵州马声名大振。后来，明政府大小战事，都诏令贵州大小土司，征集贵州战马以充军用。

四百余载沈官桥

沈官桥位于贵阳市北郊麦架镇沈官寨南隅，横跨麦架河上。桥头北岸，立有青石碑记，碑文竖向楷书，为捐资人姓名及捐助银两，落款为“万历丁酉仲



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的沈官桥今貌

冬修桥碑记”。

沈官寨，明代称沈官堡，设置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属贵州卫右千户所一百户军事机构，首任百户为沈氏，故名沈官堡。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贵州宣慰使安观，在沈官堡驻守地修建麦架桥，贯通贵阳至水西之道，为麦架河上首座官修桥梁。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沈官堡附近民间集资，修路建桥，沟通麦架河南岸曹官、程官诸堡，连接沈官、朱官诸堡，以便官商人畜往来，故名沈官桥，以示与老桥——麦架桥之别。

根据当地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批商民及屯军后裔，在沈官桥南岸聚居下来，形成麦架下寨。在此居住的居民首先是向氏家族。尔后，贵州都指挥使镇远侯顾成后裔迁入。在沈官桥《修桥碑记》中，向氏、顾氏捐款人较多，

体现了向、顾两氏当时的经济实力。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官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马文卿于此寨建寺，将麦架下寨更名为马家寺，马氏后裔自谷七堡迁入居住。明末，由于马氏家族的崛起，马士英官居东阁大学士，马家寺寨声名远播，沈官堡、马家寺为世人所知，沈官桥亦被人们视为标志性建筑之一。明末清初，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副使李嘉瑞、云南布政使李如楠父子，通过科举走出此寨，马士英之子、文士马鸾（字伯和）回归此地，显示了文化繁盛之景象。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清政府于此设市场，干支子、午日开场集市，经济地位较为突出。清末，马家寺及寨子毁于咸同战火，失去昔日的辉煌，沈官桥依然横跨两岸，发挥原有的作用。

龙洞堡的来龙去脉

龙洞堡位于老贵阳的东南面，古代在湖广到云南的驿道上，过去和现在都是贵阳出入中原、京城的重要交通要道。



龙洞桥今貌

龙洞堡当初只是一个负责传送公文的递铺。古代规定 60 里设一驿或站，10 里或 20 里设一铺。葛龙站（今龙里）与贵州站（今贵阳）之间就增设了铺。不过设铺之初，这里并不就叫龙洞铺而叫头铺，往东 10 里之地今观山湖区宾阳大道附近称为二铺。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游历龙洞堡，发现龙洞堡老街旁边，有一处天然溶洞。洞中钟乳倒悬，怪石嶙峋，宛若蛟龙，相传曾有龙潜藏其中，郭子章遂在溶洞石壁上刻题有“见龙洞”三字，因洞无水，又称“甘龙洞”。有了郭子章在“见龙洞”题字之后，这里才叫龙洞铺。后来贵州卫成立，在此设哨，称为“龙洞哨”，几年过后，为控制水西和水东土司，贵州前卫成立。因龙洞哨地接水东领地，位置重要，撤“哨”改为“堡”，龙洞堡即因之得名。龙洞堡是一座兼具军事城防作用的城堡，但随着时间流逝，防御功能的堡墙塌毁不存，只留下一条生活色彩较浓的老街，人们也慢慢忘却了城堡，而称呼老街为龙洞堡。老街其实是个汉族大寨，过去有近百户人。老街至今还保留着中原式的建筑风格，有私塾、庙宇，还保留了不少古迹，如见龙洞、龙洞老桥、顾成墓、杨侯爷墓、舒敬堂父子墓。还有罗吏古钟，这是一件少数民族文物，异常珍贵。

关于龙洞堡的“堡”的读音是 pù 还是 b o 呢？“堡”字有两个读音，一为 pù，一为 b o，用于地名时读 pù，用于军事设施时读 b o，如碉堡、城堡。同样作为古代军事故地的龙洞堡读 b o，而贵阳存在的陈亮堡、黄泥堡、杨眉堡、鸡场堡、新堡等地名为什么只读 pù，而不读 b o？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龙洞堡桥头修了一个“荣军学校”（今社会主义学院处），有学员数百人。这些学员都是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大都是外省人。他们在战场上常与“碉堡”打交道，来到龙洞堡后就习惯地把堡(pù)读 b o。当时的荣军学校是龙洞堡人最多的单位，他们的读音影响了当地人，也影响了附近的人，于是龙洞堡(pù)就逐渐音变为龙洞堡(b o)了。

20 世纪 90 年代，龙洞堡被选址建设民航机场。1997 年 5 月，贵阳龙洞堡机场建成通航。2005 年 12 月，中国民航局批复同意贵阳龙洞堡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随着航空综合承载能力显著提升，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跻身全国 2000 万

级大型繁忙机场行列。2021年，贵阳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建成投用，贵州进入“双跑道”机场时代。龙洞堡作为承载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也随着起降的航班声名远播。

贵阳四条河 桥梁何其多

明代贵阳乃“四水相集”之地。城南门外有南明河沿城墙蜿蜒而过，城内自北向南有则溪水穿城而过，称为贯城河。水磨河（市西河），源于三桥下五里，于西门金锁桥向东流入两江口汇入南明河。城西还有太慈水（小车河）在太慈桥汇入南明河。因此贵阳城内及城郊桥梁众多。

位于城南门外的南明河上的霁虹桥具有重要的景观地位，霁虹桥俗称南明桥、南门桥，为九孔石桥，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是贵阳最早修建的桥



清末南明桥与浮玉桥之间的“芳杜洲”景色

梁。该桥连接南门与南明河南岸，是连接贵阳城与南门外大街的重要通道，同时霁虹桥也在南门渡口之上，成为城门、水、陆交通的枢纽。

浮玉桥旧名南堤，位于甲秀楼下，横跨南明河两岸。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贵州巡抚江东之在河上筑堤，人称“江公堤”，其实就是横跨南明河上的浮玉桥。北岸地势较低，而南岸是一块高地，桥依地势而建，南端呈拱弧状，过甲秀楼后桥面不直，远远望去，就像浮在水上的一条玉带，故名“浮玉桥”。它是一座九孔石桥，南端孔大，其余八孔小，半圆形的桥拱映在水中而成正圆，有如“水中明月”。桥下是回水激荡的涵碧潭，水流在此形成漩涡，出现了“长江水倒流，九眼照沙洲”的奇观，“水从碧玉环中流，人在青莲瓣里行”的诗句，就是这无限风光的写照。南明河畔原有一片沙洲，长满香附草，人称“芳杜洲”，



○
民国时期的化龙桥

贵阳女诗人许芳晓写道：“芳杜洲前春水生，碧潭相映数峰青。盈盈细草裙腰色，随着游人绿进城。”浮玉桥将甲秀楼与南岸的山寺连接起来，山水楼阁尽在画图中，成为国内著名的风景桥。虽说北京颐和园的玉带桥比它长，但这种桥型出现的时间比颐和园的玉带桥要早两百多年。

则溪水（贯城河）蜿蜒城中，碧绿晶亮，波光粼粼，宛如一条玉带，美名“玉带河”。贯城河之上横跨着振武桥、威远桥、遵德桥、控制桥、宣泽桥、忠烈桥、化龙桥等桥梁。从“威远”“控制”“振武”“宣泽”等桥梁命名能体会出流官对于桥梁这一重要交通设施乃至整个贵阳城的掌控意图。一些桥梁由于靠近重要的大型建筑，索性直接以该建筑命名，强化了桥梁与建筑设施的联系，例如“忠烈桥”靠近城中祭祀唐代名将南霁云的忠烈庙，故得名，后因贵阳府署设在此街又称“府桥”，在今市府路上。“都司桥”靠近贵州都指挥司衙门。这些由建筑设施命名的桥梁无形中扩大了建筑在城中的影响范围。都司桥两侧多有民房，有“过桥不见桥”之说。

化龙桥坐落在北门外的鲜鱼巷，这里河床深切，激流汹涌，急流在岩石之间飞旋碰撞，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般，在半空扬起漫天的水雾。水深可以捕鱼，渔人捕到鱼后，就地卖鱼，故名鲜鱼巷。化龙桥始建于弘治十年（1497年），河床中的石岩，经过河水日夜的冲刷，变得神态万千，虬结神奇，犹如群龙斗嬉，“化龙”二字，可能就寓意于此。它是一座三孔石桥，桥正中一孔有斩龙剑，据说可斩涌水桥之龙。临河有“挽澜”两个将近两尺大小的大字摩崖，笔力苍劲。

北门连接新、旧城，人流密集，形成“笙歌十里市中市，冠盖千家城中城”的盛况。则溪水（贯城河）流至北门外，架一桥以通往来，桥名威远，俗称北门桥。在则溪水（贯城河）流经大十字的地方，永乐年间建了一座遵德桥，将老东门经大十字到大西门的街道连通，这是一座单孔石桥，桥上有石狮子，俗称狮子桥。

市西河因旧时河上的碾坊水磨，又被称为水磨河。它从三桥改茶寨奔腾到南明河，在旧时的贵阳有着重要地位。这条河流也有桥梁无数。其中香炉桥、



○
民国时期大西门外的香炉桥



○
民国时期的金锁桥

金锁桥和通济桥最出名。

香炉桥，桥虽小，却有历史。清代贵阳古城，出西门上狮子山或走西北方向，必经水磨河上的香炉桥。桥前有一牌坊，桥的另一端置一高1米、宽0.7米的石香炉，香炉内常年香火不断，人们在取道香炉桥去桥附近的土地庙及桂月寺前，都要在此驻足上香。桥下水磨河流水清澈纯净，水磨石碾，滢滢碧水，袅袅香烟，连同三元宫、狮子山，成为西门外的好景致。而后有了居民及连接香炉桥与狮子山的街道，就有了香狮路这样一个好听的街名。

金锁桥，历史比较久远。明郭子章《黔记》：“西门外有金锁桥。”这是它最早的历史记录，传说此地是贵阳城少有的风水之地。所谓：“前瞻栖霞，后倚狮峰，左雍城郭，右揽明河。”说明此处是贵阳城能够连接四方的绝佳位置。曾经的金锁桥是真的名副其实的金锁桥，桥上两边护栏各有多根大石柱，每个



民国时期老贵阳西出口的通济桥



太慈桥今貌

石柱之间由铁链连接，而铁链中间都有一把大锁，以锁锁桥，气势又美观。

头桥、二桥、三桥旧名通济桥，头桥伫立一亭，名“山溪一曲亭”。亭柱上有一联：“说一声去也，送别河头，叹万里长驱，过桥便入天涯路；盼今日归哉，迎来道左，喜故人见面，握手还疑梦里身。”那时的贵阳交通不便，北往四川，有关刀岩及鸭关所阻，羊肠小道步行困难。西去云南，出西门须沿着市西河岸先到头桥，再经二桥、三桥，才转入通滇大道。人们送别亲友赴滇川都送到头桥而止，桥头建有接官亭，为官府送往迎来之所。

太慈水即今小车河，《徐霞客游记》写道：“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王阳明至此作《太子桥》诗：“乍寒个暖早春天，随意寻芳到水边。树里茅草藏小景，竹间石溜引清泉。江花照日犹含雨，岸柳垂阴渐满川。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诗的前两句点明了时令、游踪，山区的早春，乍暖还寒，但是王阳明先生游兴不减，寻芳水边，所至小车河，

树里茅亭，竹石清流，汀花含雨，岸柳垂荫，将五百多年前小车河的自然风光再现眼前，着实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从全诗来看，王阳明先生必定是在借“景”消愁，抒写诗人惨遭宦官奸佞贬谪的愤懑；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发人深思的太慈桥诗话。

明代贵阳十景

明代，贵州建省以后，中央集权统治不断拓展及深入，贵阳已慢慢纳入内地化进程中，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贵阳具有浓厚的地方自然生态人文景观文化逐渐发展起来，许多风光旖旎的风景名胜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明朝（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两书中有“贵阳八景”之说，但事实上只有七景，即铜鼓遗爱、狮峰将台、鸭关使节、龙井秋阴、灵泉印月、圣水流云、虹桥春涨。明朝（万历）《贵州通志》记载，当时贵阳有十景，十景的名称是：东山胜概、藏甲遗踪、贵竹清风、铜鼓遗爱、鸭关使节、狮峰将台、灵泉印月、圣水流云、虹桥春涨、龙井秋阴。其中东山胜概、藏甲遗踪、贵竹清风三处为新增的。（万历）《贵州通志》是巡抚江东之主持撰修的，其中“贵阳十景”亦应是经江东之审定，“十景”之说应为官方认可的。

东山胜概：今省电视发射台处的东山，为十景之首，《贵州图经新志》中的东山谓“山颇高大，而林木丛茂”，明人谢三秀有《东山志略》，称东山为“黔中之胜”。

藏甲遗踪：藏甲岩在城内西南隅永祥寺下，俗名鬼王洞（今六洞街处）。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有一将叫王志，英武过人而貌丑，军中呼鬼头，官至校尉。藏盔甲于洞中，故称藏甲洞。贵阳有藏甲岩，但王志藏甲遗踪之事，纯属附会，是借武侯征南事扬名。

贵竹清风：“贵竹清风”景在老城北门（今喷水池）附近。此景可以领略贵阳竹林的清风，也有借景抒情之意。贵竹既实指贵阳，又指贵阳的竹，借竹为“四君子”之一，虚怀正直，以自勉和激励他人。“清风”亦是如此，既实指景物，王阳明《君子亭记》曰：“清风时至，玉声珊珊。”又指为人为官之道。

铜鼓遗爱：此景位于今水口寺铜鼓上的仙人洞，其半山的来仙洞有进出口，因通风较好，空气对流时在洞口可听到嗡嗡之声，民间传说这是诸葛亮南征时留有铜鼓藏于洞中的铜鼓声。

狮峰将台：此景位于今花果园附近的狮子山。此景系指明洪武初，征南将军傅友德筑台于狮子山上阅兵，明弘治时遗址尚存，1954年修公路时，狮子山被拦腰劈断，将台遗址已不复存在。

鸦关使节：鸦关又称雅关、小关，在今黔灵镇，建于明洪武年间小关，雄居高岗，横空驿道，形势险要，今关隘门保存尚好，上刻“北门锁钥”四字。

龙井秋阴：龙井又名一品泉、龙泉，位于今延安路龙泉巷，龙泉水出石隙中，清冽甘味胜于他井。井上有龙王庙，又有桥跨贯城河上，桥中有“一品泉”亭，龙井附近的龙井巷口至北门桥一段街过去称为一品坊。

灵泉印月：灵泉系建于元代大兴寺内的一井泉，泉极澄澈，凡月出没时，虽偏东西，而泉中皆见影。明清两代，大兴寺香火旺盛，但“印月”之景已无，“灵泉印月”徒存其名（今中华南路贵阳壹号处）。

圣水流云：圣泉又名百盈泉、漏沟泉，为贵阳现存最早名胜古迹之一。位于黔灵湖北面小埠上，是著名的间歇泉，日涨缩百多次，历数百年而不减。

虹桥春涨：霁虹桥在治城南明河之上，为永乐二年（1404年）镇远侯顾成所建。景云“虹桥春涨”即此。该桥曾有过霁虹桥、襄阳桥、中正桥、南明桥多种名称，每到春夏南明河涨水时，人们都要到霁虹桥上观看潮涌的河水，贵阳老百姓将霁虹桥上观看潮涨的河水与观看钱塘江潮相比美，于是贵阳人便有“虹桥春涨”之说。

霞客游记描贵阳

三百八十六年前，徐霞客就到过贵阳，他把亲历、亲见的事都写在《徐霞客游记》中。徐霞客，名宏祖，江阴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旅行家、文学家。其所著《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世间真文字”，是游记，又是历史、

地理百科全书和文学作品。全书由三十多篇游记组成，其中，《黔游日记一》和《黔游日记二》专写贵州山水和风土人情。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二十日，徐霞客从广西南丹进入贵州，经独山、都匀、麻哈（今麻江）、平越（今福泉），于四月初八来到贵阳府属的贵定县，在岩头铺、杨宝山住宿之后，雇脚夫挑行李到了鼓角（龙里卫西的谷脚），又经过三十里跋涉，在四月十一日到达“贵州”。徐霞客一直把贵阳称为“贵州”，他所说的“贵州”实为贵阳。他在贵阳府境内游历了八天，然后由广顺白云山到平坝，经安顺、镇宁、黄果树、关索岭、新兴所（今晴隆），从普安州（今盘州）出黔地进入云南。



川黔驿道上的雅关残存遗址

徐霞客以精练的文字描写了贵阳的山川形胜，认为“四面来水”即南明河、水磨河（即市西河）、则溪水（即贯城河）、太慈水（小车河）四水相汇贵阳城，这是贵阳形胜独特之处。图云关是贵阳的咽喉重地，从广西、湖南来的驿道都必经此关。鸭关是贵阳的“北门锁钥”。徐霞客到贵阳的第二天便游览了黔灵山的古佛洞，洞在后来赤松和尚所开的“九曲径”旁。

在贵阳住了两日之后，他便出“司南门，度西溪河”向西南行，来到太子桥。太子桥即今太慈桥，相传建文帝逃匿贵州时曾在此桥歇息，故有“太子桥”之称。过了太子桥，在山间南行二里路便到堰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甘荫塘、甘堰塘。过四方河，来到“大水沟”，徐霞客曾在大水沟路旁的大树下小憩。沿河上行，峰回路转，“有九巩同拱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佗佬桥”。华佗佬桥即花佗佬桥，因可通定番州（今惠水）而称济番桥，徐霞客在这里吃了一顿农家饭。沿石板路西行数里，过桐木岭、青崖桥，从北门进入青崖城（今青岩城）。城垣“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山，城中颇有瓦楼闾闾焉”。到青岩的那天，天气很好，“晴霁竞日，夜月复皎”。青岩是贵阳“南鄙要害”，明为贵州前卫屯堡，南去定番州，西南去广顺州，十五日出青岩定广门去广顺。

徐霞客的贵阳之旅，兴致最浓的就是广顺白云山。白云山初名螺拥山，因“山形如螺拥”得名。相传靖难后，建文帝逃到贵州，在白云落发为僧，徐霞客以怀古之情来到白云山，由北登山，山上“树密深丛，石级迤邐”，有两株三人合抱的大杉树，据说是建文帝手植。山上的白云寺，有前后两重阁，亦称为建文帝开山所建。后阁前檐下有一泉水，“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时有双全金鲤出没”，人称“跪勺泉”。阁西往上半里，有“洞悬山顶危崖间”，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傍为榻，据说从小穴中流出白米供建文帝所食，人称“流米洞”。左有峡高迸，上透明窗，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人称“潜龙阁”。“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四伏，远近皆出其足下”。石脊中裂一隙，“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泉水溢处，甘冽异常，“不减不溢”“见有巨鱼”“穴小鱼大，水停峰顶，亦一异也”，因南京老僧结庐其侧，故名“南京井”。深箐之中，“耸



木重崖，上下窈渺”“空山娇艳，宛然桃花洞口逢也”，僧人在山中结庐为“静室”，是参禅打坐、读书作画的幽静地方。潜龙阁后的诸“静室”，“旷而不杂，幽而不闕，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绝人寰，洵栖真之胜处也”。徐霞客在白云山住了三日，然后告别白云寺住持自然大师而去，经猪槽堡、柳家堡、狗场堡而达平坝，继续他的“万里远游”。

大西军贵阳抗清

明朝灭亡后，南方诸王先后建立弘光政权、隆武政权、绍兴政权，顺治三年（1646年），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次年（1647年）改为永历元年，这就是永历王朝之始。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部称“大西军”。大西政权被清军攻破，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进攻贵州，占领贵阳。按照张献忠的遗嘱，大西军与南明永历王朝联合抗清。

大西军控制贵州后，在政治、军事方面都采取了一番整顿措施。如革除明朝一些积弊，严惩贪污和犯法官吏；严肃军纪，士兵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即斩首；营官失职，责打八十军棍；禁止士兵参与贸易，实行军垦屯田。优待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吸收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大西军，在府、州、县设置“登闻鼓”，土司、头人可随时击鼓，要求官吏接见。对通往湖南、四川、广西的驿道进行整修，整顿驿站，在边境增设关卡，以利传报军情、调动军队和转运军需。设置什造局，负责打造和修理兵器。严格保甲制度，严防奸宄，命每户设一牌，书写大小男妇姓名于牌上，以便查询。对贵阳城墙进行改建和加固，整理街巷桥道，并令家家植树于门前，使之“冬夏常蔚然”。经过各项整顿，贵州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出现了“官绝贪污受贿之弊，民无盗贼持夺之端”的良好局面。永历王朝偏安一隅，贵州名义上虽属永历政权，实际上已居大西军的控制之下，贵阳成为大西军在云、贵、川抗清的斗争中心。

早在永历元年（1647年），孙可望在昆明自称“国主”时，就引起李定国、刘文秀等大西军主要将领的不满。及至永历四年（1650年）初，孙可望以种种

威逼手段得封“秦王”后，在贵阳大造宫殿，增设文武百官，并命云、贵、川各地文武大臣到贵阳“朝见”，其对永历政权取而代之的个人野心日益明显，与张献忠“联明抗清”的遗嘱完全背离，因而与李定国等的思想距离日益拉大。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孔有德率清军来犯，永历帝仓皇出逃，途遇孙可望派出的总兵高文贵等，告以“南宁不守，当走安隆”。永历六年（1652年）十月十六日，朱由榔一行到达广南，孙可望派总兵王爱秀前往“迎驾”，驻蹕安笼千户所，然“安笼”之名不妥，遂改为安龙府，以示“龙”已在此安居，其地即今安龙县城。说来也很悲惨，孙可望每年拨给缮银两千两、米六百石，交知府造册发放，注明“皇上一名、嫔妃几口、月支银若干”，发放时按册点名，皇上也只好忍气吞声受领。可怜三个幼小的王子在此夭折，草草埋葬在玉屏山下。

永历帝重用的马吉祥、庞天寿见孙可望权重势大，暗中投靠孙可望，朝中吴贞毓等18人极力弹劾，孙可望竟将18人问斩，死后葬在安龙，人称十八先生墓。孙可望野心勃勃，欲“扶天子以令天下”，逼永历帝“移驾”昆明。太后玛利亚（永历帝生母马太后教名）见永历王朝摇摇欲坠，修书“致罗马教皇”，请求教皇支持永历王朝（此件现存罗马教廷），派卜弥格出使罗马，不知何故，他在路上走了3年，归来时永历王朝已不存在。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逃往长沙投降清朝，次年清军三路进攻贵州，李定国领军抵抗，孤军奋战，不得已护送永历帝到昆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不得已护送永历帝经永昌、腾越入缅甸，缅人将其送交清军，押回昆明被杀，人们把他们遇害处称为“逼死坡”。

时间过去了300多年，孙可望在贵阳所建的“拱南阁”还犹存在甲秀楼南侧翠微园中，大殿二楼的大梁上留下“永历乙未孟秋月吉旦，火器营都督同知高恩建”的字样。

第四章 清代贵阳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设贵州巡抚署于贵阳军民府城。康熙十年(1671年),改龙里卫为龙里县,隶于贵阳军民府。二十六年(1687年),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将新添卫并入贵定县,移驻新添卫城。以威清卫和镇西卫合设清镇县,改隶安顺府。裁敷勇卫所属修文、濯灵、息烽、于襄四个千户所设修文县,隶于贵阳府。以贵州卫、贵州前卫地并入新贵县,改设贵筑县,附郭辖东上、东下、南上、南下、北上、北下、西上、西下八个里。改贵州宣慰司新辖地为贵阳府亲辖地,辖蔡官、麦西、水边、巴香四个里及中曹正司、中曹副司、百纳正司、百纳副司、青岩司、养龙司。雍正四年(1726年),割广顺七枝、定番一枝及归化置长寨厅,移贵阳府同知分驻。光绪七年(1881年),以罗斛州判地置罗斛厅,移贵阳府同知驻其地。清末,贵阳府领开州、定番州、广顺州、贵筑县、龙里县、贵定县、修文县及罗斛厅。

一、九门四阁百条路

明朝曾经两次大规模修建贵阳石城,基本上形成了贵阳城的格局。到了清代,贵阳城又历经多次修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占领贵州全境建立政权,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重修内城城垣,加高3尺。康熙十一年(1672年),总督甘文焜修复被孙可望所毁的外城。乾隆六年(1741年),总督张广泗改建外城为石城,贵阳城垣至此基本完善。新城建成后与老城合在一起而成

“双合城”，即清代的贵阳城。新、旧两城之间以北门相通，并在贯城河上修建了北门桥。内城有城门五座，外城有城门四座，合为九门。

由于改朝换代，需要抹掉前朝痕迹，树立清王朝正统思想，地方政府将明朝的城门名称进行了更改。将明代东面的武胜门改名昭文门，俗称老东门；改南面的朝京门为迎恩门，俗称大南门；改西面的圣泉门为振武门，俗称大西门；改西南的德化门为广济门，俗称次南门；改北面的柔远门为布德门，俗称北门。外城四门，西面门因有路通威清卫（今清镇）而称威清门；北面门有路通往鸭池河六广渡（今修文六广）而称六广门；东北面门有路通“洪边十二马头”（今开阳）而称洪边门；内城和外城都有东门，为了区别起见，称内城的东门为老东门，外城的东门为新东门或小东门。

此外，贵阳民间有“四阁”之说，是指文昌阁、玉皇阁、灵官阁、皇经阁。文昌阁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今依然耸立在老东门上城墙上，清康熙八年（1669年），巡抚佟凤彩认为以文教为治，培振文风，须重建



抗战时期的大南门



民国时期的威清门

文昌阁。总督卞三元“正与捐费经营之，未果”。继任总督甘文焜“力赞之”，于是“不伤财，不劳民”，七个月时间重建竣工。佟凤彩撰写《重建昭文门文昌阁碑记》。文昌阁后又多次重修。文昌阁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阁楼，这种造型，全国仅此一例。其他的三阁早已不存，但贵阳城的老百姓仍然以“九门四阁”为贵阳城的标志。

玉皇阁在城内城基巷，为清康熙时建，又名永福观，原有文昌殿在其内，现为城基路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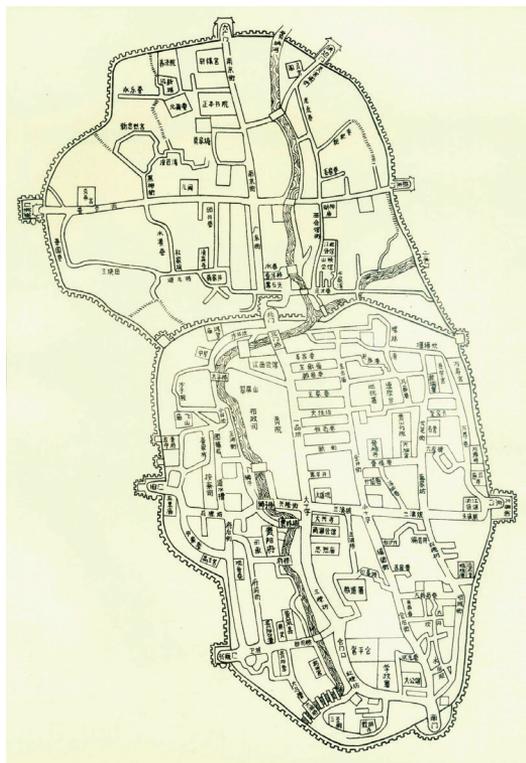
灵官阁在普陀路侧建国巷，清代建，为祭祀王善。王善俗称王灵官，是道教镇守宫观山门之神，大的宫观都建有灵官殿祀之，单独立殿供祀的称灵官阁。

皇经阁在省府路上，紧挨巡抚衙门，三层歇山顶，高出城内其他房屋，清代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设官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改名贵州公学校分校。

清代贵阳城内、城外其实有很多楼阁，但四阁均在城内，且都为道观，分别位于老城的东、西、北、中。为什么南面城内的斗姆阁没有入选“四阁”呢？大概原因在于斗姆阁的形制只有两层，在六洞桥边的永祥寺、三圣宫、吉祥寺、黔明寺、华严寺、华光庙、天后宫等一堆寺庙里，不显得突出。

清代贵阳城内南北走向的大街为全城的中轴线，此道贯穿内、外两城。内城自大南门起，经仓门口、三牌坊、大十字、抚牌坊、一品坊至北门；出北门后入外城，经黑石头、广东街、南京街至六广门，大体为今中华南路、中华中路和中华北路。与之大体平行的另一条主街，从大南门通往洪边门，在内城为仓后街、福德街、小十字、金井街、珠朝井、东岳庙后街，在外城为西会馆街、老虎巷、灵官阁街，大体相当于今富水南路、富水中路、富水北路及陕西路、和平路、普陀路。内、外城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轴线，与上述两道形成正交，构筑成贵阳街道的基本骨架。全城共有大街小巷一百二十三条。

内城街道至清代已有八十条。从老东门至大西门的街道，分别为头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兴隆街、狮子桥、花牌坊、五显庙，大致是今中山东路和



清道光年间贵阳城垣街道图

中山西路。此道与福德街、金井街交叉处称为小十字，与三牌坊、抚牌坊交叉处称为大十字。内城街道以大十字为中心，小十字为次中心，在南北向大街和东西向街道两旁形成若干走向不一、宽窄不一的街巷。

外城街巷比内城少得多，仅有三十四条。它有一条由新东门至威清门的東西向横轴线，分别称为鲜鱼巷、化龙桥、普定街，大致是今黔灵东路和黔灵西路。此路与南北向大街相交处俗称十字口，以此划分外城东南保、西南保、西北保和东北保。

近城街道实为城乡接合部和入城通道，有九条。内城外有打鱼街（今西湖路）、马棚街（今新华路）、箭道街、钱局巷（今文化路）和西门街（今三元宫一带），外城有威清街、陆广街和洪边门外街。

贵阳城坐落在山间盆地内，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城中丘陵起伏，形成不少坡、坎、槽、坝，街巷子多转弯抹角。老贵阳人一道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就说明了贵阳的街道特点。“余（一）家坝，二浪坡，三板桥，次（四）南门，五显庙，六座碑，齐（七）家湾，八角岩，九华宫，石（十）板坡。”这首顺口溜用谐音的方法，以数字开头来记录街名。顺口溜中的地点，分别指现在的米市巷口、中山东路、汉湘路、都司路口、五显巷、弯弓街、齐家巷、省政府后山顶、九华村和北新区路。

贵阳不少街巷以“湾”命名，如螺蛳湾、构皮湾、坡匠湾、齐家湾、郭家湾等。以坡命名的街巷中，头浪坡、二浪坡、三浪坡最为著名。贵阳民谣“禹门三叠浪”就是讲的这条路。这条路是老贵阳城一条东西走向的繁华街道，它的三段老地名分别叫头浪坡、二浪坡、三浪坡，新地名就是贵阳人熟悉的中山东路。“禹门三叠浪”中的“禹门”在贵阳老城东面，文昌阁旁，地势较高，街道往西坡度逐渐降低，过大十字到狮子桥头的贡院（即今大十字广场附近），已经是平坦无坡。贡院是清朝贵州科举考试的乡试场所，考举人就在这里举行。自禹门西至东门小十字（今蔡家街口）一段叫头浪坡，东门小十字至小十字一段叫二浪坡，小十字至大十字一段叫三浪坡。“禹门三叠浪”，意思是：读书人攀附鲤鱼，经过三次由大到小的浪头后，鲤鱼游到贡院，就可以“鲤鱼跳龙门”，就有通过考试中举人的希望。头浪坡、二浪坡、三浪坡的取名，既是依地势由坡而得，也是盼科举考试一帆风顺。

因贵阳城濒临南明河，又有贯城河流经内、外两城，故有沿河街、玉河街、小河坎、双水关巷等街名。河上多有桥梁，以桥命名的街道不少，如遵德桥街、济平桥巷、太平桥街、狮子桥横巷、贯珠桥、三板桥等。城中多有塘、井，故有堰塘坎、小堰塘坎、四方井巷、琵琶井巷、薛家井巷、团井巷、大井坎、小井坎、沙井坎、龙井巷、珠槽井、金井街、竹筒井巷、黑羊井巷、白沙井巷等名称。

因为是省城，城内建有很多官署，很多街巷以官署名命名，如府前街、府

后街主、铁局巷、钱局巷、都司桥街、火药局等。城内有掌管全省教育的提督学政署，府学教授署驻外城地，县学训导署驻内城。贡院在布政使司署侧，为全省乡试考场。府学宫规模宏大，在府学教授署侧的薛家井巷。县学宫在县学训导署侧，地近堰塘坎、文笔街。城中有三大书院，贵州书院在巡抚署对面，正习书院（南书院）在顺城街，正本书院（北书院）在外城大街侧。储存粮食的机构常平仓，建在今市场路旁，因此，常平仓后的路叫仓后街，即现在的富水南路；仓前的路就叫仓门口，即现在的市场路。之所以叫市场路，就是因为常平仓是买卖粮食的地方，是很老的粮食市场。

清代的贵阳城与明代一样，城内保留了很多牌坊，有一品坊、蔡家坊、三牌坊、红牌坊、花牌坊、抚牌坊等。城内还保持着一些田野风光，于是有三块田、六座碑、双槐树等地名。有的街道是以行业命名的，如盐行街、珠石巷、轿夫巷、鲜鱼巷、耙耙巷、三才巷、打鱼街、马棚街、皮匠湾、油榨街等。

贵阳城中名门望族世代聚居某一街巷，于是便有车家巷、颜家巷、王家巷、马家巷、赵家巷、方家巷、尹家巷、尚家巷、毛家巷、林家巷等。贵阳城内黔灵西路马家巷，就是马士英的花园宅邸。过去的马家巷是一条专门前往马府的死胡同，后来马氏家族衰落，巷子被打通，一头连着毓秀路，一头连着黔灵西路。马府现已不存在。

新建的街道多以地方命名，如南京街、广东街、普定街、陆广街、威清街、红边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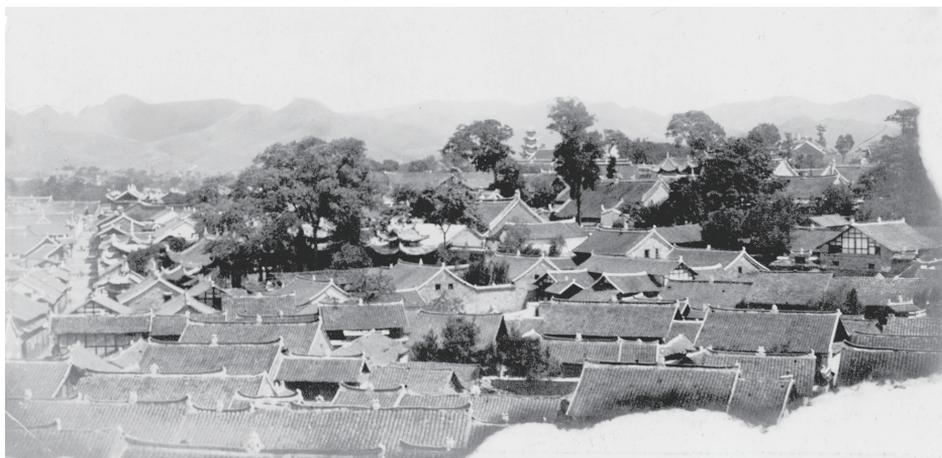
二、七十二行百业兴

清代，清政府在贵阳废除土司制度，推行流官治理（即朝廷直接委派官吏来治理），在农业和税收上实行“按丁输赋，按亩征粮”，中原及邻近各省人员迁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清代贵阳城出现了许多商业街，著名的有西会馆街、广东街、南京街、普



定街、仁寿街。西会馆街因山西、陕西会馆得名，山西人以开钱庄闻名全国，陕西人多开当铺，从事金融活动，所以西会馆街实际上是当时贵阳的“金融一条街”。广东街是清代兴起的一条商业街，在长度不到三百米的路段上，有三十多家丝线铺，最早的是“钱家老店”，以后又有刘氏的义兴仲、义和生、义厚祥、义和祥、义盛祥，汤氏的汤福兴、汤福隆、福兴隆，卢氏的义利生、义利兴，此外还有傅洪顺、钟义成、殷茂盛、杜春荣、冉聚昌、义生祥、冯乃盛、罗恒发、孙文泰、春生茂、刘鑫盛、杨恒兴、吴万中、蒋华先、张中荣、郑厚福等店铺，故俗称广东街为“丝线街”。南京街的起源很可能与江南一带客商在这里做生意较为集中有关，后来，江西人逐渐增多，他们在南京街主要经营菜油、大米及香蜡纸烛。普定街的得名很可能是因普安（即安顺）人善于经商，长于贩运“广货”（外地货物）与土特产。仁寿街源于明代的渔巷铺，附近有鲜鱼巷，可能是当时的水产市场。在广东街、南京街和普定街、仁寿街的交叉口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与内城的大十字均为贵阳商业繁盛之区。



清末南京街（今中华北路一段）

从街道名称上，可以看出清代贵阳城的工商业已成行成市。盐行街，顾名思义是以盐业为主，有盐号二十余家，著名的如协兴隆、永隆裕、宝兴隆、永发祥等。马棚街因驮马聚集而得名，是运输行业集中的货物集散中心。轿夫巷因轿夫会聚而得名，轿子是当时运送客人的重要交通工具，特别是“麻乡约轿行”出现后，有过街轿子和长路轿子。还有些街巷以此方式得名，比如珠石巷可能因珠宝店铺、作坊多而得名，粑粑巷大概是卖糍粑的摊贩多，打鱼街可能是打鱼人的住地。

清代来贵阳的“客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手艺”和“佣工”者，仅贵阳府亲辖地和贵筑县就不下四五百户，这又给贵阳的手工业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铁器打造业相当兴盛，数十家铁匠铺集成了一条“铁匠街”，还有一条巷子因官办铁局而得名。贵阳还有一条“铜匠街”，家家户户都制作铜器。皮匠们也集中在一条巷子里，称为“皮匠湾”。乾隆年间，“于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匠，教民纺织”，因“织成的布，较之贩自客商者价贱而易售，小民趋利若鹜”，故“纺织者已不下数百家”。贵阳的丝线业，自乾隆年间以来兴起，最初是湖南常德人钱韦高、刘一重传入丝线技术，以后竟使广东街成为“丝线一条街”。贵阳造纸始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先在鱼铺湾兴建纸厂，招募江浙工匠制造各色纸张，清代尤甚，远销云南。刻书在明代主要是官刻，永历年间贵阳寺院刻有《语嵩和尚语录》等书，清代除藩署（布政司）刻本、臬署（提刑按察司）刻本、提署（提督衙门）刻本、学署（学政）刻本、府署刻本以外，又有若干私家刻本，如陈氏的灵峰草堂刻本、高氏的怡怡楼刻本、颜氏文慰堂刻本、花近楼刻本等。晚清贵阳还出现一些刻坊，著名的如家荫堂、熊大盛堂、昆记熊大盛堂、训纂堂等。手工艺产品中，贵阳雄精雕刻享有盛名。《黔南识略》记云：“雄精不易得，贵阳雕镂为佛像，玩器人皆宝气之。”

在城市手工业的推动下，贵阳附近出现了一些专业村寨，例如白纳正司的锯镰寨、骑龙的顶贯寨、白纳司的打铁寨、水边里的瓦窑寨、巴香里的锣锅寨、王潘里的纸厂寨、捕属里的沙锅寨、谷上里的煤窑寨、西隅里的铁厂寨等。



贵阳府属各州县也有一些工矿业，比较突出的有开州汞矿、定番纸、清镇绸、贵定丝烟。开州汞矿的开采在清代达到鼎盛，其矿坑有广岔八大堡、猪窑堡、周家堡、同心堡、打柴堡、小金关、西衙厂、沙沟、时家屋基、罗家沟、马烈山、大发堡、马家堡等数十处，炼灶数以千计，规模和产量超过铜仁万山。定番州出产的纸，质量优良，与印江纸同被指定为贵州乡试用纸。继遵义之后，贵阳地区也推广桑蚕，从事丝织的人渐多，清镇所产称“眉公绸”，定番所产为“定番绸”。贵定县自引种晒烟以后，因获利多而民间普遍种植，在县城出现了一些丝烟铺，产销两旺。

到了晚清，商品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与国际市场联系，一方面是“洋货”，如洋纱、洋布等进口货物在贵阳销售；另一方面是贵州的“土产”运销外省或国外，商业更为活跃，形成了“七十二行”的格局。七十二行中，最兴盛的是盐业、绸缎业、纱布业、百货业。如前所说，食盐销售一直是贵阳商业的大宗，自光绪初年丁宝桢在四川改革盐政后，实行“官运商销”，于是产生了华氏家族那样的大盐商，贵阳盐行街生意也更加兴隆。绸缎业的发展与贵阳丝绸需求量增大有关，而距离贵阳不远的遵义又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江浙、四川的丝绸也通过客商运到贵阳，于是出现 60 多家绸缎铺，以浦庆昌、蔡恒泰、群明社、张日兴等商号最大。纱布业的兴起，与洋纱、洋布的输入有很大关系，在贵阳市面上已有英国的阴丹士林布，美国的“金狗牌”标布，日本的倭绒、羽纱，法国的毛料以及“泰西缎”“泰西纱”等，华日兴等 10 多家商号专门经营洋布。不过，土布在贵阳仍然行销，因洋纱优于土纱，织户需要量大，所以纱布业兴盛一时，有德大生、同义厚、马文泰、万盛兴等 30 多家店铺。百货业既经营本省的土特产品，也经营外地的“广货”，有王隆昌、陈兴隆、戴宝华、荣永兴等字号。药业自明代中医传入以来逐渐兴起，因中医、中药行业都推崇孙思邈，在贵阳城内及青岩都建有药王庙。光绪十四年（1888 年），唐炯与于德楷合资创办了同济堂中药房。清末还出现了京果海味业、照相业和钟表修理业，贵阳最早的照相馆是田家巷的“镜秋轩”。



文通书局拣字车间

与此同时，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成为繁盛的商业街区。清末贵阳商业户数有 300 多家。同时近代工厂也先后出现，先是官府在贵阳设立火药局，厂址在今会文巷。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设立警务工厂，从游民中选出 120 名工人，经费由巡警费中拨出，手工生产一些日用百货。贵州巡抚庞鸿书还提出一个方案，兴建“普通大工厂”，下分织布、制革、漆工、缫丝、军装、木工六个分厂，但未能实现。贵阳最大的近代企业是贵阳文通书局，它筹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由大盐商华之鸿独资经营。文通书局的全套设备，包括对开机、四开机、六开机、圆盘机及电镀、铸字、照相、装订设备，均由日本进口，技工多在日本培训，还聘来三名日本技师。文通书局设址于王家巷，工艺工序分为铅印部、铸字部、检排部、装订部、影印及金属制版部、绘画部、石印部等，能印制图书、图表、银票、钱票、商标、广告等，其规模和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宣统年间（1909—1911 年），商人刘少樵投资 5 万银圆成立的贵阳皮革有限公司，从美国进口机器，招募工人生产，是贵阳最

早的股份制企业。熊静安在西湖路开办贵阳皮革有限公司，资本为 10 万银圆，进一步发展了股份制企业。

七十二行各有组织，称为“行会”。行会不同于会馆，它不是以同乡关系结合，而是按行业划分，同一行业的人无论是老板或者雇工，都能参加进来。行会由把头控制，制定各种行规，规定价格，要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必须申请入会，否则不准开业。同行的人都敬重某一始祖，敬之如神，于是出现许多名目，如丝织业建“嫫祖会”，染织业建“梅葛会”，缝纫业建“轩辕会”，厨师及饮食业建“詹五会”，屠宰业建“张爷会”，酿酒和卖酒的建“杜康会”，行医卖药的建“药王会”，泥、木、石匠建“鲁班会”，铜匠铁匠建“老君会”，理发匠建“罗祖会”，陶瓷业建“华光会”，等等。行会的情况复杂，有的是纯商业性的，有的是服务性或手艺性的，有许多是工商合一的，如杜康会就包括酿酒和卖酒的，药王会就包括医生、药店主和药工，但因它们都面向市场，故一般归入商业范畴。贵阳有轩辕宫、药王宫，说明这两行相当兴盛。不管哪个行业，做生意都希望发财，所以财神最受尊敬，除在新东门内有永源宫（财神庙）外，在近郊还有六座财神庙。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商部奏准仿欧美成立商会组织，在贵阳也设立了贵州商务总会，统管各种行会，辛亥革命后改组为贵州省城总商会，其任务是维护工商业的权益，推动工商业发展，组织货源，协调矛盾纠纷，摊派各种捐税。

三、乡村市集赶场忙

赶场是中国农村的民俗活动。由于缺乏交易规范和场地，居住分散的农村老百姓在特定的日期，到某个村镇买卖农副产品，换购必要的日用生活品，北方叫“赶集”，南方叫“赶场”“赶街”“赶山”“赶墟”（赶圩）“赶闹子”，各地叫法不同，形式大同小异。

今天，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赶场是遥远又模糊的概念，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更是不容易理解和想象的事情。场镇是个小社会，里面蕴含着浓浓的人



清末贵阳坊市

情味，那充满着吆喝声和喧嚣的场镇是无法被替代的，掩藏在场镇里的历史故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明代贵阳城内汉人较多，郊区少数民族较多，初时政府只开了卯（兔）、申（猴）两场，弘治十二年（1499年）政府为了便于汉人与少数民族贸易，又增开了子（鼠）、寅（虎）、午（马）、戌（犬，即狗）四场，共有六场。一到场期，人们手提肩挑去到指定地点贸易。贸易的物品仍然主要是土特产品。贵阳历来是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处，虽然习俗各异，但风气和平，一般情况下都自由交易，相安无事。场有场主，场主要对交易进行管理，并负责解决纠纷。

清朝以来，市场日渐增多，星罗棋布，遍及四乡，贵阳府亲辖四里六司及贵筑县所属九里，共有市场40余处。其中，有不少是由屯堡发展而成，如朱昌场、洛湾场、乌八场、青岩场、马堡场、胡朝场、刘士连场、穿心堡场、孟官堡场等；有的是由哨铺发展而成，如沙子哨场、石板哨场；有的系土司所在地，如扎佐场、养龙场、中曹司场；有的少数民族村寨，如花仡佬场、巴香场、摆

金场、高坡场、麦西场等；有的则在今市境外，如清镇场、修文场、定番场。虽然场名已用地名代替，但场期仍按十二地支顺序，如沙子哨在丑、未日集场，或在子、午日集场。当然，有的仍以十二生肖命名，如狗场、鸡场，但因同一名称不止一处，于是有大马场、小马场、大龙场、小龙场之分。青岩场原系屯堡，道光年间有居民 80 余户，因在贵阳通往广顺、定番道上，市集繁荣，故有二场，一场在寅、未日，一场在己、亥日。花佬寨原为佬族村寨，设场以后，周围数十苗寨、布依寨和汉族村寨均来此赶场。乌八场颇大，有居民 600 余户，而新场铺不过 20 余户，有的甚至只有场坝而无居民。有的赶场地点，政府虽然定了，但赶场期老百姓认为不吉利，如鼠场、虎场，人们不愿意去，刚开始时热闹，以后就逐渐衰落了。日久天长，原有的地名老百姓忘记了，但一说到马场、狗场、猪场，谁都知道是指哪里。今天的羊昌就是以前的羊场，1959 年设立白云镇的



清末贵阳赶场天热闹的街市

地方就是原来的鸡场。

赶场天，各种行业，各类交易，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猜拳行令声，争吵打骂声，人声鼎沸，还有牛马嘶鸣，猪崽尖叫，羊儿咩咩，无比喧闹嘈杂。还有大宗的粮食市场、猪羊牛马、木料市场。猪肉摊一早就搬到市场中段去集中，不像闲日那样零星在门边摆卖。熟食摊，天还没有大亮，熟食摊的老板就催促他们的伙计起身洗猪头，刷锅盖，宰鸡杀鸭，煽旺炉火，预备好待卖的卤肉、卤鸡等。盐巴摊，当时吃的是四川自流井的块盐；布匹市摊，早期行销土产窄布，后来进口“阴丹布”，畅销一时；百货摊，主要有成衣、针、线、香粉等；农具摊，主要交易木器、竹器、铁器、秸秆纺织品等商品；还有燃料摊，横七竖八的长枝的山柴堆放着，也坐了几个头戴包巾、身穿褶裙的苗族妇女等人问价。至于烟摊、烟馆、酒摊、酒馆、茶馆、饭馆、糕点摊、水果摊、算命摊、测字摊，摸骨相命取痣摊，比比皆是；叮叮当当敲麦芽糖，沿街叫卖“炒米糖开水、盐葵花”，声声入耳；市场上永远都有赌场，赌博项目有很多种，小赌大赌各不同，其中最直接的赌博方式叫“押大、押小宝”和猜“苞谷籽籽”。逢赶场天的赌场更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正午，约十二时将过，熙来攘往的场就开始了，下午二时到四时这一段时期是场日最拥挤的时间。四时以后，人们就渐渐散开回家去了。

四、万马归槽于贵阳

自元代开辟驿道到清代，贵阳已成了西南大通道，成为“南来北往，西出东进”的咽喉重地。几条重要的省际驿道在贵阳交会，使贵阳成为西南重镇，通过驿道可以上云南，下四川，走湖广，进京城。驿道是古代交通的大动脉，无论内地或边疆，也无论平原或山地，都靠驿道相互联络。不同的是，贵州的驿道盘旋于山间，翻山越岭，崎岖不平，不能行车，主要靠马代步和运输。成千上万的马匹，从四面八方来到贵阳，使贵阳成为“万马归槽”之地。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驿站多有废弛，路途不通，在康熙、雍正年间，

贵州驿道重新修整。清代仍沿用元、明时期开辟的驿道干线，但根据实际需要，加强了湖广至云南驿道（包括湘黔和滇黔驿道）的建设和管理，改修旧道，增设驿站。自贵阳皇华驿以西设清镇、平坝、普利、安庄、坡贡、郎岱、阿都田、白沙、上寨、刘官屯、亦资孔 11 驿；皇华驿以东设龙里、新添、酉阳、杨老、清平、重安江、兴隆、偏桥、镇远、青溪、玉屏 11 驿。贵阳作为省城有皇华驿并设有驿前市，往东有龙里驿，往西有威清驿，往北有扎佐驿、底寨驿、渭河驿、养龙坑驿，“龙场九驿”上有龙场驿、六广驿。为了减少驿站开支，各驿道上原设的驿、站一律裁撤，改设递铺。到现在今以“铺”命名的地名在贵阳不少，如龙洞铺、毕铺、汤耙铺、阿江铺、老鸦关铺、凤凰铺、毛栗铺、斑竹园铺、堰塘铺、太慈铺、乾堰塘铺、大水沟铺、烂泥沟铺、石板铺、花仡佬铺、杨柳井铺、青岩铺等。清代绿营兵有镇、营、汛、塘等建制，塘是最基层军事组织，在贵阳附近遍设塘兵，出东门有虎场塘、巴香塘，出南门有板桥塘、打铁塘、高坡塘、顶塘、龙洞塘、黄泥塘，出西门有大水塘、花仡佬塘、杨柳塘、桐木塘、石板塘，出北门有阿江塘等。驿道上哨所有：关口哨、龙洞哨、梅子哨、界牌哨、牛路哨、北关哨、乾沟哨，贵州前卫的头桥哨、湾子哨、野鸡哨、黑石头哨、黑山哨、黎元哨、黑土哨、杨柳太平哨、长坡哨、永安哨、石柱山哨、沙子哨、凤凰山哨、三角塘哨、毛栗哨、花仡佬哨、桐木岭哨、簸箕哨、波罗二哨、石板哨、摆找哨、打铁哨等。

清代把大道延伸到各府、厅、州、县乃至一些偏远山乡，全省大道里程达 9375 里，设铺 534 处。主要大道有 36 条，贵阳府至罗斛厅（今罗甸县）道，全程 297 里，设铺 21 座；贵阳乾堰塘至广顺州道，全程 107 里，设铺 10 座；贵阳府至开州（今开阳），全程 170 里，设铺 11 座；清镇经毕节、威宁至云南宣威道，全程 620 里，设铺 34 座、站 3 所；清镇至平远州（今织金）道 287 里，设铺 16 座；贵阳府罗斛厅也新辟了大道。

在修筑道路的同时，桥梁也随之发展。明以前关于桥梁的记载极少，当时民间过河主要是利用跳磴、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藤索桥和竹索桥等，少

有大型桥梁。到了清代以后，石拱桥日益普遍，还有了铁索桥。

由于贵州境内山峦起伏，沟壑密布，道路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翻山越岭，曲折盘旋，因而修路非常困难，由于驿道和大道多在山间穿行，往往出现“关倚岩间立，人从石隙过”的情况，因此关隘特多。现在贵阳的地名中，有许多称为“关”的地方，如图云关、鸦关、凤凰关、蔡家关、六冲关、汤耙关、土地关、小土地关、打铁关、五里关、百达关等都属于这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图云关和鸦关。

图云关古名油榨关，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贵州巡抚王燕改名图宁关，道光元年（1821年）又改名图云关，以后一直称为图云关。图云关地处贵阳城南要冲，地形险要，扼守此地，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关上奇石崔嵬，玲珑百态，树木葱茏，凉风习习。此处有驿道经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离筑赴湘、桂的必经之道，明清两代迎送官员、送别乡人都在此举行仪式。关前诸峰环峙，俗呼为“满林春笋”。图云关的岩壁上刻有“黔南首关”四字。

鸦关，俗名小关，位于贵阳东北面的古代通四川的驿道上。明代贵阳八景之一有“鸦关使节”，说明鸦关古代是迎送使节的场所。这里地势险要，素有“北门锁钥”之称。鸦关拱门，建筑古朴，攀藤附蔓，沧桑遗痕斑斑，是贵阳难得的古迹，今已不存。

贵州的驿道和大道，弯道多，坡度大，崎岖不平，基本不能通车，陆路运输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人挑马驮，或施抬杠，或以背负，或者使用滑竿、轿子，或以马匹代步，行旅艰难。但是有了驿道，外地移民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贵阳，或经商，或手艺，或宦游，或来筑置产、佣耕。驿道使贵阳与外地的经济联系加强，川湖的布帛、巴蜀的丝绸、两粤的海产、江西的瓷器以及中原的奇巧之物源源进入贵阳，而贵阳的土特产品也通过驿道运往各地。缅甸、印度及东南亚各国使节通过云南驿道进入贵州可达京城。

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在日记中就记有嘉庆年间缅甸人贡象过贵州之事。

清代贵阳名士罗文彬所著《香草园日记》，记有缅甸人骑象过贵阳的情景。光绪元年（1875年），缅甸使者直也驮纪门、腊门甸素等驱象队入京朝贡，路过贵阳，全城轰动，观者如潮。日记写道：“四月十三日，缅甸贡象至省，倾城士女出观。十四日，阴。与雪兄登东城视驯象，男女杂遯，几无立脚处……申刻，复同雪兄出城看象。……十五日晴。贡使驱象上院，与诸君出观。”象棚搭在老东门，罗文彬应朋友之约，“出东城，顺过象棚”。次年春，缅使自京城返回缅甸，又过贵阳，贵州巡抚立即通知沿途各府、州、县派官员负责接送，三月初二抵达省城贵阳。

五、文教事业大发展

清军入关以后，兵锋南指，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基本上平息了贵州的抗清力量，控制了贵州政局。在战后的重建工作中，清首任云贵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均较重视“文治”。赵廷臣在上清廷的《抚苗疏》中提出，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大一统事业，应乘此遐荒初辟之机“首明教化，以端本始”。于是，随着清朝政权系统在贵州的建立，各地的儒学校逐步恢复。到康雍乾时期，贵阳的学校教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家弦户诵、文风日盛，扭转了人们对贵州贵阳剽悍成习的印象。贵州学政洪亮吉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选得乡试俊才后，赋有“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诗句。虽然统治者推行科举制度，目的是借助“学而优则仕”路径推行“教化”政策，最终达到树立文化权威，控制民众思想，统一社会秩序的目的，但客观上增强了贵阳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推进了贵州文教事业从“人文未盛”向“大魁天下”的重要转变。

（一）府学宫、县学宫和贡院

贵阳府学，俗称府学宫，亦称孔庙。地址在薛家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庙巷，现为粮食厅所在地。中国儒学向以孔子为创始者，全国各地都有孔庙，以山东曲阜孔庙最著名。贵阳的孔庙与府学宫同为一处，清顺治十八



清末贵阳府学宫礼门

年(1661年)贵阳两次重建府学宫。其后,康熙、雍正两朝及道光十九年(1839年)均有修建,规模宏敞,庄严肃穆。每年逢孔子诞辰,贵阳府知府都要率大小官员与府学、县学、书院师生到孔庙祭祀孔子,行三跪九叩礼,十分隆重。届时贵阳府知府还要讲话,劝勉学生勤学尊师。

县学宫是贵筑县学的俗称。(道光)《贵阳府志》记载:“贵筑县学在府城内东北隅。”地址即今忠烈路9号贵阳幼儿师范学校所在地。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贵筑县成立,经多次修缮,规模日渐宏敞。按清制“府、州、县”学为官学,地方长官较为重视,设施也较为完备。贵筑县学大门两侧各有牌坊一座,额书“道冠古今”和“德配天地”。入内,主体建筑有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至圣后殿,其他还有明伦堂、名宦祠、王公祠、乡贤祠、官厅等。因为是祭祀孔子的地方,所以大门外还仿孔庙竖有下马碑,文武官员一律到此下马。

贵阳的贡院所在地在今大十字广场的中西部，即科举时代贵州举行乡试的地方。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建贡院开设乡试。明朝时期的贵阳贡院本来在城西，后因战火遭毁。顺治十六年（1659年），巡抚赵廷臣请准改建于此。学政提督署本来同贡院在一起，后迁大南门常平仓南面，即人们所说的学政署。

贡院的规模很大，南抵狮子桥，北达翠屏山即今太平路一带，东临今中华中路，西沿贯城河。老贵阳中心的这一大片地区之所以没有其他建筑，比如官署、寺观、书院、民房等，均因明、清时期都属贡院范围。贡院前还有一个大坝子，即今大十字广场南部，专供参加乡试的秀才们在此等候喊号，这个坝子后来就成了老贵阳的一个地名——“贡院坝”。贡院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跳龙门之处，考好了就是举人，既可上京会试，金榜题名，也可踏入仕途，光耀门庭。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贡院坝充满了读书人的希望、追求和向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上书准奏，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贡院的辉煌也从此不再。

（二）清代贵阳书院

明末清初，贵州境内战祸连年，使明代建立的书院大都毁于战火，衰败不堪。清朝建立之初，国基未稳，清政府为了防止书院讲学宣传民族思想，聚众成势，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因而在积极创办官学的同时，严禁创设书院。到康熙晚期，清政府虽未明令创立书院，但各地的书院已逐渐由沉寂转向复苏。贵州改土归流后，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等在治理“新开苗疆”过程中，把化导苗民子弟视为“振励苗疆之要务”，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一大批义学的创办，推动着书院在贵州的蓬勃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年）贵州巡抚元展成奉旨创办贵山书院后，贵阳府及其所属定番州、广顺州、开州、罗斛厅、龙里县、贵定县、修文县共创建和修复19所书院。

贵阳府的贵山、正本、正习3所书院在清代后期十分著名，为贵阳及贵州

省培养了大批人才。3所书院各有教学特色：贵山肄业者多为文生，正本肄业者多为童生，正习肄业者多为举人。光绪年间贵州学正严修莅黔时，首先拜会贵阳3所书院院长，并多有赞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本书院改办为贵阳府中学堂。

贵山书院是清代贵州办学层次较高且最大的书院，其教学质量为一般府州书院和官学所不能企及。可以说贵山书院是清代贵州省级重点书院。

在历代名儒的耕耘下，贵山书院硕果累累，人才辈出。贵山书院学生贵阳青岩人赵以炯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中状元，成为云贵两省自开科举以来“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史称“贵州之有状元自以炯始”。

正本书院地址在府城北门外六厂门内大街（即今中华北路）。嘉庆五年（1800年），贵州巡抚常明在省城北门外旧贵筑县丞废廨地（即六厂门）修建正本书院，俗称北书院。贵州学者、著名书法家严寅亮曾任书院主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设贵阳府中学堂。

贵阳正习书院，俗称南书院，嘉庆五年（1800年）布政使常明建，光绪初年，改名学古书院。

康熙初年，清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巩固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统治，不能单靠军事镇压，还必须辅之以安抚政策，而安抚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广设义学，贵阳的义学以康熙年间贵州巡抚卫既齐和道光年间巡抚贺长龄倡建者最多。贵阳亲辖地和贵筑县均设有义学。定番州、罗斛州、广顺州、贵定县、龙里县学、修文县、清镇县也有义学。清末兴办新学以后，贵阳与中原不同，对私塾并未严加禁止，而是明令改良作为小学补充。宣统元年（1909年），贵州谘议局第一届会议提出《推广教育案》，列出了7条改良办法。

贵阳府在清代出了900举人、100名进士、21名武进士和2名状元。武状元曹维城可谓名家传世：其父曹元肃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武进士，官至副将；其子曹石则是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科武进士，雍正御

前带刀侍卫，卸任后离京返回贵阳，与曹维城居住在贵阳城南状元府（即今曹状元街）。曹氏祖孙三代都是武进士，其中还有武状元，算是贵州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武术世家。曹维城则与光绪年间文状元青岩人赵以炯、麻江人夏同龢、遵义人杨兆麟并称为清代贵州“三状元一探花”。

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国家政治舞台的贵阳人中，出现了许多著称于世的人才。如上疏反对丈量贵州土地“徒滋生纷扰，无益于民”的包祚永；担任吏部考功郎时持正不阿，人称“硬黄”的黄辅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前往敌营，慷慨陈说，要英法速罢兵议和，被天津百姓称为“石父母”的石赞清；历官 37 年，勤政爱民，始终一致，有古循吏风的李朝仪；两次担任会勘使臣，对中英滇缅划界作出了贡献，铮铮铁骨，一身爱国正气的陈灿；担任御史刚正不阿，不畏强暴，仗义执言，曾弹劾权奸袁世凯与奕劻，直声震天下的陈田；向光绪皇帝上《推广学校折》，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的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参与编撰《康熙字典》的周起渭；编撰《畿辅通志》的黄彭年；以诗词书画名噪京华的姚华；等等。

清代贵阳文风比较兴盛，父子兄弟同登科甲人翰林者不乏其人。父子进士者如黄彭年及子国瑾等；兄弟进士者如徐必选、徐必远，何德新、何德竣及李端棻、李端綮等。而“世代簪缨，科名不绝”的家族，有周际华一门、赵国澎一门。贵阳何氏五代七翰林。青岩赵家，除赵以炯中状元大魁天下外，从光绪五年到十五年（1879—1889 年）的十年间，赵家一门四喜：长兄赵以焕光绪八年（1882 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 年）中进士，官至江苏丹阳知县；光绪五年（1879 年）三弟赵以炳与赵以炯同入庠，同榜中举人，赵以炳中得经魁；四弟赵以燿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与赵以炯同榜中丙戌科进士。赵家一门出了三个进士、一个经魁，还中了一个状元，这在科举时代实在是极其难得的殊荣。

（三）清末学制改革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近代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相当一部分贵州人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开放、进步的世界观，从而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渴求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在公车上书活动中，贵州举人的表现十分积极。公车上书参与者计18省共1300余人。据康有为写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可知，正式签名者仅16省共603人，其中广西籍举人占99人，贵州籍举人占95人，位列第二，其中贵阳府及其各属厅州县者44人。贵阳籍举人的人数占比很高，体现出了当时贵阳的文化教育相对开放，并且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人才，反映出了贵阳乃至贵州文教事业的开放性与进步性。

在爱国思想的影响下，贵阳不少青年纷纷致力于探索新学。后来有不少人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逐步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与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近代化思想在黔籍士子中所产生的影响，推动了贵州的教育事业由古代向近代过渡。

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他提出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对“西学东渐”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之洞一直把贵州作为第二故乡，关心、支持贵州教育制度改革。他的学生严修在贵州任学政的时候，成为“新学”入黔的倡导者。任贵州督学期间，他深感贵州教育的落后僵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改革学古书院，亲自拟定革新书院章程，撰写了《学古书院肄业条约》，聘请绥阳名宿雷廷珍（玉峰）主持中学，严修自己主持西学。严修的改革和执教，使学古书院成为清末贵州培养新式人才的摇篮。因其开了贵州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书院改名为经世学堂，以算学闻名省内外。经世学堂引进“西学”，比湖南的时务学堂还早，成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开端。严修改组后的学古书院为清末民初的贵州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后来创办贵州通省公立学堂和贵州优级师范



严修与经世学堂学生。
中坐者为严修，站立右
一为黄干夫

选科学堂的唐尔镛；创办算学馆和达德学校的黄干夫；创办贵阳九所官立小学堂和官立中学堂，贵州首任教育厅厅长周恭寿；清末贵州教育总会会长、建筑学家乐嘉藻；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和逻辑学家王延直；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毛邦伟；大学者姚华；科学家彭述文；以及后来活跃在清末民初贵州政坛上的钟昌祚、刘显治、金开祥、张协陆、熊继先等等，皆出自严修的门下。

贵阳人李端棻亦是首倡学制改革先锋。他不仅是鼓励、号召贵州籍举人参与公车上书、推动维新思想传播的重要人物，而且是清政府改革近代学制第一人。在甲午战争后，李端棻怀揣教育救国梦想，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向朝廷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提出在京师建立大学堂、各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分别对招生对象、招生办法、学习期限、课程设置、师生待遇、教学方法等提出具体建议。最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立起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门，为清末学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维新运动失败后，李端棻被流放新疆，途中遇赦回到贵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端棻受贵州巡抚邓华熙宴请，主讲经世学堂期间，更以“卢梭论”“培根论”为题，向学员阐述西方民权与自由思想，并召集诸生在私宅讲学，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端棻掌贵山书院，大力提倡改革，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与科学文化知识，使贵阳以至贵州省内一时风气渐变，言西学维新者，日益普及。除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之外，李端棻还参与创办贵州第一所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及贵阳第一所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并在一些



清末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中外教官

学校授课，逝世前还留下遗嘱，将积蓄的 1000 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作为办学经费，赤心助力贵州教育近代化。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遂下兴学诏令，将全国书院均改为新式学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次年，贵州巡抚邓华熙奉诏，将在贵阳设立的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这是贵州省第一所新式教育的高等学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
第一班毕业生合影



清末贵州留日学生与
“鉴湖女侠”秋瑾（前
排左三）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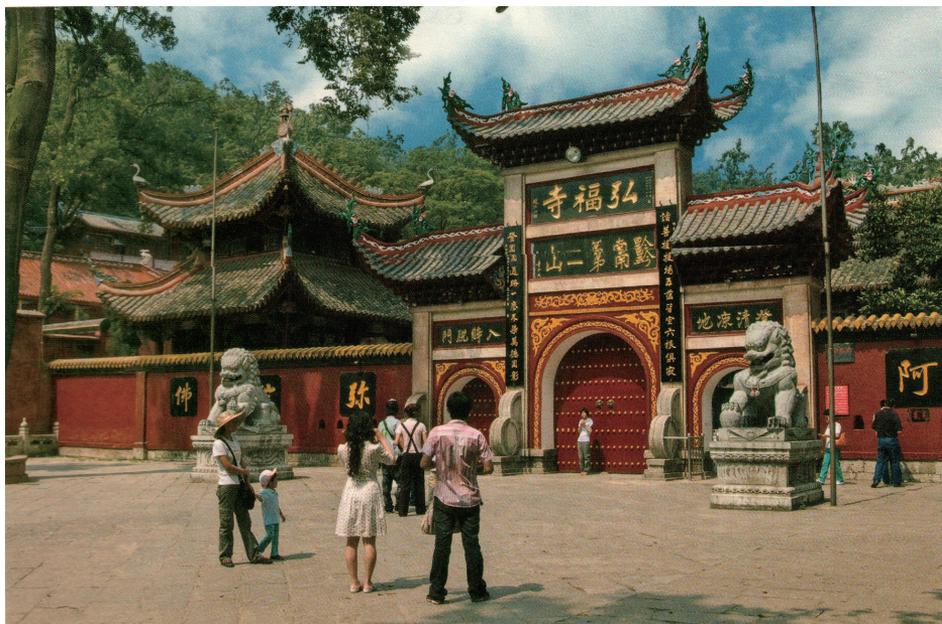
府。大学堂拟定了完备的办学《章程》和各项教学计划、管理条例，还专门开设外语专业，分英文、法文、日文三班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等科目。就当时贵州大学堂与全国同类高等学府比较而言，贵州大学堂亦不为落伍，且可充中上水平。

清末，贵阳办起了 60 多所小学堂和中学堂，还开办了贵州师范传习所、贵州简易师范学堂、贵州优级师范学堂、公立师范学堂、农林学堂、矿业学堂、蚕桑学堂、官立政法学堂、宪群政治学堂、武备学堂、巡警学堂。贵州巡抚林绍年 3 次奏请派留学生出国，共派出 151 人到日本留学和考察。

六、五大宗教共一城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往往被统治阶级作为“教化”工具。明代贵州建省后，“驯化人心”在政治上来说也益加重要。明代在推行儒学的同时，又“观民设教”，将佛教、道教等宗教引入贵州，作为“弭边患、化愚民、佐王纲”的政治工具。到了清代，贵阳成为佛、道、伊斯兰、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贵州相对平静，于是邻近省特别是四川境内的僧人纷纷逃入贵州以避战祸。同时，外地许多不满社会现实或不愿降清的士大夫也潜入贵州避难，或遁入空门削发为僧，或结庐荒野隐居山林，其中不乏高僧大德、饱学之士，他们交往密切，谈禅论道。据（道光）《贵阳府志》记载，贵阳府亲辖地有佛寺 200 余座，仅城内近郊就有寺庙 36 座。著名的有大兴寺、永祥寺、黔明寺、弘福寺等。另如位于今合群路铜佛巷的铜佛寺、位于护国路中段的指月堂、位于富水北路的觉园和位于猫猫巷的文殊寺等，均是当时贵阳城内的著名寺院。城外东北的相宝山上的相宝山寺（又名屏山寺），处于东山与相宝山之间的扶风山（俗名螺蛳山）上的扶风寺，均为城郊著名古刹。青岩一地就有迎祥、朝阳、慈云、龙泉、寿佛等寺，洪边里各村寨有寺庙 23 座，佛教之盛可见一斑。



黔灵山弘福寺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教，自宋元时开始传入贵州，及至明代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贵阳成为全省道教传播的中心地区。到了清代，城内外有宫观祠庙 150 多座，著名的三大道观是大道观、南岳山道观、三元宫。

大道观是贵阳兴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它位于今贵阳繁华的大十字东面约 100 米处的中山东路左侧，今已不存。大道观祀神之多为黔省道观之首。南岳山道观祭祀南岳神，始建于明朝，清代曾维修和扩建。三元宫地址在贵阳大西门金锁桥东侧，前临水磨河（市西河），后靠西门城墙。光绪十四年（1888 年），贵阳人许义宗等组成乐善堂，集资改建为三元宫。



清末三元宫

此外，贵阳宫观祠庙五花八门，有祖师庙、灵官庙、五显庙、财神庙、龙王庙、牛王庙、马王庙、川主庙、二郎庙、炎帝宫、玉皇阁、文昌阁、魁星阁、斗姆阁。这些宫观庙宇中，文昌阁、关帝庙、五显庙、财神庙、玉皇阁、祖师庙数量最多。

元明时期，有不少回族或因军事屯垦，或为官游宦，或以百工匠作进入贵州。清代早期，也有部分穆斯林因为官、经商，在贵阳定居。咸同时期贵州苗民起义被镇压后，又一批穆斯林来到贵阳。入清以来，贵阳穆斯林渐多，雍正二年（1724年）贵阳修建清真寺。贵阳清真寺在新城团井巷口，离薛家井不远处，今地名叫团结巷。

天主教虽早在永历政权时已传入贵州，但仅在少数上层人士中活动，尚未大量深入民间。清代，罗马教廷始终想将天主教大量传入贵州，但清政府禁教甚严，仍无大的进展。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取得传教权，以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取消“禁教”，采取“保护”政策，从此，天主教的活动从秘密转向



清末贵阳北天主教的钟楼

公开。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罗马教廷将贵州升为独立教区，次年派巴黎外方传教会白斯德旺到贵州任主教，不久以胡缚理继任，并在贵州各地建天主堂、修道院、医院、学校。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凭着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护照”，干预地方行政，欺压群众，激起贵州人民的激烈反抗，其中最早爆发的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就发生在贵阳府辖境内。清代，贵州的天主堂很多，以贵阳北天主堂、南天主堂、鹿冲关圣母院等最为著名。

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政府被迫取消“禁教”之后，基督教也要求与天主教享受同等待遇，基督教差会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内地会到贵阳之初，

先后在福德街和仓后街租赁民房，改建为福音堂，人称“车家巷福音堂”。这是内地会在贵州的总堂。咸丰初年以来，基督教另一教派循道公会传入我国，循道公会传教重点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内地会、循道公会都把开设医院、建立学校作为争取群众、发展信徒的手段。光绪四年（1878年），内地会派遣1名英国医师潘惠廉博士来贵阳行医传教。后潘医师收有两名青年信徒程乾生、孙镜（鉴清）为徒，传授医术，为贵阳培养了第一代华人西医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潘医师还保荐两人去重庆英美合办的宽仁医院学习西医外科专业。他们在重庆学习期间，经常与同盟会人士接触，受进步思想影响，孙镜加入了同盟会，参与自治学社，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程乾生任法政学堂校医和陆军小学医官。贵州光复后，孙镜任贵州军政府枢密院交通部长，程乾生自己开业行医，成为贵州第一个私人挂牌开业的西医。

七、山城会馆何其多

省城贵阳是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驿道干线的交会点，又有龙场九驿通往黔西北，还有大道与州县相通，过往马匹、夫差数以千计，往来官兵、客商不计其数，城内官署愈多，官户、民户、客商、士人云集于此。

清代，外省人入筑经商，初时都是挑箩串街、摆摊设点，本小利薄。江西人卖油，湖南人售布，四川人打草鞋。等到本钱略有积累，同乡来得多了，继而开始结帮经商，控制行业，发家致富。在贵阳，有经营钱庄的山西帮，经营当铺的陕西帮，运销丝绸、百货的江南帮和浙江帮，做布匹生意的两湖帮，做瓷器、粮米、菜油生意的江西帮，进行长途贩运的福建帮，运销食盐及手工艺工的四川帮，广东帮已控制照相业、钟表修理业及部分颜料五金业。后来一些大商家出面号召同乡捐资修建会馆。会馆既是同乡聚会的场所，又是洽谈生意的交易所，还兼做客栈、货栈，为过往或新到同乡提供食宿，资助经济困难的同乡，购置公共墓地“义园”，设私塾以育子弟。清代，贵阳先后建有湖南、

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福建、江南、山陕、浙江、两广、北五省等十一个外省会馆。

江西会馆称为万寿宫，这是因为他们崇奉的“许真人”许逊在江西修道成仙，并在南昌附近的西山逍遥峰飞升。宋徽宗特别推崇道教，将许逊追封为“神功妙济真君”，并扩建许仙祠，赐额“玉隆万寿宫”。江西人以此为荣，便将在全国各地的会馆都称为万寿宫，供奉许真人。贵州各地都有万寿宫，仅清代贵阳府就有七八处，贵阳城中龙井巷有万寿宫，蔡关里虎场、青岩及贵筑西上里扎佐都有万寿宫，贵阳府属广顺城、龙里西门及贵定挑水门、平伐场也有万寿宫，足见江西商人遍及城镇和乡场。江西会馆势力强大，按原籍分为南昌、建昌、瑞州、吉安、临江、抚州六府，由六府轮流推选总领。由于会馆经济实力雄厚，置有大量房产和田产，大十字至北门桥及威清门、紫林庵一带都有江西会馆地产，还在新东门外坪子上建江西义园。江西会馆集会甚多，最大的是八月十五“真君会”，初一、十五有朔望会，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都有聚会，逢年过节给同乡送礼。民国年间，江西会馆办有豫章中学和豫章小学。贵阳的万寿宫大都不存，现仅存青岩的万寿宫是一个宽大的四合院，有戏楼、两厢及大殿，在门前的牌坊上有“八仙图”，但将许真人暗中加入，于是“八仙”变成了“九仙”。

湖南客商最先建立三楚会馆，它始建于清初顺治年间，康熙年间改称湖南会馆，但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与湖北客商合为两湖会馆，堂上有“分得洞庭柑，客话共倾三斗酒；听来衡岳雁，乡音又到数行书”的楹联。后来，湖南、湖北人越来越多，遂分为湖南会馆和湖北会馆。湖北会馆即禹王宫，供奉治水的大禹，旧址在田家巷，后改为湖北街，现为市府路小学。湖南会馆人多势众，下分长沙府、衡阳府、永川府、宝庆府、常德府，还有共同的“大公”组织，会馆设在内城南大街上，即现中华南路原百花影剧院处。湖南会馆最隆重的神会是寿佛会，除在城中建寿佛寺外，青岩、贵筑县北上里、龙里城西、修文县北乃至罗斛（今罗甸）都建有寿佛寺。咸丰年间，湖南人黎培敬任贵州巡抚，

到贵阳来的湖南人猛增。在会馆中，衡阳府的财力最为雄厚，在城中商业区有许多房产，还在紫林庵建有“楚衡别墅”。湖南会馆办有岳英小学，在罗汉营、石洞坡、虹桥、五眼桥等处建有义园。抗日战争期间，湖南人大批疏散到贵阳，新旧同乡之间发生矛盾，新来的人便组织成立“湖南旅黔同乡会”。

四川与贵州邻近，明末清初以来，移入贵阳的四川人颇多。先后建立了新、老两个四川会馆。四川人最敬重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凡有四川人到的地方都建川祖庙或二郎庙。乌当区下坝大山村的川祖庙犹存，现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四川人特别精明，在贵阳主要经营餐饮业和服务业，下层多是各种手工艺匠。老川会馆清初已建，旧址在外城鲜鱼巷侧的化龙桥边，即现黔灵东路口原豫剧团处。老川会馆的财产为先入黔的富商所掌握，把处于社会底层的四川人排斥在外。新来的四川人在清末另建一个会馆，地址在曾任贵州巡抚的洪雅人曾壁光祠堂，即现成都路小学。清末，四川人在新会馆创办客籍学堂，民国年间办有洪雅小学和子惠（杨森）中学。四川会馆的义园在新路口、六广门、红边门、周家山等处。

江南会馆为江苏、安徽等地客商所建，时间可能较早，南京街很可能与这些客商有关。会馆建在九华宫，内有九华楼、鲍花潭、荷花池，像把江南园林搬进了贵阳。江南会馆虽然是徽商及南京商人活动的场所，但江南多才子，书香气息很浓，会馆中诗词楹联特别丰富。

浙江商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主要经营丝绸、布匹，他们在头浪坡建浙江会馆，旧址在今中山东路老东门小学。抗战期间，江苏、浙江、安徽人大批来贵阳，被称为“下江人”。江南会馆在贵阳创办谌华小学，浙江会馆创办聚群小学。

山西人和陕西人来贵阳较早，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合建秦晋会馆，他们都崇敬关云长重义气、讲信用。山西人开钱庄，陕西人多经营当铺，对贵阳的金融颇有影响，所以清代的山西会馆街很可能是贵阳最早的金融一条街。不过，后来陕西人多了起来，人称陕西会馆，后来便成了陕西路。

北方人来贵阳的人渐多，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五省移民联合在福德街（今富水南路）建北五省会馆，旧址在今富水路小学。陕西会馆在贵阳亦有秦晋小学，北五省会馆亦有冀鲁豫小学。

闽商富有开拓精神，很早就把生意做到贵阳，在内城贯城河边六洞桥附近建天后宫，即今华光巷附近，曾一度改为福建路。福建人最崇敬的是妈祖，妈祖漂洋过海，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危难之中。从宋徽宗到清代同治皇帝，对妈祖累有褒封，封号由夫人升为妃，进而封为天妃、天后，直到天后圣母。福建人以天后为荣，会馆都称“天后宫”。天后宫的戏楼特别讲究，分上下两层，座位分内台、外台和楼台。福建人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在文化上敢于开创，在天后宫最先办起了贵阳第一个兴群茶园（实为戏园），又创办福建客籍学堂，后改为聚福小学、八闽小学。

“天下老广是一家”，广东、广西人在贵阳六洞桥永祥寺南侧建两广会馆，旧址在原贵阳三中处。两广会馆在南明河畔，风景优美，池馆、园林为各会馆之冠，是士人宴游的好地方。

云南以贵州为外出通道，清代经驿道而来的滇商在外城老古巷（今和平路）建云南会馆，旧址在贵阳原第九幼儿园。

兴义地近云南，人多善于经商，在贵阳建立兴义八属会馆，会址在南明河畔，与翠微阁隔岸相对，即今西湖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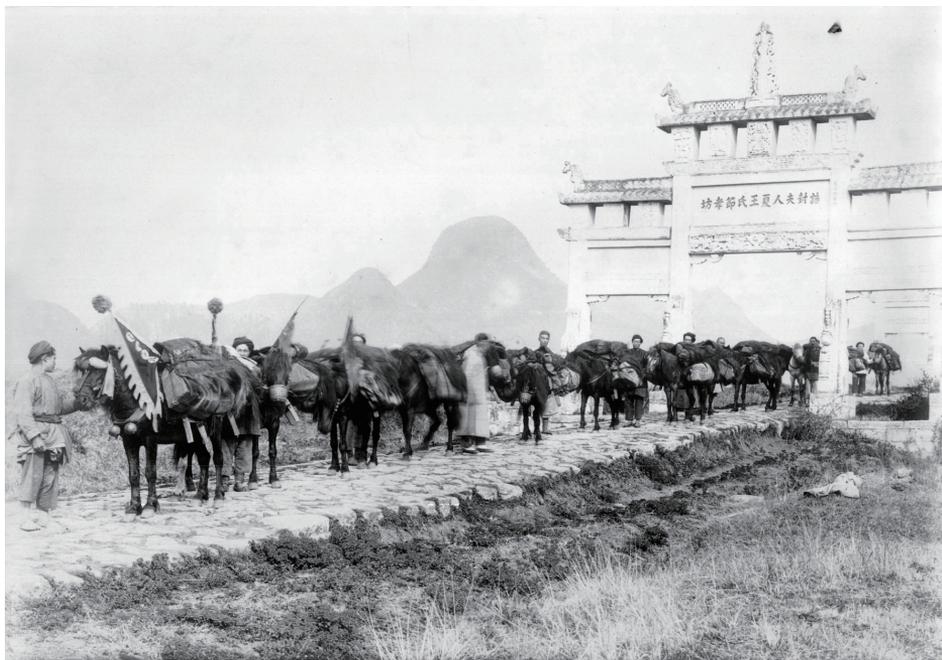
八、邮局报馆进贵阳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藩篱既失之后，风雨难蔽难挡，外来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源源涌入，贵阳也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承受着西洋物事的“东渐”。

（一）“麻乡约大帮信轿行”

清代从成都经重庆至贵阳的驿道上经常会看到一队这样的人马，他们着装

统一，头缠青帕，上身青短衫，下穿兜裆叉裤，打着蓝白相间的绑腿，足蹬多耳麻鞋，鞋尖还扎着一朵大红绒花，许多人还背负长剑或大刀。他们的身旁往往是几十匹甚至百余匹的驮马，几十乘的轿子，几十担的挑子。如果你走到队伍的最前头，必定会看到那匹矫健的头马背上插着两面三角白牙边的旗子，上面大书三字“麻乡约”。这就是在清末民初，西南地区最大的民间运输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简称“麻乡约”，创办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四川省綦江县（今重庆綦江区）人陈洪义在重庆创办，总号设于重庆，在成都、贵阳、昆明、乐山设立分号，沿驿道设站，贵州境内有松坎、遵义、盘县等站，主要经营货运、客运、递信、银钞等业务，除川、滇、黔三省外业务范围还扩



清末来到贵阳油榨街的马帮



驿道上的轿子

大到汉口、上海等地，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西南地区地形多变、地势复杂，道路崎岖不平、交通不便，运输多以肩挑背驮为主。“麻乡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办发展并且最终成为当时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信誉最好的民间运输巨头。时人这样评价“麻乡约”，叫作“管得宽，管得长”。“管得宽”是说他们的客运、货运、信函、汇兑无所不包，经营客运的叫“麻乡约轿行”，经营货运的叫“麻乡约货运行”，经营信函和汇兑的叫“麻乡约民信局”，所以合称为“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管得长”则是指远到京津沪汉，缅甸、越南，近到西南各地的穷乡僻壤，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运不到的。为什么叫“麻乡约”呢？《辞海》（1979年版）解说为：“乡约，旧

时奉官命在乡中管事的人。”创办人陈洪义热心公益事业，办事公正无私，加以脸上又有麻子，当时人尊之为麻乡约。后以此为其企业名。

当时贵阳“麻乡约轿行”客运项目有过街轿子和长路轿子两类，长路轿子由贵阳至重庆行程 15 至 16 天，运价 17 元；贵阳至昆明行程 20 至 21 天，运价 22 元，麻乡约轿行从运价中抽取管理费 1 元。运输工具有轿子和滑竿，按站食宿，每 5 天由雇主招待轿夫打一次牙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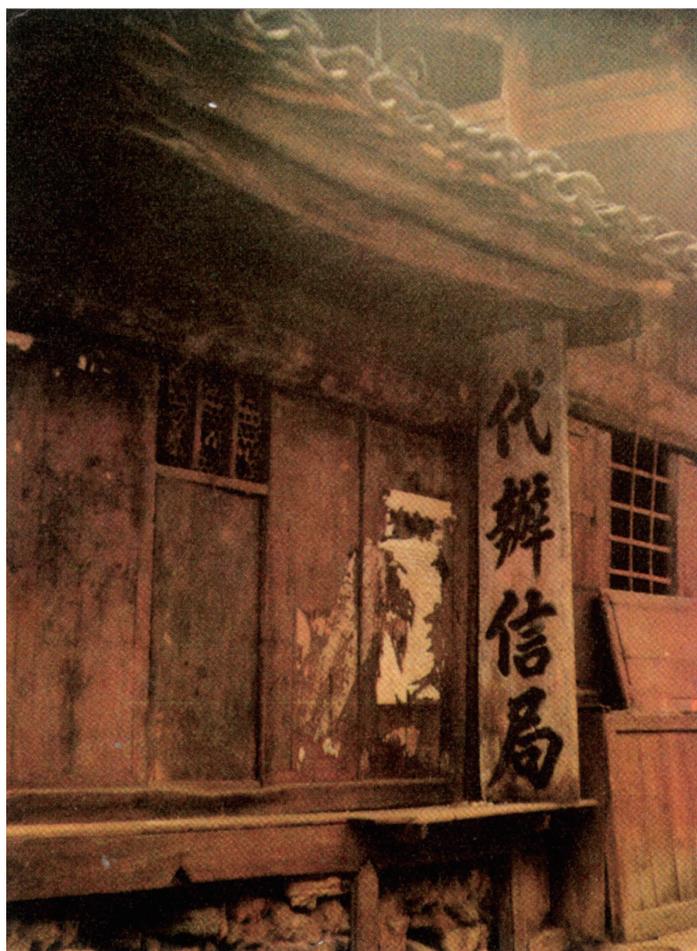
“麻乡约货运行”采取分帮挑抬或驮运、背负的方式，负责代招运夫，依货物品种采取不同包装，无需货主跟随，按期把货物送到指定地点。

“麻乡约”还开展寄信、寄包裹及汇兑业务，可寄至成都、嘉定、泸州、重庆、打箭炉、昆明、汉口、上海等地，有快件和慢件两种，快件由专人走送。由于信誉卓著，受到社会各界信赖，历时百余年，直到近代邮电交通发展起来才逐渐衰落。

（二）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信局——青岩代办信局

咸丰十一年（1861 年），“青岩教案”发生以后，天主教教会迫切需要沟通各教区、教堂间的联系和信函往来。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 年），天主教贵阳教区干脆委托天主教徒苏杭在青岩北街 49 号开办青岩代办信局，附带办理民间通信业务。代办信局，不收受官府信函，邮程为青岩自贵阳往返。以后代办信局牌子转挂到今南街 56 号铺面。青岩代办信局是贵州最早的邮局，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信局，青岩代办信局比光绪皇帝批准的官办邮局还早 8 年。1999 年 6 月，北京邮电博物馆馆长亲赴青岩，按 1:3 比例缩小 56 号房，作为当年代办信局房型，带回北京，存列在北京邮电博物馆展厅内。

贵阳最早的邮局设在田家巷（今市府路与中山西路交界处），只有一名营业员。后邮局迁往三牌坊（今中华南路）。宣统二年（1910 年），邮传部决定按省分设邮区，贵州邮区在贵阳设立总局，以印度人杜达为邮务总办，有局员



清末青岩代办信局旧址

16人，负责管理全省邮政，并在贵阳设营业处。此时贵州邮局很少，邮路仍依托驿道，主要是步班邮路和马班邮路，其递信方式略同于麻乡约。邮局开办后，限制私办递信业务，麻乡约递信业务衰落，青岩代办信局也改为邮政代办所。

（三）贵阳最早的电报、电话

光绪九年（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由于电报未通，中国“军报由

驿往来，时虑迟缓”，对战事非常不利，不能“保障边疆军事情报的及时传递，提高军队快速反应能力”。清政府为弥补短板，决定将电报线修到昆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设立了毕节电报分局，当时的贵州巡抚潘蔚颇具开放意识，看准这一时机，即时奏请清政府，要求“经由毕节县、分设子线”，在贵阳架设电报线。光绪帝于同年4月27日批准，5月顺利完成从毕节经大定（今大方县）、黔西（今黔西市）、清镇（今清镇市）至贵阳的省内第一条电报线路，电报机安装在巡抚衙门内，用“摩尔斯电码”进行通报。因为当时只有一条电路，从贵阳发出的电报和接收外地来报，都要经过多次中转。电报开通后，清政府贵州当局在省垣巡抚署（今省府路贵山饭店内）创设“贵州电报局”，同时开办“贵阳电报局”。该局为官办，亦称“官电局”，为地方政府经营的通信机构。贵州电报局为双重管理制，既兼管省内各局，又直接管理贵阳电报局，对上隶属云南电报总局，一切均向云南电报总局请示。巡抚潘蔚力主架设贵州第一条电报线，首开“贵阳有线电报”之先河。邻近的湖南，更近中原，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尚未设电报。

清政府成立邮传部后，官用电报、商用电报都统一由贵州电报局经办，电报线路和省内电报局逐渐增加。清末增加两条电报线，一条由贵阳经安顺、安龙、黄草坝（兴义）至云南，另一条由贵阳经重安江、镇远、铜仁至湖南。贵州通报地点仅贵阳、黔西、毕节、威宁、安顺、安龙、黄草坝、重安江、镇远、铜仁10处，以官报为主，私人电报极少，电文兼用汉文和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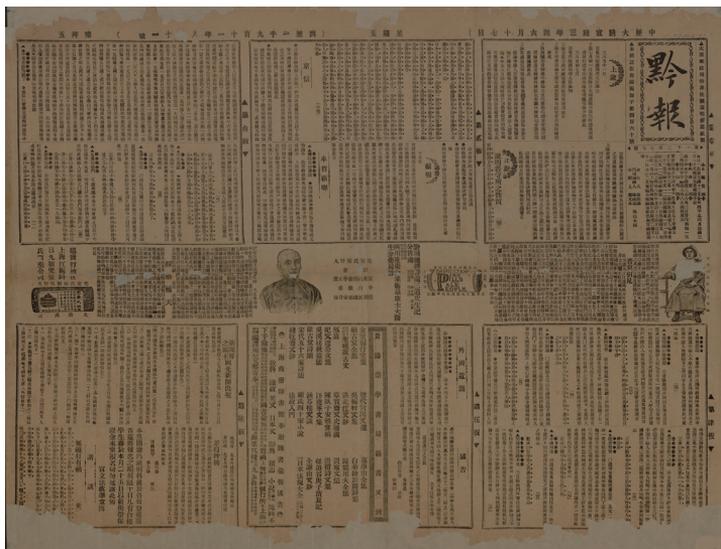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邮传部发来一台50门磁石式交换机，并配给24部壁挂式电话机，供巡抚衙门及军警机关使用，贵阳始有市内电话，而且在贵州仅此1处。次年正月动工兴建省城各衙门电话线路，2月中完成，隶属于巡警总署管理（其后，改置贵州巡警道，改隶道署管理），专供省城各衙署、局所、学堂之用，民间无一装用者。宣统二年（1910年），全市有市话杆路15里，线条52里，实装11户（衙署6、局所4、学堂1）。各户电话机均装于办公地点，概未收费。



（四）贵州最早的民办报纸——《黔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先后传入贵州，《时务报》《民报》等报刊逐渐在贵阳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秘密传阅。贵州本地没有报纸出版。上海出版的《申报》，因路途遥远，辗转寄到贵阳时，时间逾月，新闻已成旧闻。创办一张贵阳出版的报纸，开通民智，了解天下大事，传播本省本地新闻，成为欧风东渐中贵阳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周素园的推动和建议下，集股金8000两银子，士绅于德楷、唐尔镛等成立《黔报》馆于贵阳后新街通志书局，后迁往独狮子（今贵阳醒狮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这年农历六月初八，即公历7月17日正式出版，这是贵州省出版的第一张民办报纸。开办之初的《黔报》多系转载外省大报的消息。第一年，最高发行量未超过千份。周素园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人，他所编辑的《黔报》，对贪官污吏多有揭露，言论主



《黔报》

张较为进步，这引起了报纸老板唐尔镛的不满。宣统元年（1909年），唐尔镛把持了《黔报》，周素园被迫卸任离职，编辑由陈廷棻接任。1912年3月，滇军侵黔，《黔报》编辑陈廷棻避居广顺，该报遂告停刊。

此外，清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贵阳还创办了《西南日报》和《贵州公报》，《贵州公报》办的时间较久，于1920年11月才停刊。举凡清末民初贵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大事，该报均有刊载，是研究这一时期贵州历史重要的资料来源。

（五）贵州第一家照相馆——镜秋轩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张百麟私宅名为镜秋轩（今市府路小学对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百麟为解决经济困难和掩盖其秘密革命活动，决定将镜秋轩前院辟为照相馆，取名“镜秋轩照相馆”，聘请广东来的摄影师谢石琴主理照相馆一切事务。谢石琴喜好书法，贵阳“甲秀楼”三字牌匾就是谢于宣统年间所书。镜秋轩拥有当时国内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感光材料，加上技术熟练和周到的服务，因此，很快获得消费者的好评和良好的信誉。

一时间，镜秋轩名声在外，到镜秋轩留影照相已经成为城里人时尚消费的好地方。

镜秋轩白天照相营业，晚上便是自治党人集会活动的地方，张百麟“凡有会议，皆莅其家镜秋轩”。宣统三年（1911年）11月3日，贵州辛亥革命前夜，张百麟在镜秋轩发布武装起义的动员令，坐镇镜秋轩统筹各方。第二天，武装起义成功，谢石琴立马带上新购的手提式照相机来到谘议局，拍摄了大量贵州光复独立的照片。11月6日，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谢石琴在梅园紫薇厅为贵州大汉军政府组成阁



——
谢石琴

员以及张百麟、杨苾诚、周素园、赵德全、任可澄几位主要领导拍摄合影照片。

九、辛亥革命举义旗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历史上遂将其称为辛亥革命。

贵州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贵阳打响的。当时贵阳有自治学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两大政治团体。自治学社以张百麟为首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其中骨干，社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在“自治”的口号下宣传革命。贵州宪政预备会以任可澄为首领，地方绅士为骨干，思想上倾向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希望改变现状，但不主张革命。自治学社为了发动革命，做了几年



贵州陆军小学堂第三期毕业生合照

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们发动组织哥老会，在新军、陆军小学和其他武装力量中发展社员，又派社员加强与省内外各地的联系，积极筹备枪支弹药。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成立。此后，贵州起义步伐加快。22日，贵州巡抚沈瑜庆致电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兴义巡防营管带刘显世率靖边团营500人到贵阳。30日，云南起义胜利，消息传到贵阳，以自治学社为主的革命党人备受鼓舞。11月3日夜，自治学社在贵阳白沙井张百麟家开会，决定当夜发出动员令，4日晨起义。当晚，动员令传到次南门外的陆军小学，学生们立即行动，公推学长邝质夫为临时领队。起义队伍出校门由新桥上游徒步涉过南明河，直奔南厂，与陆军第一标会合。同时，自治学社派胡刚到南厂新军营通知起义决定。士兵遵照命令集合，标统袁义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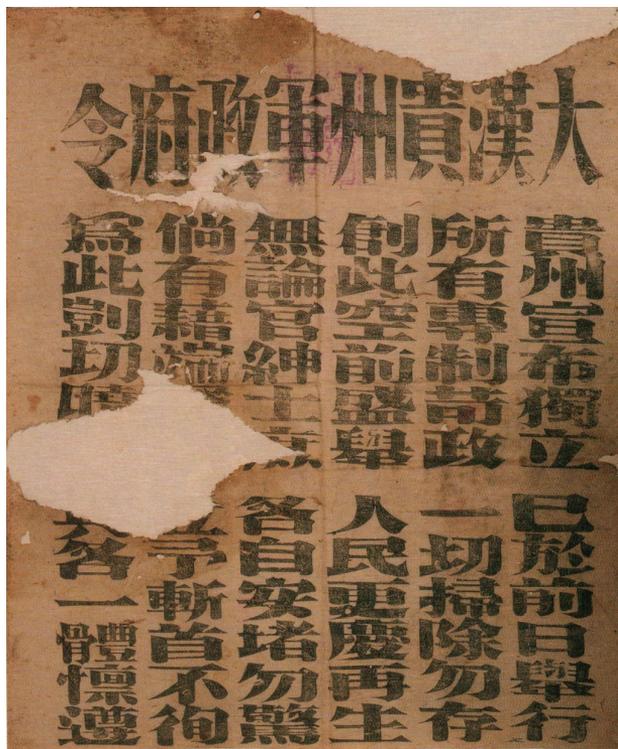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员在梅园（今贵山酒店）合影

反对起义，自治学社社员杨树清向天鸣枪，袁义保仓皇逃走。起义士兵公推教练官杨蔭诚为指挥，队伍开拔到南岳山下，布置作战。

贵州巡抚沈瑜庆听说陆军小学起义的消息后，妄图凭借巡抚衙门卫队顽抗。但卫队在管带彭尔坤领导下已响应起义，卫队士兵人人臂缠白布标志，衙门大炮炮门被全部撤去。沈瑜庆见大势已去，被迫交出巡抚印信。4日早晨，起义的新军与陆军小学学生分别由大南门、次南门整队入城，维持秩序，贵阳宣告光复。

贵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贵阳的统治。起义成功的当天，大汉贵州军政府在贵阳成立。第二天贵州枢密院成立，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杨蔭诚、赵德全被推举为正、副都督，自治学社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宪政预备会的任可澄任副院长。行政总理由周培艺（素园）担任。贵州成为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后全国最早光复的省份之一，



《大汉贵州军政府令》

贵阳成为全国第六个宣布独立的省会城市。这一天的贵阳城，满街都是汉字白旗迎风飘扬，人人臂缠白布袖标。入夜，家家门前悬灯一盏，庆祝革命的胜利。

在大汉贵州军政府初建时期，除了新军与陆军小学的学生参加维护贵阳的社会治安外，还组织了贵州辛亥革命临时学生卫队。达德学校也进行了安排，学生王若飞带头剪掉了头上的发辫，与二十多位同学一起组成一个小队，代表达德学校参加了临时学生保卫队，负责保卫、稽查贵阳大南门的城防任务。

掌故：

吴三桂剿灭水西

明朝末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同知安邦彦起兵反明，战争从天启元年（1621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战乱中，四川巡抚徐可求死难，贵州巡抚王三善死难，被称作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兵败自刎，贵州总兵阵亡于贵阳城下。叛乱中，贵阳被围半年，兵民相食。最后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石柱总兵秦良玉、四川总兵杜文焕等平定。奢崇明兵败被杀，奢家几乎没剩什么人了。而水西的安氏，虽兵败但实力尚在，明朝对安氏未强制执行改土归流。直到清朝取代明朝后，安氏才表示臣服，安坤被任命为贵州宣慰使。

清初，因担心水西安氏成为清廷在西南统治的威胁，清廷想借平西王吴三桂之手铲除水西，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吴三桂也正想拔掉贵州水西安氏这颗钉子，剪除自己称霸云贵的后患。水西土司安坤早就看出吴三桂和清廷想除掉自己，遂联合明将皮熊，联络乌撒土司安重圣，土官罗大顺等人联合反清，共同夺取云南。吴三桂统领云南十镇兵马，由毕节七星关进入贵州；令总兵刘之福驻兵大方，扼其咽喉，命贵州提督李本深率领贵州四镇兵马在大方的六归河会剿。但是由于书吏误将六归写成陆广（今修文县六广），贵阳出发的军队和粮草前往陆广驻扎，才发现陆广一个人影都没有。吴三桂大军在果勇底城（今天的织金县以那镇）被围，走错路的李本深在陆广截获了安坤的侦探，得知吴

三桂在果勇底被围已经两月之久，便火速率军前往救援。水西军战将又夏拉被吴三桂收买，对李本深阻截不力，吴的援兵和粮草抵达果勇底城。双方在果勇底进行决战，水西军大败。后安坤在阿札坏地被俘，被“磔死”（凌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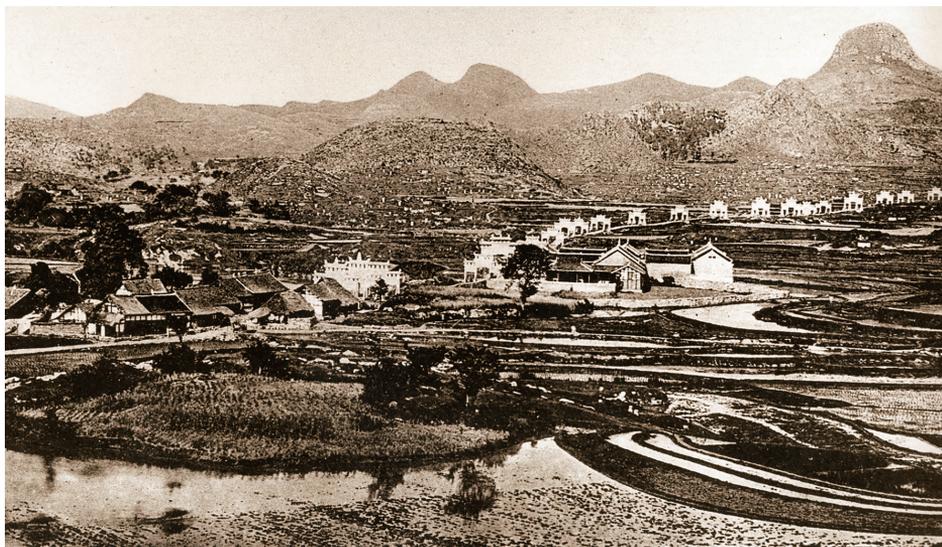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王朝实施“削藩”，安坤之子安圣祖在威宁起兵，助清兵削平吴三桂，先后收复了大定、黔西等地，安圣祖得任水西宣慰使。吴三桂反叛清廷失败后，其妻陈圆圆客死异乡，葬于贵州的岑巩龙鳌河南岸。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安圣祖病死，安无子，康熙乘机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朝廷委派）代替土官。至此，结束了水西近1500年历史的土司统治制度。

古风古韵话牌坊

牌坊，又名牌楼，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牌坊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必须经过皇帝“恩准”才能建筑，所以牌坊正面上方都刻有“圣旨”两字。贵阳多山产石，多数牌坊由上好石料建筑而成，少数是木牌坊。石牌坊外形高大，气势雄伟，坊上精雕虫鸟花卉，飞禽走兽，图案纹饰，有的还有书法极好的楹联，美丽壮观。明、清两代贵阳牌坊多数建在城内主要街道上，少数建在城边或近郊。据地方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贵阳城内有牌坊80多座，万历年间有50多座。到清朝后期，在贵阳城内走不了几步就有一座牌坊。石牌坊最多的是油榨街，二十多座牌坊横跨在古驿道上，牌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头的“万里封侯”坊，它为贵州松桃人杨芳所立。杨芳为清代名将，与杨遇春合称“天下二杨”，又与贵州籍名臣李士杰、刘清合称“贵州三子”。道光七年（1827年）杨芳在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军功封为一等果勇侯、太子太傅。贵州父老为他建牌坊以表其功。清末在贵阳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用相机拍摄了很多张牌坊照片，并做成明信片寄回法国。

在封建社会，立牌坊主要是为了传播封建礼教，标榜功德，鼓励读书做官。贵阳最早的牌坊是明代洪武年间顾成修建的“与国咸休”和“世禄坊”。



清末贵阳油榨街上的牌坊群



青岩赵彩章百岁坊

顾成受朱元璋派遣征伐贵州有功，受封为“镇远侯”，他建牌坊是为了感谢“皇恩厚赐”。贵阳最多的牌坊是进士坊、翰林坊、举人坊，仅今中华中路上就有一二十座，明朝汪懋、汪度父子皆中举，干脆修一座“父子经魁坊”，光耀门庭。除了官员感谢皇恩和中举的读书人修建的以外，贵阳还有三种牌坊：一是官府、庙宇、学宫前的标志性牌坊，如巡抚衙门前的抚牌坊，大道观前的“大道观”坊，府学宫前的泮宫坊；二是贞节坊，丈夫死后妻子守节不嫁，建坊鼓励效法，如为龚景妻袁氏修建的牌坊；三是宣传地方形胜的牌坊，如霁虹桥（即南明桥头）的“西南重镇坊”，北门外的“贵竹清风坊”，龙井侧的“一品坊”。

1927年，周西成主黔政，修城内马路通行汽车，就把今省府路至喷水池沿途牌坊拆去。以后几十年拓宽城内街道，城内牌坊陆续被拆。今天遗留下来的极少数城郊牌坊成为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品，如青岩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建的赵理伦百岁坊，有8只石狮子稳定石柱，皆为扑跃状，神态逼真，造型奇特，被画家刘海粟誉为石雕杰作。

曹维城与曹状元街

清朝贵阳出过文、武两状元，文状元名赵以炯，武状元叫曹维城。曹维城，字价人，贵阳人。生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武进士第一，即武状元。中状元后曾在云南任副将职，有善政。他武艺高强出众，尤其善使长剑及画戟，“长剑倚青天，高门列画戟”，是他形象而具体的写照。曹维城的生活年代，史书记载不详，大概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知何年去世。曹维城作为武状元，不仅武艺高强，而且能诗善画。曹维城与黔中名士朱文、吴中蕃、潘德徵相交甚好，常有诗文酬唱。朱文有《曹状元头招饮，以诗见嘲，因和之以诗》，其诗开头即说：“我爱曹公子，风流多蕴藉。二十夺状头，三十称诗伯。”说明曹维城30岁时诗已经写得很好。曹维城风流倜傥，富贵不骄，为人豁达，钟情松石，好招客饮酒，追欢忘形。著有《飘然子集》，未刊行。（道光）《贵阳府志》载有曹维城《初秋登黔灵山赠瞿脉上人》诗，

诗云：“居与佛庐近，探幽不厌频。开来天外寺，隔断世间尘。檐敞风烟细，窗虚景物新。白云常住处，从尔问禅真。”曹维城的画，今已难觅。

据《黔诗纪略后编》记载，曹维城之子名曹石，字乖崖，亦为雍正二年（1724年）武进士，任过侍卫官、副将。曹石继承其父爱诗传统，著有《秋烟草堂诗稿》三卷。曹维城及其子曹石，堪称一门两文武全才。

曹维城居住在贵阳城区南面的一条巷子里，这条巷子地名叫常平仓，由于武状元曹维城清初曾住在这条巷子里，常平仓之名被人忘记，状元巷之名却响亮起来。民国以后，曹状元巷逐渐发展起来，巷道拓宽，商店、小贩云集。1931年这里空地上出现了群星电影院，放映露天电影，热闹非凡。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地名变成了“新市场”。1981年，这里叫市场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名曹状元街。曹状元街在今电信综合大楼北侧，是一条连接富水南路与中华南路的街道。

曹维城的故居是典型的贵阳大宅院建筑，前有朝门，中为四合院，一直保存完好，1992年因该地建高楼拆除。

来仙阁上不见仙

来仙阁位于东风镇麦穰村赵家庄一侧大塘河中的矾石上。背山面水，前面是开阔的乌当田坝，极目瞭望，景色宜人，清代贵州布政使陈预有“兹地甲黔中”之赞语。此阁与洛湾田坝的“万松阁”相峙屹立，被称为“雄”“雌”二阁。据《贵阳府志》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李氏曾建小亭于矾石上，名“水月小亭”或“水月招堤”。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乡人建九眼桥于矾石与河岸之间。此后两百多年，小亭经风雨侵蚀，逐渐倾圮，仅剩九眼桥。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乡人集资协力在河中矾石原小亭址上建阁。因阁凌空高耸，四面环水，云雾缥缈，松翠鹤鸣，似有仙人降临，故名“来仙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来仙阁因焚于火，乡人复集资重修，比甲秀楼重修早一年。现在匾上“来仙阁”三字斗大楷书，笔力浑厚，就是光绪三十四年



来仙阁

（1908年）时书写的。

来仙阁有“锁水”“踩桥”等民间神话传说。“锁水”，传说修建来仙阁是为了锁住南明河和挑水河的水，保证乌当大坝千亩良田的灌溉。“踩桥”，传说来仙阁修竣，为便于游人玩赏，修了一座“来仙桥”，桥竣工欲请一名德高望重者来踩桥。众人正议论难以定夺时，一白发老人飘然而至，他信步上桥，伫观良久，便吟道：神仙能来到，自然过得了。只要来仙阁，不要来仙桥。河中突然掀起波涛，将来仙桥冲走，老人也冉冉升天而去。从此这里就再也没有建桥了。直至2001年，为充分发挥来仙阁的旅游价值，方便游人玩赏，在阁侧

建仙临桥横跨南明河两岸，此桥犹如一月弯弓，静待仙人来登。

1944年4月，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贵阳参加第二十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带领学生到曾发生过第四纪冰川作用的乌当考察地质地貌时，到来仙阁小憩，对此佳境及建筑风格赞叹不已。由于来仙阁与贵阳市的标志性建筑甲秀楼在建筑格局上极为相似，故有“姊妹阁”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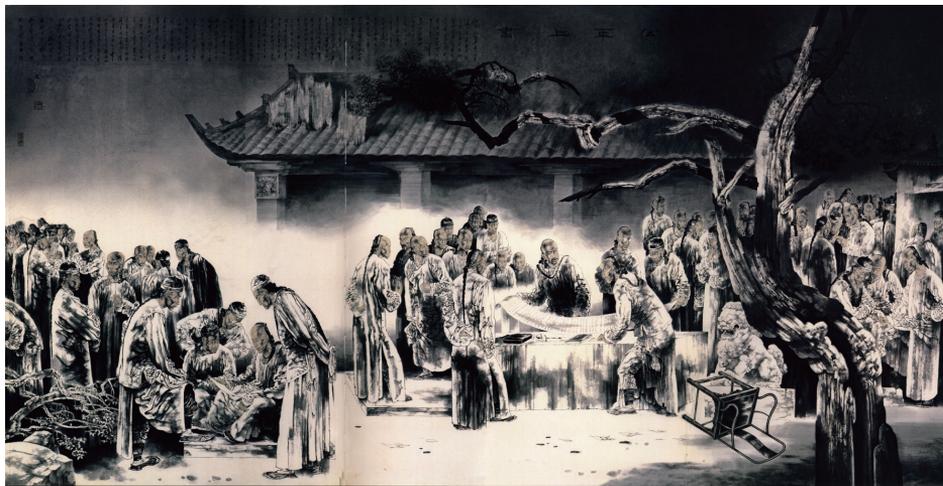
贵阳有条钱局巷

从次南门往西走，从前有条次南门街（今文化路），街上有座桥架桥（又称乔家桥、蟾宫桥），过桥以后，在街的右边有条钱局巷，巷的右侧是雪涯洞，钱局就设在这里。钱局是专门铸造钱币的，现在的人很少知道清代曾经在这里设局造币，不了解它的来历。钱局设在这里是很有道理的，因铸钱需要用火来冶炼铜、铅，稍有不慎便会引起火灾，如果设在城内就会有大的隐患，所以把它设在次南门外靠近南明河与水磨河（市西河）交汇的地方。说起来钱局巷只是一条近城的小巷，贵州的钱都是从这条小巷子里流向全省，意义非同寻常。清初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货币的需要量大增，钱不够用，地方官员纷纷请求在贵州铸钱，几经周折，终于在雍正九年（1731年）批准在贵州设“宝黔局”。钱局最先设在毕节，用云南东川的铜和威宁州、水城厅所产的铅铸币。可是因管理不善、技术不高，铸成的钱砂眼很多，轻重厚薄不一，不符合国家要求，便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将宝黔局迁到贵阳，由贵阳府监制，贵阳从此有了钱局。钱局有十五座大炉，每年铸钱五十四卯，每卯用铜、铅一千斤，铸钱十二万四千余文，大量的钱币像流水一从钱局流了出来。这个钱局铸造了“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咸丰通宝”“光绪通宝”和“光绪重宝”，改为贵州官钱局后又铸造了“黔宝银饼”。钱按官府统一定制铸造，称为“制钱”，纯用黄铜的称为“黄钱”，加铅而带青色的为“青钱”。这种铜钱均为圆形方孔，孔的四方铸有“××通宝”字样，并铸有满文和汉文，贵州所铸的钱一律加铸“贵”字。一枚铜钱称为一文，轻重、厚薄、大小、样式都有严格规定。钱与银有一

定比价，用绳索将一千文钱穿为一串，折合银一两。有了制钱，交易更为方便，易于找补，便于流通、兑换。铸钱是一种特殊铸造技术，质量要求极为严格。首先，铜与白铅、黑铅的比例必须精确无误，以保证钱币的成色。其次，每一千斤原料铸造多少文钱必须精确计算，保证钱的重量不能有丝毫误差。其三，钱的厚薄必须统一，大小必须一致，严防钱币厚薄不均、大小不一，以免造成币制混乱。其四，制钱不能有砂眼，圆形及方孔的轮廓都必须规整、光滑，所铸字迹必须清晰可辨，要求铸造上十分精细，不能有半点马虎。因此，铸钱是一种高水平的铸造技术，铸钱在贵阳出现，标志着贵阳在铸工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科技上有了新的进展。

“公车上书”中的贵阳举人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战败后，日



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被派往日本，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约。《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中国后，激起全国人民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共同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呢？原来汉代中国举孝廉可乘公车赴京城，这里的“公车”是代称，即指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就是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皇帝。

“公车上书”表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希望清政府变法拯救祖国危亡。“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唤醒了民众，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公车上书》号称有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签名，但经查，真正能提出姓名者仅603人，这些人可以称为“公车上书”的坚定者。在603人中，贵州占了95人，贵阳府有40人。在贵阳府中，贵筑县有28人。在贵阳府上书的举人中，李端棻、李端榘、李端燾、李端荣四兄弟，他们是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子，维新派官员李端棻的堂弟，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的弟弟，他们受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维新派官员李端棻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贵阳女婿”梁启超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个著名人物。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之所以为世人知晓主要有两点：一则他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与他的老师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人称“康梁”；二则他是近代中国的著名学者，早期他的政论文，流畅通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所著《饮冰室全集》影响深远。

梁启超一生政治上有所作为，学术上成就巨大，与他的夫人李蕙仙这位贤内助关系很大。李蕙仙相夫教子，能讲一口北京官话。所以梁启超后来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好帮手，戊戌变法时期，



上海创办女学堂，她曾出任提调。李蕙仙又是一位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妇女，梁启超的子女各有成就，而其子梁思成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不能不感谢这位伟大的母亲教育。

李蕙仙是贵阳人李朝仪的女儿，因而梁启超是“贵阳女婿”一点不假。李朝仪，字藻舟，清朝贵阳府贵筑县人。他生活的时代主要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后，主要都是在北方做官，历任平谷县知县、三河县知县、顺德府知府、大名府知府、永定河道、山东盐运使、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府尹等职。

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婚姻，是由著名维新派官员、贵阳人李端棻牵线促成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他特别赏识年仅16岁的考生梁启超的才能，放榜时，梁启超名列第八，考中举人。李端棻父亲死得很早，母子相依为命，自幼受到叔父李朝仪的关怀、教育，为报叔父之恩，李端棻以堂兄身份做主，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光绪十七年（1891年），18岁的梁启超与李蕙仙在北京结婚。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贵阳

辛亥革命后，贵州军政府内部矛盾日益凸显，立宪派利用各种机会挑拨军政府内部的团结。云南军政府以出兵北伐为借口，派唐继尧率滇军侵黔。1912年3月3日，滇军进占贵阳，颠覆了贵州大汉军政府。贵州历史进入了24年的军阀统治时期。1935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改组贵州省政府，结束了贵州地方军阀统治。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阳成为抗战大后方，沦陷区学校、医院、企业、资金、人才流入，贵阳获得了一次发展机遇，交通、电信业、工矿业、商业、金融财政等都有较大进步，农业因新品种引进、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1941年7月1日，贵阳建市。抗战胜利后，“战时经济”短暂繁荣的消失和国民党当局加紧准备内战形势下，贵阳的发展跌入低谷。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阳声势浩大的“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对摇撼国民党贵州当局的统治和迎接贵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贵阳自此称为“市”

民国时期，贵阳建置变化较大。1914年，废除贵阳府，以贵筑县及贵阳府亲辖地改设贵阳市。1941年7月1日，撤销贵阳市设贵阳市，另设贵筑县治花溪。



（一）废府设县

清朝末年，贵州省共管辖贵阳、安顺、兴义等 12 个府。贵阳府有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定番州、广顺州及长寨厅。宣统三年（1911 年）11 月 4 日，贵州光复，成立贵州军政府。1912 年，废除清代巡抚、布政使各职，设立贵州都督。同年，将贵筑县属地并入贵阳府亲辖地。1913 年，将贵州都督改为贵州护军使，添置贵州民政长总揽民政，并确定贵阳为贵州省会。

1914 年 1 月，改贵阳府为贵阳市。贵州省仍以贵阳为省会。由于贵阳府建置取消，原属于贵阳府辖的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定番州、广顺州及长寨厅等不再属于贵阳市的辖地，而原与贵阳府治同城的贵筑县，将县治移驻扎佐，后又移驻今息烽，改名息烽县。

1914 年 5 月，民政长改为贵州巡按使。8 月，分贵州为黔中、贵西、镇远三道，黔中道列为一等，镇远道列为二等，贵西道列为三等，贵阳市属黔中道，而为道治。1915 年，废除巡按使，设贵州省省省长，与贵州督军同治。贵州省政府改革贵阳市建置，将清代的里甲废除，改为区乡。当时，城区及附郭地直属于警察厅，分为 4 区。外城为北区，驻北书院；内城大街以东为东区，驻三道坎；内城大街以西为西区，驻都司桥；南门及次南门外为南区，驻武侯祠街。城外分为 9 区。到 1937 年 11 月又将 9 区改为 6 区，取消镇称谓，一律改为乡。城区及附郭无变动。这一建置，直到 1941 年贵阳设市前未变。

1920 年，废黔中道，该道所辖 31 县直属于省。1935 年，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改组贵州省政府。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在贵州施行《行政督察专员条例》，分区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在贵州建立了 11 个行政督察区。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辖贵阳、修文、息烽、清镇、开阳等 10 县。

从国民政府统治贵阳时期至贵阳设市以前（1935—1941 年），贵阳市人口 185896 人。

（二）贵阳建市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省政府再次调整行政督察区。清代属安顺府的清镇，1913年属贵西道，1937年划入直辖区；清代属贵阳府的修文，1913年属黔中道，1937年划入直辖区；清代称为开州的开阳，属贵阳府，1913年改开州为县，1930年3月，因当地有开阳书院故址而改名开阳县，1937年划入直辖区。1937年贵州省政府改贵阳市直属于省。

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规定：“凡人口在百万以上者，或二十万至三十万以上者设市，或在政治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亦应设市。”贵阳于1930年提出设市的倡议，但当时贵阳处在军阀割据时期，省内战乱不断，贵阳人口凋敝，经济落后，设市条件还不成熟。

到20世纪30年代末，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高校、企业的内迁，科技、人才，甚至银行大量涌入，昔日闭塞落后的贵阳在短短几年中，全市的工业、农业、交通、商贸、教育文化都发生了巨变，使贵阳发展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贵阳设市条件成熟。

第一个条件是公路的开通使贵阳得以与省内外连通，贵阳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公路交通枢纽。贵州的公路建设始自周西成主黔时期，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周西成首次成立了“公路局”，以贵阳为中心修筑省内公路，到1935年，先后修筑了贵阳环城公路，贵阳至桐梓、贵阳至黄果树、贵阳至广西六寨、贵阳至惠水等公路。1936年修通了贵阳至湖南新晃的湘黔公路、贵阳至四川的川黔公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又修通了贵阳至昆明的滇黔公路。至此，贵阳至滇、川、湘、桂4条公路干线修通。同时还修通了一批县道，以贵阳为中心计有13条支线，由贵阳可直达省内31县，贵阳成为省内的交通中心。

贵阳还修建机场，开通与省外的航线。1932年，王家烈部队将贵阳团坡桥运动场改建为飞机场，这是贵州最早的飞机场。1933年至1934年，又先后修建了贵阳玉厂坝飞机场和平远哨飞机场（又称清镇机场）。1935年至1936年，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先后开辟了重庆—贵阳、重庆—贵阳—昆明、

贵阳—长沙—南昌—南京航线。交通的畅通，拉动了贵阳经济繁荣发展。

第二个条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埠厂商内迁，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熟练的工人，加上贵阳地区资源比较丰富，许多轻工业应运而生，机械、化工、卷烟等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贵阳轻工业发展的兴盛时期。1938至1939年迁入贵阳的厂商达101家。此后贵阳新兴工厂不断出现，1941年注册7家，1943年达25家，1944年注册67家，工人总数由战前的536人发展到3500余人，资本总额由战前的13.5万元增长到5735.6万元。工业门类的系统化上，战时增加了卷烟、电力、橡胶、水泥、电器等，形成以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为龙头的多门类的生产经营。随工厂数量、门类的增加和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技术管理人才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1940年该公司有高级管理人才、专门技术人才和职员627人，技术工人1191人，到1944年增加到1084人和1676人。抗战期间，在贵阳建立贵阳电厂、贵州煤矿公司、贵州水泥厂等20个工矿企事业单位。

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业也得到跨越式发展，空前繁荣。贵阳工商业企业1937年仅为1420户，资本总额180万元；1943年急剧增加到4239户，资本总额增至10614.14万元；1945年又增至5422户，资本总额21000万元。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的商业地段墙毁屋摧，但几年后迅速恢复繁华。据《贵阳市工商业调查记录》记载，1943年贵阳商业中，以旅馆业最多，达415家，茶楼酒肆次之，有219家。

第三个条件是文化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继1937年大夏大学迁入贵阳后，湘雅医学院于1938年、防空学校于1939年、之江大学于1941年也先后迁入贵阳。同时贵州省又在贵阳先后建立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这些高校为贵阳、贵州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仅大夏大学1942年的237名毕业生中，就有107名黔籍学生。

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迁来贵阳，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曾在贵阳做了《宇宙与人生》科普学术报告；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用汉语演讲了抗日

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战场的有关情况；贵州籍著名文学家谢六逸与蹇先艾等在贵阳文通书局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活动；著名画家徐悲鸿先后三次在贵阳逗留，举办画展……报纸杂志出版繁荣，茅盾、欧阳予倩、端木蕻良、于伶等许多全国的知名作家都在贵阳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彩色电影、京剧、川剧、评剧、越剧、相声等落户贵阳，上海的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均在贵阳开设了分店。各大书店销售《辩证唯物论入门》《中国妇女》《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全集》《短篇英语背诵文选》《算术辞典》等书籍，涉及学科齐全，内容广泛，为贵阳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第四个条件是人口大量增加，1937年贵阳人口统计为22765户、121304人。随着沿海沦陷区人口大量内迁，贵阳人口逐年增加，至1940年统计，贵阳县有30185户、177655人。到1941年贵阳设市之年，贵阳人口已达185896人。

1940年11月，贵州省民政、财政两厅草拟了《贵阳市政府组织规章草案》呈交省政府。1941年，贵州省政府组织两次会议，讨论修正通过该草案，报呈国民政府行政院。6月，行政院第517次会议决议，同意贵阳设市，并任命何辑五为贵阳市市长。7月1日，贵阳市政府正式成立。7月21日，正式划定贵阳市的行政区域。

从1930年倡议设市，到1941年正式设贵阳市，前后经历了12年。贵阳市政府成立及贵阳市划界以后，原贵阳县辖区不在贵阳市所辖之地，划归贵筑县，贵筑县政府驻花溪。同时将原属长顺县的党武、马林、燕楼等地区划入贵筑县，又将原属贵阳县之长田地区划归定番（今惠水）。

1944年11月，贵阳市政府遵照《市修政组织法》规定，将本市20个乡镇一律裁撤，成立9个区公所。一区在六广门，二区在东门，三区在大西门，四区在次南门，五区在大南门外，六区在太慈桥，七区在三桥，八区在龙洞堡，九区在红边门。一至五区为城区，六至九区为郊区。区之下不设乡镇，直接辖保。这一建制，直到贵阳解放未变。

（三）城市状貌

民国初期，贵阳城区道路基本保持清代的格局，城内除大十字、小十字和南北大街属闹市外，余皆背街小巷。

贵阳的城墙，由于现代武器的广泛使用，在军事防守上的意义已不大，反而有碍于城市交通。贵阳城垣进入了逐渐撤弃的时期。

1927年，老城北门城楼西南角，由于年久失修，受雨水冲刷而倾塌。当时，周西成主黔政，正创修城内马路，省政府遂命拆弃，并将老城北门一带隔离新城的城墙一律尽拆，这是贵阳拆城之始。周西成死后，1929年10月，政府在已拆老城北门月城原址，建一高约1米、直径50余米的圆台，并环以石栏，东、南、西、北四方各有入口处，有石级上下。台之正中，有5米的像座，上立身着西服的周西成铜像。像前有圆形石池，池中置一石狮，此台俗称“铜像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铜像台拆毁，修建了花圃和喷泉，这就是现在称为“喷水池”的地方。

1936年，当时政府修建大西、威清、六广各门穹洞，拆去各城门上的谯楼，改修碉堡。同年，又在大西门侧另辟一门，称中山门。于是，由城内之中山公园前可通此门直达金锁桥。1937年拆除大南门月城，辟为广场，以利交通。又封闭原南门，在其侧另辟一门，名为中正门，由此可直达铜像台。1938年，今中山路东段，从小十字起修建马路，在原老城东门侧将城墙拆开一口，正对东山，使中山路延伸，一直接通环城马路。至此，老城之西门、南门、东门虽仍有门，但已非原来的城门。

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毁街道十余条，死者数千人。以后，为便于疏散，在乐群路、世杰路、飞山街、指月塘、沙锅寨、郭家湾等处分别拆除城墙若干段，筑路以通城外，使贵阳城的出口通道大大增加。

抗日战争后期，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市长时，市政府命令拆除城墙，标价变卖城墙石块，又将城基卖给市民建筑住宅。杨森的下属官员遂借此贪污中饱私囊，搜刮民财。至1946年，贵阳城垣基本拆除，仅某些地段尚余剩断

垣残壁而已。

1926年9月11日，贵阳环城马路动工，路长20余里、宽10米，可通汽车。1928年开始修建城市街道，至1937年，城内修了三条道，一条是由六广门起，经北大路、南京路、广东路、西成路、中华路、南华路，至中正门（今大西门）止；一条由威西门经威西路、普定路至南京路口；一条由省政府（即光明路）至中华路中段。到了1939年拓修街道30余条，总长度3781米。1940年省临时参议会会议决定，拆除全部城垣，修筑道路。1941年贵阳设市后，市政府工务局分两期拓修中心区干路和支路。翻修中华路、中山路两大干线时，路宽扩至9米，历时3月完成。至1944年，共完成51条街道工程的修筑任务，总长度13516米。此外还翻修外环城疏散道路、公园路、箭道街、富水路和贵惠路，利用旧城墙基石修筑了城基路。这些道路中除省府路和中华路部分路段为块石路面外，其余皆泥土碎石路面。

贵阳商业荟萃之区是在“六广门，经北大路、南京路、广东路、西成路、中华路、南华路，至中正门”这条线上。由湖南、广西方向进入贵阳的第一条路是油榨街，这里集中了许多榨油作坊。南门外的街道是马棚街（俗称马房街，今新华路），每日有大批骡马驮米到贵阳集散，附近有米市巷。过了南门桥便是盐行街，有数十家盐号销售川盐，华家的永隆裕盐号最为著名。从盐行街至北门桥的大街（今中华南路、大十字、中华中路）商号林立、银行众多，绸缎、布匹、百货等老字号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还有许多大书店、金号和银楼。

铜像台（今喷水池）热闹非凡，摆摊设点，玩杂耍的、放西洋镜的、卖食品的，样样都有。铜像台至十字口（今黔灵西路口）为广东街，丝线业特别发达，以刘义兴丝线铺为著，故有“丝线一条街”之誉。后来棉纱、土布业兴起，商人每日清晨都到广东街打听物价涨跌行情，交易极为活跃。十字口至灵官阁接口（今普陀路）为南京街，江西商人在这里开了许多油铺，以销售油盐柴米为主。大街两侧多有行市，棉花街（今科学路）上家家户户都在弹棉花。二浪坡、三浪坡（今中山东路）上，多是餐馆和电影院。中山东路多有旅社、餐馆和食杂铺。



北门桥附近贯城河边有铜匠街（后称大同街）和铁匠街（后并入太平路），是铜匠和铁匠作坊汇集之地。铜像台附近有条“三才巷”，实为劳务市场，要雇泥木石匠、帮工、佣人便到这里去找。大西门附近有条“轿夫巷”，要坐轿子便在这里雇轿夫。金沙坡（现在人民大道旁）是买卖旧货的市场，往往可以“沙里淘金”，淘到一些古董和宝物。紫林庵、黄金路一带，有许多修车行、补胎店和汽车配件商店。西湖路原称打鱼街，要吃鲜鱼到那里去购买，还可以吃“河水煮活鱼”。

从 1926 年开始，在大南门至北门桥的大街（今中华南路和中华北路）中



20 世纪 80 年代末贵阳大西门中山西路遗存的部分“骑楼”

山路（今中山西路）、普定街（今黔灵西路）等街，修建了一批“骑楼式”商用建筑。这种建筑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并结合中国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特点，最先在广州等沿海城市流行起来，后来引入贵阳。骑楼一般为砖木结构，通常是二三层，楼下为店铺，楼上住人，后面是住家的庭院，保持“前店后居，下为店铺上为人居”的传统店铺格局。但在临街的铺面前，增加了一条两米多宽盖顶的人行道，并立有一排圆形或方形的廊柱，人在骑楼下行走可避风雨和日晒，与西方城市的街市建筑相仿。主体结构为穿斗式木构架，壁镶木板或用灰条，屋顶为双坡面或单坡面，盖青瓦。为了防火，在房屋之间筑有较高的封火墙。因为是中式结构、西式装修，人们把它称为“假洋房”。日机轰炸贵阳时，市中心区的骑楼多被炸毁，中山西路、黔灵西路及新华路的骑楼一直保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但随着城市改造慢慢也消失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风东渐，西学日兴，留学人员陆续回筑，西方风格建筑也在贵阳出现。1917年建成王伯群公馆，公馆是一座仿罗马式的建筑，它由主楼和塔楼两部分组成，具有中国民居格局的特点而又有浓郁的古罗马建筑风格，是当时贵阳最时髦的西式建筑。公馆前临顺城街，后靠正谊路。

王伯群是贵州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5年与贵州人戴戡、蹇念益、陈国祥一起参加梁启超、蔡锷、汤觉顿在天津密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会议，回贵州后与其弟王文华组织护国军反袁，护国运动胜利后，为纪念这些仁人志士，这条路改名为护国路。

1923年修建的“华家阁楼”也为中西合璧，它是富商华之鸿所建，在一个四合院中建有一座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阁楼用以供佛和藏佛经，称为“大觉精舍佛阁”。但楼前的对厅及南北两厢均为两层砖木结构房屋，有四廊相通，装有西式玻璃窗及半玻璃门，门窗上部为半圆形拱券。

贵州富商戴蕴珊，人称“南百万”，他的别墅称“戴公馆”，建于1925年，坐落在贵阳市大南门附近的曹状元街。别墅由正楼、东西两厢房、库房和院子等组成。正楼系穿斗式砖木结构的歇山顶建筑，共三层，各层均有回廊，廊外



位于护国路的王伯群公馆

檐的砖柱之间砌筑圆形拱券，墙体则为青砖砌筑，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典型建筑。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西式洋房多了起来。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贵州省主席兼第 25 军军长王家烈的“虎峰别墅”。它坐落在头浪坡（今中山东路），现为贵州省交通勘察设计院办公用房，保存完好。这是一座三层楼五开间前后的仿西式建筑，是当时贵州最好的“洋楼”。四面有外廊，廊柱是矩形砖柱，上承连续拱，拱券为哥特式双心圆弧拱，二楼和三楼有栏杆，民间称为“走马转角楼”。采用推拉式大玻璃窗和双扇大玻璃门，门窗拱上有美观的石膏花饰，室内及外廊的平顶上有吊灯和装饰，但屋顶是中国式的青瓦单檐歇山顶。

此外，位于贵阳市中华北路六广门的“桐梓系”军阀毛光翔的官邸“毛公馆”，也是一栋中式与欧式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建筑。有主楼、跨楼和厢楼，主楼为三层，跨楼和厢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青砖青瓦、宽走廊、深屋檐、大

圆拱门，镶有五彩玻璃窗，木质扶手和地板。1935年3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和一批亲信、将军飞抵贵阳企图围歼红军，蒋介石的行营就设在毛家公馆。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除2900箱留存南京外，其余的分三路紧急迁移，南线的80箱运到贵阳后，最初就存放在“毛公馆”。

1935年在黔灵山麒麟洞旁建了一座西式别墅，这是一座环境清幽的砖木结构平房，入口处有外廊，内有客厅、餐厅、书房、卧室及卫生间，装镶花木地板，是当时最讲究的别墅式宾馆。1935年蒋介石、宋美龄来贵阳时在此下榻，后来囚禁过张学良。

20世纪40年代，贵阳的标志性建筑是贵州银行大楼。始建于1946年，它是贵阳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构体的砖混结构建筑，正面为2层，背面为4层，大厅层高5.2米，是当时贵州的最高楼。主体部分在大楼东侧，入口处有雨棚和石阶，底层粉青灰色如砌石状，雨棚上方有4根向外凸出的竖向粗线条，开大玻璃窗，窗间墙为红砖白缝清水墙，线条分明，挺拔刚劲，有时代感。这座大楼如今尚存，为工商银行中山西路营业处。



○
贵州银行旧址



虎峰别墅



毛公馆

20世纪40年代，在醒狮路（今科学路）建有科学馆、物产陈列馆、艺术馆等建筑群。科学馆平面为横列“二”字形，物产陈列馆平面呈纵向“工”字形，艺术馆平面呈“一”字形。其中轴线为一条5米宽的石铺通道，均为砖木结构建筑，造型新颖别致，演讲厅及展厅空间高、采光好、跨度较大。

20世纪40年代规模较大的公共建筑是六广门体育场，始建于1945年，占地3万多平方米，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田径运动场及游泳池，还设有体育馆、音乐厅、露天剧场、茶室和花圃，取名“合群体育场”。

二、军阀混战乱贵州

唐继尧入黔后，颠覆了贵州大汉军政府，当上了贵州都督。而贵州刘显世也当上了贵州都督府的军务部长。刘显世，贵州兴义人，生于1870年。祖上两代都是办团练的，不仅掌握武装力量，还获得了朝廷赏赐的顶戴花翎，是兴义著名土豪，县令见了刘家都得靠边站。唐继尧在贵州实行高压政策，大力搜刮贵州资源，广借外债，强征士绅，唐继尧在贵州统治期间，民众怨声载道。此时，蔡锷入京任将军府将军，为缓和云贵矛盾，遂向袁世凯推荐唐继尧继任滇督，唐继尧向袁世凯推荐刘显世继任贵州都督。1913年11月1日，刘显世宣誓就任护军使职，护军使不管全省政治，只独揽军权。至此，兴义系军政集团对贵州的统治从此确立。兴义系军政集团主政贵州后，刘显世和王文华决定重建贵州陆军。王是刘的亲外甥、侄女婿，虽只进过优级选科师范，却不乏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1914年7月，刘显世、王文华着手组建黔军6个团，以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教程加以训练。刘显世周围又网罗了一批政客官绅。刘显世统治贵州长达8年，经历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护国运动后，兴义系内部“旧派”和“新派”矛盾斗争日益加剧。“旧派”是以刘显世为首的所谓“元老派”，形成较早。“新派”是以王文华为首的少壮派军政人员，其主体是一批辛亥革命前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护法之役后，王文华坐镇重庆，兵权在握，又使刘显世感到威胁，刘于是密电唐继尧，



1912年，刘显世与文武官员合影

请其遏制王文华。唐继尧告知刘显世，将以滇军韩凤楼代王职务。王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当即将驻渝黔军改为5个旅，自任总司令，决定先发制人。1920年10月，王文华为了避免直接迫使刘显世下台造成“外甥不认舅的舆论”，借口到上海养病，另任命卢焘为代理总司令，谷正伦为总指挥，以“清君侧”名义率军入黔。1920年11月，王文华的警卫营长孙剑峰率军进入贵阳，突然袭击刘显潜组织的游击军，捕杀熊范舆、郭重光等人。刘显世闻讯逃往昆明。此事件发生在1920年，史称“民九事变”。该事变结束了刘显世的统治。

“民九事变”发生后，群龙无首，贵州政局混乱，在谷正伦、何应钦等的建议下，议会推荐任可澄为代理省长，但任可澄见谷、何矛盾日益尖锐，担心波及自己，半年后辞职。被王文华挟持到上海的袁祖铭，在刘显治、张彭年等人的帮助下，逃到北京，投入了北洋军阀的怀抱。由于王文华越来越表现出拥护孙中山的坚决态度，要令贵州“附北弃南”，只有除去王文华不可。在刘显

治等人的支持下，袁祖铭收买刺客，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将王文华刺杀，作为向北洋政府的“见面礼”。在黔军内部，为维持团结，便由广西籍的第三混成旅旅长胡瑛领衔通电，公推总指挥卢焘继任总司令，黔军表面人心初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于7月任卢焘为贵州总司令兼省长。1922年袁祖铭组织“定黔军”回黔。卢焘即于1922年3月引退。袁祖铭“定黔军”4月占领贵阳，袁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执掌了贵州军、民两政大权，入主黔政。1922年8月，袁祖铭正式接受北洋政府委任的贵州省省长职务，同时宣布废除“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在袁祖铭“定黔”成功时，云南的唐继尧又想恢复侵黔时“滇黔联军总司令”头衔，想当西南王，要求袁祖铭拥护他。袁祖铭因已得到南方孙中山和北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对唐的要求不予理睬。于是唐继尧联合刘显世占领贵阳，赶走了袁祖铭。

1923年3月12日，唐继尧委任刘显世为贵州省省长，刘显世深感自己不过是唐继尧在贵州的傀儡，于是9月就借病退辞去省长职务，由唐继虞兼任省长。此时的贵州财政支绌、社会混乱、兵匪横行、民不聊生。又过半年即1924年2月，唐继虞辞去省长兼职，由刘显世的堂兄刘显潜任贵州省省长。

1925年，袁祖铭又在北洋军阀支持下以川黔边防督办的名义，开展“复黔”之战。最终鉴于各种势力的牵制，以滇军离黔，由袁祖铭手下彭汉章任省长，和平接管了贵州政权。彭汉章头脑简单，主政贵州一年，适逢春旱，人祸天灾，怨声载道。1926年，袁祖铭任周西成成为贵州省省长。周西成主政贵州，开始了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长达10年的历史。

周西成当上省长后，贵州进入了周西成时代。周西成，1893年出生，桐梓人，1913年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黔军中任中下级军官。1922年，王文华被刺，黔军内部混战，周西成趁机控制了第一混成旅，自称旅长。在袁祖铭返回贵州，以及唐继虞滇军杀进贵州期间，周西成率军转战四川和黔北，躲避这两方势力的打击。滇军撤走后，周西成趁机回到贵州，占领了黔北大片地盘，他以赤水、习水、仁怀为中心，整顿交通，发展商贸，创办兵工厂、铸币厂，

囤积粮食，势力日益壮大。形成了虎踞黔北和黔西北，进而窥视贵州全省的态势。袁祖铭虽然不喜欢周西成，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寻求与之和解。周西成也想借助袁祖铭掌控贵州全省，于是名义上投靠了袁祖铭，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周西成上台后，也大肆安插同乡、同学以及亲友，排斥异己，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桐梓系”军阀集团，原“兴义系”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27年1月，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设计把企图染指自己地盘的袁祖铭杀了，李燊率领的袁祖铭残部逃往川鄂湘三省交界处，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3军。李燊在外面混得很艰难，特别想打回贵州。周西成虽然通电拥护蒋介石，但蒋介石也想消灭他，于是支持李燊武力夺权。1928年10月，李燊第



周西成与贵阳士绅

一次攻打贵州失败。半年后，李燊与龙云一起出兵，第二次攻打贵州，周西成亲赴前线督战，结果中弹负伤，落水身亡。龙云为什么要帮助李燊？只因云南军阀唐继尧垮台后，手下四大镇守使混战，周西成派兵支持龙云的敌人，龙云获得最终胜利后，于是和李燊联手做掉周西成。1929年5月，李燊率军进入贵阳，蒋介石任命他为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虽然战死，但他的部下并没有被消灭，6月，周西成旧部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等，联合围攻李燊，李燊战败，逃往云南，不久在香港郁郁而终。

根据周西成早年定下的继承顺序，他死后，第一继承人是毛光翔，第二继承人是王家烈。就这样，毛光翔执掌“桐梓系”。

毛光翔能力平平，他之所以能被周西成看重，是因为他既是周西成的同乡加同学，又是周西成的表弟加妹夫，关系很硬。王家烈、犹国材等人认为他是靠关系上去的，非常鄙视他，不买他的账，彼此明争暗斗不断。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以“驱虎吞狼”之计，大力支持和资助王家烈与毛光翔内斗。

1932年2月，王家烈带兵包围贵阳，向毛光翔摊牌，毛的部下要求一战，毛光翔却听从他母亲意见，把大权拱手让给了王家烈，带兵退到了遵义。王家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但是他无法掌控全省，犹国材、毛光翔等人割据一方，也不买他的账。王家烈上台后，纵情享乐，不理政事，把事情全推给了老婆万淑芬。万淑芬不断提拔自己的娘家人，形成了一个外戚集团，因万家在铜仁，所以这个集团被称为“铜仁派”。

1932年11月，倒王战争爆发，战争由犹国材“领衔”，打了一年多，王家烈惨胜，但元气大伤，于是双方划地停战，各霸一方。毛光翔心灰意冷，隐退赤水，1947年病逝。

贵州军阀中，以王文华和周西成能力最强，但王早死，没有机会一展抱负，周西成主政贵州三年，治理成效很显著，严惩贪官污吏，清除匪患，建立金库制度，注重教育，关注学生，严格军队纪律，不准扰民，维护地方治安，破天荒在贵州修筑公路，在贵阳办电厂。省立贵州大学也是周西成主政贵州



时创办的。

1934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派薛岳率军尾随红军也进入了贵州。蒋介石逼王家烈让出省主席一职，命令他率军与红军作战，把他撵出了贵阳。王家烈被红军击败后，蒋介石停发了第二十五军的军饷，收买了王家烈手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煽动官兵找王家烈闹饷，王家烈只得向蒋介石发了4份辞职电报。1935年4月17日，民国政府发布了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王家烈的辞职请求，以及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的决议。4月底，蒋介石给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让他离开贵州。5月1日，吴忠信在贵阳宣誓就职。桐梓系军阀对贵州10年的统治结束。这也是辛亥革命以来，贵州军阀割据势力的结束，贵州历史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三、护国运动急先锋

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运动，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目标，以滇、黔两省独立武装反袁为主力。贵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运动时间较早，是昆明之外的又一运动中心。

1915年8月，杨度等在北京成立筹安会鼓吹中国实行帝制，贵阳达德学校师生就公开举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大旗。10月10日，达德师生演出新剧《亡



达德学校编演的
新剧《共和鉴》

国恨》和《共和鉴》，连演5天，以戏剧宣传共和，反对帝制。10月27日，达德教员凌秋鹗、黄齐生等数十名教职员工致电斥责筹安会（筹安会是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政治团体）：“君主之说，适足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该电报是贵州人民护国反袁的先声。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5日，蔡锷等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通电武装讨袁，不久，组成护国军出征。贵阳知识界肖廷葵上书刘显世，要求早日独立反袁。

1916年1月18日，贵阳各界举行有2000余人参加的“人民代表大会”，要求宣布贵州独立。24日参加云南首义的戴戡率护国军纵队抵筑。两天后贵阳各界在省议会集会欢迎，戴戡历数袁世凯祸国罪恶，慷慨陈词，他说：“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它哉！再论到战败一层，袁世凯现已众叛亲离，不亡何待！”听者为之动容。在形势压力下，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被推为都督。这天，贵阳城遍贴“巩固共和”标语，五色国旗飘扬。

贵州独立后，云贵组成护国军滇黔联军，戴戡率北路黔军北伐四川綦江，王文华率东路黔军东征湘西。贵州是继云南起义后，第一个响应云南宣布独立之省。贵州的独立，使滇黔连成一片，有力地推动了反袁运动的发展，加速了袁世凯帝制的灭亡。3月19日，贵阳各界成立“贵阳征兵抚恤会”，支援出征。4月2日，贵阳妇女万余人在贵州公园（即梦草公园）集会，黄淑媛、江继坤、



1915年12月，护国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合影。中为蔡锷，左一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右一为云南督军唐继尧

赵德馨等发表演说，妇女们纷纷捐金抚恤将士及家属。在举国一片反袁声中，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6月6日死去，护国运动胜利。8月22日，达德师生编演新剧《恢复共和》，连演6天，观众有4万余人。当时，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回筑省亲，亦欣然观看演出。

四、文化新风入黔来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贵阳文化界也在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浪潮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文化运动首先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开始。贵阳达德学校率先提倡使用白话文授课和作文，《达德学校学生白话文成绩周刊》《达德周刊》在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与科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达德周刊》成为贵阳教育界率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楷模。

黄齐生在达德学校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创办女学，招收女学生，动员和聘请达德书社成员董北平的妹妹董德莹为达德学校教师。他还在女学生中提倡“天足”运动，号召女生不缠足，并动员自己的女儿、侄女和女教员们带头放足和抵制缠足。一时间，贵阳的“天足”运动和兴办女学纷纷兴起。贵阳在这期间兴办的女学堂除达德女小外，还有光懿、毓秀、培德、贞静、崇德、蕴贞、复旦、自奋、淑慎等校。同时开办的还有以解救妇女为目的，鼓励妇女走向社会的劝业女子工厂。

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女教育家白铁肩发挥了显著作用，她和黄烈诚等创办光懿女子小学堂。白铁肩还邀请曾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刚等担任校董，大胆提拔女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和教学，为贵阳的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

贵阳是全国话剧演出活动兴起较早的地区，1913年10月，黄齐生就以谭

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史实，编导了话剧《维新梦》，在达德学校公演后，引起很大的反响。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黄齐生等人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事迹编写了话剧《亡国恨》。以歌颂美国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开展独立斗争，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史实编写了话剧《共和鉴》。这些新剧的首演多在达德学校，影响较大，一时被贵阳人称为达德戏班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也逐渐受到贵阳知识界的关注与传播。1917年12月11日，《贵州公报》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报道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率领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的情况。接着贵州《铎报》连载了《俄国过激派与德国之关系》等述评，文中多次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字。这些闻所未闻的思想让贵阳人耳目一新，报纸被抢购一空。不久，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通过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周逸群、王若飞等传入贵阳。这些进步书刊犹如沉寂中的一声惊雷，促使贵阳知识界开始对民族觉醒、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

继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会”之后，1918年10月，在“新派”人物王文华的支持下，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和贵州法政学校校长刘敬吾等人在贵阳发起成立了少年贵州会，宣布：“少年贵州会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提倡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增进学识，崇尚气节，锻炼身体，娴游艺术，进而造成少年中国。”11月10日，何应钦等人向全省宣告少年贵州会正式成立。少年贵州会的成立，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它的“造就少年中国、造就少年贵州”的少年精神吸引了贵阳广大爱国青年的参与，迎合了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欲望，加入者络绎不绝。少年贵州省会是贵州人民觉醒的表现，它把中国前途和贵州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呼唤“德谟克拉西（民主）”，打败“强暴黑暗的恶势力”，追求“个人完全独立人格”，对活跃贵州思想起了启蒙作用。它最响亮的口号是“警醒夜郎”，语重心长地

告诫人们，千万不可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否则又成“夜郎自大”。它主张“了望之镜台，具千里之尽福”，睁眼看中国、看世界，广泛接纳新思想、新知识，与时代“车趋竞进”，磨砺品格，阐扬正义，振作精神，迅速赶上世界潮流。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贵州有许多人走出大山，到日本留学，到欧洲勤工俭学，到北京、上海求学，他们中间有的人成为贵州共产党的杰出人物，有的人成为国民党军政要员，有的人成为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

五、“五四”风雷撼山城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五四运动爆发后，贵州军阀统治者认为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过激党”指使，因此极力封锁消息，下令各报馆不得刊登各地运动的消息。但革命的洪流无法阻挡，在北京读书的贵州籍学生纷纷写信回家，讲述五四运动的情况，号召家乡人民起来响应。从5月19日开始，《贵州公报》《铎报》《少年贵州报》等报纸，开始陆续报道北京五四运动以及全国各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消息。6月1日，贵州国民大会在梦草公园光复楼举行成立大会。贵阳各中等学校学生、达德小学的部分学生和各界人士数千人参加，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演讲，联合通电抗议巴黎和会，力争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及其他不平等条约，要求惩办卖国贼，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

7月16日，贵阳各校及各界群众再次集会梦草公园，召开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大会，提出“争还青岛，诛锄卖国贼，排斥日货，提倡国货”的口号。与会学生面对国旗宣誓：“从今后，我愿为国牺牲生命及各种权利！”光懿女校教师杨静如登上讲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地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她持刀砍下自己的一节小指，在白色手巾上用鲜血写下“誓雪国耻”四个字。台下学生、群众深受感动，齐声举手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河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侵略者！”口号

声经久不息。

在贵州学联支会的领导下，贵阳各界群众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贵阳城中贩卖日货的一些商店铺户，都在学联支会的监视之中。学联支会把没收来的日货集中起来，在城中主要街道示众销毁。一些贩卖过或隐藏过日货的商人，纷纷向学联支会具结保证，今后不再贩卖或储存日货。为了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商界发表抵制日货宣言，规定凡是日货，全省商人一律停止买卖，如有违纪者，货物没收销毁，人以奸商论处。日本人在贵阳大十字开设的“小林洋行”出售的“仁丹”“大学眼药”等货物无人购买，商店张贴的商品广告被群众撕毁，该店被迫倒闭，日商狼狈回国。10月13日，在学联支会的组织下，学生们将缴获的日货用滑竿抬着在主要街道上游行，最后将日货抬到甲秀楼旁的沙坝上全部销毁。



梦草公园光复楼



贵阳学生在浮玉桥侧
焚烧日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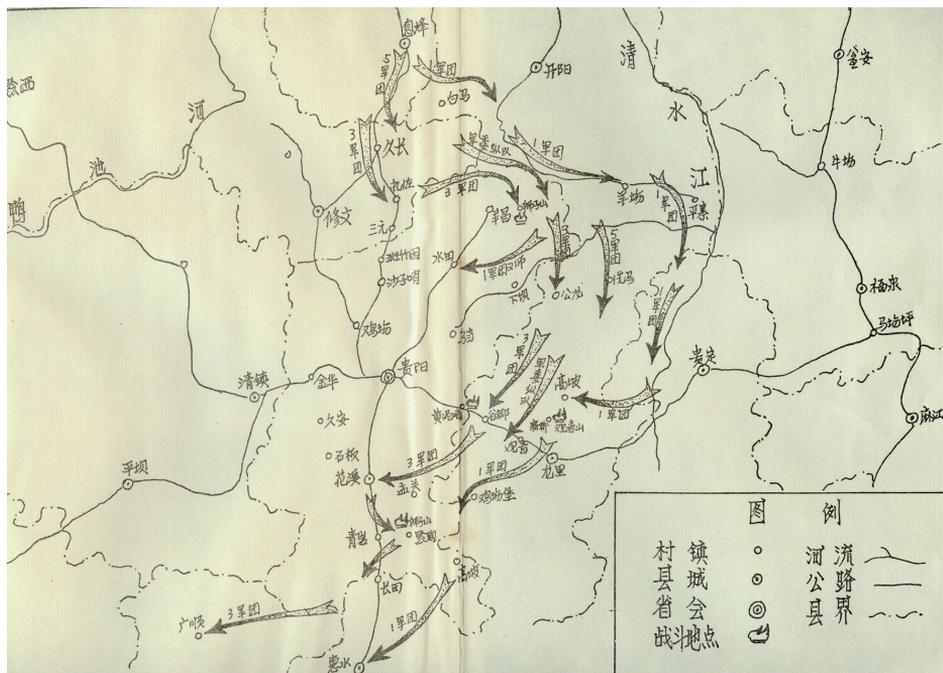
五四运动以狂飙突进的精神让贵阳青年思想得到洗礼，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贵阳的发展，新文化、新思想在贵阳各所学校得以广泛宣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德谟克拉西”“布尔什维克”等新名词在贵阳青年学生中广泛运用，那些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从五四运动之后就在较大范围内被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群众普遍接受。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积极寻求和思考科学的救国救民理论。五四运动以后从国外回到贵阳的刘方岳最先在达德学校宣讲巴黎公社的情况，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田君亮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作为课本，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贵阳当时出现的一批进步书店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书店中一些进步书刊，如鲁迅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在学生中得到广泛传播。

六、红军三次过贵阳

1934年底，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利，中共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上旬，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艰难的战略大转移，即长征。长征路上，红军在经过湖南境内的时候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在连续穿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兵力减少了大半。这个时候，红军在长征路上作出第一次战略调整——向贵州转战！贵州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期间转战时间最长的省。

贵阳是红军长征中唯一兵临城下的省会城市。1934年至1936年中央红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经贵阳线路示意图

军及红二、红六军团三次过贵阳，足迹遍及贵阳地区的乌当、白云、花溪、清镇市和开阳、息烽、修文等8个区（市、县）80多个乡1700多个村寨，经历了21场战斗，牺牲了上千名将士。红军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给贵阳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育和鼓舞了贵阳人民。

红军长征首次过贵阳是1935年1月1日，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由瓮安进入开阳县境内，经彻夜激战，突破洛旺河防线，于1月2日抵达乌江南岸。1月3日至6日，红三军团从开阳乌江南岸的茶山关、桃子台和楠木渡三个渡口越过乌江，进驻遵义县尚嵇镇一带，随即攻占遵义。

红军长征第二次进入贵阳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率领陈诚等国民党中央委员乘坐飞机抵达贵阳，亲自坐镇，妄图将红军一举歼灭。毛泽东指挥红军南渡乌江，进入息烽境内直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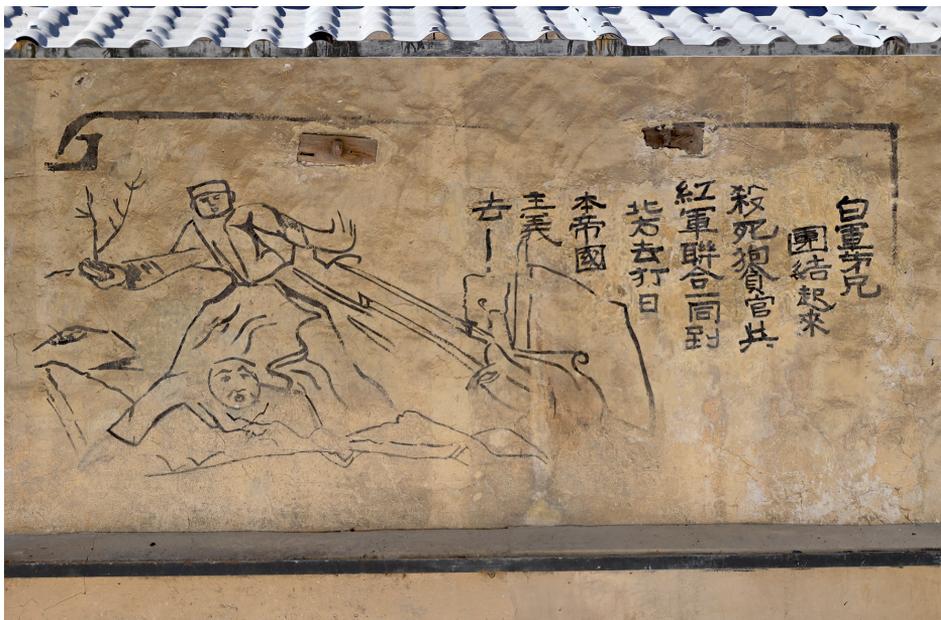
贵阳修文县大木村红军标语

向。在息烽、开阳、修文等地，红军与敌军多次展开激战。主力红军及军委纵队为一路，南下修文，假装攻打贵阳，同时又分兵往黔东南方向，四处“响起枪声”，给敌军造成贵阳已被红军包围的假象，迷惑敌军。这时坐镇贵阳的蒋介石已经是坐立难安。蒋介石认为红军是来拼命的，因为兵书上讲“擒贼先擒王”，要是红军攻破贵阳，自己的安全可就岌岌可危了，他“十万火急”地给在云南镇守的滇军首领孙渡发送电报，让孙渡“日夜兼程猛进……万勿延误”。孙渡接到这个紧急命令后，率领部队日夜兼程，从黔滇边境赶往贵阳救驾。6天的路程，孙渡率领军队3天就赶到了。蒋介石的这一调兵举动正中了毛泽东预先设定的声东击西之计。就在滇军拼命赶赴贵阳救驾的同时，让蒋介石意料不到的是，自己作出调出滇军的决定，为红军敞开了西去的大门，红军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速度往云南方向进发。4月下旬，各路红军先后进入云南，摆脱了贵州的敌军，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佯攻贵阳，仗虽不大，却对敌军统帅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因为调出滇军，为西去云南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先决条件，成为战争史上弱军威逼强敌统帅被迫调动军队的光辉战例，为红军继续长征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第三次过贵阳发生在1936年。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完成钳制敌军的任务后，于1935年11月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前往贵州省黔西、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进入贵州，于1936年1月集结在贵定县新马乡和龙里县洗马河一带，造成进攻贵阳的态势。

正当蒋介石在贵阳忙于部署城防时，1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兵分4路，分别渡过南明河，从开阳县龙岗镇、乌当区的下坝等地快速穿插到修文县扎佐、白云区沙文乡一带，并进攻修文县城。红六军团在扎佐与贵州保安第一、第二团作战，俘虏保安团丁300余人，缴获枪300余支，造成北渡乌江之势。国民党郝梦龄纵队慌忙在乌江北岸布防，阻挡红军北上。2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突然掉头西进，搭浮桥越过猫跳河进入清镇市卫城一带，于2月2日离开贵



贵阳花溪高坡乡红军标语

阳越过鸭池河，占领黔西县城。

七、贵州成立省工委

1934年下半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活动的发展，贵阳的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党的各种外围组织，并逐步发展党员。到1934年底，党的组织得到不断发展，有党员40余人，为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贵州的革命运动需要统一的组织领导，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人商议，于1934年9月组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因为工委由9人组成，亦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为宗旨的由党内和党外人士组成的革命组织。“九人工委”的任务是寻找上级党组织，发展革

命力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尽快在一些学校中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同年冬，贵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贵阳女中党支部建立。之后，贵州省立师范学校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林青赶赴遵义，经过寻访，见到了早年同被关押在上海监狱的狱友吴亮平。吴亮平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经过吴亮平的介绍，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罗迈代表中共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1935年1月中旬，林青返回贵阳传达中央决定时，因邓止戈当时在外未能参加，秦天真、刘茂隆等听取了林青的传达。鉴于贵州干部缺乏，省工委决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定刘茂隆参加省工委为委员，省工委负责将此决定向中央汇报。当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林青赶赴遵义，途中被阻，未能向中央报告，而刘茂隆一直作为省工委委员进行工作。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35年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杨涛（潘汉年）到达贵阳，与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接上头，听取了贵州工作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一）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二）窃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三）掩护杨涛去上海以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下达任务的核心是要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背靠云南”可以牵制滇敌，“面向遵义、重庆”则与川黔边的斗争相联结、相呼应，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了工作。林青及时向缪正元布置窃取敌人密电码的任务。缪利用在国民党军队电台工作之便，迅速偷抄，完成了任务。缪还按林青指示，随时做好准备，待与红军接近时，寻机带电台投奔红军。当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期间，秦天真通过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设法窃取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地图和密电码本。省工委还遵照中央指示，派地下党员蓝运臧（女）护送杨涛经广西、香港安全抵达上海，完成了护送中央代表的任务。中央代表留下与红军联络的暗号，在后来地下党组织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省工委还利用各种机会牵制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支援红军。中央红军从遵义挥师北上时，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黄大陆利用军阀各自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拼杀的心理，以参谋长身份劝说黔军何知重部以“兵无宿粮”为由，避开与红军作战。当红军一渡赤水时，何知重按兵于桐梓，未参加土城战役。红军二渡赤水前，王家烈电令何知重部在二郎滩等处防堵，作战命令落入缪正元之手，缪及时通过杨逸民（地下党员、缪身边的电台文书）转告黄大陆，黄又设法使何知重将部队停滞于习水、土城一带，从而减轻了红军的阻力，为配合中央红军转战黔北，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八、魔窟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是国民党军统局在息烽设立的秘密监狱，它是由军统局在南京设立的军人监狱演变而来。抗日战争爆发前，军统局在南京军人监狱里设立了秘密监狱，将军统逮捕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秘密关押。监狱分设改、过、自、新4个分监。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监狱迁往武汉，又迁到湖南益阳。由于军统逮捕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败退，京沪沦陷，遂于1937年11月，将监狱迁往贵州息烽这个偏僻的山区，到1946年7月撤销。为了保密，对外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辕”。因其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管理最严，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内部称之为监狱的“大学”。



监狱迁来之初，设在息烽县城北的川主庙，后转移到息烽县城南 6 公里的阳朗坝猫洞。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在全国设立的最大的一所秘密监狱。

息烽为群山所掩，阳朗坝地势低凹，所修监房，犹如民房，一般人很难知道这是一座杀人魔窟。且川黔公路从侧穿过，离贵阳仅 70 公里左右，交通方便，易于控制。

息烽集中营从成立到撤销的 7 年多时间里，先后关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其他人员 1200 多人，其中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者 600 余人。被送到息烽集中营关押的都是所谓案情重大者，无期限的长期监禁，而许多人在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即惨遭杀害。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韩子栋、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和爱国将领黄显声等，都被长期关押在此；张露萍、张蔚林、冯庆传等共产党人在这被杀害；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批评蒋介石也曾在此关押。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一家，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外号“小萝卜头”）也被关押在这里。1946 年息烽集中营撤销时，仅有 72 人被转移到重庆军统所属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关押。

息烽集中营不仅是国民党反动当局设置的人间地狱，用来摧残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革命意志的场所，更是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们坚持真理、追求理想、奋起反抗的特殊战场，无数革命者在这个特殊的战场，面对摧残、折磨和屠刀，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大无畏气概，与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和殊死的较量。

1941 年 3 月，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以及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原型）、许晓轩（《红岩》中许云峰原型）等一批地下党组织的重要骨干，利用放风和做工劳动的机会，秘密组建了狱中党支部。随后，秘密党支部又逐步吸收了宋绮云、张露萍等一批共产党员参加狱中党组织的工作。这样，一个狱中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形成了，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又有了自己的组织，为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提供了组织

保证。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革命者们挫败了监狱当局的连座法，并取得了改善伙食、痛打叛徒等斗争的胜利。同时，党组织还利用敌人“狱政改革”的时机，用笔名在狱中的《复活月刊》上发表“一个月的世界与中国”“七月里的石榴花”等文章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的罪恶行径，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还自编自演节目，鼓舞身陷囹圄的难友。张露萍将《日出》中的陈白露演得栩栩如生；赵力耕在话剧《反正》中慷慨激昂地喊道：“起来吧，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再当亡国奴了！”

在息烽集中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诗篇，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九、抗日救亡掀高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日本殖民地。贵阳同全国一样，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贵阳各个学校顿时沸腾起来，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抗日。同年冬，各学校学生会联合组成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创办《救国旬刊》，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接着贵州妇女救国团、贵州各界抗日救国会也相继在贵阳成立。

1937年6月，全国学联代表、北平学联主席杨蕴青来到贵阳，在贵阳地区地下党的支持下，7月2日，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贵州学联成立后第五天，七七事变爆发，学联组织各校师生在校内外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学联在省立贵阳师范、女子师范、女中、高中、贵阳中学都建立了支部，各支部的骨干大多是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各校学联支部利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开展活动，除张贴抗日救亡墙报、成立歌咏队、组织示威游行外，还在秘密油印刊物《贵州学联》上刊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学联的《告同学书》。利用国民党当局组织“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机会，学联组织广大学生下乡，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获得很大的宣传效果。

1938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武汉总部，派中共党员张益珊到贵阳推动贵州成立“民先”组织。张通过黄齐生的介绍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又得到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支持，率先将一部分进步青年与中共党员发展为“民先”队员。民先贵阳地方队部建立后，即以“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坚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民先”队通过印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开办小型图书馆、举办时事报告及演讲会、向民众传授军事知识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宣传“民先”的性质和任务，号召“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

知识界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蓬勃开展。1938年，大中学校的爱国教师组织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曾邀请途经贵阳的徐特立到会讲述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文艺界的“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的救亡工作也十分活跃。以原川军20军军长杨森名义组织的筑光音乐会，由于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加入，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文艺团体。七七事变以后，“筑光”通过音乐会、电台广播、街头演唱、集众教唱等形式开展救亡宣传，在贵阳地区和邻近各县、区、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筑光音乐会成为当时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中参加人数最多、活动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组织。

以大、中、小学生为主体的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于1936年12月成立，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发展到236人。1938年夏，一批中共党员加入“沙驼”，建立了中共沙驼剧社支部。以后，“沙驼”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戏剧为武器，从舞台到街头，从城市到农村，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常与“筑光”等文艺团体配合，组织联合演出或开展慰问伤员活动。抗战爆发后，“合群体育艺术部”“青光话剧社”等戏剧团体，也经常深入城乡公演抗战剧目，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
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部分成员合影



○
贵阳筑光音乐会部分成员合影

抗战期间，工商界、宗教界、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通过建立各种组织开展救亡活动。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贵阳邮务工会曾组织群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行径。贵阳青光抗战工作团在贵阳市区设立献金台，募捐支前，并到息烽、黔西、大定、毕节等县演出抗日话剧，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宗教界的爱国人士成立了贵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积极开展救亡活动。文化界的贵阳大夏歌咏队、贵州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中苏友好协会贵州分会、新文学学会等组织，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读新书店和生活书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日救亡宣传和直接支持前方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春，生活、读新、新知三家书店的总部在贵阳成立了分支机构，即贵阳读新书店和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这两家位于贵阳中华南路闹市区的书店开业后，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书店不仅与《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密切合作，向读者供应《新华日报》《群众》《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报刊，还出售各种政治理论著作和抗战书籍，以读者为对象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抗战形势。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书店工作人员还用自己的钱购买笔、墨和纸张，组织读者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由书店集中负责寄到前线去。

贵州各界抗敌后援会是国民党在贵州组织的规模最大的救国团体，会址设于国民党省党部。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抗敌后援会开展了一些活动。如1938年举行“九一八七周年纪念会”，为抗敌守土将士举行募捐演出。此外，在前方取得胜利时也及时举行庆祝，开展募捐活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贵州当局还组织了两次战地妇女服务团、两次青年战地服务团。1940年7月，贵阳各界群众开展“铸像锄奸”活动，募款铸汪精卫夫妇跪像，令其遭万世唾骂，以“褫其魄而寒其胆”；1941年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手工行业举办抗日献金活动；省立图书馆举办抗战书报展览；各阶层群众请缨杀敌；宗教界组织募捐义卖、慰问荣誉军人、祈祷胜利活动；全省各小



贵阳街头抗日大游行

学学生开展“节约储金献机运动”等。这些活动反映出贵阳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

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唤醒和教育了贵阳人民，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解放战争时期贵阳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图云关上红十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生理学奠基人、爱国华侨林可胜博士于1937年12月在武汉汉口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负起艰巨的抗战救护重任。其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救护信条是“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病安全，增人类

幸福”。

1939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及167后方医院辗转迁至贵阳的图云关，至1945年底撤离贵阳。救护总队在图云关驻扎了7年，图云关至此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医药救护和医学人才培养中枢，有8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大批医药用品从图云关走向抗战前线。救护总队抗战期间累计救治伤病兵民2000万余人，谱写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乐章，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下辖4个医疗大队，大队以下为医疗中队，中队以下为医疗队。此外，还成立了一些专业队，如手术队、防疫队、护士队、运输队等。根据工作需要，医疗队的一般编制为医生三四人（其中一人为队长）、护士数人、助理人员数人。4个大队为华北大队、华中大队、华东大队、华南大队：第一大队设在湖南邵阳；第二大队设在江西弋阳；第三大队设在湖北均县；第四大队设在西安（后改为太行大队）。第四大队曾派出两个中队到陕北，其中副大队长墨树屏医生于1941年10月18日殉职于太行山区。



1942年林可胜随军去缅甸



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167 后方医院及美军第 27 医院驻地

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除正面战场外，同时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太行、太岳、江西、皖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病员及群众服务。1938 年，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出医疗队、医护队到延安协助医疗工作，开展抗战救护工作。当时一支医护队分在位于宝塔山的边区医院，另一支医疗队分在甘谷驿站医院，还有一支医护队则分在延安城内门诊部。

这些医疗队，除负责战区救护工作外，还定时将战区情况向总队反映。如 1941 年，日本在湖南常德发动细菌战，该队马上派出医生到战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救治，防止疾病的蔓延，并向国际社会发出报告，使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得以公之于世。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迁至图云关后，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救护总队比邻而居，专训军医官兵。卫训所规模完善，拥有教室、实验室、动物室、药品系、敷料系、特别营养部、环境卫生实习场、假肢工厂、矫形外科中心、卫生用具制备科、汽车场等，设立了急救、治疗、防疫、护理、环境卫生等全套的军中卫生勤务培训项目，从战壕到后方医院，让受训人员学之能用，学之管用。当时的图云关是一座享誉国内外的医科大学，是一个战时医学人才的培养中心和输出中心。抗战期间，卫训所连同五个分所共培养医学人才近两万人，其中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医学界的杰出人才，例如荣独山、汤蠡舟、周寿恺、张涤生、屠开元等。

救护总队集中了全国优秀的医学专家、学者和精通业务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当中有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外名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和留学的医学博士，也有国内协和医学院、东南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正医学院等的高才生，还有来自欧美、印度的外籍医护人员、技术人员。1939年秋，在英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和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由英国医药援华会出面，组成国际援华医疗队，从欧洲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



国际援华医疗队部分成员在贵阳图云关

队所在地贵阳图云关驻地，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员们并肩作战。他们以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为基地，赴各战区参加实地救护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贡献。

高田宜医生，原名 Barbara · Courner，原籍英国，高田宜是其来到中国后所起的中文名字。关于她的情况少有资料记载，据说她出生于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于伦敦妇女卫校。她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立志要把所学奉献给全人类。她曾经在印度工作过，在得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暴行后，她自愿申请到中国进行战地服务。她于 1941 年来到中国，被安排到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工作。1942 年 3 月，日本又向广西投掷了“鼠疫细菌弹”。救护总队部闻讯后，马上筹备组建医疗队赴广西扑灭鼠疫，高田宜医生立即自告奋勇参加医疗队。她在临行前患上了感冒，却没有顾及身体的不适，只是匆忙注射了防疫针，以便按时成行。不幸的是，防疫针注射后不久就引起了过敏反应，高田宜医生不到 24 小时死亡，此时正值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夜。这位伟大的女性，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她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1985 年，贵阳市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些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以身殉职的高田宜医生，竖立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和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墓碑。除向战区提供服务外，救护总队还为当地驻军和百姓服务，如为驻军检查身体、防治疾病、宣讲卫生知识等。1940 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曾到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考察，勉励大家克服困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贡献。

救护总队有专门运输车辆 150 多部，设运输站 7 个（重庆、昆明、贵阳、衡阳、褒城、泸州、金城江），运输队 9 个，以抢运伤兵和运送药械。1941 年至 1942 年，通过运输队，成千吨医药物资从图云关运往抗日前线。

救护总队从 1938 年 1 月至 1945 年 10 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共进行外科手术 119836 人（次），骨折复位 35522 人（次），敷伤 8784731 人（次），住院治疗 2142997 人（次），门诊军人 2481685 人（次），门诊

平民 2002996 人(次), 预防接种 4632446 人(次), X 射线照相 5631 次, X 射线透视 52798 次, 灭虱人数 792148 人(次), 检验 226593 人(次), 特别营养补给 934833 人(次)。研究资料统计, 卫训总所及各分所, 培训军医 15000 多人, 极大地改善了军队的医疗条件。

1945 年底, 救护总队部撤离贵阳图云关到重庆, 后迁南京。1946 年 5 月底, 完成其历史使命, 奉命解散。

十一、“二四”轰炸酿惨案

1939 年 2 月 4 日, 日本飞机对贵阳进行了狂轰滥炸, 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天上午, 18 架日本飞机沿广西大溶口, 贵州的榕江、八寨(县名, 今属丹寨县一部分)、都匀、贵定等地, 向贵阳飞来。12 时, 18 架敌机分成 2 批, 每批 3 组, 每组以 3 架排成品字形, 由贵阳东面侵入市区上空。敌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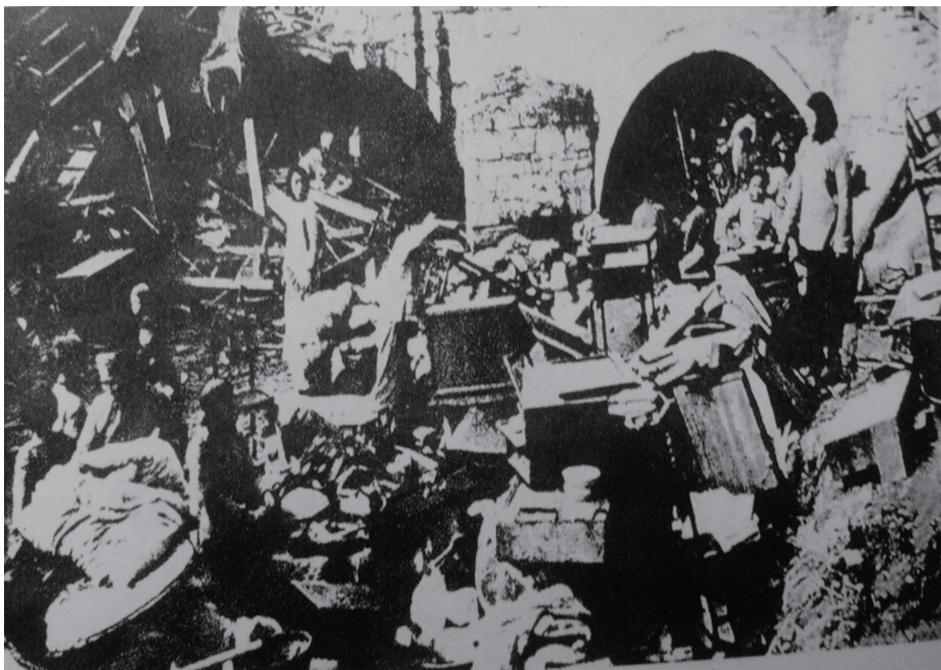
日机轰炸后的贵阳城, 浓烟四起

过东山垭口，即飞向城区南部。敌机的轰炸意图明显，其目标是以南明河为界，以大十字为中心的贵阳市商业繁华之地。这时贵阳的防空武器虽有两架高射炮设在东山山顶，但实际上无所作为，贵阳基本上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敌机轮番俯冲投弹数十分钟后向贵阳东南方向的贵定、都匀、荔波飞去。

轰炸的前几天，贵阳正在进行防空演习。2月4日这天当警报响时，贵阳广大居民还以为是防空演习，做做样子，大多仍待在家里不出来；等听到爆炸声，意识到真是敌机轰炸时，才惊慌失措地逃避，但为时已晚。当时贵阳的民房是木结构和砖木结构居多，着火易燃。敌机轰炸后，正新街、金井街（今富水中路）、中华路、贯珠桥等十多处立即起火，火光冲天，爆炸声隆隆。随着火势蔓延扩大，楼倾墙摧，高楼巨厦轰然倒塌。在金井街、正新街和一些巷道处，街口过窄，出路被火势封住，居民无法全部逃出，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因为救火机全城仅有3部，又无自来水，实际上用水灭火起不了作用，救火主要靠拆除房屋，切断火路。到下午三四时，火势稍煞，只有少数地方仍在冒烟。

以大十字为中心，南至贯珠桥、北抵光明路（今省府路）、东到护国路、西临花牌坊（今中山西路与公园路交会处）的贵阳商业最活跃地带，惨遭浩劫，昔日繁华，皆成灰烬。受损失较大的商号有：恒兴益百货店、隆昌源百货店、永丰泰百货店、广和昌百货店、广聚源皮鞋店、张鹤麟笔墨庄、中央银行贵州分行、凤祥银楼、朱铭泰瓷器店、同济堂中药店、德昌祥参茸店、恒和参茸店、刘源春五金店、莫裕顺皮箱店、亨得利钟表店、阿嘛照相馆、求精洗染店、璇宫理发室、金筑戏院和廉洁食堂。

“二四”轰炸是贵阳现代史上的一次浩劫。据事后统计，日机共计投弹129枚，被炸地点达39处，被炸最严重的地方有中华南路（投弹13枚）、飞山街（投弹11枚）、中山路（投弹10枚）、贯珠桥（投弹8枚）、民教馆附近（投弹7枚）、通商路（投弹7枚）等处。据当时的中央通讯社记者实地调查，共计被毁房屋1286栋，被毁房屋最严重的街巷是金井街（被毁173栋）、中山路（被毁121栋）、贵山街（被毁112栋）、三山路（今中山东路，被毁



“二四”轰炸后，贵阳灾民清理残存物品

99栋)、中华路(被毁88栋)、正新街(被毁87栋)、六座碑(今民生路,被毁72栋)、南华路(今中华南路,被毁58栋)等处。这次惨案使贵阳大十字繁华之区损失殆尽。惨案使贵阳损失的动产不动产约值2500万元,死伤人数为1223人,其中死亡(包括炸死、烧死、压死)521人,伤702人(受伤后死去者为33人),登记的灾民数就有8998人。灾民蓬头垢面,流落街头;有的身背箱笼,携儿带女搬向郊外。

十二、战时经济大发展

（一）战时工业

工业的蓬勃发展在战时贵阳表现得十分抢眼。沦陷区工厂内迁，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熟练的工人。1943年内迁贵州工厂达到154家，其中贵阳有73家。工人总数亦由战前的536人增加到3500余人。工业门类由战前的印刷、染织、火柴、皮革等4个行业扩大为卷烟、机械、电力、化工、橡胶、制酸、水泥、电器、面粉等行业。其中化工、机械等行业均与军事关系密切。

抗战期间，贵阳成为抗战大后方运输枢纽，来往汽车络绎不绝，长途奔驰的汽车需要加油、更换车胎，酒精在战时可作为替代品弥补汽油供应不足。抗



抗战时期的贵阳中南橡胶厂



战中期，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发展酒精生产。到 1943 年，贵州核准登记的酒精厂发展到 52 家，当时，贵阳每月生产酒精可达 5 万加仑之多。

贵阳中南橡胶厂创建于 1941 年 3 月，是贵州最早的一家橡胶加工企业，也是最大的一家私营橡胶企业。贵阳车胎翻修厂在美国的援助下，于 1944 年 4 月建立，职工 40 余人。月翻修胎 600 余条，全年翻胎 7045 条，产品专供军用。科达橡胶厂于 1944 年由衡阳迁来，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皮碗。1946 年，又有永生、民生、西南 3 家厂设立。其中，永生厂主要生产蓄电池箱、胶鞋底等，民生厂主要生产补胎胶、翻胎胶及各种鞋底，这些产品解决了交通运输之急需。

机械工业成为贵阳抗战时期重要部门之一。抗战时期一些兵工、民营企业



贵州省企业公司创立会摄影纪念

先后迁入贵阳地区。如 1944 年原汉阳炮厂内迁独山，再迁贵阳；1939 年中央修械所迁贵阳中曹司，1942 年改名四十四兵工厂；第五十三兵工厂也于 1942 年将修理光学器材的精密仪器疏散于贵阳，成立修理所，后改为贵阳分厂。迁入贵阳的机械工业民营工厂有中国煤气机制造厂、德兴机器厂、驻筑汽车修理厂等，1944 年统计约为 15 家。迁入贵州的机器工厂还有上海通用机器厂（后未复工）、汉口瑞丰汽车修理厂、汉口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等。这些工厂企业不仅带来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还带来资金、人才、技术和生产管理、营销制度、经验等。

贵阳本地的机械工业也得到发展。1938 年伍效高创办新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5 月建新生五金厂，它是贵阳最早建立的机械厂。该厂总投资 50 万元，厂址设在湘雅村，主要生产建筑钢铁构件、铁床、行军床、手榴弹壳等。1938 年省立模范工厂在窄口滩增建金工车间，产品是各种小型五金工具、轧面机、汽车零件等。同年，交通部西南运输管理局汽车大修厂成立于中山门外交通路 164 号，有技工 40 人。次年改称中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修理总厂第一修理所，工厂迁马王庙后有各种机具 30 多件。1943 年称马王庙修车厂，除承修汽车外，开始仿制汽车配件。马王庙修车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汽车修理厂。

1939 年 6 月 1 日，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它是贵州最大的垄断集团。省主席吴鼎昌任主任委员，省政府委员何辑五任董事长，彭湖任总经理。初定资本金 600 万元，省政府占 20.5%，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占 20.8%，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占 58.33%，地方商股占 0.37%。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得到内迁各厂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熟练工人和资金的支持下，所办工厂填补了贵州工业的空白，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掌握机器生产技能的新工人，贵州近代化的步伐因之而有所加快。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1939 年 9 月创办贵企印刷所，有员工 170 人，印刷《贵州日报》《贵州企业季刊》《西南实业通讯》及省、市政府文件等，成为贵阳较大的印刷企业。又在贵阳建立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专



营国货，后来成为民国期间贵阳最大的百货公司。1939年底与协昌兴记、大中华厂合并成立贵州火柴公司，生产安全火柴、硫化火柴等。此后，又建成贵州化学工厂，主要生产肥皂、蜡烛、墨水、香水、美发油等。建筑材料方面，建成了贵州水泥公司、生产“金钢”牌水泥，为贵州机制水泥之始。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又与省建设厅合办贵州省矿产探测团，地质学家乐森璋、罗绳武、蒋溶等参加该团工作。贵州矿产探测团调查工作中，最重要的发现为贵筑、修文一带的铝矿，储量有17000余万吨，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铝矿。1942年9月，将中国煤气机械厂与新生五金厂吞并，组建中国机械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煤气炉和汽车零配件等。是年，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000万元（法币）。1943年，又与重庆中国农林机械公司合作组建中国农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制造厂，增加生产喷雾器、抽水机、碾米机、榨油机、磨粉机等，成为贵阳较大的机械制造厂。当年资本又增至5000万元（法币）。此外，还建有黔陶陶瓷厂，生产碗、杯、盅等日用品和一些电用瓷器及卫生瓷器。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与发展，使得近代企事业管理模式逐渐在贵州各行业中扩散，取代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管理。这种管理理念的更新，为近代贵州工商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家重要企业。其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涉及行业之广、雇用工人之多，堪称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尤其经历初创与调整的1939至1941年，进入扩张阶段后，该公司借助对本地企业的兼并及抗战内迁企业的资金与设施，生产与销售均一度达到鼎盛。据统计，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最盛时期投资的“各项事业达28个单位”，分别为自办类2项（玻璃、化工）、合办类5项（烟草、水泥、火柴、丝线、木业）、投资类9项（煤矿、电气、面粉、火柴原料、水利、林牧、垦殖、盐井、商业），投资总金额22600余万元。然而，好景不长，从1943年开始，受抗战局势影响，整个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始萎缩。1944年秋，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后，一部分日军乘胜追击，沿黔桂铁路北犯贵州，并占领黔南重镇独山，贵阳震动，

公司各厂相继不得不停工疏散。抗战胜利后，内迁企业、机关、学校、人员纷纷撤离贵阳，市场购买力一落千丈，物价上涨，企业资金周转不利，到临近贵州解放，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名存实亡。

（二）战时商业

贵阳凭借其西南公路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一跃成为西南商业繁华的城市。根据《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记载，贵阳领有开业许可证的商号，1937年为1420户，总资本180万元（法币）；1942年猛增至3894户，总资本达7999.53万元（法币）；1943年又增至4239户，总资本达10614.14万元（法币）。1943年，全市商业从业人员约1.8万人，若以五口之家计算，靠商业养活的人口近10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3。据《贵阳工商调查录》记载，商业行业有绸缎、百货、纺织、布业、运输、汽车材料、五金、电料、新药、国药、旅馆、香烟、图书文具、颜料、陶瓷、纸张、印刷、戏剧、糖食、南货、茶楼、酒肆、服装、鞋革皮件、首饰、粮食、旧货、油、棉花、驮马运输、铜铁锡器、竹木、煤炭、米粉、面粉、米面食品、纸炮、茶具、洗染织补、屠宰、酱油、摄影、理发、杂货等44种。

作为大后方，操下江口音的，操湖北、湖南口音的，操广东、广西口音的人全都来了，他们或避难居住或临时驻留。这一时期，中华路（大十字以北）和南华路（大十字以南）上，百货商店一家接着一家开张营业，寂静的山城骤然热闹起来。

来到贵阳的人最先是“找住找吃”。政府在贵阳设有难民接待站和难民收容所，民间旅社和客栈有450多家，威清门一带有很多小客栈。最大的旅馆是贵州大饭店，它由江西人杜德和创办，设在独狮子（今中华南路旁的醒狮路口），是一座木结构的四层楼房屋，有大小客房44间，客满时搭临时铺位。贵阳市协济战区文化人委员会在艺术馆附近设招待所，接待战区流落到贵阳的文化人，花溪西舍可谓是当时最豪华的宾馆。

茶楼酒肆也繁荣兴旺，著名的有会仙茶楼、华园茶社。川菜、粤菜、江浙菜、北方味、清真馆发展很快，他们相互竞争，各显特色，共谋发展。黔菜馆在抗战中兴起，据说有十来家，著名的有醉阳春、云荣春、汉云楼、老不馆。川菜出名的有杏花村、豆花村、飞花村、万花村，俗称川菜“四村”。粤味餐厅有大三元、冠生园、五羊、金龙、百乐门、南园、东园、桃园等九家，大都集中在大十字附近，大三元是当时贵阳最大的餐馆。江浙味以大江苏、小上海著名。下江人还在街上卖白糖方糕、黄松糕、豆面馍馍、条条糕、玫瑰猪油糕和油炸臭豆腐。北方味主要是面食，有天津馆、北方馅饼店、天津狗不理、北方饺子馆等，街上卖馒头、包子、油条、大烧饼的多是北方人。回族在贵阳开设许多“清真馆”，著名的有金钰和孙玉顺，炖牛肉、牛肉面、卤牛肉誉满全城。

贵阳的传统小吃很多，肠旺面是贵阳的特色，面条中加猪肠和血旺、红油、脆哨、软哨、绿豆芽，吃起来油而不腻，别有风味。当时最著名的是苏肠旺，老板苏德胜，店在广东街与十字口交会处，食料精选、制作精致、调味讲究、服务周到、顾客盈门。

雷家豆腐圆子源于清末的雷老太婆，世代传承，店在贵阳三牌坊（今中华南路），在精制的豆腐中加上香料、食盐、葱花做成圆子，掌握火候，使之“香酥可口”，百年不衰，是贵阳的老字号。

宋氏五代人经营甜品，以卖糕粑稀饭出名，后来又卖炒米糖开水和八宝饭，店在南京街，店名为玉盛甜品店。他家的碗耳糕、米团粑、沧粑、凉甜糕、热糍粑、锅巴糍粑、油炸粑（豆沙窝），大人小孩儿都喜欢吃。

恋爱豆腐果据说是一对恋人在躲飞机时吃到的，这种又嫩又辣的烤豆腐非常可口，一传十、十传百而成为流行的美味小食。

湖南面和湖南馄饨很受欢迎，湖北的武汉豆皮也在贵阳出售，“欢喜坨”在贵阳被称为“糖麻圆”。

贵阳的老糕点铺广寒宫、义信昌等生产黔式糕点，如鸡蛋糕、沙琪玛、鲜鹅蛋、核片糕、灯草糕、黔式月饼，大三元、冠生园等生产西式糕点、饼干、面包、

广式月饼。1944年东方食品公司由长沙迁来，生产湘式糕点和广式糕点，自产麻雪枣、酥糖、小花片、烘糕、蛋卷、蛋薄脆、奶油麦麸饼干、麦片、代乳粉及小儿健脾膏等。

另外，猫猫巷(今和平路)的“邓皮蛋”，三宫殿(今延安东路)的“余豆豉颗”，麦香村的挂面都很有名。孙绥之创办的“味莼园”是贵阳的老字号，先后在大十字、河西路和苏家桥设店，所产“卫生酱油”“口蘑酱油”“虾子酱油”最受市民欢迎。

贵阳国药颇盛，大药房有同济堂、生生药房、五福堂、协济药庄、普济药房、国泰药房、卢庆元药房、觉仁药房、大春药房等。同济堂是老字号，创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经营地道药材，精心炮制，药物齐全，自制丸散膏丹，有名医坐诊，强调“童叟不欺”，在贵阳有很高声誉。抗战期间，来了许多西药房，如新洲药房、大公西药房、健华药房、公达药房、亚洲药房等。

文化市场方面，全国各大书局也在贵阳有经营。中华书局贵阳分局主要经营中华书局版图书和教科书，兼营体育用品和文具；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除销售各种商务版图书以外，还经营风琴、手风琴、显微镜、望远镜、照相机、运动器材等；世界书局经营本版图书、学术专著、各种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兼营教学用品、测绘仪器、日记本、练习本；正中书局经营图书和课本；开明书店贵阳分店经营教科书、社会类图书、文艺图书和青年读物；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经营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图书及通俗读物；新亚书店贵阳分店主要经营教科书及人体解剖、动物、植物、数学、化学、防空、防毒等各种挂图；贵阳读新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和报纸；贵阳文通书局设有发行所，经销学术专著、文学名著、各种丛书、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全国各大书局的图书在贵阳均能买到。

贵阳张鹤龄笔墨庄，生产的毛笔都刻有“寸楷羊毫”“小楷羊毫”“鸡狼毫”等字样，还经销各地的墨及钢笔、铅笔、画笔、三角板、圆规等文教用品。

电影业特别兴盛，先是在中华南路创办明星电影院，后在富水中路建群新电影院，在小十字建贵阳电影院，在大十字建贵州电影院，在中华中路建民教

电影院，放映国产片、外国片，看电影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热点，有些地方还放露天电影。最大的戏院是“黔舞台”和金筑大戏院，演出京剧、川剧、评剧、话剧。金筑大戏院白天演戏，晚上放电影，京剧的“管家班”和川剧的“天曲社”最为走红，麻子红的马戏团红极一时。照相业悄然兴起，曾氏兄弟的艺术社，以艺术人像为特色。

火柴是重要的日用必需品，没有火柴不能生火做饭，不能点灯照明。过去贵州所用的火柴都是由外地运来，贵州企业公司创办贵州火柴公司后，所产舞龙牌安全火柴、飞马牌硫化火柴、小安全火柴、民三火柴、贵州牌火柴极为畅销，加之其他几家火柴厂，不仅满足贵阳的需要，还大量外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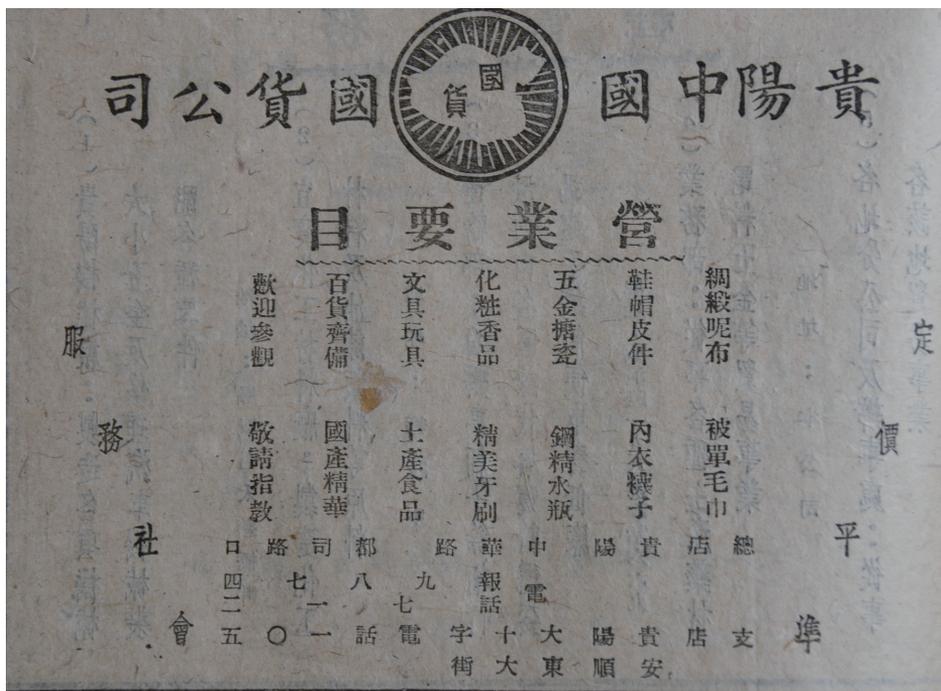
贵州引种美烟成功后，烟草业勃然兴起，民间办起了欧亚卷烟厂、利亚烟厂、金筑烟厂、南明烟厂，香烟不但可以自给，而且大量外销，成为一种新的商业行业。

1944年，上海人蔡健安在贵阳中华中路开设上海时装公司，聘请技艺高超的师傅，招考培训技术工人，根据潮流缝制各种时装，新颖时髦，上衣特别讲究针法，顾客如不满意可以退款或重做，顾客盈门，应接不暇。

贵阳金银首饰业有丁兴隆、宋华丰、聚宝斋、宝富斋、宝兴斋、喻古星、袁裕主、汪裕泰等十多家，首推丁兴隆金号和宋华丰金号，真金白银，信誉度高，两家都设在中华路上。

钟表业有亨得利号、西门子公司等，亨得利贵阳钟表眼镜行，专销瑞士手表和各种眼镜，兼营唱机、唱片、钢笔。大十字中心有四个钟面的钟亭，据说这座钟是西门子钟表店邱姓老板出资，由宁波师傅姚斌制造的。当时这座钟是个新玩意儿，算是给贵阳城市增加了点现代气氛。过了几年，时钟内部机械失灵，钟的指针四面不同，于是贵阳开始流传一句歇后语：“大十字的钟——各走各的路。”

内迁贵阳的企业给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各方面变化，或扩大规模，或开启新的行业，或改变经营方式。贵阳原先也有几家百货店，如永丰泰、陈



贵阳中国国货公司广告

兴隆、刘源春号，但规模不大、货源不多。贵阳商业最引人注目的企业是贵阳中国国货公司。该公司初期由上海联营公司、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贵州省政府为主组成（后来贵州省政府变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38年12月25日成立，设址于贵阳盐行街，以销售国货为特色，主要出售毛巾、袜子、被单、玻璃、绸缎等以及其他日用百货，成为贵州最大的百货公司。

股份制企业在贵阳的出现，标志着贵阳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走向现代商业。这一时期的股份公司还有：运输业中的贵州商办汽车联合股份公司、贵阳中国联运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汽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运销业中的贵阳交易介绍股份有限公司、中兴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同丰商贸股

份有限公司，金融业中的贵州银行、聚康银行，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年，因外地搬筑商号纷纷迁回原地，抗战期间来筑移民大批复员，一下子热闹的商业区骤然“降温”，市场变得冷清起来。广东街成为黄金、白银、棉纱、布匹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市场，江西帮、湖南帮、贵州帮各有活动场所。大十字的黑羊井（新华书店对门，原百货大楼旧楼侧）成为银圆的黑市市场，许多穿长衫的人利用袖子里数指头的把戏，做银圆黑市交易，货币贬值，人心惶惶不安，人们提着成捆的、扛着成袋的钞票来换银圆。

（三）战时农业

长期以来，贵州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

1938 年 4 月 1 日建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简称农改所），专门负责改进全省农业。该所以油榨街原省立林场作为本部。原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林学家皮作琼任第一任所长。所内设置的八个系分别为：农艺、森林、畜牧兽医、柞蚕、农业经济、植物病害、经济昆虫、农业工程。除设在油榨街原省立林场的本部外，农改所还设有施秉美棉繁殖场、遵义柞蚕试验地，以及省直辖联合农场、血清制造厂、马车制造厂、农艺实验场等。贵州农改所从成立到抗战胜利，在推动全省农村与农业经济发展上做了不少工作，尤其在研究与改进贵州农业技术、森林保护、发展蚕牧、推广兽医、改良农作物品种、优选苗木、加强防疫，以及培养训导省内农业技术人员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这对改变长期封闭于崇山峻岭中、世代恪守传统耕作方法的贵州农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在美烟的引进、倡种与推广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清代中叶，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迁居贵州的居民带来了烟种，在贵定试种成功后，逐渐成为该县主要栽种经济作物。抗战前，贵州的烟产量已居全国第四位。但由于农民所种均为土烟，质地欠佳，尽管产量多，原料方便，但仍未成为卷制香烟的原材料。

1938年，农改所通过贵州省政府与广西省政府交涉，引进了美国烤烟种，并采集本省土烟65种，以及山东、广西等省的一些烟种，进行品种培育比较试验，经过多次试验比对，农改所的科技人员认为在贵州种植美国“佛州黄金叶”烤烟种最好，该烟叶叶脉细，叶片平，植株高大，单位面积产量比土烟能增产一倍以上，且色香味俱佳，不仅优于土烟，且超过美国本土的烤烟。

1940年，农改所与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由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经费，省农改所负责提供技术和种子，在全省推广美烟，并聘请技师来黔指导农民种烟和烘烤烟叶的方法。农改所以低价向农民提供烟苗、建立标准烘烤房，传授烤烟分级打包、评定标准等知识。从此，烘烤烟叶取代了晾晒烟叶的方法，为发展贵州烤烟奠定了良好基础。

抗战后期贵州烤烟种植面积达到40多万亩，年产量20多万斤，烤烟已成为贵州农业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在农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烟叶产量在云贵川三省中已居第一位，截至解放前夕，贵州烤烟与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齐名，是中国四大烤烟生产基地之一。

美烟的引种，还推动了本省制烟工业的迅速发展。1940年7月，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迁黔的汉口中国青年协记烟厂合作成立了“贵州烟草公司”，用美烟叶为原料制成了“企鹰”“老刀牌”“金骆驼”等香烟，并远销长沙、桂林、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因香味和可燃性俱佳，颇受消费者欢迎。美烟的引进倡种和随之而来的制烟工业的发展，成为贵州的主要财源，直至今日，烟草事业仍是贵州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和重要财源，在贵州国民经济总产值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烤烟引进与大面积推广外，抗战时期贵州的农业的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典型的表现为：改良和引进了一批水稻、棉花、大豆、马铃薯等良种，推广了各种蔬菜、花卉、绿肥作物；贵州森林植物得到了普查，进行了大批经济林木的移植试验，扩大了林木种植；推广了家畜杂交繁殖与疾病防治；进行了农具改良，蚕桑、茶叶种植研究。成立了贵州农学院和省立贵阳高等

农业职业学校，以及省立江口、锦屏、湄潭等农林职业学校和农业教育机构。此外，农田水利、战马养殖、农副产品生产等方面，在这一时期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四）战时金融

抗战前贵阳金融业居于全国落后地位，全省只有 2 家近代金融机构在贵阳设分行，即中央银行贵阳分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贵阳分行。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内迁金融机构迁入贵阳，贵阳的银行业发展迅速。

在贵阳开设的银行多达 30 余家，国家级银行有中央银行贵阳分行、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中国农民银行贵阳分行、邮政储金汇业总局贵阳分局、中央信托局贵阳分局、农本局贵阳专员办事处；外省地方银行有广东省银行、湖南省银行、广西银行、昆明银行。浙江省银行和福建省银行也在贵阳设办事处。许多著名商业银行也在贵阳设立分支机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贵阳分行，这是外省最早在贵阳开设的商业银行；还有中国国货银行贵阳分行、聚兴诚银行贵阳支行、四川美丰银行贵阳分行、亚西实业银行贵阳分行、利群银行贵阳分行、大川银行贵阳分行、大同银行贵阳分行、福锂银行贵阳分行、和成银行贵阳办事处、重庆商业银行贵阳办事处、云南兴文银行贵阳分行、云南实业银行贵阳分行、云南益华银行贵阳办事处、昆明商业银行贵阳分行、复兴实业银行贵阳分行、醴陵农民银行贵阳办事处。

银行业已成为贵阳的一大行业，1938 年 7 月成立的贵阳银行业同业公会成为贵阳商会的重要行业分会，主要职能是开展金融市场及银行营业状况调查，草拟金融业的规章制度，传达财政部、省政府有关文件和决议案，增进金融事业的公共利益及规划，调节同业相互间的争议，举办金融界共同关心的活动等。

1941 年成立贵州银行，采取股份制经营，资本总额初定为 600 万元（法币），分为 12000 股，每股 500 元，由贵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贷款给贵州省政府做银行专用基金，其余由富商认购商股；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聘请总经理和协理负责经营；设业务部和信托部，办理存款、贷汇兑、信托等

年有股东 53 户。1948 年 8 月，改定资本为金圆券 35 万元。聚康银行股东多为贵州盐业巨头，业务以仁、永两岸川盐运销处及利民盐号为主，并为各盐号担保向国家银行借用低息贷款。王伯群、刘玩泉、伍效高历任董事长；刘玩泉、刘熙乙、孙蕴奇、邓若符历任总经理。聚康银行在与盐业运销有关商埠及重庆、贵阳、安顺、上海、汉口等地设有分行；在广西梧州、湖南长沙设支行，在四川五通桥、内江和省内都匀、毕节、盘县、赤水以及广州设办事处。1948 年，该行常务董事刘玩泉、刘熙乙先后涉案被捕，又值国民政府币制改革，该行经营困难，濒临倒闭。虽经在黔主要股东伍效高、帅灿章等筹集黄金约 600 两、银圆 13000 余元维持，但仍无起色，业务每况愈下，于 1949 年 10 月清理结束。

贵阳的银行多集中在正新街和省府路上，正新街上有中国国货银行、福钰银行、云南益华银行、复兴实业银行。省府路上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聚康银行、四川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西南实业银行、大川银行、昆明实业银行，可谓是贵阳的“金融一条街”。

十三、“文化重镇”贵阳城

沦陷区大学、文化机构和科研院所迁往贵阳，推动了贵阳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了贵阳的文化品位，使贵阳文化跻身于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的前列。

（一）贵阳教育发展

日本侵略中国，不仅仅是占领了我国的大好河山，掠夺我国丰富的资源，奴役四万万同胞，还企图消灭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使中国“亡国灭种”。为了不让文化教育遭到破坏践踏，大批学校、文化机关纷纷内迁，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悲壮而又充满奋发不屈精神的文化大搬迁，可歌可泣，可圈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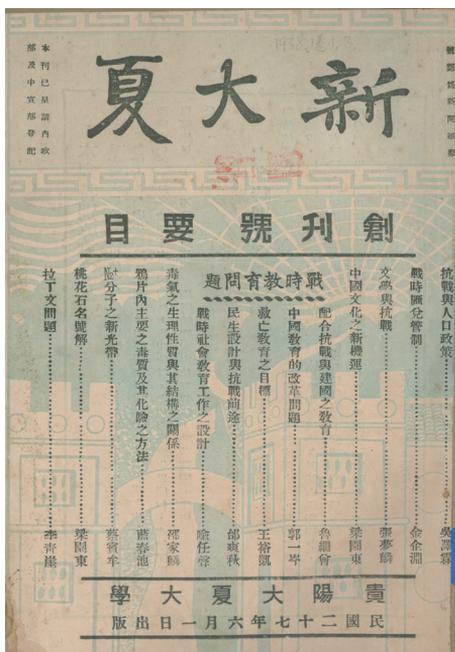
大量高校内迁，为贵阳带来了众多学术大师与高质量的学生群体，构建了贵阳文教事业发展的根基，极大推动了贵阳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私立大夏



私立大夏大学

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私立之江大学先后搬来贵阳。

最先迁入贵阳的是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大夏大学由贵州人王伯群创办，校名“大夏”意在“光大华夏文明”，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华东师大的前身。该校于1937年迁至贵阳，最初借南明河畔的讲武学堂为临时校舍上课，后来在花溪正式建校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夏元璠（北京大学原理科学长），社会学家吴泽霖、史学家翦伯赞、文学家谢六逸、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曹未风、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法学家湛志远等都曾在此任教。该校在校学生1450人左右，在贵州8年共有毕业学生1576人，大夏大学的毕业生为贵州各个行业提供了大量人才。1944年大夏大学迁至赤水，1946年迁回上海。大夏大学迁走前将办学经验、师资、生源和全部校舍拨给贵阳师范学院，为贵州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夏大学校刊《新大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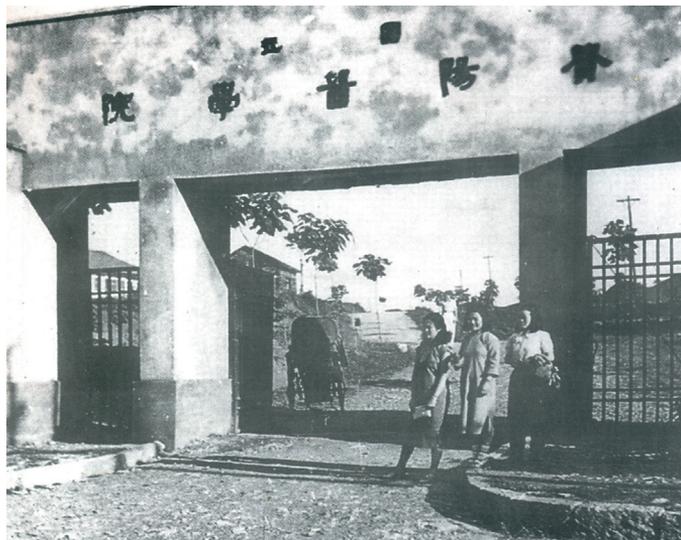


国立湘雅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原为中美合办，与协和医学院、齐鲁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成都华西医学院齐名，1940年改为国立医学院，内科专家张孝骞任院长。1939年4月，湘雅医学院迁至贵阳次南门外的石洞坡，租借贵州湖南商会“长沙义园”建临时校舍。初到贵阳，湘雅师生一无所有。为保证教学工作的延续，湘雅医学院只得借用位于贵阳阳明路贵阳医学院的教室上课，贵阳医学院的帮助与支持使两校结下深厚友谊。1941年，湘雅医学院与贵阳医学院共同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并呈报教育部备案，在长沙、沅陵、衡阳及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分设考区。现在的贵阳医学院将湘雅医学院的张孝骞教授列为该校的创始人之一，足见贵阳医学院与湘雅医学院在抗战时期所结下的笃厚感情。

私立之江大学原设在杭州，有工学院、商学院和文学院。1943年之江大学工学院迁到贵阳花溪，下设土木、建筑、机械、化工四系，有学生一百人，1944年迁至重庆，1945年迁回杭州。

除内迁大学外，贵州本土的高等教育也得到发展。七七事变后，北平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不少师生撤退到武汉，1937年决定创办国立武昌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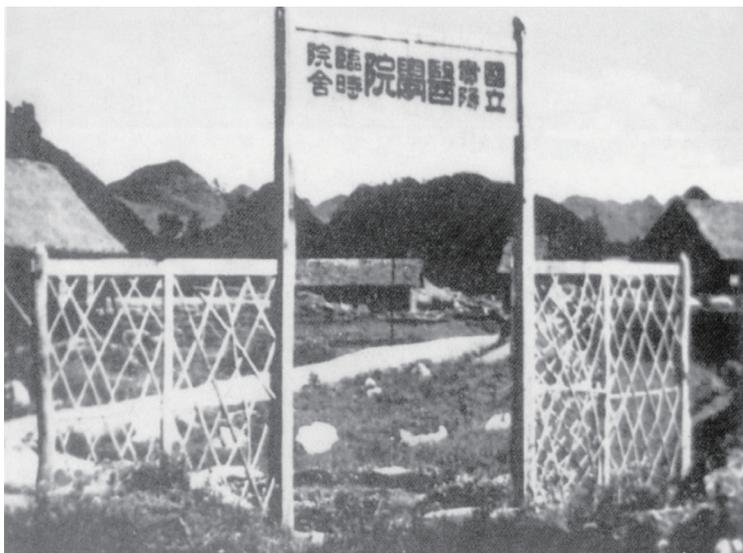
国立贵阳医学院



院，并在武汉、长沙、重庆等地招生。不久武汉战事吃紧，教育部决定将武昌医学院改为国立贵阳医学院，1938年迁往贵阳。医学院设有五年制医学本科，附设医事职业学校及医院，聘任李宗恩博士为院长。学院先以阳明路两广会馆和三圣宫为临时校舍，又划拨南郊太慈桥一空地建新校舍。1941年学院创办了附属医院。该校云集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一批医学教授和医生，包括贾魁、杨济时、杨崇瑞、尹觉民等医学专科大家，首创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

1941年6月，民国政府决定创办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同年7月，聘任重庆大学教授王克仁为院长，开始筹备工作，暂借贵阳文化路省立贵阳师范学校部分校舍，于1941年10月20日开学。内迁的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系一至四年级学生，全部转入“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修业。大夏大学迁走后，其校址被拨给国立贵阳师范学院。1946年9月，学院迁入雪涯路原大夏大学校舍。作为贵州省第一所培养中学教师的高等学府，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为培养师范人才作出了贡献。

1939年，贵州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贵州大学，经教育部考察



国立贵阳医学院
临时院舍

认为贵州尚不具备建综合大学的条件，决定先建一所农工学院。1941年9月正式建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水利专家李书田为院长，选址在花溪（原贵州农学院旧址），时值私立大夏大学经费困难，要求改为国立大学，蒋介石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顺水推舟，宣布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等坚决反对，但成立贵州大学的文件已经下达，只好以贵州农工学院加以扩充，于1942年正式建立国立贵州大学，教育部司长、贵州人张廷休任校长。

抗战期间，上海私立大夏大学、长沙国立湘雅医学院、杭州之江大学工学院以及在贵阳建立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大学6所高等院校汇聚贵阳，使贵阳成为贵州高等学校最集中的城市。

高等教育的兴起，推动了贵阳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初中等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发展，使贵阳教育体系更为完善。

抗战前，贵阳的职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从1937年起，贵州省政府和教育厅先后制定颁布《贵州省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章程》《贵州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办法》《贵州省推进职业教育计划》等法规，贵阳地区的职业学校迅速发展，涵盖农、工商、医与贵阳经济发展需要的行业。这一年，省立初级职业学校易名为省立贵阳职业学校，办高级职业科。1939年，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成立。1940年，贵阳医学院医事职业科改名为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原省立贵阳高级职业学校易名为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并新成立了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3年，贵阳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成立，中国护士学会也于同年开办贵阳私立黔筑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46年，增设省立贵阳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48年，私立尚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由广西迁到贵阳。

抗战前夕，贵阳市有中学8所，在校生2930人。抗战期间，贵阳中学教育有较大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学达到18所。1949年贵阳解放前夕，全市有普通中学24所，在校学生4036人。贵阳国立中学有：国立十四中、国

立贵州战时中学、国立贵阳青年中学。省立中学有：贵州省立贵阳中学、贵州省立贵阳高级中学、贵州省贵阳女子中学、贵州省立清镇中学、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贵州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私立中学有：清华中学、达德中学、博群中学、南明中学、正道中学、导文中学、西南中学、豫章中学、力行中学、永初中学、宏雅中学、程万中学、两广中学。其中，豫章、宏雅、两广3所中学为会馆创办，程万为教会创办，其余为私人创办。

贵阳近代最早出现的小学，是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寻常小学堂和民立小学堂。1915年，贵阳市城内有省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19所，学生近1700人。到了1941年，贵阳市市立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私立小学共49所，学生12877人。贵阳著名小学学校有：私立达德小学、私立志道小学、私立正道小学、私立蕴贞女子小学、私立复旦小学、私立正道小学、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贵阳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贵州省立实验小学、贵州省立高坡小学。

幼儿教育有贵州省第一所专门的幼稚教育机构——省立贵阳幼稚园，以及私立敬一幼稚园、私立静波幼稚园。青岩办过乡村教育、社会教育实验区，开办贵州省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讲习所。

（二）活跃的抗战文艺活动

随着这批学校的迁入和贵阳高校的成立，省外十多家书店（书局）迁入贵阳，对开启贵阳民智、增加文化气氛大有好处。1938年，全国著名的开明、生活两家书店开设贵阳分店，原设南京的军用图书社迁来贵阳；1939年，总店设在新亚书店贵阳分店开业，由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联合经营贵阳读新书店开张。此外，正风书店、正中书局贵阳分局等都是由外地人在贵阳开办的书店。

许多教授、学者、专家以及研究机构驻足筑城，或在此工作，或经此转赴他处。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戏剧家田汉、安娥、熊佛西等，翻译家李青崖、曹未风，书画家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沈逸千、赵少昂、商承祚，音乐家马思聪、王慕理、王人艺等，电影演员胡蝶、谢添，学术大师陈寅恪都曾来到贵阳。

其中，画家徐悲鸿曾于 1937 年、1942 年、1944 年三次莅临筑城。

方敬，四川人，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抗战期间，任贵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兼任《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主编，并与吕荧等创办《时代周报》。他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也曾发表小说《乡下》等，歌颂抗日英雄，揭露社会黑暗。巴金在抗战期间一度寓居花溪，并在此与萧珊结婚。在筑期间，他创作了《生与死》《妇与夫》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憩园》的大部分，并以自己在贵阳某医院的经历为素材，创作小说《第四病室》。李青崖，湖南人，抗战期间来筑，任大夏大学中文系主任。翻译出版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作品选》。齐同，本名高滔，东北人。大夏大学教授，贵阳中学国文教员。出版长篇小说《新生代》，反映北平一二·九运动，读者争相购买。萧乾，路过贵阳，写有《贵州书简》《湘黔道上》。茅盾，路过贵阳，写有《贵阳巡礼》《司机生活片断》等散文，在贵阳报刊上发表。

在全国享有盛名的贵阳籍作家谢六逸、社会教育家马宗荣，以及遵义籍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也在抗战期间返回贵阳，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著名文化人的到来，使山城贵阳的天空，增添了耀眼的文化星宿。贵阳文化一扫昔日封闭、冷清、活动范围狭窄、影响面不广的景象，出现了一派生机、全面繁荣的局面。

文化团体不断涌现，社会文化设施增多，文化活动频频举办，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曲艺、杂技、舞蹈、电影、报纸、杂志、广播、出版等文化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达到空前境界，文化成为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如文化团体，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官办的有社会部贵阳社会服务处艺文社、党风剧社、测光剧团等；民办的有 1937 年 8 月由丁树琦、谢凡生、刘方岳、丁慰慈、何冠群、马空群等 29 人发起组织的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1940 年 2 月由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吴道安、田君亮、齐同、刘薰宇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1938 年 12 月由蒲定安、高滔、孙立斋等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等。



从报纸来看，1937年4月，本地出版的报纸仅有《革命日报》《贵州晨报》《黔风报》《民众日报》《民生日报》5种；1938年汉口的《武汉日报》迁来贵阳，更名《中央日报》（贵阳版）出版；接着是1944年湖南的《力报》《大刚报》《大华晚报》搬来筑城印行；南京的《朝报》也迁到贵阳，更名《民报》复刊。报纸众多，风格各异，为读者提供了口味不同的精神食粮。1944年，据不完全统计，贵阳已有《贵州日报》、《中央日报》（贵阳版）、《大刚报》、《力报》、《民报》（晚刊）、《贵州商报》、《大华晚报》、《南明晚报》、《黔灵晚报》、《天下报》、《商情报》、《诚报》、《立言报》、《火柴头画报》等14种，这年是抗战期间贵阳报纸最多的一年，种类几乎达到战前的3倍。

在杂志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文艺刊物或与文艺有关的刊物，就有《文讯》（月刊）、《文风杂志》、《七七》（半月刊）、《十日旬刊》、《抗敌》等34种。贵阳在1944年人口最多时不过30余万人，如按平均人口计算，当时杂志出版的盛况，用今日的眼光来衡量，也是令人惊叹的。

在文学方面，首先，很多人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贵阳各大报纸文艺副刊众多，办得活跃、生动。《革命日报》先后辟有《朝曦》《晴岚》《文化抗战》《革命军》《新垒》等文艺副刊，《贵州晨报》辟有《每周文艺》《怒芽旬刊》《突击队》等文艺副刊，《中央日报》（贵阳版）辟有《前路》《文艺周刊》等文艺副刊，《贵州日报》辟有《大十字》《骆驼》《新垒》等文艺副刊，《力报》辟有《文艺新地》《动与力》等文艺副刊，《大刚报》辟有《阵地》文艺副刊。1938年3月《革命日报》的《小小拳头》副刊，发表过小学生冉隆经的《战士颂》、小学生邓宗岳的《学学汪踣》，小学生也拿起笔作刀枪，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说明抗日文化之深入。

其次，文学成果迭出。1940年谢六逸出版了《日本之文学》，1942年蹇先艾出版了《乡谈集》，著名词学家吴梅先后出版了《霜崖诗录》《霜崖词录》《霜崖曲录》《南北词间谱》，陈安仁出版了《中国文化演进史观》，卢前出版了《卢冀野诗抄》，黄尧出版了《漫画贵阳》。

最后是稿源广，稿件来自全国各地。1939年《革命日报》曾设《国立艺专抗战画展特刊》，当时国立艺专在四川；同年该报《革命军》副刊连载过向培良的《大时代的插曲》（话剧），稿件寄自湖南长沙；1945年6月10日《大刚报》的《阵地》副刊发表过茅盾的《谈春暖花开的时候》，当时茅盾先生也不在贵州。

在戏剧方面，由于戏剧具有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生活气息浓、群众喜闻乐见等特点，易于为抗战宣传服务，各种戏剧，特别是话剧、京剧、川戏在这一时期都得到较快发展。

话剧团体中专业团体和业余团体相继成立。专业团体以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民众剧团最著名，该团1940年4月成立，1945年改组为民教剧团；业余团体以沙驼业余话剧社、狼火剧团、华生抗日救国话剧社、力行剧社、贵大剧团等较著名。当时话剧经常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生死关头》《国恨家仇》《刘汉卿的秘密》《在关内过年》等数十个，洪深的《包得行》，田汉的《扬子江暴风雨》，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少年游》，曹禺的《日出》，这些名剧都曾在贵阳舞台上演出。话剧演出将方言改为国语（即普通话），提倡男女同台演出，开始注重舞台布景，创造配音演出。

京剧方面，由于外地的杜文林京剧班、厉家班、四维儿童戏剧训练班纷纷来筑，名角云集，各献其长，演出活跃，使贵阳成为抗战时期大西南京剧表演的中心之一。1945年2月15日为戏剧节，在召开纪念会时还确定该月22日至28日为贵阳市戏剧运动周，这不能不说是贵阳戏剧的一大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因为有著名文化人的倡导，有众多集会作为阐述主张的讲台，文化界学术氛围与往昔相比，探讨、研究之风盛行。在贵阳的讲台上，竺可桢演讲过《宇宙与人生》；谢六逸演讲过《战前上海文化界状况》；熊佛西演讲过《今后戏剧的趋向》；在贵阳的报纸上，常书鸿发表过《抗战画展与后方宣传》；在贵阳的舞台上，田汉参加演出过吴祖光的《少年游》。

翻译家曹未风于1942年在文通书局翻译出版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全集》，



殷炎麟翻译出版了美国培林革的《西洋戏剧史》。如果说，在抗战前贵阳的读者对世界戏剧还相当陌生和肤浅，可以说在抗战中贵阳读者已开始系统认识世界戏剧的辉煌。

在抗战中，许多未曾有过的新事物、新景象在贵阳出现了。如 1939 年著名相声演员欧少久携其弟子来贵阳演出《大闹公堂》《卢沟桥之役》，为相声传入贵阳之始。电影开始上映彩色影片，结束了单纯上映黑白片的历史；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在吴泽霖、陈国钧两位先生率领下，深入贵阳苗乡仲寨（今称布依寨）及定番（今惠水）、安顺、炉山（今属凯里）等地调查，汇集调查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民族学论文集》《炉山黑苗的生活》《苗胞影荟》《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多部著作。《贵州日报》曾辟有《社会研究》副刊数十期，先后发表《大花苗名称来源》《苗舞与中国古代乐舞》《安顺苗夷岁时志》等多篇文章，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全国文化和地方文化汇合，活跃了贵阳的抗战文化，提高了贵阳的文化品位，抗战时期贵阳文化跻身于大后方文化的前列。

（三）全国七大书局之一——贵阳文通书局

贵阳文通书局筹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 年），系贵阳人华之鸿（号延仪）独资创办，经理为田庆霖。拥有日本生产最新铅印、石印全套机器设备，职工百人左右，资金总额白银 20 万两。

该局铅印的第一部线装书是宣统二年（1910 年）出版的郑珍辑录的《播雅》。宣统三年（1911 年）10 月，书局在王家巷正式对外营业。民国初年，该局已能印刷古今书籍、报纸、杂志、票证、五彩挂图、商标、广告、名片、信笺等。当时印刷的“黔币”，构图细致，印刷精美。文通书局是 1949 年以前贵州省最大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同时也是贵州最早引进和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

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系统出版了《经世社丛书》《大学丛书》《新闻学丛书》《国际时事丛刊》《教育丛书》《语文学丛书》《文艺丛书》《医学丛书》

《中学辅导丛书》《边疆问题丛书》，以及世界名著、地方文献、中小学教科书、各种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同时还编辑出版有《文讯》（月刊）。此外还承印政府公报、日报、期刊多种。特别是1922年至1941年期间，陆续出版了贵州文献征辑馆编辑的《黔南丛书》1~6集和别集，共70册。这部丛书除收集明清时著名黔人著述外，其他省外名人有关贵州省的记载也收集在内。这对研究贵州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学、民族习俗等方面都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1941年6月，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扩大书局组织，增设机构，设立总管理处，成立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著名社会学家马宗荣为所长，著名作家、大学教授谢六逸为副所长。编辑所在马、谢两所长主持下，设立112人的编审委员会，均来自政商界和内迁高校、科研机构。其中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都有不少教授专家参加。编委中知名人士不少，如张道藩、冯友兰、张孝骞、竺可桢、苏步青、茅以升、陈建功、王伯群、潘公展等。因此，有评论说，“文通”编辑所的编审队伍，只有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才能与之媲美。这些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先后编辑出版《大学丛书》《大教育家文库》《苗夷研究丛刊》《经世社丛书》等众多重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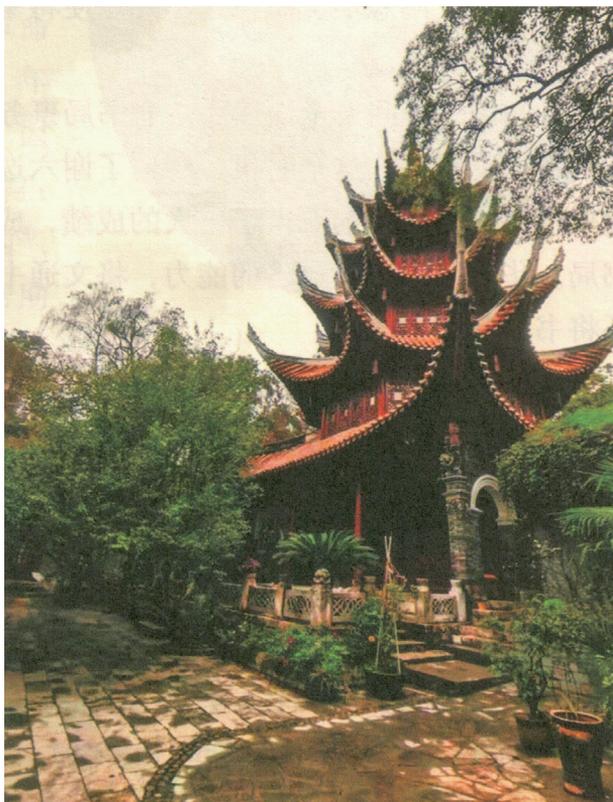
1943年，为了扩大发行销售中小学教科书业务，华之鸿同意马宗荣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联系，参加成立“七联处”（即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七家为：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及文通书局），文通书局被教育部指定为印制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单位，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虽然文通书局在“七联处”中印刷教科书的任务最少，但面对贵州及周边地区的教材需求，印刷数量也相当可观了。文通书局先后在昆明、重庆、成都、长沙、上海、广州等设立分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著名学者顾颉刚、白寿彝被聘为文通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1947年下半年，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文讯》月刊。文通书局编辑所也几经迁移，最后落户上海。1952年4月，贵阳文通书局并入

贵州人民印刷公司。

（四）贵州首家广播电台

贵阳市广播事业是从接收设备逐渐普及开始的。20世纪初，贵阳市只有少数收音机接外地广播，限于少数达官贵人和军政首脑机关使用。当时发射机的功率较小，接收距离较远，再加上收音机灵敏度不高，收听时需架设室外天线。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收音机，几乎全是国外生产直流电子管式，贵州全省的拥有量不超过50台。20世纪30年代后期，广播电台在贵阳建立，全省收音机拥有量逐年增加。截至1945年上半年，全省有收音机305台，一半以上在贵阳市。



民国贵阳广播电台
旧址华家阁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坚固播音壁垒”，对敌人（指日寇和汪伪军）实施有效的广播和获得有力的国际同情，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拟设昆明及贵阳广播电台，以供战时宣传之用。1938年4月成立贵阳广播电台筹备处，次年1月1日贵阳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贵阳广播电台的短波发射机功率较大，其电波传送可达数千千米之外，其覆盖范围除全国大部分城乡外，还可传送到南洋一带。因此，电台用国语、英语、马来语向东南亚广播，用客家语、沪语等向沿海各地播音，成为影响力仅次于中央台、国际台、昆明台的广播电台。贵阳广播电台台址是租用电台街22号华问渠的私房——华家祠堂，一般称作华家阁楼，后将街道名改为电台街。

建台初期，发射及播音室都在一处，为防备空袭，1939年由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拨款，于小团坡（现半边街106号501台所在地）购买土地，着手修建新台，不久将发射部分迁往新址。新台址占地31亩，有房屋11间，播音和办公仍在电台街。

（五）社会教育“五大馆”建立

抗战时期，贵阳文化教育蓬勃发展，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建立了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省立科学馆、贵州省艺术馆、贵州物产陈列馆。

1936年设立的贵州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简称“贵阳民教馆”），隶属于贵州省教育厅，在全省起到示范作用。馆址在今中华中路西侧原人民剧场处。该馆设有剧院、运动场、茶室、图书室、阅览室、卫生室、眼病诊疗室、卫生教育展览室，开展了一系列“为民众服务”业务，如问字、代笔、法律顾问、科学指导、卫生指导、旅行咨询、荣誉军人及家属服务工作，还指导公共食堂、茶园、理发室、浴室、厕所的建设和经营。1940年，贵阳民教馆举办了说书艺人培训班，帮助民间艺人提高知识水平和表演技能。贵阳民教馆积极推广篮球运动，每逢星期日，都在馆址侧边的篮球场举办“星期篮球赛”，贵阳各机关、学校、军队、民众团体都组织篮球队参加比赛，持续了多年。贵阳民教馆每周



贵州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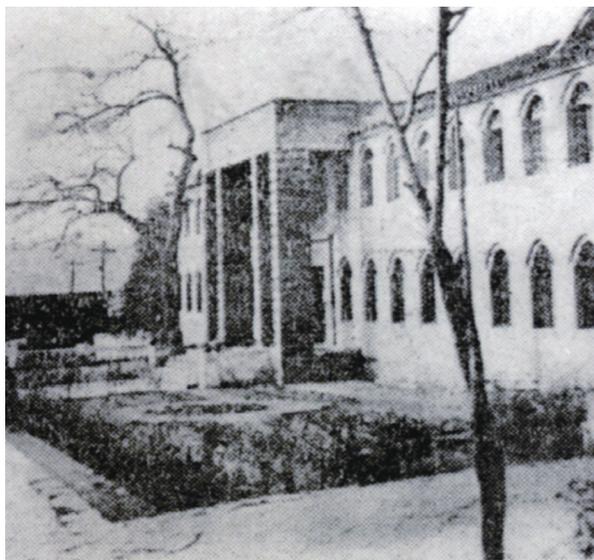
放映一次幻灯片，普及科学知识，放映三场露天电影，后来还成立“民众电影院”对外营业。贵阳民教馆成立了民众歌咏队，传唱抗日歌曲，又成立“民教剧团”，演出话剧。

1944年，桂林失守，大批文化人来到贵阳，剧作家田汉在贵阳排演吴祖光的《少年游》，并在贵阳民教馆剧场公演。之后，《少年游》的演出班子并入“民教剧团”，改建为半职业性质的话剧团，罗军、麦放明等一批专业剧人加入了剧团。剧团延续了10年之久，演出了夏衍的《离离草》《芳草天涯》，曹禺的《雷雨》，吴祖光的《嫦娥奔月》《林冲夜奔》，老舍、宋之合编的《国家至上》和沈游的《重庆二十四小时》等10多部话剧，还将许多世界名著改编为话剧，如小仲马的《茶花女》、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贵阳解放后，在“民教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贵州话剧团。

贵州有公办的图书馆始于1913年，名称是贵州图书馆，地址在贵阳梦草公园内（今恒峰步行街附近），创办人和馆长是贵阳人陈矩。

馆内收藏清末贵州官书局和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图书，藏书不丰。据1917年统计，有旧书900余本，新译书800余本，外文书50本，图书总共不到2000本，实在少得可怜，甚至比不上贵阳当时有的私人藏图书。然而，它毕竟是贵阳图书馆事业的开端，难能可贵。

1936年，贵州省政府决定成立贵州省立图书馆，初选地址在贵山书院（今省府路贵山饭店）。后来又改在了清末粮道署旧址（今科学路原省文联院内），将一座日字形大楼改建为图书馆楼。贵州省立图书馆设有图书阅览室、研究参考室、杂志阅览室、报纸阅览室，后来又增设了儿童阅览室、外文阅览室、特藏室、地方文献室、善本图书室和借阅处，可同时供300余人阅览。馆内先是接收了教育厅图书室的2500册线装书，继又在南京、上海购回500多册新书，增订各种报纸、杂志。1940年，在大夏大学社会部的帮助下，收集了一批地方文献和民族调查资料及名人字画。1945年，接收贵山书院全部图书和美军移交的外



贵州省立图书馆

文图书，并向社会发起征募图书的活动，最后共藏书 52277 册。其中古籍线装书 18994 册，科技图书 2367 册，外文图书 392 册，文艺图书 28031 册，报刊合订本 2493 册。另有馆藏书画、碑拓、照片 1586 件。贵州省立图书馆每天开放 12 小时，夜间也可阅览，而且经常举办各种读书活动，读者人数持续增长，每年接待读者 8000 人次，到 1948 年入馆人次已经达到 18 万人次。

1938 年 4 月，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图书西迁至贵阳。教育部令贵州省立图书馆妥善保管。这批国宝级别的图书先是存放在贵州省立图书馆书库，不久转移到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1939 年 2 月 4 日，贵阳遭到轰炸，为了安全起见，贵州省立图书馆于当年 4 月 8 日将这批图书搬至贵阳北郊许官溪镇金鳌山地母洞，采取安全、防湿措施，按时晾晒，完整保存了 5 年 8 个月。1944 年，教育部令将这批图书迁往重庆。《四库全书》在贵阳得以安全存放，是贵阳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

1938 年，贵州省政府为普及科学知识，发展科学教育，决定在贵阳建立贵州省立科学馆。次年 8 月成立科学馆筹备处，以蓝春池为筹备处长，周诒春、夏元瑰为筹备委员。周诒春是留美教育家，曾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燕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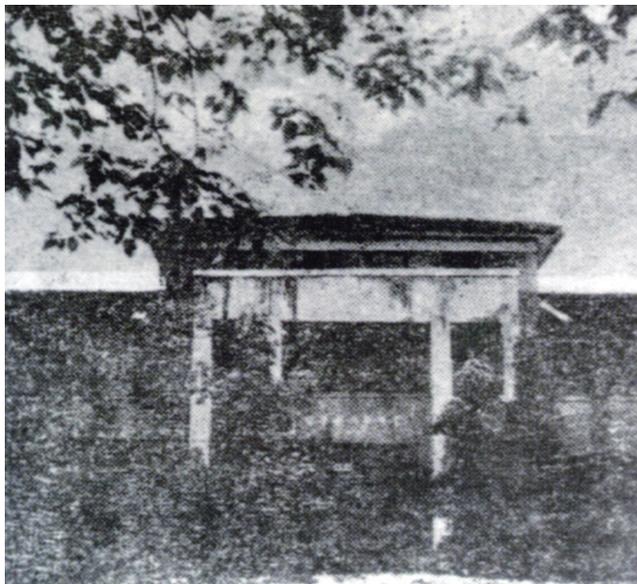


存放在贵阳北郊地母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代理校长、实业部次长，抗战期间任贵州财政厅厅长。夏元瑰原是北京大学理科学长、著名物理学家，抗战期间任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在“管理中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贵州省立科学馆在醒狮路（今科学路）修建大楼，与省立图书馆、省立艺术馆构成了一个科学文化建筑群。省立科学馆处在这个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主楼建筑平面为横列“工”字形，中部较高，两翼向前外伸，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建筑。进口处是宽10米、深5米的四柱平顶门楼，左侧二楼为阶梯式演讲厅。

省立科学馆设有若干陈列室，陈列生物标本、矿物标本、建筑模型、飞机引擎、炸弹模型，还有各种理化仪器、科教幻灯及参考书籍。

贵州省立科学馆隶属于教育厅，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普及教育，陈列各种标本、模型供人参观，举办科学讲座及展览等。就在科学馆成立的当年，“中华自然科学社贵阳分社”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科学团体，以“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贵阳分社有社员60人，均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以科学馆为



贵州省立科学馆

依托，“中华自然科学社贵阳分社”举办各种自然科学演讲会、座谈会，进行科学常识测验，协助科学馆普及科学知识，出版自然科学刊物。1943年，省立科学馆与国立中央化学研究室合作，组建贵阳化学实验室。1949年，将贵州省科学仪器厂并入。195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省立科学馆改建为贵州省博物馆。

1943年，应著名文学家谢六逸的倡议，贵州省政府决定成立贵州省立艺术馆，馆址在醒狮路（今科学路）科学文化建筑群右侧。省立艺术馆是一座平面为工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立面造型新颖别致，正面墙体设计为三个方块组合，中部略高，有通连两层的入口门窗，其余为实体墙面，虚实对比较强，富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展厅平面为T形，参观者可沿墙环行，T形交叉处设有讲台，亦可作为小型表演舞台，利用梁间高窗采光，获得了可以陈列展品的整块墙面。艺术馆的任务是开展艺术活动，组织艺术团体举办书画展览和音乐演奏会，推进艺术教育在贵阳的开展。省立艺术馆成立了艺术促进会，设有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下设总务部（设文书、会计、出版、交际、事务五股），美术部（设展览、研究二股），音乐部（设演奏、研究二股），戏剧部（设演出、研究二股）。首任馆长陈恒安是著名诗人、书法家，为人谦和宽厚，善于团结文化人。音乐家马思聪到贵阳后，陈恒安极力推荐马思聪继任馆长。

中外闻名、被誉为提琴圣手的马思聪，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马思聪偕夫人于1944年8月1日抵筑。贵州省艺术馆于8月5日举行艺术晚会，以欢迎由粤、桂来筑的文化界名流老舍、熊佛西、司徒慧敏、马思聪、张曙等。马思聪在晚会上演奏了《小夜曲》《流浪者之歌》。这是马思聪在贵阳市首次登台表演。其后，同月16日至18日，马思聪夫妇正式在贵阳举行第一次演奏会，这是贵阳乐坛难有的盛事。主要演奏的节目有：马先生自己创作的《西藏音诗》；孟德尔逊的《E短调协奏曲》《寂寞之夜》和《流浪者之歌》，还有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家的成名曲。演奏会票价一元一张，为当时贵阳的最高档次，但为一睹琴圣风姿，观众仍十分踊跃购票。

马思聪对演奏会持严肃之态，稍闻观众的咳嗽声，他是不开弓的。应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邀请，马思聪于1945年9月，继陈恒安之后，接掌黔省艺术馆任馆长。之后马思聪在贵阳举办的演奏活动有：1944年8月5日，参加省艺术馆主办的艺术晚会；1944年8月16日至18日，主办提琴演奏会；1945年10月2日，就任省艺术馆馆长后，主持贵阳市政府的音乐晚会；1945年10月27日至31日，主办提琴演奏会。

第三任馆长周稷是艺术家，第四任馆长杨秀涛是著名的油画家。贵州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桂百铸、秦元魁、方小石、王渔父、孟光涛、郭可、肖家驹、于世沅、朱石麟、严文炜、赵彤等都聚集于文化馆。

1946年，艺术馆国画、西洋画、音乐研究室招收学员，并于1948年发展为“贵州艺术专修班”，共设美术、音乐两个专业，专修班由馆长杨秀涛担任美术讲师，肖家驹、于世沅等为音乐讲师，前后两期培养学员60人，为贵阳乃至贵州培养了一批中小学美术、音乐教师，成为贵州艺术教育的先导。

省立艺术馆开展一系列艺术展览活动，尤以徐悲鸿画展和故宫博物院书画展影响最大。1943年元旦，徐悲鸿画展在省立艺术馆举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画奔马意蕴深刻，神形兼备，令人称奇。抗战爆发后，故宫博物院迁到西南。其中有一部分珍贵书画藏于安顺华严洞。1944年初，故宫博物院将珍藏的200多件书画在重庆展出，然后由重庆经贵阳运回华严洞。时任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恒安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决定在贵阳举办画展。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自4月13日至20日，第二期自21日至29日，共展出自晋迄清的书法、名画200余件。该次展览引起轰动，观者如云，实为贵阳城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举。

1930年“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在贵阳中山公园开展，展览不仅展出贵州工矿农商产品，还展出了手工艺品256件、金石书画247件、历史文物134件，并有川剧、京剧、电影及清唱、歌咏、杂耍、武术等演出。在此次展览的基础上，为了开发贵州资源，促进西南各省经济建设，1939年6月，中国西南实业协



会贵州分会、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议筹建贵州物产陈列馆。贵州物产陈列馆坐落在当时的科学馆右侧一座砖木结构单层建筑内，分左中右3个大厅，后有半圆形回廊将3个大厅连通，四周开设大玻璃窗，采光充足。

1941年“贵州物产陈列馆管理委员会”成立，由周治春任主任委员，聘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谭沛霖为馆长。陈列馆以“征集本省物产，设馆陈列展览，供社会人士观摩研究，借谋产品之改良发展”为宗旨，设有总务、征集、陈列、保管四部。陈列展览从开馆到1949年，前后9年，共展出了贵州的农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工业品及手工艺品，推动贵州开发实业，对宣传贵州、认识贵州起到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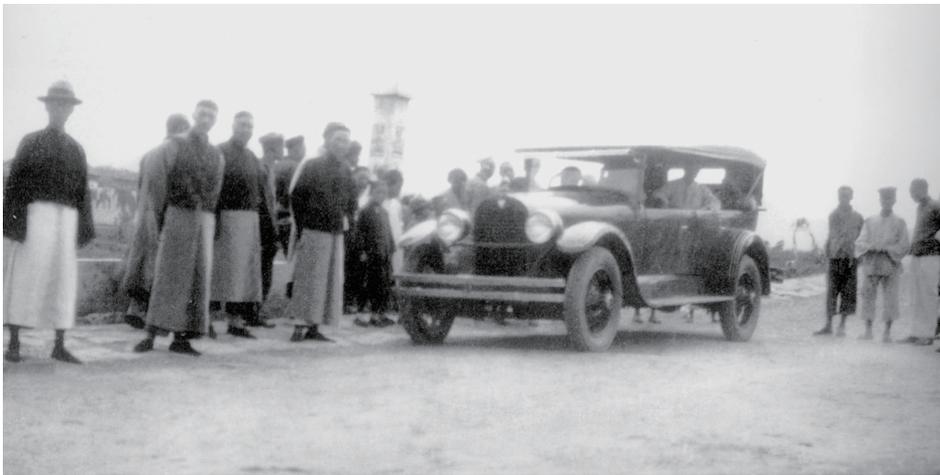


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正副会长及常务委员各馆馆长合影

十四、大西南交通枢纽

贵州的公路，无论是旧时的盘山公路，抑或是现代的高等级公路，都从贵阳开始，以贵阳为中心辐射全省各地。1926年，贵州省省长周西成在广州购买了一辆美国制造的雪佛兰轿车，因为贵州没有公路，只好拆成零件装箱，通过珠江水路运到三合（今三都）启岸，然后抬到贵阳。车到贵阳，万人空巷，夹道欢呼。第二天街上贴出布告：“汽车猛如虎，莫走当中路。若不听劝阻，轧死无告处。”

抬进来的汽车，便成了贵州修筑公路的契机。第一条马路是从省政府到世杰花园。“世杰”是周西成的字，他的官邸在今延安中路，人称“世杰花园”。因为这条马路必须经过北门，古老的城墙阻碍行车，于是首先拆除横亘在新、旧两城之间的北门城墙。接着修建的是环城马路，发动市民和学生修路，绕城墙一圈，也就是后来的内环城路。省政府拟定的《全省马路计划大纲》确定贵州公路以贵阳为中心，修建通往省外的公路。往湖南方向的为“贵东路”，通



周西成“抬”进贵阳的第一辆车

往云南方向的为“贵西路”，通往四川的为“贵北路”，通往广西的为“贵南路”。

最先修建的是“贵西路”中贵阳至黄果树的一段，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为平缓，工程较其他道路施工相对简单，他本想把“贵北路”修到他的家乡桐梓，但中间被乌江隔断，贵阳的汽车只能北行至养龙司，遵义南行的汽车只能到老君关为止。周西成在黄果树附近战死的时候，“贵东路”只完成贵阳至甘粑哨一段，从甘粑哨到广西的“贵南路”才开始动工。马路虽然有了几条，但贵州实际上还只有周西成乘坐的那辆七座的雪佛兰轿车。直到1931年，袁千臣、张彭年等人发起组织“贵州民办先导车运股份有限公司”，以集资款从上海购来了10辆汽车，在贵阳—黄果树、贵阳—桐梓、贵阳—独山等3条公路进行客货运输，才开始了贵州的公路运输。

1933年，“贵北路”终于修通到桐梓，“贵东路”通至玉屏，“贵西路”仅通盘县，“贵南路”仅通独山，四条干线都是不能出省的“断头公路”。



周西成修路，挥锄者为周西成



1927年贵西路开始修筑，图为竣工的贵阳至安顺段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贵州，为了军事需要，国民党当局相继开通了黔桂、川黔、滇黔、湘黔四条省际公路，勉强通车。贵州的公路，因地形关系，必须翻山越岭，跨过江河，大都是盘山公路，极为艰险，加之车辆破旧，交通仍感不便，从贵阳到重庆也得走三天。

抗战时期，贵州的公路显得重要起来，贵阳成为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1937年，国民政府重点建设京（南京）滇（昆明）公路，将湘黔公路和滇黔公路纳入总体规划，成为南方的一条陆路大通道。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成了陪都重庆的屏障。这一时期，海上运输被封锁，铁路中断，长江航道被战争截断，战时运输主要靠公路。由于四条省际公路交会于贵阳，无论是从湖南或广西进入西南都必须经过贵阳，然后转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成了西南公路交通枢纽，西南公路管理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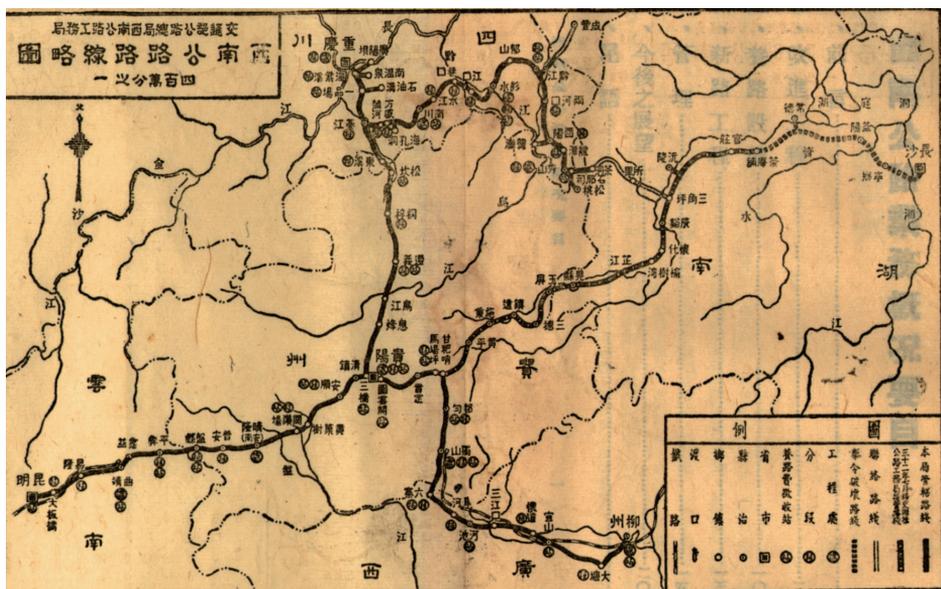


滇黔公路上的三岔河桥

由长沙迁往贵阳。

当时，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起初是从越南河内运来，由黔桂公路经贵阳转运到重庆。日本占领越南后，外援物资从缅甸仰光运来，通过滇缅公路与滇黔公路运到贵阳，然后运往前线，这条运输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生命线”。日军进攻东南亚，封锁滇缅公路，战略物资运输线一度中断，不得已开辟“驼峰航线”，用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但当时的飞机运量小、飞行高度有限，越过喜马拉雅山风险极大，难解抗战之急。于是从印度开辟一条史迪威公路到云南，通过“二十四道拐”到贵阳、重庆。无论是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从云南把战略物资运往前线都必须经过贵州，滇黔公路上的贵阳成为交通咽喉。犹如日内瓦之于欧洲，贵阳故有“东方日内瓦”之称。当时贵阳的交通特别繁忙，军车、邮车、商车络绎不绝，每日通过贵阳的汽车不下数千辆。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中国所需的汽油均靠进口，由于东南沿海城市



西南公路线路略图

相继陷落，日本封锁海上运输，汽油供应日益紧张，日本封锁滇缅公路以后，汽油更加奇缺，出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悲壮局面，寻找汽油代用品成为当务之急。用酒精、桐油、木炭等进行试验，最后实验结果是：以木炭产生煤气作料最为经济实用。木炭汽车的问世离不开一位工程师，他就是李葆和。李葆和，河南济源人，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机械制造，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回国后在汉口成立中国煤气机制造厂，1939年将厂迁到贵州龙里。煤气机制造厂与贵州企业公司合作，成立中国机械制造厂股份公司，主要生产煤气发生炉。下设龙里、贵阳两厂，以李葆和为总工程师。李葆和研制的“上吸式”煤气发生炉，以木炭为燃料，采取压入式送风，产生二氧化碳，经过除尘，还原为可燃性的一氧化碳（煤气），性能比中吸式、下吸式优越。1941年试验成功后，在贵阳举办煤气车技术培训班，培训56名驾驶员，结业后到云南畹町接运50辆进



西南公路运输局的长途公路运输车

口汽车，开回贵阳改装为木炭汽车。1941年举行煤炭汽车大赛，数十辆汽车载满货物，从重庆海棠溪出发，经过“七十二道拐”，越过乌江到达贵阳，一、二、三名都是贵阳的木炭车，于是取名“胜利牌”，又因研制者为李葆和而称“葆和式”。为了推广木炭汽车，在贵阳成立了中国煤汽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把改装的木炭车用于公路运输，以贵阳为中心，北至重庆，南至金城江，东至芷江，西至昆明，很快就跑遍西南各地，为战时运输作出了宝贵贡献。

十五、爱国民主运动兴

解放战争时期，贵阳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1946年以贵阳师范学院师生的“拒杜”运动，揭了解放战争时期贵阳学生运动的序幕。1946

年底，师院学生在校内张贴标语、举行罢课，抵制教育部委派原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杜叔玠出任院长的决定。各系学生推举代表成立“拒杜委员会”，喊出了“不要政客，要学者”的口号。当时北平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贵州各校学生纷纷散发传单，呼吁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国民党贵州当局鉴于这种形势，收回了对杜的任命，改派曾景为院长。由于曾景仍是政客，不受学生欢迎，在校未及一年，即被进步师生赶走。1948年初，原武汉大学数学教授肖文灿出任院长，师院的“拒杜倒曾”斗争取得胜利。

1948年3月，发生了贵阳医学院学生捣毁《民报》报馆的事件。这家由国民党军统特务直接控制的报纸，仇视进步师生，公然捏造消息诋毁贵阳医学院的声誉，愤怒的师生捣毁了报社的部分设备。贵阳医学院学生捣毁《民报》的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事后《中央日报》专门刊登了《民报》馆被贵医学生捣毁，停刊三天的新闻报道。

1949年初，由于物价飞涨，贵州大学的师生生活陷入困境，许多人连一日两餐也吃不上。3月26日，全校学生举行罢课，赴贵阳请愿。师生们散发了《告全市父老书》，揭露国民党只顾发动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学生们向省政府请愿时齐声高喊：“你们看戏跳舞，老师锅里无米煮！”“老师要吃饭，我们要读书”等口号。国民党当局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下，被迫答应“由省府照省级公务员例购买平价数量，借发一月公粮”解决教职工目前的食米困难；学生的食米差额也“由省府拨助一千石救济”。在贵大师生开展斗争的同时，贵阳师范学院也组成了“反饥饿运动委员会”，草拟了《反饥饿反迫害罢课示威游行宣言》。3月29日，师院1500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打着“反饥饿”横标和漫画，师生们手执三角小旗，沿途高呼口号，赢得了市民的广泛同情。

在贵大、师院等“反饥饿”斗争的影响下，贵阳8所中学的教职员工开展了请愿活动，要求教育厅立即发足1949年3月份薪水，并给每个教职员发放救济金5万元。这一合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八校联谊会”立即做出“停教待命”



贵州大学学生“反饥饿”游行队伍

的决议。4月16日，4000多名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教师的罢教斗争。学生代表与统治当局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迫使统治者做出提供200担食盐暂作解决问题的费用的保证。当时的报纸曾对八校学生的联合游行做了如下报道：“本市省立八所中等学校学生，因目前物价狂涨，教师待遇微薄，生活濒于绝境，特于昨（16日）午后一时联合冒雨游行，向社会呼吁，沿途秩序良好，深获民众同情。”

工人的斗争是城市反蒋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工人因失业而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据统计，1945年贵阳市有失业工人4万人，到解放前夕，失业工人人数几近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广大工人不堪忍受黑暗的政治压迫与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在贵阳影响较大是贵阳电信局职工的

怠工斗争等。1946年初，贵阳电信局职工响应上海电信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3月上旬，国民党交通部被迫对全国电信职工做出让步。

日益高涨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抗丁、抗粮、抗捐为中心的反抗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暴动遥相呼应，有力地冲击着国民党在贵州的反动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国民党贵州统治当局，向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挥起了屠刀。

贵大师生的“反饥饿”斗争中，史健被选入“抢救师生员工饥饿大会”主席团，作为学生代表与省府当局举行谈判，后来又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团主席。史健在学运中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9年5月下旬，国民党特务开始在学校盯梢，逮捕学生领袖。史健在大家的帮助下离校隐蔽，不幸“于7月1日在安顺被捕”。在狱中，史健始终不向反动派屈服，于9月28日被杀害。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工厂和农村也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镇压。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宣告覆灭。接着人民解放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奋勇追击溃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已面临灭顶的命运。1949年5月以后，国民党省参议会、省党部、保安司令部等分系统制定应变纲领，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韩文焕亲自到兴仁、毕节、镇远、独山、遵义、铜仁召开会议。企图根据统一制订的应变计划，从政治、军事、经济几方面加强法西斯统治，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其办法是：一面利用各种军警宪特组织搜集情报，监视与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面在原来的中统、军统特务机构之外，成立“贵州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侦防组”“反共保民动员委员会”等反动组织，进行反共宣传，筹集应变经费。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各种计划，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建



立了中共贵州省工委，省工委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新青”）。在这之前，华南分局于1948年陆续派出一批人到贵阳，组成了中共贵阳特别支部。贵阳特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1949年3月，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域工部也派人到贵阳工作。贵州党组织在发动群众、坚持斗争、迎接解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掌故：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同时向武汉发起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中共驻武汉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决定西迁重庆。为了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指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贵阳人袁超俊（原名严金操）担任交通站站长。当时的袁超俊26岁，刚入党不到两年，却已是一名“老地下”。身为贵州本地人，在达德学校上过学，加上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周恩来认为由袁超俊担任此职再合适不过。1939年1月3日，交通站借用达德中学校舍开始办公，正式启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印章及信函。同时致公函给国民党驻贵阳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备案。交通站建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把与中共贵州省工委的联系方式交给袁超俊，袁超俊随即与省工委取得联系，省工委先后派出丁树奇、高言志、雷正光作为省工委与交通站之间的联络员。

为不影响达德学校正常的教学，在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交通站租用六座碑一所民房（今民生路41号）作为八路军交通站的办公地点，后又在威清门外租有民房作为招待所，并在威清路建有仓库及停车场。活动时间从1939年至1941年。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运送物资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右五）与运送人员合影留念

交通站作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设立在贵阳的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八路军、新四军各兵站的接送和物资转运工作。1939年上半年起就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从越南、缅甸等地购买和运进的药品、军火、汽油、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共有150车。还负责接收宋庆龄、廖承志夫妇以及海外华侨在香港捐赠的药品、汽车、毛毯、衣物等物资，并将这些物资安全转送延安，有效地保证了抗战后方中共南北交通线的畅通。1939年冬，交通站通过史沫特莱女士，协助中共红十字会特别党支部做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林可胜的工作，成功将外国援华的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由贵阳运送



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交通站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领导及八路军、新四军来往人员的接待，因为交通站是党的干部去重庆转延安及去华东新四军总部的必经之地。在交通站经过的中共领导人有叶剑英、徐特立、李达、李克农、叶挺、张云逸、张敬承、袁国中、古大存等，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也曾在此住过。通过交通站帮助解决了一些越南共产党人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汇款等问题。

交通站还接待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家属，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夫人赵莱及父母、弟媳，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 20 多人。1939 年 2 月 4 日贵阳遭日机轰炸后，这批人由交通站负责安排转移到青岩居住两年，袁超俊经常骑自行车到青岩看望他们，为他们送去生活费及书报。直到 1940 年底，才陆续离开贵阳。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同年 1 月 21 日，国民党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的特务和宪兵团、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队、中统黔室行动队、军统黔站行动人员将交通站包围，逮捕了交通站留守的李配之、鲍启文等 7 个工作人员，查封了站内物资。经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贵州国民党当局于 8 月份将被捕人员释放。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从建立到被查封，在贵阳活动了两年多的时间，它的历史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贵阳的一面公开的旗帜，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反映其他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一切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意见。它始创于 1938 年 1 月的国民党统治区武汉，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成立于 1938 年 9、10 月间。地址在贵阳市富水西路 12 号（原慈善巷 8

号)。抗战期间，党中央为了宣传抗日，传播马列主义，在一些国民党统治的中、小城市相继建立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的分店，这些书店出售革命书刊的同时，也零售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当时设在贵阳马家巷的《大公报》社，也出售少量的《新华日报》，由于读者踊跃，门市上往往供不应求，兼之有些心怀叵测的人借抢购的手段来达到没收的目的，使得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无法获得党报。1938年4月，秦天真和邓止戈由延安回贵阳主持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工作，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党支部书记熊蕴竹向他们汇报了以上情况，省工委作出了在贵阳设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决定。恰在这时，《新华日报》记者秋江由重庆来贵阳采访，省工委请秋江同志将设置党报专门分销机构的意图带回去研究，不久，总社表示同意成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并制发楹



《新华日报》贵阳
分销处旧址

圆形橡皮印章一枚。尽管开展工作困难重重，但《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仍然成为地下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盏指路明灯。

《新华日报》从重庆运到贵阳，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贵阳客车站行李房工作的胡钦曾转送。报纸从重庆海棠溪车站运出时，就混杂在旅客的行李中，装在客车的后座，捆作一卷，这就避免了“查禁”“没收”的危险，躲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使报纸从未脱期，源源不断地送到贵阳读者的手里。

《新华日报》在贵阳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的群众，这是他们必须学习的重要内容。另外，一些进步人士和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的成员也有许多人订阅。这些订户，有的是工作人员投递，有的是自己到分销处取报，连同外县的一些订户，每天分销报纸五百份左右。分销处发行工作，由省工委派地下党员吴同尘（吴之平）、郎德服、陶祖铭（陶洁）等人负责。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白色恐怖笼罩贵阳，一些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相继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决定结束《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工作。

贵阳历史上第一个公园

贵阳最早的公园，是梦草公园，亦称“贵州公园”。梦草公园建于1912年9月，地址在导水槽街西侧（今恒峰步行街）。这块地方在明代，始名毛府塘，先是贵州提学副使毛科的府邸；后是贵州提学副使谢东山的住宅，谢东山将毛府塘改名梦草池。梦草，是取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诗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南朝的宋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明末，该地曾是贵阳著名诗人吴中蕃（吴滋大）的别墅。经多年培植，梦草池成为贵阳颇具名声的园林胜地。清代，这里成了按察使署，辛亥革命以后才辟为公园。

公园开办之初，数亩大的梦草池内荷花怒放，荷叶微荡，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池中有“池心亭”，登亭观荷别有情趣。池旁有紫泉阁、光复楼、吴滋大先生祠、得月轩等楼台亭阁。光复楼藏有平播钟，是明代贵州巡抚郭子



梦草公园池心亭

章平定播州（今遵义地区）后所铸造。池塘周围古木参天，曲径通幽，树龄千年者为皂角，数百年者为冬青。游人漫步林间小道，心静气舒，流连忘返。此外，公园还养有虎、狮、水獭、仙鹤等动物，供游人观赏。

1926年初，公园的正式名称是贵阳市公园，当时贵阳并未设市，老百姓仍称梦草公园。1929年，毛光翔主黔时，梦草公园改名中山公园。1935年以后，这里次第成为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省参议会驻地，公园虽仍存在，但花园渐渐缩小，逐渐破败。

有了中山公园，公园路的名称也随之出现。将公园东侧沿墙的道路名称由“倒水槽”更名为公园路；解放以后金沙坡一段称为公园北路。公园背后称公园西路。公园南路早先在贵阳府署后边而称府后街，1938年前后改名南通街。

此街是由公园往南通都司路的街道，后来改名为公园南路，与公园北路连成一体。2018年贵阳市提升改造原八鸽岩路、公园路、合群路、青云路，并分别与主城区东西向的北京路、延安路、中山路、都司路、瑞金路、解放路相交，形成一条南北贯穿老城区与中环路连接的城市主干道，这条道称为“人民大道”。

设在贵阳的气象观测站

贵州省内最早的气象观测点有两个，一个在威宁石门坎基督教堂，由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特（Bergrit）于1924年开始设点观测；另一个在贵阳南门外马棚街（今新华路）天主教堂。其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始于1920年10月，由法国传教士翁秉正（Justin Vion）负责每天的定时观测。所有记录都按时报给天主耶稣会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并转发国外。

1935年，南京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派气象人员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学员顾侠携带气象仪器来贵阳，在三块田（今合群路）租民房建起贵阳气象测候所（直属南京的气象研究所），并于1935年9月1日起正式开始观测记录，这时贵州省才有自己的气象事业。1936年竺可桢推荐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的贵州籍清华大学毕业生李良骥回贵阳担任测候所所长。李良骥到任后，即将测候所迁至贵阳桑园（今贵阳六广门体育场附近），继续开展气象观测工作。1937年经民国贵州省建设厅同意在接收贵阳测候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贵州省建设厅气象所，并将所址迁到大南门马棚街的雷祖庙（今新华路），也就是天主教堂的隔壁。因为气象所的观测场和天主堂的观测场只有一墙之隔，双方的观测记录应较一致，不会有中断现象。即是说气象所的观测虽然是1937年开始的，但与天主堂的记录连接起来，就可将气象所的资料延长到建立前的1920年。

省气象所成立后，李良骥将全省测站网建设的初步设想函告在南京的竺可桢教授，竺可桢给予大力支持，并同意1937年先建桐梓、独山、毕节三个测候所，所需仪器设备由南京无偿调拨，并由中央航空公司空运来贵阳转发。

城内有座铜像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阳市有个街道广场叫铜像台，广场有座上身着西服、面南而立的铜像，铜像台的铜像，是1929年才出现的。1927年贵州军阀周西成主政贵州时，因创修城内马路（即公路）开始拆除北门城墙。周西成死后，1929年10月，省政府在已拆老城北门月城原址，建高约1米、直径约50米的圆台，环以石栏，向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筑台阶以通上下。台的正中央，筑高约5米的像座，其上竖周西成铜像。以后这里便名“铜像台”。

周西成是桐梓县黑神庙人，一生只活了37岁，统治贵州近3年，在贵州创修公路引进汽车，建电气局使省城贵阳开始有了电灯，设省立贵州大学培养地方人才，与其他统治贵州的军阀唐继尧、刘显世、毛光翔、王家烈等相比，他可算贵州军阀中的佼佼者。

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晚间的铜像台下成了贵阳城藏污纳垢的地方。在灰暗的街灯下，搽脂抹粉的下等妓女三五成群勾引嫖客，贵阳人称之为“站电线杆的”。算命测字的先生，桌旁贴着“指引迷人去路，提醒久困英雄”的招徕对联，唾沫横飞地在打胡乱说。卖狗皮膏药的，赤裸上身，腰缠黑色紧身带，手执钢刀，身旁放着炉火熊熊的熬膏大铁锅，嘴里喊着：“哪个贴了我的膏药，巴起就扯不脱！”卖膏精鸦片的，混迹于人群中，生意兴隆。这里还有赌扑克牌的、耍猴戏的、走江湖吞钉子的，流氓地痞穿梭其间，大肆敲诈勒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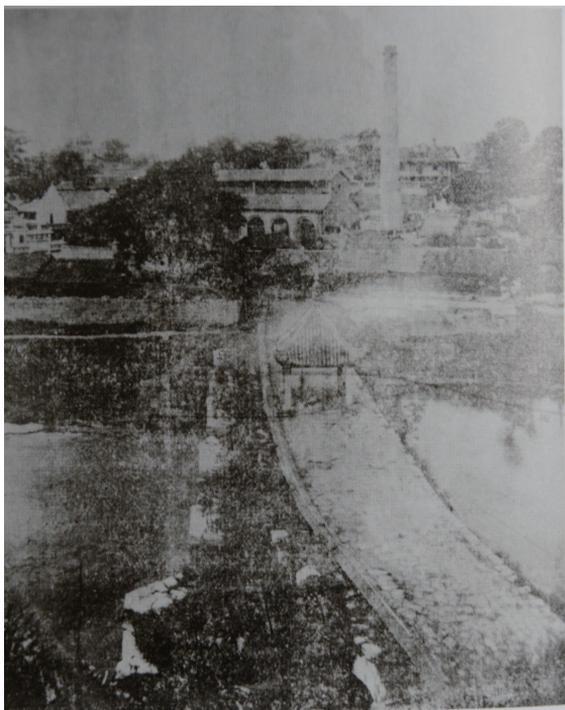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9月2日，贵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决定于9月6日下午2时拆除甲秀楼“平苗纪功”铁柱和周西成铜像。此后，铜像台原址建起了人工喷泉和街心花园，这里变成喷泉飞溅、花香四溢的“喷水池”。

贵阳何时有了电灯

1926年6月，周西成决定创办省城贵阳的电气局。9月，电气局筹备处成立。开通电灯，发电机哪里来呢？那时贵州镇远搁置有两套美国泰来洋行制造

的75千瓦直流发电机，是民国初年王电轮、蔡衡武代表贵州向美商订购来的，由于贵州政局不稳，就一直放在镇远。

周西成先是请省立贵州大学教授刘守一先生主持技术工作。刘先生到镇远察看发电机后认为，机器长年日晒雨淋，锈蚀严重，配件丢失太多，一时很难修复。周西成于是转请花莱峰修复。花莱峰当时是电气局筹备处的技师。他曾在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气工程科学习数年，回国后又在江苏戚墅堰发电厂任工程师数月，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那时镇远到贵阳没有公路，只有羊肠小道。花莱峰接受任务后，组织人抬马驮，历时数月，吃尽千辛万苦，才将机器运回贵阳。接着又在刘守一先生的帮助下，主持修复工作，缺少的配件亲自绘图纸就地制造。1927年9月10日，这天正好是中秋节，夜晚，在花莱峰和工人们的努力下，终于发电成功，贵阳的电灯亮了。这是贵阳也是贵州省最早的



南明河畔甲秀楼附近的
贵州电气局

城市发电。第二年9月，电气局正式成立，花莱峰因发电有功被聘为总技师。

花莱峰是贵阳人，字蓬瀛。他是给贵阳带来电灯的人，是贵阳的“光明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莱峰先后在贵州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任教，是国内知名的电气工程专家。1966年在昆明逝世，享年66岁。

民国贵阳的三座机场

贵阳民国时期，建有三座机场，分别是团坡机场、玉厂坝机场、清镇沙子哨机场。

团坡机场是贵阳建的第一座飞机场，其实它的前身是“团坡运动场”，周西成在这里举办了贵州省第一届运动会。1932年，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王家烈，看到湖南省主席何键、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广西省主席李宗仁都建有航空部队，为壮大自己在贵州的势力威望，王家烈便要求何健派飞机前来贵州开辟航线。于是王家烈将离湘黔公路最近的团坡运动场，建成一个小飞机场使用。机场无专门的导航设备，机场内仅有一座木质停机棚，只能停放两架飞机。别看这机场设备简陋，接纳数次的飞机升降还从未出过飞行事故。团坡机场开辟了贵州的民航发展史，它是贵州贵阳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飞机场。后来，由于团坡机场太小，被改作运动场使用，成为当时市民踢球、骑自行车、跑马的体育运动场地，老贵阳称为“跑马场”。

王家烈发现团坡机场停不了几架飞机，没有发展前途，便于1933年选择玉厂坝另建新飞机场。机场以玉厂坝（今贵阳火车站侧飞机坝一片地区）为中心，面积超过1平方千米。王家烈又令其侄子将1000担鸦片运往广西梧州，分转广东、香港出售，买回3架德国飞机。1938年，原设在广西的空军学校转移昆明，10余架教练机转场途经贵阳，并传说要在玉厂坝机场进行飞行技术表演。贵阳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10多架飞机的飞行表演，飞机飞抵贵阳当日，晴空万里，由于玉厂坝机场离城中心很近，当飞机在玉厂坝机场降落时，贵阳成千上万民众到机场观看，人山人海，热闹异常，一片欢呼雀跃之声，真令贵州人有大开



眼界，大饱眼福之感。1942年下半年，驻清镇平远哨机场的美国空军轰炸机中队轰炸海南岛日军基地后，返航途中有两架轰炸机降落于玉厂坝机场。由于机场跑道承受力不强，致一架轰炸机着陆时受损，后经美军机修人员抢修后飞回平远哨机场。此后，玉厂坝机场便停用，分别改作美军驻贵阳的后勤基地及国民政府军队汽车第10团的停车场和仓库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机场一部分建成了贵阳火车客站、贵州省新体育场，玉厂坝地名也被贵阳人改称为飞机坝。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相继成立，刺激了试图独立的西南军政当局。广东、广西军政首脑商议组建西南航空公司，打通粤、桂、黔、滇、闽五省交通，抵制南京国民政府势力的渗透。贵州军阀王家烈大力支持这个提议，但因当时贵阳易场坝机场承接不了大型运输机，他一方面积极派代表参加筹建西南航空公司会议，另一方面则积极勘察地形修建新机场。1934年3月，王家烈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在贵阳地区勘察机场场址，先是以北郊沙子哨为机场场址，该地四面开阔，面临川黔公路，交通方便，最为理想。可该地多为良田好土，地方人员又强烈反对。随后遂改变方向，向贵阳以西的清镇县平远哨勘察，认为此地相宜，其地多为丘陵荒坡，占用耕地极少，且无人反对，场址择定后，随即派员进行测量，并调集清镇县、平坝县的民工伐木，破土兴工。1934年11月建成。1935年4月28日，中国航空公司首次开辟重庆至贵阳航线，并在贵阳设立了民用航空办事处。此时正值中国工农红军三渡赤水，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为了阻击红军，蒋介石还命中国航空公司开通贵阳至昆明航线。

抗战期间，清镇机场是贵州境内最大的军民合用机场，设立了航空站，属甲等航站，并驻有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各一个飞行中队。随后美国空军又派驻一个轰炸机中队，共有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20多架，主要是侦察日军飞行情况，配合黄平旧州机场起飞轰炸机轰炸柳州、广州、海南等地区的日军及与日空军作战。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清镇机场交民航使用。

肠旺面馆的行话

肠旺面是贵阳独有的传统风味小吃，深受贵阳人喜爱。“肠旺”二字，“肠”是猪大肠，俗称肥肠；“旺”是猪血，“肠旺”又与“长旺”谐音，满载期待与祝愿，带着美好的寄托。早餐吃一碗肠旺面，是一天好兆头的开始。

清朝光绪年间，贵阳开始有了肠旺面，据称苏姓开业最早。最初经营的肠旺面馆，店堂狭窄，肠旺面的主要成分就是面条（或米粉）、大肠、猪血、红辣椒，以及由猪头肉炸成的脆臊，价格便宜。吃肠旺面的主要是下层人士，如轿夫、马夫、小贩、衙门差役、绿营士兵等，富商大贾则不屑一顾。到了清末民初之际，经营肠旺面的店铺多了，质量大有改进，它由面条（或米粉）、大肠、血旺、脆臊组成，外加酱油、醋、葱花、绿豆芽、油炸泡豆腐丁（称为“泡臊”）等，红辣椒变成了红辣椒油，浇在面上，看起来红红的、油油的，人未吃进嘴里就先分泌口水，急欲一饱口福。

据说肠旺面加绿豆芽，是由铜匠街傅姓肠旺面馆率先经营。起初，有顾客叫堂倌（即服务员）到附近豆芽店买豆芽煮来吃。久之，加绿豆芽成为吃肠旺面的“小菜”，“小菜”钱也成了掌瓢和堂倌瓜分的小费。以后家家肠旺面都加豆芽，小费也就取消了。

20世纪20年代，南门口、贡院坝、北门桥、煤巴市、花牌坊、铜匠街等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有较有名气的肠旺面馆。禁不住诱惑，顾客中巨富绅士、名门太太小姐也接踵而至，登门品尝。到了30年代，南京街上的苏得胜肠旺面馆，因为材料讲究，口味好，虽然门面不大，但“苏得胜”之名贵阳人大都晓得，生意十分兴旺。以后，贵阳的大馆子如汉云楼、云荣春、醉阳春等也经营肠旺面早点，登门者多为有地位、有身份的人。

肠旺面好吃，跑堂和站灶师傅的“言子”更是招徕顾客的关键。一有顾客入门，只见跑堂伙计立马上前。

一声“招客”，先给灶上传进信息。然后擦桌，说：“请坐，客人吃什么？”站立等候吩咐。灶上立即放嗓接应：“招客几位？”如果是两个熟人，并无特

殊要求，跑堂伙计马上回答：“行肠旺二位，锅头煮娃娃（熟人）麻利带（快）？”站灶师傅一听是熟客，连忙反馈：“啊……五营四（哨）加格毛格（多），马口（大肠头既厚且肥）手上来！”（以上为歇后语，括号内的字不说出来）。如果来客既要吃清淡一点，又要面条少，那么跑堂伙计就喊：“听啰！手上行面减条麻油红，樱桃哨儿多几颗。”站灶听得明白，立马接应：“樱桃几颗不消说，接二连（三）你喊下来！”如果碰着三个人一齐进店，其中一人要吃粉；另一个吃面，要硬，汤多；第三个不吃葱，要带绿豆芽。伙计又一口气报进去：“灶上，四席松客三位，一位胭脂花（粉），接下打脆汤宽不吃，合席（第三位）免青肥鸭大（鸭——豆芽的谐音）哟！”三人三个样，联珠般传进去，随后从灶上端来三碗内容各别的肠旺面，依次送到各人面前，从不错乱。

好的跑堂业务娴熟，嗓音清脆，“言子”满嘴，引而即发，俨如一片歌声，喊得满堂场面热烈，几乎半条街都能听到动静。过路的人有驻足倾听的，有禁不住诱惑，要进店“来一碗”的。这种诙谐的行业语言，在当时极为盛行。

中国谍战片开山之作在贵阳拍摄

1937年2月14日，中国谍战电影的开山之作《密电码》在南京新都大戏院首映。剧本由贵州人张道藩编写，由上海明星公司演员演出，黄天佐导演，电影在贵阳黔灵西路进行拍摄。该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剧情惊险刺激，开创了我国谍战电影的先河，是贵州电影史上剧情片的开山之作，并被当时不少影评人认为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影片。该片讲的是一群青年人由国民党中央派遣来某地建立国民党，结果因密电码问题，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失败的故事。

这个电影故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1927年初，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派遣四个贵州青年张道藩、黄宇人、商文立、李一之回贵州筹备国民党党务，准备在贵州建立国民党。动身之前，张道藩被任命为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其余三人为筹备员，黄宇人兼筹备主任。四人来到贵阳后，由于当政者周西成的阻挠、监视，实际上无法开展任何工作。周西成自1926年6月1

日当上贵州省省长兼二十五军军长后，贵州成了他的独立王国。周西成一直不愿意国民党势力侵入贵州，他害怕国民党在贵州建立党务工作后，危及他的独立霸权统治。国民党中央一连给张道藩等人来了三个密电，被周西成截留。周西成命民政厅厅长杨干臣通知张道藩等将国民党中央的密电码交出，遭到拒绝。1927年5月3日，张道藩、李一之因密电码被捕，被刑讯逼交密电码，李一之被断去一腿。不久，商文立和平越（今福泉）被拘捕，后想方设法逃出；黄宇人化装剪成平头，穿上中学生服装，经贵定、广西六寨逃出贵州；张道藩开始被关在省政府，后借口生病住进省立医院，在贵州老同盟会会员平刚帮助下，逃离贵州。后来，周西成的部下终于在李一之老乡罗中英家中找到密电码。李一之誓不背叛，周西成的贵阳卫戍司令车鸣翼在其司令部旁的扶风山麓，活埋了李一之。国民党势力在贵州确立后，在扶风山麓，立有李一之墓碑。

张道藩因为这次经历，也捞足了政治资本，从此官运亨通。张道藩出身书香门第，国外留学期间结识陈立夫后加入国民党，逐渐成为CC系骨干，历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海外部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等职，长期领导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眼中的贵阳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东部国土大部沦陷，民国政府西迁入蜀，贵阳成为后方重镇，接纳了很多军政机关、研究机构、学校、医院、企业。大量外省人涌入贵阳，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当时的贵阳，贵阳也因此首次进入文化视野。

战前，绝大多数外省人士都未到过贵州，他们对贵州历来的了解，大抵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俗谚，以及王阳明《瘞旅文》中所写的蛮烟瘴雨。

1938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太太写信给汉口的亲戚说：“……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条街！”（茅盾《贵阳巡礼》）

城内最繁华的街道是十字街及中华路一带。大街上的房屋，许多是骑楼，如香港及汕头各地所见的，下雨时，不带雨伞，行走很便利。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路上的行人是很拥挤的，尤其是夜晚，街上电灯通明的时候，游人更是热闹。因为防空，全市的房屋多半都已涂成了黑色。（沙鸥《贵阳一瞥》）

走进中山门，一直向前，那儿便是最热闹繁华的十字路口。从这儿前走，退后，或是左转，右行都可以看到高楼大厦，万商云集。最多的是吃店，南厨北菜，件件都有。其次就是洋货店，这里面日用品尤为家常所必需，所以生意最好。因为人多，各种店铺的生意都还鼎盛。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外来的人。摩登的女郎，涂脂抹粉，衣饰入时，挟着洋装的男友，或是握着手杖的绅士，懒洋洋地走在街边，左顾右盼，离开商店，走进电影院。新兴的商店是时代化的，和上海没有两样；本地的商店，还是保守着原样。（沙鸥《贵阳一瞥》）

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但即使大多只得二层，可是单看那“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大概是什么未来派之类罢），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何况还有那么的大玻璃窗。这在一个少见玻璃的重庆客人看来委实是炫耀夺目的。（茅盾《如是我见我闻》）

最热闹的是中山路，商业鼎盛，生意殷繁，旅馆饭馆，陈设华丽的百货商店，如贵州国货公司等，也还有几家，各银行，钟表店，绸缎公司，商务印书馆等，也都应有尽有，此外是以茅台酒为标榜的酒店也不少。马路上充满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市民，摩登女士，当然也来点缀这新兴市面。（张琴南《入川纪行》）

金融业，除中，中，交，农四行外，尚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其他有纱布业五家，绸缎业十家。保险业有太平等四家，

运输业有中国旅行社等三家，首饰业有宝成银楼等三家，典业两家，盐业七家，棉花业四家，汽车公司六家，较大旅馆有远东，同乐社，江南，巴黎，四海等三十家，小旅馆及学生寄宿舍等七十余家，餐馆有二十余家，小食品店有五十家，国药铺有四十余家，西药房也有十家，百货公司有中国国货公司，书局有商务，中华，世界，正中等十余家，尚有瓷器，铜铁，竹木，米丝，杂货等店号共计近千家。（顾君毅《贵阳杂写》）

据我所感到，贵州人很富有情感，很喜欢朋友。同时也很机敏，而常有风趣，但没有云南人那样沉着。（李长之《西南纪行》）

专章 七十五载铸辉煌

贵阳是大西南战役中第一个解放的省会城市，贵阳解放截断了国民党的“大西南防线”，打破了蒋介石掌握西南的梦想，推动了贵州全境的解放进程，并推动了云南、四川、西康三省的解放。

贵阳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贵阳市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政权，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三线建设推动贵阳交通的大跨越，成为西南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昔日贫弱落后的边远山城，旧貌换新颜，名副其实地步入工业城市的行列。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潮开始在中华大地涌动。贵阳也在春潮的鼓动下开始迎接勃勃绿意的春天。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贵阳市改革开放，后发赶超，洼地崛起的步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壮丽篇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属于这座城市发展历程中独有的足印，犹如一张张芬芳的书页散发出持久弥香的神韵。蔬菜产供销体制改革、社会公交体制改革、街道财政体制改革、农村改造茅草房工程、贵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以大数据为引领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一圈两场三改、农村五治……一项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推动着城市发展前行。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属于这座城市发展历程中独有的硕果，犹如一步步浸满足印的阶梯连接着城市的今昔。环城林带、小孟工业园区、南明河变清、“三环十六射”城市路网、会展城的建成、贵阳北站投入运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青岩古镇晋升国家5A级景区、贵阳孔学堂、修文阳明文化园……一件件建设成效彰显城市改革开放的魄力。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属于这座城市发展历程中成长的荣誉，犹如一颗颗散发着光彩的珍珠，透射着令人自信的光芒。全球十大避暑名城、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首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中国百强城市、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中国最具潜力的旅游城市……一个个荣誉镌刻着城市改革发展足迹。在2009年全国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国家统计局评选贵阳市为新中国成立60年最具代表性的60个城市之一。

在前行路上，贵阳市感恩奋进，后发赶超，这座城市的人民用自己的双手为创造辉煌的未来创造着无限可能。于是有了“息烽堡子村”成为中国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第一村；“三线建设”播下现代工业文明种子，筑牢贵阳工业经济发展基石；“三大改革”尽显贵阳开放创新魄力，成为全国各地城市效法之先驱；践行“两山”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的贵阳篇章应运而生；勇立数字经济发展潮头，“中国数谷”的城市名片全国首屈一指。

荣誉见证着光荣与梦想，光荣与梦想见证不懈的追求与执着的历程。

一、大西南战役中解放的首个省会城市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华东、西北和中南大部地区后，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往重庆，残存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分别撤向西南各省和广西一隅。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西南地理和国民党军力部署情况，对解放军进军西南作战作出一系列指示，指出：消灭胡宗南集团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应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方针。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战役随即展开。

贵阳，是川黔、湘黔、桂黔三条公路的枢纽，它北通四川、东接湖南、南连广西、西达云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攻占了贵阳，不但可以斩断西南中

南两大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联系，关死成渝地区守敌西逃的大门，还为攻取重庆、成都打开了翼侧迂回的通道。因此，黔境作战，贵阳为二野第5兵团的首要攻略目标，志在必取。

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贵州即将解放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变得愈加疯狂。为了在省城推行男女老幼跑光、粮食物品藏光、一切用具搬光的“三光”政策，当局成立了“疏散指挥部”，计划先炸毁南门大桥、烧毁报务局、话务局、贵阳电厂，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然后组织反共骨干分子上山“打游击”，伺机卷土重来。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地下组织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同时，发动群众为保卫城市而斗争。

电厂是首要被炸毁的目标，贵阳电厂工人闻讯后，全体员工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保家护厂、与工厂共存亡的战斗口号，采取了多项护厂措施。11月12日，敌宪兵队乘车到电厂附近寻衅破坏，由于护厂工人严阵以待，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当晚，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率残匪窜回贵阳，指挥破坏中曹兵工厂、电讯局，大肆抢劫银行。全市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刘伯龙部曾企图对电厂下手，因护厂工人声势浩大，未敢炸厂。电厂护厂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城市夜间照明，使反动派不敢肆无忌惮地对省城进行洗劫。与此同时，贵州广播电台、贵阳盐务局、文通书局、《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印刷厂、贵阳邮政汽车修配厂等单位的职工及爱国工商业者，也纷纷起来保护所在机构、企业或商店，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全省各大、中学校师生，响应中共组织的号召，利用合法组织及各种形式进行护校，防止了敌人的破坏。

11月初，卢焘等爱国民主人士毅然挺身而出，组织“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11月11日，临时治安委员会在当时的市参议会（今中山西路）成立，选举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第二天，临时治安会发布通告，宣布该会“唯以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目的”，即日起开始昼夜办公。接着治安会从盐务局、税警队、42补给区司令部、法院及私人手中搜集到手、步枪400余支，成立了由190余人组成的自卫队，“日

夜轮班巡逻全市，以防宵小”。在制止敌人炸毁北郊军用仓库和电厂的护厂斗争中，治安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治安会加强了与各公用事业单位的联系，动员各单位集合员工，保护自己。对当事人已逃跑无人看管的机关、仓库、公房，治安会均派人前往看守。由于治安会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在国民党逃离后的“真空期间”，贵阳没有发生大的骚乱。

国民党当局对治安会保护城市的斗争非常痛恨。11月12日，刘伯龙从黄平窜回贵阳后，看到治安会的通告，当即下令撕毁。第二天，刘伯龙“约见”卢焘、张彭年等治安委员会负责人，限令治安会立即撤销。14日上午，刘伯龙派人将卢焘押到二桥转弯塘加以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卢焘为保护贵阳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国民党大规模破坏城市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敌人在逃离前对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了疯狂的逮捕和屠杀。1949年11月11日，反动派在贵阳杀害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与进步人士3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十一惨案”。

1949年10月23日，二野前委下达川黔作战命令，要求五兵团一刀子插



贵阳各界为被国民党杀害的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民主人士卢焘出殡

到贵阳，务必在11月15日之前进占贵阳。5兵团向各部队提出了与国民党军争时间、比速度的口号，开展了“看谁追得快、看谁打得猛、看谁抓的俘虏多”的立功竞赛运动。部队在“进军大西南”口号的鼓动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顾严寒路险，连日风餐露宿，每日行军都在100里以上，猛追溃逃的国民党军。

11月3日，16军首先向湘黔边境敌人发起进攻，敌军被我军连追带打，成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我军迅猛挺进。11月9日，16军在镇远打败了国民党第49军的一个加强营，突破了黔东防线，打开了通往贵阳的大门。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纲、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于13日晚仓皇逃离贵阳。11月14日，解放军经过进入贵州以来10多天的大追击，犹如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贵阳图云关。当天晚上10点左右，16军46师138团先期抵达贵阳的油榨街。为了防止敌人反扑，在地下党的配合下，138团连夜向清镇开进，在15日天亮前进占清镇，巩固了贵阳的外围，保证了贵阳的安全。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17军50师进驻贵阳，贵阳宣告解放，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贵阳上空。贵阳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贵阳各族人民。“解放军进城了！”“解放军进城了！”1949年11月15日夜半，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了贵阳市区的油榨街。夜城的大街小巷沸腾了。人们似乎忘记了不久以前蒋军撤退时留下的惊慌、恐怖，纷纷从工厂里、店铺里、学校里跑出来，每个人嘴里就像广播电台一样，播送着解放军入城的消息，播送着迎接解放军的歌曲。这一夜，人们差不多都没睡多少觉。度过了黎明前黑暗的30万市民，彻夜浸醉在狂欢之中。

11月17日上午，接管贵阳市的部队举行入城仪式，成千上万的工人、职员、学生、市民齐集南门外，结队欢迎。贵阳电厂的职工，抬着毛主席画像，举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电讯局的职工深情地唱起歌曲《你是灯塔》，表达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当解放军威武雄壮的行列通过时，大家纷纷同解放军指战员握手，向他们鼓掌和欢呼。军民欢乐团结的气氛，充满了山城贵阳。

二野第5兵团攻占贵阳后，从东南方向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粉碎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

白崇禧集团西撤滇、黔的企图。从此，白崇禧和胡宗南两个战略集团的联系被切断，等待着四川境内国民党军的是越来越紧的包围圈和被各个歼灭的命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强渡乌江，占领南川，于11月30日解放重庆。此后，第二野战军抢占乐山、蒲江、邛崃、大邑等城，与第一野战军一部合围成都。12月9日，云南卢汉、西康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宣布起义。同月27日，解放成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大西南中，共歼灭国民党军90余万人，解放了贵州、四川、云南、西康四省，使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贵阳

贵阳解放，翻开了历史纪元新的一页，贵阳开始书写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篇章。解放后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改造破旧的贵阳城，建设社会主义新贵阳。解放初期，贵阳市采取强力措施，清匪镇反、禁烟禁毒，迅速恢复生产，进行民主建政，古老的山城焕发了生机，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951年，贵阳顺利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彻底根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翻身做主人，迸发出无尽的力量。1953年至1956年9月，中共贵阳市委领导全市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施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贵阳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在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取得巨大成绩。

贵阳城区周围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区，形成了若干卫星城镇。如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油榨街、二戈寨，以机械、水泥、化工为中心的甘荫塘，以机械为中心的中曹司，以铝工业为中心的白云区，以水电、钢铁为中心的清镇，以磷矿为中心的开阳，以煤矿为中心的林东，还有马王庙、扎佐、龙洞堡、洛湾、新添寨等。开阳磷矿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磷矿产区之一，与湖北襄阳、云南昆阳并称“三阳开泰”。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喷水池的兴建标志着贵阳旧城改造的大规模实施。1954年翻修的中华路是贵阳的第一条混凝土路面道路。同年，新建了从喷水池到紫林庵的延安路，两旁新建了风格各异的三层或四层楼房，成为当时贵阳最漂亮的新街。自此以后，主要街道陆续改为混凝土路面或沥青路面，小街小巷也渐次翻修。北京路、朝阳路（今遵义路）、解放路、解五路、延安西路、外环东路等一批新路相继建成。1958年黔桂铁路铺轨到贵阳，从贵阳火车站到电信大楼新辟了一条路面宽50米，中间有草木葱茏的隔离带的遵义路。架起了横跨南明河的朝阳桥。新建和扩建了解放桥、团坡桥、金锁桥等28座桥梁。

贵阳市政建设的加速发展，推动城市功能逐渐完善。先后新建了黔灵、阿哈、

花溪、小关及松柏山等水库，建起了中曹、河滨、南郊等水厂，使日供水量达到 10 万吨。开始治理城区南明河、贯城河、市西河、小车河。大街小巷都安装路灯，20 世纪 60 年代起，高压汞灯、钠灯逐步取代了旧时的白炽灯。沿街种植行道树，修建了一些街心花园，城市面貌逐渐亮丽起来。先后改造了城区的黔灵公园、河滨公园，开辟了森林、南郊两个新公园，郊区则有花溪公园、金华湖、百花湖、红枫湖等景区。市民增加了游玩的去处，丰富了娱乐生活。

随着贵阳城市建设的发展，新式建筑不断出现。“一五”时期，贵阳汽车客站、贵阳汽车中心站、贵阳饭店、百货大楼、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及实验小学、贵阳六中、贵阳师范学院等成为标志性建筑。“二五”时期的标志性建筑有电信综合大楼、贵阳火车站，贵阳钢铁厂、贵州铝厂、贵阳棉纺厂等企业厂房，以及贵州工学院、贵州财经学院等院校的宿舍。

1965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三线”建设在西南地区拉开序幕。至 1979 年，在贵州建立了航空工业、航天工业、电子工业三大军工基地和一批重大项目，为贵阳奠定了工业城市的基础。

贵州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区之一，在抢抓历史机遇中，贵阳的工业和交通取得了较大发展。川黔、贵昆、湘黔三条铁路干线相继竣工通车，与已建成通车的黔桂铁路在贵阳形成“铁十字”交叉，贵阳一跃成为西南铁路运输的枢纽，提高了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期间，冶金工业部、铁道部、水利电力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等国家部委都十分关注贵阳，增加建设项目，加大建设力度，贵阳成为全省的工业中心。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的调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引进，增强了贵阳的科技实力。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经济比较困难，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大批从沿海、东北等“一线”地区来贵阳参加“三线建设”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成为贵阳新一代移民，扎根贵阳，为“三线建设”和贵阳发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和贵阳本地职

工融合在一起，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克服了不可想象、难以计数的困难，创造了贵阳工业从一穷二白到迅速崛起，成为西部地区工业重镇的历史伟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贵阳经济社会的发展成绩斐然。昔日贫弱落后的边远山城，旧貌换新颜，名副其实地步入了工业城市的行列。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贵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贵阳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贵阳市花溪区小碧公社率先在31个生产队推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普遍实现增产增收。至1987年，全市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1984年至1992年，贵阳市逐步转入以城市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率先在全国实现了“街道财政体制改革、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社会公共交通体制改革”，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创建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向内地滚动发展的新格局。1992年1月，国务院批准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月，贵阳市成立对外贸易西南商行，首先在云南边境的瑞丽和打洛建立贸易分行，第一次打开了从内陆向边贸发展的大门，迈出了敢“冒”敢“闯”的第一步。8月，中央批准贵阳市为内陆开放城市，贵阳市经济社会步入了划时代发展阶段。1996年，贵阳正式实施以市带县新体制，开阳、修文、息烽三县和清镇市并入贵阳市，拓展了筑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发挥了省会中心城市开放带动的功能。

跨入新世纪，贵阳市相继作出了“工业强市”“环境立市”“建设生态经济市”等战略决策和部署，加速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坚持“三轮驱动”，强力推进金阳新区建设，做大做强做美贵阳市，有效地加快了贵阳市城镇化进程。

贵阳市坐落于山间盆地，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每平方千米超过2.5

万人，发展空间受到区域空间的致命制约。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贵阳市的城市发展无从谈起，也将严重束缚贵阳的经济发展。因此，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贵阳西北郊建设新区，就成为人们的梦想。

2000 年 6 月 2 日，国务院批准贵阳市城市新的总体规划，金阳新区应运而生。金阳以金华农场和阳关得名，预示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拓展贵阳城市发展的新空间。2001 年 10 月 25 日金阳新区建设启动，2012 年 11 月 15 日，金阳新区改设为观山湖区。20 年时间在一片农村农场之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被称为“金阳速度”。观山湖区正逐步成为贵阳市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座生态型、园林式、数字化的现代都市新城日臻形成。创新模式与“金阳速度”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贵阳城市发展突飞猛进。

贵阳工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建成以食品、机械、化工、冶金、电力、建材为主的综合性工业体系。2000 年 2 月，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成为全国最大的铝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全国精密光学仪器三大生产基地之一，全国电工仪器仪表五大生产基地之一，全国航天、航空、电子三大国防科工基地之一。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完成了 4 条铁路干线电气化改造以后，贵阳南站枢纽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开通，1997 年，龙洞堡机场建成通航、1998 年开始建设株六复线，贵阳也逐步走向“内联外通”的开放道路。贵阳交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公路通车里程大幅增加，高速高等级公路从无到有，农村公路建设便民惠民，形成了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路相互衔接的四通八达立体交通网络。

20 世纪 80 年代前，贵阳是全国酸雨污染严重的城市之一。中共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抓手，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于 2001 年成功摘掉“酸雨城市”的帽子。2007 年在全国率先作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重大战略部署，探索了一条西部欠发达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贵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支持贵州发展的两个国发2号文件，贵阳实现了“黄金十年”的精彩蝶变。2012年至2023年，贵阳市经济总量由1634.16亿元增长至5278.04亿元，连续跨越四个千亿级台阶，增速连续10余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常住人口达到640.29万人，2022年以来，人口增幅居全国26个省会城市第一位。今天的贵阳已经由解放前一座不足十平方千米的小城发展成为建成区面积400余平方千米的现代化城市。“中国林城”“中国避暑之都”“爽爽贵阳”“中国数谷”正成为享誉中外的城市名片。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2012年12月《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规划（2012—2020年）》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成为首个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规划。2013年1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举办，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升格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成为中国最早创办，经国家批准的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峰会。通过十多年的辛苦耕耘，贵阳日益成为世界生态文明交流的重要地标，论坛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平台，《贵阳共识》成为全球携手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宣言，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这张贵阳城市名片越发亮丽动人。

2013年是世界“大数据元年”，几乎所有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都将业务触角延伸至大数据产业。贵州敢为人先，2014年被业界誉为“贵州大数据元年”。2015年2月，经工信部批准，贵阳、贵安新区共同创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标志着“中国数谷”正式落户贵阳。

贵阳主动抢占大数据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在制度保障、平台架构、安全体系、数据服务以及产业布局等方面先试先行。2016年以来，作为全国首个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贵阳市探索建设全国首个大数据安全靶场。2017年5月24日，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贵阳国家高新区揭牌。2023年成为贵阳贵安“智算元年”，大数据政务、民用、商用亮点纷呈，城运中心建成投运，形成贵商易、招商易、互联网医院等一批典型应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新进展，人工智能排产落地实施，数字赋能全面提速。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作为全球首个聚焦大数据的国家级盛会，历经九载春秋，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大数据辉煌成就、集结全球大数据资源的国际交流平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智慧和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阳市推进“多规融合”，老城区功能有效疏解，新区建设加速推进，城市格局由“单中心时代”进入“双核多组团时代”。贵阳贵安按下了融合发展的“快进键”，在融合发展中拉伸了城市骨架、拓展了发展空间。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城市“一圈两场三改”和农村“五治”作为贵阳贵安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也是贵阳贵安重要的民生工程、治理工程和作风工程。随着一件件民生项目的逐一落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功创建，贵阳孔学堂、阳明洞、阳明祠“三足鼎筑”精神大厦现雏形，贵阳正逐渐成长为一座有文化厚度、有人文温度的城市。日新月异的贵阳正在成为老百姓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高路入云端，天堑变通途。”贵阳立体交通体系日益完善，在中国西部交通枢纽重要地位愈加凸显。2014年，贵广高铁开通运行，标志着贵阳迈进“高铁时代”。沪昆高铁、渝贵铁路、成贵高铁、贵南高铁等建成通车，贵阳成为全国重要高铁枢纽；2018年，龙洞堡机场跻身全国大型繁忙机场行列。2021年，贵阳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建成投用，贵州进入双跑道机场时代，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跻身全国2000万级大型繁忙机场行列。轨道交通1号线实现了贵州轨道交通“零突破”。贵阳至开阳城际铁路建成运营，轨道交通1

号线、2号线、3号线全线开通运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现代航空彻底改变了贵州和贵阳交通的面貌。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贵阳与周边省市相连的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线路密集，能够快速便捷地连接整个西南地区，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2023年，贵阳上榜全国性交通枢纽。立体交通的格局正改变着位于西南的贵阳成为通江达海，连接海内的便捷而开放的现代化城市。一座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正在绚丽绽放。

贵阳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许多关键技术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从“两弹一星一艇”的成功研发，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再到C919大飞机成功试飞，以及重大节庆活动的阅兵式上展示的武器装备，无不凝聚着贵阳智慧。贵州詹阳重工研发的全地形车，成功亮相南极，其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行列。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跨越式推进，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丰富多彩的文化供给，提升了这座城市的“颜值”“气质”。贵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六爽”贵阳正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走向世界。

今天的贵阳已经发展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更是贵州省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先行区。乘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东风，贵阳正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强省会”为主抓手，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攻点，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主路径，做到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数字活市、人才兴市，努力把贵阳贵安建设成为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排头兵、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西南地区更具影响力的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新时代“强省会”新篇章。贵阳的明天必将更加壮丽辉煌，贵阳的发展必将更加波澜壮阔！

后 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宝贵的贵阳历史文化资源，2023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决定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程。

为保障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共贵阳市委成立丛书编纂工作协调机制，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办公室设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单位承担具体编纂工作；组建丛书学术委员会，对丛书编纂质量进行评审及学术指导；引入总审订团队，从整体性和规范性上进一步提升了丛书编纂质量。

编纂这套丛书，凝聚了各方智慧，汇聚了多方力量，得到了省内外多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滕伟华同志的悉心指导。省内相关行业的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撰稿，以融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与普及性于一体为目标，力争将丛书打造为促进贵阳历史文化繁荣发展、提升贵阳人民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文化读本，让贵阳这片土地更加厚重，让贵阳这座城市更加灵动，让贵阳市民更加自信，让外来游客更加向往，让贵阳未来更加美好。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承担首批1+10《丛书》首卷《贵阳史话》的编写任务。受命以来，《贵阳史话》编辑部精准谋划、倒排工期，不折不扣推进编纂工作。《贵阳史话》篇目历经4次重大调整，最终付梓出版。

在《贵阳史话》即将面世之际，我们对于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关心与指

导表达最真挚的谢意！对各位撰稿老师和参编人员的辛勤付出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对各位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表达最衷心的感谢！囿于时间和水平，本书如果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